三联生活周刊®
2016.8.15
2016年第33期
www.lifeweek.com.cn

时事：“萨德”入韩，意味什么？

海鲜诱惑

中国人重塑海洋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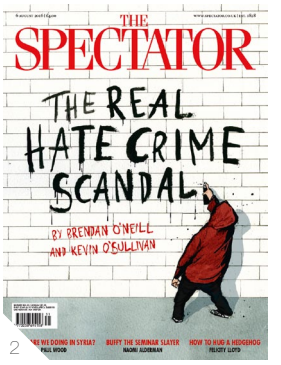
899
9 771005 360000 33>
生活周刊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15元

《经济学人》2016.8.6

为什么优步输给了滴滴？

本周优步在中国市场缴械投降，令全球科技行业震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不再是简单地模仿西方公司。不过，获胜的滴滴几乎垄断了中国叫车出行的整个市场，给中国互联网监管部门带来了新的大问题——如何在便利和垄断之间求得平衡。如果中国技术开拓者想要真正跻身全球前列，他们应该更热切地拥抱竞争。

1



2

3

4

1 《新科学家》2016.8.6

超级食物

在市场上的众多食物中，人们对来自异域的少见食物格外钟爱，将某些浆果赋予抗病的功效，可以突出地补充能量，这些食物被人们称为“超级食物”。英国最新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百姓相信“超级食物”的科学性，甚至愿意花高价购买。但事实上，这些食物中营销噱头的成分远高于它的实际价值。

2 《旁观者》2016.8.6

仇恨罪

英国警方表示，在脱欧公投后的这段日子里，英国在涉及种族歧视和宗教信仰方面的仇恨犯罪率大升。可官方公布的相关数据能如实反映实际情况吗？质疑者认为，警方对这种基于歧视与偏见行为的罪责界定模糊了动机与证据的重要性，仅以受害人的个人感受为决定因素的定罪会扩大打击面，一些行为是否该构成仇恨罪还有待商榷。

3 《纽约客》2016.8.8

民众的声音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我是你们的声音。”在费城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及其支持者们讲述了关爱的故事。互相攻击的两党都在强调美国人民的权力与权益，承诺一个美好的明天。可谁又能真正代表民众的声音？民粹主义是在推动进步还是会掣肘发展？进步主义者的口号是希望还是噱头？

4 《连线》2016.8

“吃”的科学指南

“吃”本是个简单事，但考虑到可持续发展、身体健康以及食物的美味度等多重因素，“吃”里面的学问可不小。《连线》杂志推出 2016 年“美食的科学指南”，推出六道一人食的单盘美味食谱，倡导夏日可少食牛肉、多食鸡肉，重视玉米、胡萝卜、豆类等仍保留多样野生植物特性的传统农作物，重新定义食物的价值。

P32 封面故事
中国人重塑海洋生态
海鲜诱惑

40 舟山渔场的兴衰
54 蓝色沙漠中的猎人
70 艰难的转型
76 渔业的未来
90 海洋的未来

P138 音乐：“蝎子”未老

社会

时事：“萨德”入韩：“特殊主义”重回东北亚 98

经济

市场分析：高铁永不歇 94

专访：钢铁，去产能与重组 106

商业：大众的新能源战略之局 110

商业：广汽的 SUV 破局之道 112

专题报道

“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116

《牡丹亭》：舞台演出史上的“变形计” 126

400 年后的四场梦 128

文化

艺术：谁拍摄了体育？ 130

电影：钟汉良：偶像四十 134

音乐：“蝎子”未老 138

设计：弗朗索瓦丝·吉洛：毕加索之后的生活 142

时尚：对于奥运，他们关心的不只是金牌 148

思想：你不可以不快乐 158

书评：如何做一名聪明的病人 160

书与人：谢默斯·希尼，在诺奖后…… 162

专栏

邢海洋：个人“加杠杆”的限度 18

袁越：为什么女性性高潮这么难？ 154

张斌:“生个孩子，我们一起去里约好吗？” 156

宋晓军：第四条“红线”才是“实线” 157

朱伟：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2） 164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66

环球要刊速览 2

读者来信 10

天下 12

理财与消费 20

好消息·坏消息 22

声音 23

生活圆桌 24

好东西 28

个人问题 168

2016年第33期，总第899期，2016年8月15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名誉主编 Honorary Editor-in-chief
朱伟 Zhu Wei

执行主编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王小峰 Wang Xiaofeng　谢九 Xie Jiu
袁越 Yuan Yue　陈晓 Chen Xiao　王星 Wang Xing
主笔 Editor
李三 Li San　鲁伊 Lu Yi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i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蒲实 Pu Shi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关海彤 Guan Haitong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曹玲 Cao Ling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程磊 Cheng Lei　石鸣 Shi Ming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记者 Reporter
邱杨 Qiu Yang　付晓英 Fu Xiaoying　孙若茜 Sun Ruoxi
杨聃 Yang Dan　张若凡 Zhang Ruofan　周翔 Zhou Xiang
刘敏 Liu Mi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赵潇 Zhao Xiao　苗千 Miao Qian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张雷 Zhang Lei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插图 Illustration Editor
张曦 Zhang Xi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雍江 Yong Ji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发行助理 Circulation Assistant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发行财务 Financial Executive
王霄 Wang Xiao
发行物流 Issue Logistics
王荻 Wang di
发行库管 Release Library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读者服务助理 Reader Service Assistant
金宇迪 Jin Yudi

市场发展中心 Marketing Development Center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傅东方 Fu Dongfang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velopment
总监 Director
钦征 Qin Zheng
内容编辑 Editor
薛芃 Xue Peng　刘彭媛 Liu Pengyuan　徐睿洽 Xu Ruihan　刘凌 Liu Ling
美术设计 Artistic Design
张莉 Zhang Li
技术支持 Technology Department
刘国强 Liu Guoqiang
手机产品 MB Product
辛军 Xin Jun
平板产品 Tablet Product
连子君 Lian Zijun
活动事业部 Event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傅东方 Fu Dongfang
副总监 Deputy Director
庄山 Zhuang Shan
运营 Operational Manager
罗启宏 Luo Qihong　邢宇 Xing Yu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殷佳婷 Yin Jiating
文案 Official Documents and Letters
孙名梓 Sun Mingzi
活动专员 Event Executive
周宇飞 zhou Yufei
视频事业部 Video Department
李倩 Li Qian　吴冰川 Wu Bingchuan　孙明楷 Sun Mingkai
节气刊事业部 Solar Term Department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王晶 Wang Jing
设计 Design
袁媛 Yuan Yuan

创新产品中心 Innovative Products Center
松果事业部 Songguo Department
总监 Director
魏一平 Wei Yiping
运营部 Operational Manager
阿润 A Run　赵雯珺 Zhao Wenjun　李骁楠 Li Xiaonan　赵夫宏 Zhao Fuhong
孙正之 Sun Zhengzhi　刘小荻 Liu Xiaodi
市场部 Marketing Department
孟佳 Meng Jia　赵卓 Zhao Zhuo　夏青 Xia Qing　尤帆 You Fan　奚牧凉 Xi Muliang
行政 Administration
叶秋菊 Ye Qiuju

三联生活周刊
www.lifeweek.com.cn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吴泓林 Wu Honglin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主任 Financial Controller
陈晓华 Chen Xiaohua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法律顾问 Legal Counsel
金桥律师事务所 马眉 Ma Mei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84681030 84681029（传真）
E-mail：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51
E-mail：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 0063 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 :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成　都	：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028）86667805
重　庆	：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3）86359776
南　京	：江苏凤凰台文化公司（025）83327129
杭　州	：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0571）88256120
广　州	：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020）87376490
武　汉	：武汉春秋书店（027）85493562
西　安	：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29）82100585
昆　明	：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71）64122816
沈　阳	：大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24）23934765
哈尔滨	：志诚远大书刊公司（0451）88341879
青　岛	：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0532）83840608
济　南	：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531）82903395
长　春	：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0431）82752206
大　连	：大连渤海书店（0411）84609410
南　昌	：沧海书店（0791）8592810
太　原	：山西森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0351）7065397
贵　阳	：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0851）5661974
兰　州	：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0931）8521090
郑　州	：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0371）67647337
天　津	：天津天智书店（022）23683854
河　北	：石家庄远大书店（0311）83993043
安　徽	：合肥皖新书店（0551）64252409
新　疆	：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0991）5582981
内蒙古	：呼和浩特融联书店（0471）6263358
深　圳	：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0755）22203426
长　沙	：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0731）82253036

拍摄二维码直接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 三联生活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sina 新浪网 新浪微博 weibo.com 凤凰网 ifeng.com 腾讯网 qq.com youku 优酷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 1 · 奥迪
3 · 中华瑰宝
7 · 奔驰
9 · 奔驰
19 · 头条传媒
53 · 周刊征订
69 · 大唐雷音寺
89 · 周刊 20 年
93 · 周刊松果广告
97 · 三联新知广告
114~115 · 野生救援
141 · 首汽租车软文
155 · 奥迪软文
167 · 书店广告
封三 · WWF
封底 · 力度形象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独家代理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9号
齐家园外交公寓7-5-13
邮编：100600
电话：+86 10 85325466
传真：+86 10 85324800
电邮：vtpower@vtpower.com.cn
网址：www.vtpower.com.cn
Vtpower VITALPOWER MEDIA
力度国际文化传媒集团

南海博弈

昔日中国遭欺辱之时，贫弱国人誓死不做亡国奴；今日主权争端纷起，民意就是“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南海仲裁”后，不断有国家上演逼迫中国就范的戏码，但总是事与愿违，中国越逼越强。令人瞩目，中国空军的南海巡航正在发生质的改变——近日，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飞赴南海黄岩岛等空域战斗巡航，并实施空中加油，还突出了复杂在磁环境下的作战体系运用。我们应对威胁的实战能力大大提升，同时善用一切和平手段还是首选。我很欣赏这一期的南海报道，看得出记者们眼界开阔，对此问题有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对争端的起因以及背后各方利益的分析颇有高度。我认同贵刊的观点：解决南海争端，是中国成为真正世界大国之路上的一次大考。

海口 张立佐

乡村的蝉鸣

前不久到表弟家做客，傍晚无事表弟便带我到梨园里散步，表弟所在的村子盛产酥梨，几乎家家都有一片梨园。来到梨园没多久，我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棵梨树的齐腰部位，都缠着一圈胶带。我问表弟这是何故？表弟说其实不只是梨树，村子里房前屋后很多树都缠上了胶带，而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方便捉知了猴。

知了猴是蝉的幼虫，在夏天的夜晚，特别是雨后，它们便会从地下钻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经过一夜的金蝉脱壳，蜕变为蝉振翅高歌。伴随着蝉声萦耳，捉知了猴也几乎是每个乡村少年都会经历的快乐往事。可在我的印象中，捉知了猴的场景应该是三五少年，打着手电，在月光下来回寻觅罢了，捉到了固然开心，捉不到也在玩耍中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怎么还要在树上缠胶带呢？听了我的疑问，表弟说过去的老方法怎么能赶上现在的新形势呢，过去捉知了猴只是小孩子晚饭后的消遣而已，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知了猴因富含高蛋白，现在变成了城里颇受欢迎的餐桌美味，于是村里有人干起了专门收购知了猴的生意，然后卖到城里饭店做食材，每只收购价0.5元左右，如果捉得多了，算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现在一到晚上，村里男女老少都会出动，在树上缠上胶带，因胶带表面很滑，知了猴爬到这里，便没办法继续往上爬了，自然方便捕捉。

记得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偶尔也会把捉来的知了猴扔到火里烤着吃，可那只是小孩子的恶作剧罢了。那时候乡村经济落后，物资相对匮乏，很多人只有到年底才能吃上肉，可也没见谁家把知了猴端上餐桌，倒是有些小伙伴在大人的指导下，会利用暑假空闲时间收集蝉蜕，然后卖给中药材铺换些零用钱。相比过去，现在生活明显好了，很多人都是营养过剩，怎么反而还需要通过知了猴来补充营养？而且两相一比较，小时候虽然经济差些，但人们对知了猴的利用主要是把蝉蜕作为药材，比现在更符合生态平衡？但表弟却说，正所谓“舌尖上的中国”，现在人们吃东西比过去讲究，要有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树上爬的，知了猴是树上爬的典型代表，自然难逃厄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知了猴的厄运反而成就了村民，不管怎么说，通过捉知了猴换钱岂不比只听蝉鸣强许多？表弟的话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我担忧，知了猴再多，能架得住这样的捉法？也许过不了多久，乡村就难觅蝉声了，那时候的乡村还是我们熟悉的乡村吗？

不过表弟对我的疑惑却不以为然。表弟说，这两年县里、乡里承接产业转移兴建了好几个化肥厂，闻着刺鼻难闻的气味，看着污浊的废水，很多村民不理解：对于化肥厂这种落后产能，县里为何还要扶持？可县里反而打出要打造肥料之都的口号，这让很多村民都对自己以及下一代的生存环境既充满忧虑又无可奈何。表弟说，也许过不了几年，就算没人吃，知了猴也会绝迹，既然如此，还不如现在捉了卖钱呢。

郑州 关晓海

老杨的晚年

但凡清明上坟，我都随父亲顺道去看看老杨。当年被要求下乡插队，住县城的父亲偷懒耍滑，托病不去，反倒就近安排在20公里外的杨家坳，即老杨家附近。老杨朴实敦厚，见了年少的父亲，很是照顾，帮着干农活，偶尔家

里炖点腊肉，或是水田捞出泥鳅鳝鱼，也不忘叫父亲打个牙祭。父亲说，杨家坳当年是好地方，依山临沟，人少山大，竹笋香菇、红薯包谷啥都产，在那个贫困年代，怕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不敢去换钱，却能混个肚儿圆。后来修了高速路，坳旁的县道基本被弃用，年青人外出打工，妇女或老人去县城陪读，交通末梢的杨家坳渐渐被遗忘。我打小喜欢去老杨家，屋在山边，植被茂密，常见山花遍野，泉水被老杨直接引到厨房，苕窖也好大，夏天特别凉爽。

前些年，沟边还有家生产祭祀用火纸的小厂，老杨和老伴长年在厂里帮忙，那里管中饭，干一天有数十元酬劳。那时老杨的女儿已远嫁他乡，又离乡打工，一年难得回来一次，儿子在外地当保安，因房子等原因，30 岁过了也没成家，但要他回来是不肯的，也更难找到老婆。老杨夫妇愁得团团转，在火纸厂干得更卖力了，想为儿子的买房出把力。

3 年前，老杨的老伴吐血送到县医院，发现已是肺癌晚期，估计和火纸厂的恶劣气味有关，当时火纸厂因为环保问题已被关停，得到了一笔补偿，当然这和老杨夫妇无关。半个月花了不少钱，老伴闹着回了家，每天喝点中药，药引子是老杨打听来的偏方：山里的大蝎子熬汤。后来痛得受不了，才知道可以吃些止痛片。老伴很快还是走了。坐夜那天我在老家，就和父亲去了，见了老杨，我无言，他竟笑笑，说:都是命。葬事较冷清，附近的乡邻本就不多了，竟凑不出 8 个抬棺材的中青年人，花钱请来的班子。

近 70 岁的老杨开始养羊，他的自留山很大，头一批十几只山羊养得挺顺利，赚了点钱。第二批规模扩大到数十只，老杨就明显照顾不过来，病死、丢失不少，一算账难以保本，加上喂的还有猪和鸡，不堪重负的老杨就把羊的规模降回到十几只。到了晚上，不太听得懂普通话的老杨不看电视，周围过于寂寥，山风呼啸，长夜漫漫。

每次去，我和父亲会给他捎几斤猪肉，或是几十个包子油条，甚至有些调味品，或许都是老杨最需要的，那里太不方便了。如今每看见老杨，我就想到《舌尖上的中国 2》里湖北房县的独居老人。白天，他采摘被称为山中珍品的小花菇，卖钱或捎给远方的子女，似乎逍遥自在；晚上，他只能在昏暗灯光下孤零零地坐着，回忆往事……做任何事都无人陪伴，现在没有，以后更没有，他们的青春奉献给了农村，子女奉献给了城市，然后开始形影相吊，或许暂时衣食无忧，却在日渐苍老中，伶仃孤苦……

湖北宜昌 聂武钢

无处安放的诗意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多么让人迷醉的一句话！这一年里来，我也干了几件颇有诗意的事，想尝尝诗意栖居之美。但干了后，内心却充满沮丧，感到大地处处拒绝我的诗意。

第一件事是我想到近郊的一个空村住几天。听朋友说，那个空村生活设施很完善，有水有电有网络，村子在山上，去时要走 20 分钟的山路，村民们嫌交通不便，于是在山下盖了新房。村子里只有几对老人住在山上，几十幢房子都是空着的。我去了，因了朋友的介绍，村口一位退休的中学老教师热情地招待了我。他的家真是让我赞不绝口，羡慕不已——前有溪水，后有竹林，屋前的空地上有大树，还有一棵盛开的栀子花树，他们家有好几间空屋，欢迎我去住。我想我只要带几本书和一台笔记本电脑来就行，这儿所谓的交通不便对我不是问题。酒足饭饱后，我又到屋后转了转，顺着竹林里的一条小道走到头，我一下子呆住了，因为一面山坡上全是垃圾。那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积聚的垃圾，而是得很长时间才会有这样的规模，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伤口，镶嵌在这青山绿水中。我当时就打消了到这里小住的念头。

再就是我听说邻县有块湿地，年年有天鹅、大雁之类的候鸟来，于是在秋天我去了。我没搞准日期，去时鸟已飞走。水面并不大，大部分地方都已干涸，长满了青草，像一片草原。老远望着，挺赏心悦目的，可一走进去，就不是味了，因为草丛中到处有破鞋、农药瓶、酒瓶、蛇皮袋、方便盒、塑料袋、易拉罐之类的东西。我兴致全无，匆匆离开。

我家搬到长江边住后，长江南岸让我神往不已。江南那边不是城市，是乡村，隔江而望，树木葱葱，芳草萋萋，油菜花儿黄黄，很是美丽。我过江也很方便，轮渡就在楼下的马路对面，坐船过去也就 10 分钟左右，于是我就去了。这一去又是大失所望，因为那江滩几乎无法让人待得下去，不仅有湿地上的那些垃圾，还有许多建筑垃圾；更因为堤坝下就是村庄，村民们用粗大的管子将污水直接排向江滩；另外还有一个养鸭场，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有些垃圾自然可以理解，公共设施也不能管得了所有的地方，但人一到荒野乡村，就觉得这地方没人管，就可以随意抛掷垃圾甚至把它当作垃圾的堆放地，我觉得这就有问题。物质文明发达了，精神素养跟不上，管理也跟不上，那人就没有什么幸福感可言；人不是天天关在家里洁身自好就可以满足的动物，毕竟心灵也要舒展，也有与天地万物交流的欲求，但如果处处肮脏，那么这一切均无从谈起了。

安徽安庆 余毛毛

本期截稿时间：8 月 8 日 19 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南非 | 选举

8月3日，在南非德班Umlazi地区的一处投票站，人们排队参加南非地方政府选举投票。南非自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的第5次地方政府选举于本月3日举行投票。南非地方政府选举每5年举行一次，将选出200多个城市和行政区的政府官员。

美国 | **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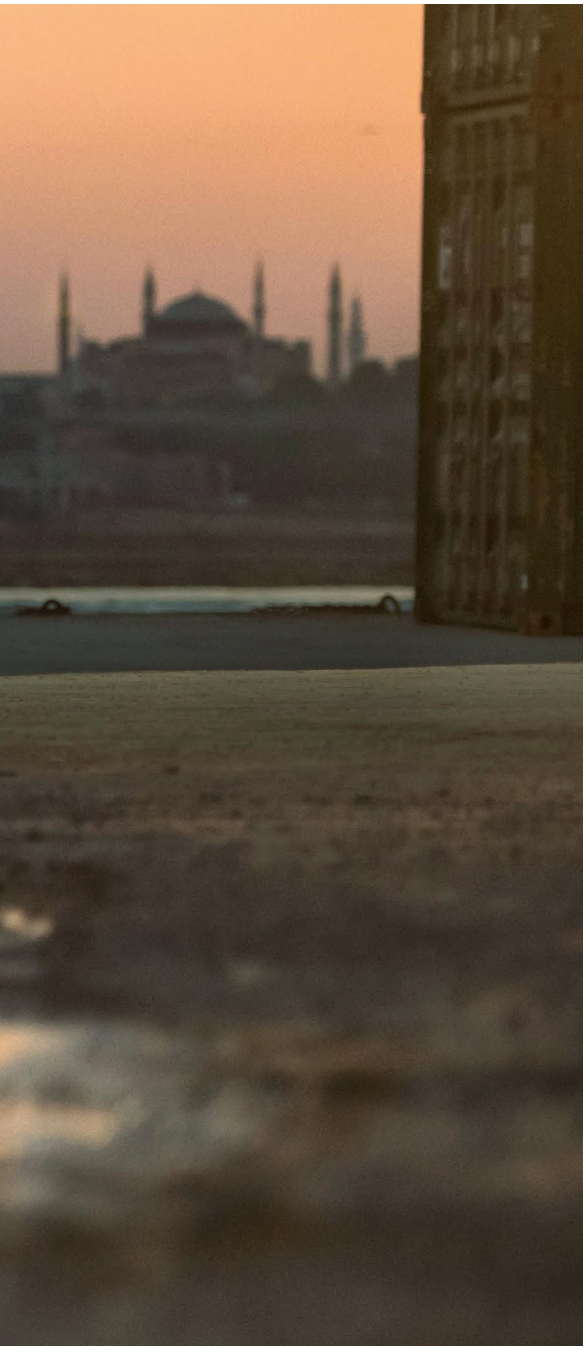
（左图）美国男演员本·费德曼和女演员亚美莉卡·费雷拉在加州比弗利山希尔顿酒店接受盖帝图像有限公司的肖像拍摄。

菲律宾 | **监狱爆满**

（右页上图）8月5日，由于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实行铁腕禁毒政策，菲律宾警方近期逮捕的毒贩数量大大增加，导致许多犯人无处安置，只能塞入本就人满为患的监狱。奎松市监狱建于60多年前，设计容量是800人，现在已经关押3800名囚犯。这些男人只能轮流睡在露天篮球场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台阶上，以及床下面和旧毯子做的吊床上。

印度尼西亚 | **手工编织**

（右页下图）印度尼西亚的民间工艺编织迄今还是采用手拉脚踏式的原始机械，这种方式更能发挥手工艺匠人的技艺和保持传统的朴质风格。图为日惹的一名妇女使用原始机械进行手工编织。



土耳其 | **跑酷**

（左图）专业跑酷选手季米特里斯·克桑尼蒂斯（Dimitris Kyrsanidis）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海达帕萨港口玩起了惊险的自由飞跃。他和另一名选手贾森·保罗（Jason Paul）共同设计了作品“梦境”，并在“梦境”上进行跑酷表演。“梦境”由几十个集装箱堆叠组合而成，最高达到了 50 米。

英国 | **全球最高“移动观景塔”**

（下图）8 月 2 日，媒体预览日期间，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站在 i360 观光塔上俯瞰。英国航空 i360 观光塔坐落于布莱顿海滩，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上最瘦高的建筑”。i360 地面部分总高 160.469 米，而直径只有 3.9 米。纵横比为 41.15 ∶ 1。该观光塔于 8 月 4 日向公众全面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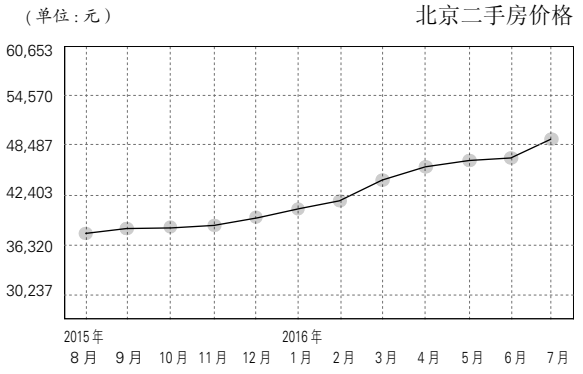
个人“加杠杆”的限度

文 邢海洋

房价仍上涨，涨到了高层频繁警示的程度。围绕着房价的争论也进入了新一轮高潮，“永涨不跌”论和“泡沫”论针锋相对。当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与全球最贵的大都市并肩，也只有当年日本的泡沫可借鉴，但当年东京最贵的房为百万美元每平方米，太过奇葩似乎又失去了借鉴意义。于是乎，央行最新出台的抵押贷款统计，成为探讨房价方向的一个着力点。

央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增加 2.3 万亿元，同比多增 1.2 万亿元。截至 6 月末，全国主要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 2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24.0%，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 15.4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2%。值得注意的是，和首付贷、众筹等“创新”迭出的一季度比，规范后的二季度购房仍呈井喷态势，个人贷款增速又比 3 月末高 5.7 个百分点。房价日涨，抵押贷款成为购房支付的主要方式，衡量一个国家房地产金融化程度的最重要指标是房贷 /GDP 比值，2012 年以前尚不到 15%，2015 年底达到 20.7%，以目前的态势，2016 年底将超过 25%。

今年初，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降低首付是否给房地产放水”时表示，很多国家的个人住房贷款占总贷款比例的 40% 至 50%，而中国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且，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产生的坏账比例仍旧明显小于其他领域，银行有意愿发展。中国企业债务冠绝全球，债务违约频繁引爆，僵尸企业更绑架了金融体系。



相对于企业贷，个人贷款业务前景不容置疑。海外，当前日本个人房贷 /GDP 之比为 40%，美国为 50%，即使今年中国达到 25%，仍有增长空间。不过问题在于，中国在住房贷款上的“超日赶美”是跳跃式发展，而以美日经验，每当房贷高速发展，跃上一个台阶，往往就为危机埋下隐患，如世纪初美国新经济泡沫破裂后急于借传统产业提振增长，利率急降，房贷 /GDP 比值从 40% 急速扩张至 2007 年的 73%，随后爆发了次贷危机，日本则是自 1985 年的 20% 蹿升至 1990 年的 25%。

居民加杠杆，于个体而言每次抵押贷款都是一次重大的家庭决策，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也必定重大。可作为群体，资产的金融化却应该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过于激进恐怕后续乏力。当一线城市刚需购房门槛从 200 万元涨到 300 万元，改善型从 500 万元提升到 800 万元，与此同时收入并没有同幅度地提升，居民购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抵押贷款。当以最低比例的首付、最长的还款周期，每月还款均需数万元的时候，居民的还款能力就成为房价是否继续上升的基础。我国 2015 年新增房贷销售比为 35%，2016 年上半年更是创历史新高至 42%，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高涨的房价，居民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贷款的现实。当然，按最新的房地产刺激政策，最低首付可以低至二成，新增房贷 / 销售的极限值可达到 80%，可即使在“零首付”泛滥的美国次级贷危机爆发的前夜，这一比例最高为 52.6%。

早在 10 年前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就看似不可持续了，可并不影响房价上涨，房价收入比也成了老生常谈。可贷款房款比毕竟比房价收入比又进了一步。尤其大城市普遍限购，购买者多是本地居民，多是卖小房买大房的换购者，偿还贷款的能力就更能预测房价的未来。目前中国居民房贷收入比为 0.46，节衣缩食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当然，若居民收入能够像此前几年那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则另当别论。

企业杠杆不可持续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向了居民加杠杆。美国和日本的经验也表明，购房适龄人口的拐点出现后，居民加杠杆会将房价推向新高度。可居民的杠杆也是有限度的，需要“且行且珍惜”。

头条传媒
HEADLINE MEDIA
娱乐营销 内容智库

“在未来，每个人都有
十五分钟的成名机会”

—安迪·沃霍尔

我们制造明星
We Make Stars

栏目插图 | **范薇**

滴滴优步的垄断之争

8 月 1 日，滴滴出行正式宣布与优步全球达成战略协议，中国最大的两个网约车平台 350 亿美元的合并引发公众对行业垄断的忧虑。滴滴方面表示，滴滴和优步中国均未实现盈利，且优步中国在上一个会计年度营业额没有达到相关规定，故不符合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条件。也有支持者认为，只要市场整体没有准入限制，保持开放的竞争环境，就会不断涌现出新的竞争。可大数据时代，平台的依赖性只会比传统行业更强，百度“武警二院事件”殷鉴不远。

新股定价“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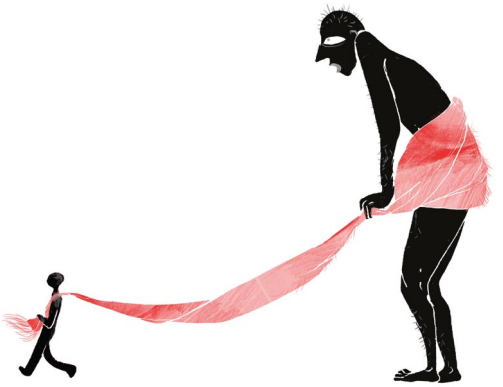
7 月份，发审委共审核 27 家公司的 IPO 申请，26 家通过。IPO 发行提速，年初以来每日只有一家申购的惯例被打破，出现了单日多股发行。随着新股增多，定价也有分化，有的低价难售，但也有的“高价待沽”。正平股份、江阴银行和江苏银行相继发布公告，因为发行价过高、市盈率高于行业水平延迟了发行日期。而三祥新材、中潜股份和健帆生物都低于中证指数相关行业市盈率。另外，并非所有的银行股都“好卖”，贵阳银行就“贱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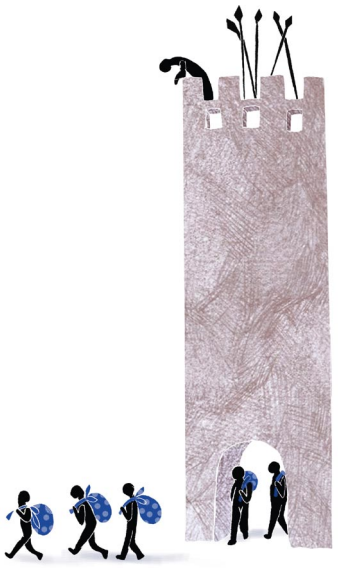
发改委急删“降准降息”

8 月 3 日，一天之内发改委关于“降准降息”的措辞发生了惊人变化。上午文章中提到“择机进一步实施降息、降准政策”，下午的文章则将这一句话删除。发改委有权“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但货币政策最终是由央行决定，发改委只有建议权。央行最近一次降息是在 2015 年 10 月，此后发改委曾两次建议降息，均无果。以目前资本外流、资产价格泡沫频发的形势，政府和央行应不会考虑货币刺激。

自住房，“遮羞布”

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7月份百城住宅价格指数，北京以3.8307万元的样本均价排名全国第21位。可全面豪宅化的北京楼市，3.8万元的价格只在远郊区县存在。北京自住房房价低于周边30%，稳定了北京房价。可随着建设指标的逐年减少，入市项目迟迟不见动作，自住型商品房或许很快将退出楼市舞台。2013～2014年是自住房土地供应高峰期，分别达到了187.4万平方米、295.4万平方米，2015年为52.8万平方米，而到了2016年只有6.65万平方米。





监管者离职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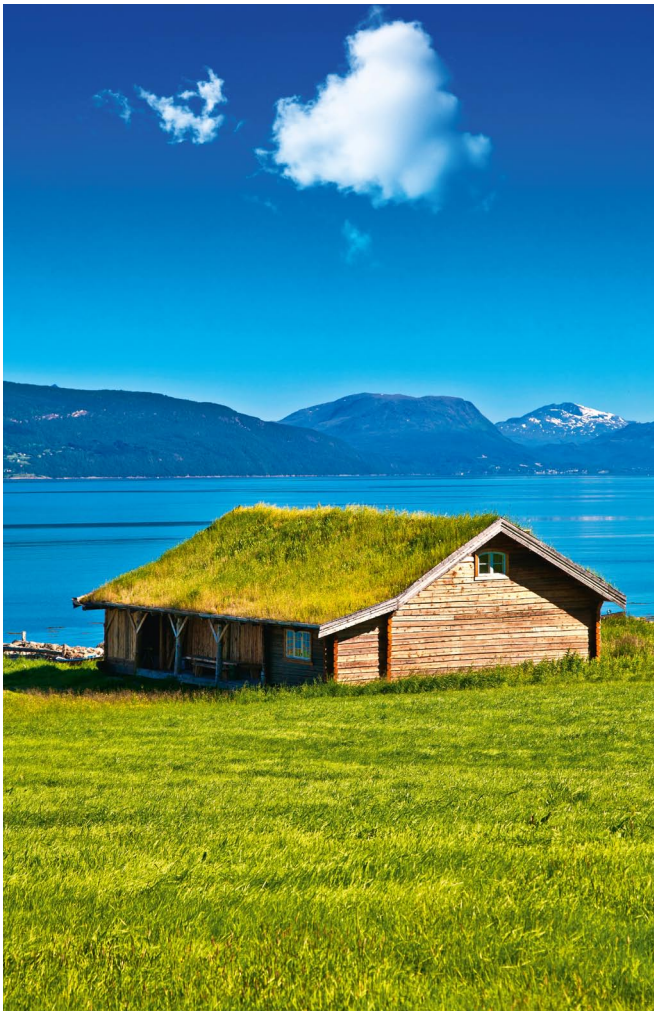
8月初，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离职，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过去半年时间，已有近30位银行高管离职，涉及2位董事长、4位行长、多位副行长以及执行董事。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5人都是证监会的老人。证监会发行部是离职最多的部门，知情人士透露，发行部2014年在任的9位处长只剩1位在岗，“快没法干活了”。

印度大一统

8月3日，印度国会上院以203：0，全票通过了创立全国统一消费税提案，全国性消费税将取代各地现存的十几种不同相关税种。该提案在提出十几年后终获通过，堪称穆迪2014年上任以来改革的标志性突破，长久以来因地方“经济割据”而经济发展备受阻挠的印度，将最终形成一个拥有12.4亿人口的统一消费市场。此次税制统一，大大提升了外界对印度继续改革的信心，印度股市在“改革牛”的预期中，创下了自2015年8月来的新高。

制造业和民间投资

统计局数据显示，1～6月民间资产增速2.8%，创下近15年来新低，而民间投资增速与全国固定投资增速的缺口进一步扩大6.2%，民间投资和国有控股投资显著分化。民间投资占比较高的制造业、采矿业和房地产业的收入和利润恶化，冷却了投资热情，在去产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前民间投资或难有提振。不过，并非所有行业的民间投资都很乏力，公用事业和医疗卫生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劲增长。只是这些部门较高的准入门槛和国有垄断，限制了民企的参与。



清凉绿屋顶

不想被城市的酷暑折磨，但又觉得大开空调无异饮鸩止渴，墨西哥恰帕斯自治大学的研究小组最新研发出的绿色屋顶系统给出了一个对环境更友好、更具有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使用回收 PET 塑料制成的新型屋顶基材可以有效地包裹住植物根茎，防止其穿破屋顶防水层，而在其上种植的绿植则能吸收太阳辐射，最多可令室内温度降低 17 摄氏度。此外，与水泥屋顶相比，绿色屋顶还有助于降低城市热岛效应和预防突降暴雨时的城区积水问题。在适当的维护下，该绿色屋顶系统的寿命至少可达 14 年。

好消息

开放与开怀

英国布鲁内尔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小组在线调查了 800 余名不同国籍族裔者后发现，那些生活在本乡本土、但对外来移民和多元文化持较为开放态度的被调查者，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对自身更加自信，更能融入周围社会，日常压力水平也显著低于有排外情绪的对照组。

点餐需趁早

经常要靠叫外卖解决午餐问题但又担心热量摄入超标，早点下单就是了。发表于《市场营销研究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在调查了 690 名公司白领和 195 名大学生后发现，至少提前一个小时订餐的人所选择的食物总体热量要比临到饭点时才下单的人所选择的食物低得多。

坏消息

岁月的伤痕

对于女性而言，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最重要因素。发表于最新一期《生殖》杂志上的研究结果指出，伴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在卵巢中的“疤痕”——纤维化组织——和炎症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会妨碍卵巢生成健康的卵子，从而令成功受孕的概率显著降低。

低收入高血压

以美国杜兰大学为首的研究小组对 131 项与高血压相关的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后指出，有史以来第一次，中低收入国家成年人的高血压发病率超过了高收入国家的成年国民。从 2000 到 2010 年，中低收入国家的高血压发病率增加了 7.7%，而高收入国家的高血压发病率却降低了 2.6%。

运动员是天赋异禀、灵魂疾驰的年轻人。他们在一分一毫中衡量出希望，衡量出在停滞不前的现实面前人类所实现的超越。他们拉开帷幕，让我们一瞥人类所能。

——《时代》周刊说，奥运会能给我们带来美好、戏剧、兴奋和欢乐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没有直播开幕式。现场直播是体育之美的一部分。全国广播公司决定为了广告费而延时播出玷污了这种美，尤其是对那些同时看推特的人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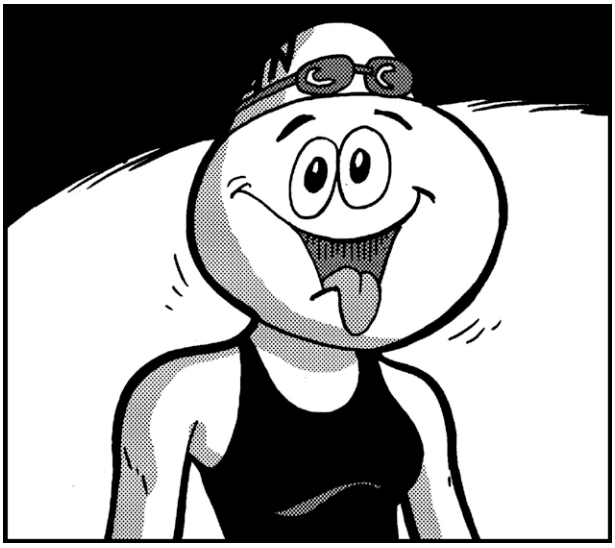
——《芝加哥论坛报》评选的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输家之一。另一个输家是澳大利亚，“服装惨不忍睹。可能是航空公司丢了服装”。

“她掀开沙发垫子看见这个……令人发指！”“临睡前把大蒜放进鞋子里，结果令人难以置信！”或者：“狗对着邮递员狂吠，他的反应是无价的。”“当你看过这些图片，就再也无法直视芭比娃娃了！”

——8 月 4 日，“脸书”发布博文宣布，他们将调整算法以减少消息流中骗点击的“标题党”文章。“脸书”还给出了几个典型的“标题党”例证。只要蓄意隐藏重要信息或夸大内容误导受众就会被判定为“标题党”

你想要安宁吗？去跟人们交往，但要独自生活，什么也别去参与，什么也别去怜惜。你想要幸福吗？先得学会受苦。

——屠格涅夫，《生活规条》



（插图 山羊胡）

做一个好人意味着对世界保持一种敞开，这是一种信任的能力，信任不在自己控制之内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会将你击得粉碎。

——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

数字

225
亿美元

6 月 30 日，亚马逊日本公司推出了中文购物页面，为消费者提供数百万种商品。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预计到 2019 年，中国对日本的电商需求有望增加到 225 亿美元。

33
项

国际奥委会 8 月 3 日决定，2020 年东京奥运会将增设 5 个项目：攀岩、空手道、滑板、冲浪和棒垒球。这样一来，东京奥运会上将有 33 个比赛项目，而非本届的 28 项，但参赛总人数仍不能超过 1.05 万人，金牌总数不超过 310 块。

1
%

《华尔街日报》说，普通人的心脏占体重的 0.5%，完美的自行车运动员的心脏应该是这一大小的两倍。

春天里

文 尖脚猫
图 谢驭飞

那时候我们都没钱，可是却总有聚会，村子里的几个小饭馆都叫我们吃遍了，现在有时候回想起来，那些饭馆里的小老板大约看到我们就害怕吧，因为我们一来就是一大群，可是菜点得却不多，不多的菜里不是素菜就是凉菜，酒却总是要很多，最便宜的啤酒或者二锅头。我们坐在那里不说话也显得很喧嚣，总是有人走来走去，抽烟、咳嗽、吐痰、擤鼻涕。后来，这些人里很是出了一些当代的艺术家、画家、诗人、歌手，他们现在当然不再去小饭馆吃饭，聚会都在私人会所或者工作室里，喝陈年的芝华士，抽粗壮的雪茄。当然也有不少没混出来的，都悄无踪迹了，或者回老家扛锄头了，或者去小区当保安了，谁知道呢。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谁的将来，成天在一起的话题就是某某卖了一张大画，发达了；或者某某傍上了某个富婆。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就是出名得利，身边左拥右抱几个年轻美女。理想我们一般不谈，尤其在饭桌上说这些会让人耻笑，我们像发了疯的野狗一样叫骂那些已经出了名的艺术家，活着的和已经死去的。让我们顶礼膜拜的都是毕加索那样富死的艺术家。然后我们相互骂，骂自己，因为长眼睛的都看得到，我们比任何人都疯。我们是一群脱离了轨道的人，在没有轨道的野地里还发疯似的乱跑。

春天里我们真的四处乱跑，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一群男男女女向山上跑，谁身上都有使不完的劲，谁都有一腔终日挥不散的阴霾要丢掉。有时候我们唱歌，最给情绪的还是崔健的《花房姑娘》和《一块红布》，唱到“我感觉我要喝点水，可你的嘴将我的嘴堵住”时，身边有女人的都去逮那女人的嘴，女人们惊叫着四散，也有忠诚地等着被男人亲的，到处是荷尔蒙和多巴胺的味道。那时候我们都长一个样。

有一次来了一个某学院的导演，带着一部大大的专业录音机，要录我们这些人说的话。我记得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那女人一直低头看小化妆镜里的自己。当然还来过各色的商人和外国人，他们参观我们居住的房屋——就是我们称之为画室或工作室的地方，有时候他们拿一条香烟就能换走一幅他们喜欢的作品。更经常来的是催缴房租、水电费、电话费等各种费用的房东，他们通常面目可憎，从来也没有一个美貌善良的房东女儿。

后来我们就四散了。四散之后土壤肥沃了许多，我想一定是之前过于局促的缘故，所以分开反而能生长得繁茂。虽然我很努了几年的力，也还是没有长出地皮儿，但是看到有长成大树的朋友还是很欣慰，要知道曾经我们一起在地里被人浇大粪啊。最幸福的是那时候有一个斜眼诗人，总在饭桌上念他的诗，他说如果有人还没有读过他的诗，就应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在阳光万丈的祖国，向他认错。那时候我们红着脸坐在凳子上，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一次又一次。

包子和包法利夫人

文 肖遥
图 谢驭飞

H姐约我聊天的地方，窗户宽大优雅，窗外密密匝匝的紫藤花是文青们最喜欢的情调。亚麻长裙、银镯子是她和她心意相通的朋友们一见如故的通关密码。在我们聊天的间隙，老板娘过来跟她打招呼，她们热烈地讨论威士忌是怎样成为调酒中的基础款的，聊瑜伽、有氧健身和马甲线，聊得开心，老板娘说一会儿按照会员价给我们打折，说完就出去了。买单的时候，店员说不知道有会员折扣这回事，要不等老板娘回来？H姐说："算了。"

H姐不会吐槽老板娘的不够意思，这些属于诗和远方之类的审美范畴，不能太计较不是？要吐槽的，是眼下的苟且生活。比如单位，最近单位里出了个歪点子专门整治包括她在内的这些爱请假的人。H姐最近又想"出去走走"，去找上司请假半个月，上司讽刺她："人家那谁谁开宝马的，家里不缺钱，请这么长时间病假还能理解，咱一般家庭就算了吧！请这么长时间假，不心疼吗？"这句话可是戳到H姐心底痛处了，她一下子炸毛了："她家那么有钱，为啥要请便宜的病假？有钱开宝马，没钱请假？我给你说，我老公拿的也是年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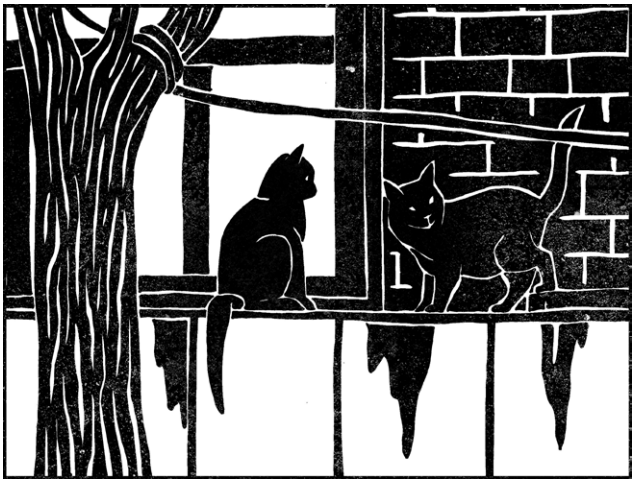
接下来H姐该吐槽老公了，H姐就不明白了，她老公咋就一点也没有审美情趣呢？他对她平时喜欢穿的布鞋和亚麻长裙，也会严厉抨击，说她穿奇装异服，说你能不能打扮得正常点儿？切！他眼里的正常吗？有腰身的套装、纹丝不乱的发型、庸俗的镶钻饰品、明光锃亮的漆皮包高跟鞋，让她打扮成那样儿出门还不如去裸奔。她约朋友看看画展，喝喝咖啡，他都气得要死，说她成天不务正业，他所谓的正业就是在家做饭洗衣拖地刷马桶。她也不是没有在缓和夫妻关系上努力，她带他跟朋友们吃饭聊天，结果他回来更火，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一群牛鬼蛇神妖魔鬼怪！

他想表达又表达不清楚的应该是，按照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的说法："一个男子刻苦耐劳，尽力工作，为的是使得他的妻子可以在适当的方式下，为他执行当时一般要求的那种程度上的代理有闲。"H姐没弄清楚的是，她的"有闲"和"消费"不过是"代理"的。她的穿戴应当给他增光添彩，她请客、送礼、社交交换来的，应当首先是他的面子。他指点她说，不是不可以交朋友，要交就交些"有用的"，比如跟孩子的班主任吃吃饭哪，请她的上司爬爬山啊，说到上司，平时跟上司搞好关系，也不至于请个假都这么难！最后还害得他花钱买礼物摆平……

然而，对H姐来说，有太多比买房啊股票啊更重要的事去追求，比如旅行发呆、吟诗作对、谈情说爱，即便这些都做不成，喝喝茶做做梦也是极好的。于是问题来了，如果她不惦记他的年薪，愤然追求诗和远方去了，就成了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包法利夫人；如果她依靠他的年薪，她就得做个忍气吞声的包子。

钓猫师

文 令吉
图 谢驭飞



它走在屋顶时，黑而如炬的脊背上反射出隐匿、但却尖锐的光，像一条游动的小蛇，在被遗弃的旧鞋子和砖砾间穿梭。

带着满心的惊喜，我豁然拉开窗纱，它只是用难以辨认的眼神轻蔑地瞥过来而已，脚步丝毫没有停顿地离去了。这道由一长排自行车库组成的屋顶许是它午后的T台，模特不会因为下面的观众吹口哨就结束演出。后来我回忆这个情景时不禁扪心自问："到底哪个是猫？"

自从知道屋顶有猫，我就开始研究怎样引猫入室。淘来一箱猫粮的我满脑子都是与它你侬我侬的图景，猫还没来，梦已做得不分真伪。我家的阳台窗户位于自行车库屋顶斜上方，这个绝妙的位置让我有一种猫一跳就可以拥入我怀的错觉。前一周堆在阳台窗外的猫粮风干或雨湿，均遁入了黄土。侦查思考后，我改变策略，用一根七八米长的塑料绳捆在一只小铁桶上，以晾衣杆做支架，用出神入化的手法，钓鱼似的将盛有猫粮的铁桶荡到屋顶上。铁桶朝出夕归，三日之后，终于提回来一碗空气。

野猫警惕性强，母猫尤为如此，有崽的母猫甚为如此，只是此前我不知道。曾经有场景令我惊喜万分——窗户下，屋顶的这一角上，一只油黑的大猫带着四只不同花色的小猫，正仰着面孔对着窗口，目不转睛地与我对视。我好想叫出来，却只敢低低地欢呼，即使如此还是把一只最小的猫吓得踉踉跄跄回奔了几步。于是，在其他人勤奋铲屎之际，我已自我感觉良好地荣升钓猫师——我还幻想着造个篮筐，把爬入吃食的小猫吊上来。

钓猫梦做得日复一日，猫还不见上来一只。不过每天早晨上班前，匆匆中缓下脚步，咪咪几声，迎来那些天使般期待的眼眸，荡下去一桶猫粮，当真还有点坐月垂云的感觉。荡桶的技法愈加娴熟：左手持杆、前推后拉，右手牵绳、时放时收，不仅可以精确落点，听那悦耳的当的一声，还能在空中画出个半弧，避开飞来的猫爪，如同猫鼠游戏。晚上归来，即开窗收线，像开锅煮菜那般自然。周末，在阳台上沏壶茶，捧本小书，且读且顿，听到动静就探头看看。

一夜，小猫许是饿了，对着窗一直叫。我跑下楼来，对着一人多高的屋顶上那双亮晶晶的眼睛晃动铁桶里的猫粮，口中咪咪作响。小猫盯着我，犹豫，向下张望去，回首，再张望。但忽然驶来的电动车打破了平静，大黑猫如游龙似的出现，裹挟着小猫眨眼间消失在暗夜的帷幕中。翌日，因为街道修缮房屋外立面，一日之间手脚架搭到了我的窗前，我的面前是行走的人腿，我的猫也不复出现。

钓猫师失业的那段时间，我微感彷徨，直至工人撤走后，偶遇了两只已然长大的小猫。我认得它俩，自小成双。它们在不远处伏着，警惕地看过来。我还未靠近，它们便或厌弃或嫌恶或惊恐地一闪，双双在我的面前射入一道围墙的缺口。我愣在那里，心中却终于释然地放下了这场钓猫梦，任这往昔里魂牵梦绕的生灵离我而去。

守戒

文 林燕珊
图 谢驭飞

听说陆大仙还是小陆时，饱受职业挫败和失恋被甩的折磨。心灰意冷的他说是看破红尘，虽未削发为僧，但将离职信发送至上司的邮箱后，便头也不回地归隐田园中去。

小陆接着便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重现于朋友圈时，小陆晒出的日常使他陡然跃升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仙。他的居所是座精简质朴的木屋。屋内布置淡雅，尤其是玄关那块青花的布帘、窗上那串铜质的风铃和床头那盏透露着日落黄般灯光的台灯，散发着浓郁的小清新气息。他的饮食来自他亲自进行的耕作。在那个不为人知的乡间，放眼是青山与薄雾。他租了一块田，种一点蔬菜。他的屋前有果树，夏秋皆有佳果。有人问："那米粮从何来？"大仙便答："睦邻友好，多有馈赠。"有人追问："那不吃肉？"大仙笑曰："众生皆平等。"口吻如隐世的高人。

这种发生在熟人中的诗意故事，叫活在苟且日子里的朋友们禁不住投去艳羡的目光。每回陆大仙公布生活照片，就如明星发布近况，瞬间能收获一大批点赞。洁净的环境、闲适的生活和天然的膳食，陆大仙的"粉丝"数量暴涨。他便更卖力地赞誉天然，抨击当下的物欲横流、消遣无度，鼓励人们脱离烦嚣、返璞归真。大仙的"鸡汤"，总有不少人喝得欢畅。

剧情的转捩点发生在某食店的一场偶遇。一名陆大仙的"路人粉"，在烤肉店见到一个容貌极像大仙的客人。"路人粉"左右端详，每扫视一次便确定一分，禁不住上前问道："请问你是陆××吗？"那人皱了皱眉头，否认了对方的疑问。"路人粉"回到座位上，翻出陆大仙的照片仔细研究。"鼻子太像了，嘴角下方那颗小痣也一样！是他，就是他……""路人粉"越想越不忿，一抬头，却发现那位可疑客人已不见了踪影。

陆大仙在城里吃烤肉的传闻一出，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突然便有许多类似的八卦汹涌而来。有人说见过陆大仙在超市购物，买了肉食与火锅底料；有人说见过陆大仙在电玩城打机，晃动着摇杆骂着娘；有人说见过陆大仙在夜店流连，捧着酒杯搂着美女……到下一回陆大仙发布他的"心灵鸡汤"和清雅照片时，质疑之声便在评论区四起，甚至有人直接谩骂，说大仙表里不一欺骗群众。舆论在那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点。

站在高点处的陆大仙顷刻形象跌进谷底。迫于重重铁证，大仙唯有坦然承认种种。然而他似乎心有不甘，反驳众人道："我非出家，何需守戒？"言下之意是他爱怎么活是他的自由。众人却不买账。有人说道："人设既定，则必须要守人设的戒。若轻易破戒，岂非消费'粉丝'情感，践踏'粉丝'信任？"

陆大仙终于陷入了沉默，从此绝迹于朋友圈之中。一段日子后，小陆低调重现于人前。

本栏目投稿信箱：mensula@sina.com

智能静音耳机

B&O 公司最新推出的入耳式降噪耳机 BeoPlay H3 可以识别特殊的声音频率或关键词（例如人名）。这项专利使得人们在外出时，无需在享受音乐的同时担心过滤掉重要的声音提醒，在紧急情况下耳机也会自动静音，增强了出行的安全性。

超薄照明灯

俄罗斯设计师奥尔加•卡鲁吉纳（Olga Kalugina）打造的超薄照明台灯，融合了极简主义的审美风格。灯身轻巧，灯光切割柔和，确保各个角度的光源都适合工作环境，设计整体颇具现代气息。

飞行员智能腕表

具有瑞士官方天文台认证的百年灵 Exospace B55 腕表，不仅是一款能与手机进行双向互动的智能腕表，还专为飞行员打造了如电子测速计、高达 50 次的分段连续计时用时记录等功能。轻按表冠或将手腕倾斜至 35 度以上，两个液晶显示屏的背光照明系统就会自动开启。

卫生间“消毒棒”

这款名为UV Bar的毛巾架可以对挂在上面的毛巾进行红外线消毒。它还便于拆卸，能给卫生间的各个角落杀菌。其充电功能被安置在墙壁支架内侧，只要将消毒挂杆放回支架，即可进行充电。

3D自行车

设计师陶马什·图里（Tamás Túri）采用3D打印技术发明了具有后现代艺术风格的自行车3BEE。最大的亮点在于其车座设计贴合了人臀部的曲线，握把和车轮也按照骑行者身材比例量身定做，增加了舒适性。“S”形单壳体车身选用超轻材料制成，方便出行携带。

花瓶路由器

Rosenthal推出了一款“连网花瓶Porcelan”。该作品上半部——花瓶顶部可以直接插放鲜花，而底部则用于路由器设施的安装，避免部件凌乱地暴露在视线之下，上下部分通过磁性底座组合起来。

变色香薰蜡烛

日本设计公司Nendo设计的这款“sunset”蜡烛，能够模拟日落时随时间迁移呈现出的动态色彩变化，由黄色变至橙色、红色、紫色直到最终的蓝色。同时，随着不同颜色的切换，气味也会随之变化，从香柠檬、柠檬香草、马郁兰草、薰衣草到天竺葵，可以充分感受时间和气味的双重流动感。

蜜蜂胸针

Chaumet 品牌的“蜜蜂胸针”，蜜蜂的身体用橙色蓝宝石、绿色橄榄石及石榴石镶嵌，镂空的黄金翅膀与钻石对比，可拆卸的胸针也能用作项链吊坠。

机器人归来

Prada 精灵古怪的机器人再次归来，出现在一系列包袋上。机器人由拉链、金属、皮革等不同材料创建，品牌的三角形 Logo 变成了机器人的嘴巴。

骨瓷吊灯

“哈顿吊灯”把骨瓷转化成宝石般的灯罩，多面的对称形式具有雕塑美，提供有棱角的线条和光影效果。

冲压铝音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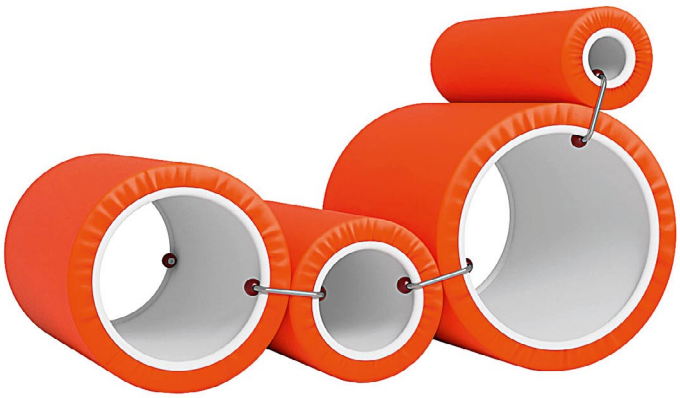
工业设计师迈克·扬与意大利电子公司 Brionvega 合作的便携音箱 Wearit，复古的造型基于 Brionvega1960 年出品的 TS 207 手持收音机。圆角音箱由冲压铝制成，并配有可拆卸手柄及皮袋。

玻璃旋转柜

Zeritalia 品牌的 Compact 系列旋转柜，手绘玻璃壁板的中空立方体堆叠在基座上，形成一个 360 度转动的支架，变化的内部空间由不同色彩的有机玻璃板分割。

装饰艺术风格

拉尔夫·劳伦 RL888 不锈钢女士腕表体现了纽约“爵士年代”的装饰艺术风格，白色表盘上组合阿拉伯语和罗马数字，有超过 40 种不同颜色的表带可供选择。



管椅

意大利家具品牌 Cappellini 重新生产了工业设计师乔·科伦坡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设计的“管椅”，四根不同直径的圆管构成模块化结构，用金属钩连接在一起。

海鲜诱惑

中国人重塑海洋生态

香港铜锣湾海鲜市场

（林竹枭 摄）

2013 年 8 月 1 日，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停泊在深圳南澳海湾内的渔船纷纷出海捕鱼

文 袁越

生物多样性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很难普及的概念，很多老百姓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去保护它。但在保护海洋物种的问题上，这个看似“高大上”的概念瞬间转化成了一个特别实际的问题：海鲜还能吃多久？

中国渔都

5 月 31 日是 2016 年伏季休渔期开始前的最后一天，零点的钟声刚过，舟山国际水产城已经开门迎客了。这个东海地区最大的渔获交易市场位于舟山普陀区的沈家门，占地面积 20 万平方米。捕鱼季节每天零点准时开始交易，一直到凌晨 5 点结束，天天如此。

这个水产城的前身是舟山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来自东海的渔获大都会先运到这里进行交易，再被鱼贩子们发往全国各地，最远甚至会被卖到东南亚和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资料显示，这家鱼市场 2015 年全年的交易量为 66.8 万吨，交易额高达 100 亿元，被当地人称为“中国渔都”，算得上是舟山市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

说到鱼市，我曾经参观过日本东京著名的筑地市场，亲眼看到了海鲜是如何从这个“日本渔都”一步步走上日本人的餐桌的。为了了解中国的海鲜市场，我又专程来到中国渔都参观，发现这个水产城就建在码头旁边，主体部分是一幢外表相当豪华的现代建筑，玻璃外墙上挂着凤凰城 KTV、水立方精品浴场和伊甸园舞厅的广告招牌，和装修朴素的筑地市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交易区位于水产城旁边的一幢低矮的建筑物内，不断有小货车进进出出，看上去很是繁忙。我跟在一辆货车后面走了进去，还没看到鱼就先闻到一股鱼腥味。越往里走腥味越重，同时又闻到了一股厕所特有的臭味，两种味道交织在一起，让人几欲作呕。交易市场的水泥地面不太平整，随处可见一摊摊黑色的泥水，我踮着脚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可一双鞋还是很快就脏得不成样子，后悔没有像当地人那样穿着长筒雨鞋进来。

走进来后我才发现，主交易区其实是建在一座高架桥的下面，有好几百米长。区内照明不是很好，只能看到一个个黑乎乎的人影。每个摊位前都有一盏小灯，一筐筐新鲜的渔获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我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批发米鱼的摊点，这种鱼又叫鲼鱼，外形酷似鲈鱼，每条都有十几斤重，可惜颜色不太好看，据说吃起来肉质也略显粗糙，算不上上等海鲜。老板正在为鱼贩子们分装米鱼，每人可以分到七八条。据说今年的米鱼收成不好，收购价涨到了每斤 50 元，算下来每个塑料筐里的渔获价值都在 5000 元以上。

没想到，这堆米鱼居然是我在那天晚上见到的体积最大的海鲜了。我在交易区转了一大圈，发现当晚的渔获以虾蟹和鱿鱼为主，海洋鱼类不但品种不多，而且个头也都不大，通常每条鱼也就 1 ～ 2 斤重，鲜有超过 5 斤的。所有的海鲜全都装在塑料筐里，上面铺着一层冰块，这属于冰鲜的海产，价值仅次于活鲜。但从现场浓重的腥臭味道来判断，这些海鲜已经在海上漂了一段时间了，应该是在距离陆地很远的渔场捕到的。

回想起来，东京的筑地市场虽然也谈不上有多干净，但起码空气里没有那么重的鱼腥味儿，臭味就更没有了。也许是因为日本人喜欢吃生鱼片的缘故，筑地市场的交易品种以海洋鱼类为主，经常可以见到上百斤重的金枪鱼，切开的横断面在灯光的照射下泛着红光，让人食欲大增。同样都是卖海鲜的，两个交易市场无论是海鲜的品种还是质量都天差地别。

舟山水产城的旁边就是渔船卸货的专用码头，好几艘 20 多米长的渔船正在卸货。我看到两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地从船上下来，手里抱着铺盖卷，一看就是收工放假准备回家的渔民。从说话的口音判断，他俩都不是本地人，而是来自北方某地的打工族。后来得知，因为渔场越来越远，像这样的渔船经常一出海就是好几个月，可两人携带的行李非常简单，只有一床被子和一个小包袱，真不知道他们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一个刚刚卸完货的小伙子告诉我，今年的收成不好，普遍不如去年，他的船一共运回来 60 箱虾，估计可以卖 1.2 万元。不过这不是总的收入，因为很多渔获直接在海上卖给专门的收货船了。由于马上就要休渔，他们反正要回港，于是把最后捕捞到的这批虾随船运回来自己卖。

小伙子皮肤黝黑，满脸疲惫，眼睛里布满血丝，看上去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睡觉了。他就是中国渔民的缩影，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常年在海上作业，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于海鲜的渴望。问题是，他们的劳动经常和收获不成正比，因为海里的鱼数量越来越少、体积也越来越小了。

左图：越南一处海鲜市场

右图：日本东京筑地鱼市场是日本最大的生鲜鱼类批发市场之一。鱼贩在开市后检查金枪鱼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从渔业的定位说起了。

渔业的衰落

渔业在国外被视为是一种工业，英文称之为Fishing Industry。但在中国，渔业却被认为是属于大农业范畴的，这才有“农林牧渔”的说法。

工业的特点是产能可计划，产量可预期，产值力争逐年增长。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全球渔业曾经历过一段辉煌的时期，但最近这20多年来一直在走下坡路，情况不容乐观。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每两年出版一份《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报告，2016年的报告7月份刚刚出版。根据这份报告，1950年是全球大规模机械化捕鱼的元年，当年全球海洋捕捞业的总产量还不到2000万吨，但此后开始了一段长达40年的高速增长阶段，80年代末期首次超过了8000万吨，但此后便一直在这个数字附近波动，整体水平停滞不前。比如1996年的全球海洋捕捞总产量曾经冲到过8640万吨的历史最高位，但此后却又逐年下跌，2010年甚至跌到了7700万吨。2014年这个数字有所回升，达到了8140万吨，但仍然低于历史最高水平。

这个跌幅看似不大，但是按照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教授的说法，实际情况远比FAO估计的更糟。他和同事在2016年1月出版的专业科学期刊《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文章指出，因为各国上报给FAO的产量数据不准确，1996年高峰时的全球捕捞量实际上应为1.3亿吨。随着FAO对统计数据的精确性要求越来越严格，2010年的7700万吨倒是十分准确的，因此全球渔业总产量的实际下降速度远比FAO估计的要大很多，最近这20年几乎是坐着过山车一路狂跌，而不是像FAO报告显示的那样只是走了一段下坡路而已。

如果仅仅是产量降低倒也没什么，问题在于这期间全球渔业的生产性投资却一直在增长。根据《渔业危机》（*The End of the Line*）一书的作者、英国《每日邮报》资深环境调查记者查尔斯·科洛瓦（Charles Clover）所做的统计，全球海洋渔船的捕捞能力一直在增长，目前的水平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海鱼捕捞4遍。其中，延绳钓鱼部分每年新增14亿个鱼钩，新增鱼线总长度可以绕地球550圈。网捕部分也在不停

（王楚众 摄）

地扩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渔网已经可以装得下13架波音747客机了！

如此高的投入，却换来产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捕鱼工业前景不算太妙。

那么，作为大农业一部分的渔业怎么样呢？农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畜牧业）的特点是画地为牢，靠资源吃饭，从业者往往收入不高，必须享受政府补贴。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渔业同样面临严重危机。

先看地。畜牧业需要优质牧场，渔业同样需要优质渔场。根据FAO公布的数据，全球海洋渔场有20%已经彻底崩溃，几乎打不出鱼了；20%的渔场严重退化，几近崩溃，必须立即停产才有可能挽救；另有40%的海洋渔场已经达到了捕捞上限，再也无法增加产量了；剩下的20%渔场要么因为各种原因尚未遭到破坏，要么正处于修复阶段，必须假以时日才能重新被开发。

再看资源。FAO把可捕捞海洋鱼类种群分成可持续和不可持续这两个类型，前者指的是捕捞量小于或者等于再生量，可以继续捕捞而不至于影响产量；后者指的是捕捞量大于再生量，如果继续捕捞下去的话，产量只会越来越低，必须立即大幅度减少捕捞量，甚至完全停止捕捞才有可能恢复种群。FAO统计数据显示，处于可持续状态的种群数量占可捕捞海洋鱼类种群数量的比例从1974年时的90%下降到2013年的68.6%，也就是说，目前的全球海洋中有31.4%的鱼类种群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再不出力拯救就完了。如果从增产的角度来看，有90%的海洋鱼类种群捕捞量已经不能再增加了，只有10%有增产的潜力。

总之，目前的海洋渔业既缺少优质渔场又缺乏优质资源，总产量停滞不前的状况似乎已经很难改变了。

海洋是很多穷人谋生的地方，这一点和全球大部分农田的定位非常相似。目前全球每7个人当中就有1人需要靠吃鱼获得每日所需的蛋白质，“粮食安全”的概念在渔业里同样适用。不过，中国人历来重视传统的种植农业，渔业相对而言没那么发达。中国的

海鲜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品，全球趋势大体相同

渔业总产值还不到农业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在“农林牧渔”这个中国传统的排名体系中敬陪末座。而且这个占比在最近一段时期逐年下降，最近这10年一共下降了一个百分点，从2001年的占比10.75%下降到2012年的占比9.73%。

有趣的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出了名的爱吃鱼，尤其是海鲜，更是很多中国人的最爱。据FAO统计，2013年中国人均水产品（包括河鲜和海鲜）占有量高达37.9公斤，比1993年时的14.4公斤增长了150%，相当于每年平均增长5%左右。相比之下，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2013年人均水产品消费量为26.8公斤，比中国少十几公斤;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为18.8公斤，只是中国的一半。

还有一个算法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不算中国的话，2013年世界人均鱼类消耗量为15.3公斤，算上中国则为19.7公斤，中国人把全球人均水产品消耗量提高了29%！

人均消耗量大，再加上中国人口多，使得中国的水产品总消费量高居世界第一位。全球四分之一的鱼都是被中国人吃掉的，总的消耗量比排名第二到第十名的国家加起来都要多。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水产品生产国，总产量高达6500万吨。如果只看海洋的话，中国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海洋捕捞船队，现有各类海洋捕鱼船19万艘，捕捞能力世界第一。但因为喜欢吃海鲜的中国人太多了，海鲜还是不够吃。更糟糕的是，中国近海渔场捕捞上来的海鲜品种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真正好吃而且个头大的海鲜几乎都是从别国的海域捕捞来的，价格相当高，老百姓越来越吃不起了。

换句话说，海鲜正在变成一种奢侈品，越来越难以登上普通中国人的餐桌了，这一点和全球趋势非常相似。

幸运的是，渔业的衰退只是特例。随着科技的进步和贸易的开放，在绝大部分国家里，无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都在进步，老百姓的生活质量逐年提高，甚至提高的速度也越来越快。那么，为什么独有渔业逆着潮流，不进反退呢？答案就在于渔业本质上既不属于工业也不属于农业，而是一种狩猎行为。捕鱼者捞上

来的海鲜不是什么“产品”，而是野生动物。

人是万物之王。如果人类真的用心去捕杀，没有任何一种野生动物能够幸免，海洋中的野生动物们自然也不例外。

人类最后的猎场

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我们的祖先依靠猎杀比自己大得多的野生动物获取宝贵的动物蛋白，并在捕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技艺，弥补自身的生理缺陷，终于成为地球上最顶级的猎手，这一点在毛里求斯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座位于印度洋上的小岛是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绝佳地点，因为该岛直到 17 世纪之前一直没人居住，处于最原始的状态，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1638 年荷兰人首次上岛定居，岛上的动物们这才和人类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这次会面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岛上特有的一种不会飞的渡渡鸟（Dodo）在见到人类之后的几十年里就被杀光了。资料显示，地球上最后一只渡渡鸟死于 1681 年，从此这种奇特的生物就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渡渡鸟绝不是人类灭绝的第一种动物。自从人类走出非洲，开始向全世界扩散之后，已经有长毛象、巨型地懒和剑齿虎等等很多种类的大型动物被人类杀光了。据统计，当智人刚刚进化出来的时候，地球上大约有 200 属体重超过 50 公斤的大型陆生哺乳动物。而等到人类扩散到全世界之后，便只剩下了大约 100 属。换句话说，就在人类还没有发明出铁器和火药之前，已经让地球上一半的大型兽类惨遭灭绝。

不过，此前的动物灭绝事件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的，而渡渡鸟是人类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一种大型生物的灭绝，因此这种鸟便成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运动的象征。今年 6 月份我去渡渡鸟的故乡毛里求斯旅行，发现这个岛的生态环境已经彻底被人类改变了。人类登陆之前的毛里求斯不只有渡渡鸟，还有很多该岛独有的海龟、蜥蜴和蛇等野生动物，可如今它们都被鸡、鸭、牛、马等家禽家畜所替代了。岛上的原始植被更是消失殆尽，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开辟成了甘蔗田，只有一小块自然保护区内还能依稀见到这个岛原来的模样。

换句话说，人类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里就把这个经过数百万年进化而成的原始海岛变成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基地，如今岛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的。

毛里求斯就是人类世界的缩影，地球上绝大部分陆地都是如此，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于是，今天的地球人已经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见到大型野生动物了，更别说去猎杀它们，吃它们的肉了。

只有南极大陆和非洲部分地区例外。

南极之所以例外是因为太冷，不适合人类生活，所以那里的野生动物活得不错。非洲大陆之所以例外，主要原因是具备了现代环保意识的人类主动加以保护，并通过发展野生动物旅游赚到了更多的钱。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非洲的大型野生动物是和人类一起进化的，它们在这一过程中慢慢学会了躲避人类，这才勉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仅凭这一点即可证明，非洲是人类的故乡。

以上说的都是陆地上的情况，占地球表面积 70% 的海洋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海洋是人类祖先的禁地，我们无法在水下呼吸，海水也不能直接饮用，所以人类征服海洋的历程要比征服陆地艰难得多。但这点困难毕竟难不倒聪明的人类，我们发明了独木舟、小舢板、远洋帆船、蒸汽机船、内燃机船、破冰船和潜水艇，可以到达海洋中的任何地方。我们还发明了鱼钩、渔网、地笼、声呐、电棍、毒药和炸药，游得再快的鱼也逃不掉。

于是，海洋野生动物逐渐笼罩在了人类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再难逃脱。渔民们先从最有经济价值的野生物种开始抓起，于是鲸最先遭殃，几种价值很高的鲸类几近灭绝。之后渔民们又开始捕捞鲨鱼，只是因为鱼翅可以卖大钱。就这样，海洋中这两种体型最大的野生动物几乎要被人类捕光了，于是渔民们又盯上了体型稍小一点的物种，比如鳕鱼、金枪鱼、三文鱼、沙丁鱼、大小黄鱼、大龙虾和海龟，把这几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海洋物种逼到了灭绝的边缘。

陆地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正在海洋里再次上演。

我们的祖先是吃着陆地上的野味长大的，今天的人类所能吃到的野生动物则几乎全部来自海洋。要想真正理解海洋渔业所面临的困境，就必须把海鲜想象成野生动物，把渔民想象成猎手，把海洋想象成人类的猎场，而且是人类最后的猎场。如果这个猎场再被毁掉，那么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一个没有野生动物的世界里，只剩下城市、农田和牧场。

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会怎样？我说不好，但我们喜爱的“海鲜”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肯定的。本期专题通过走访中国沿海渔民、海洋科学家和官员，试图弄清一个所有美食爱好者肯定都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海鲜还能吃多久？

舟山渔场的兴衰

文 袁越 摄影 黄宇

舟山渔场是中国东海地区最重要的渔场，让我们以舟山为案例，看看中国沿海渔场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想去舟山群岛的话，可以选择早上 9 点从上海南浦大桥客运站出发，先坐一个半小时的大巴车来到小洋山码头，再坐两个小时的渡轮就可以到达岱山岛的双合码头了。岱山岛是舟山群岛当中面积第二大的岛，但因为上海经由小洋山到岱山的跨海大桥尚未修通，而且岱山岛上也没有什么著名的景点，所以游客相对稀少，至今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渔村，我的中国海洋渔业考察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出海打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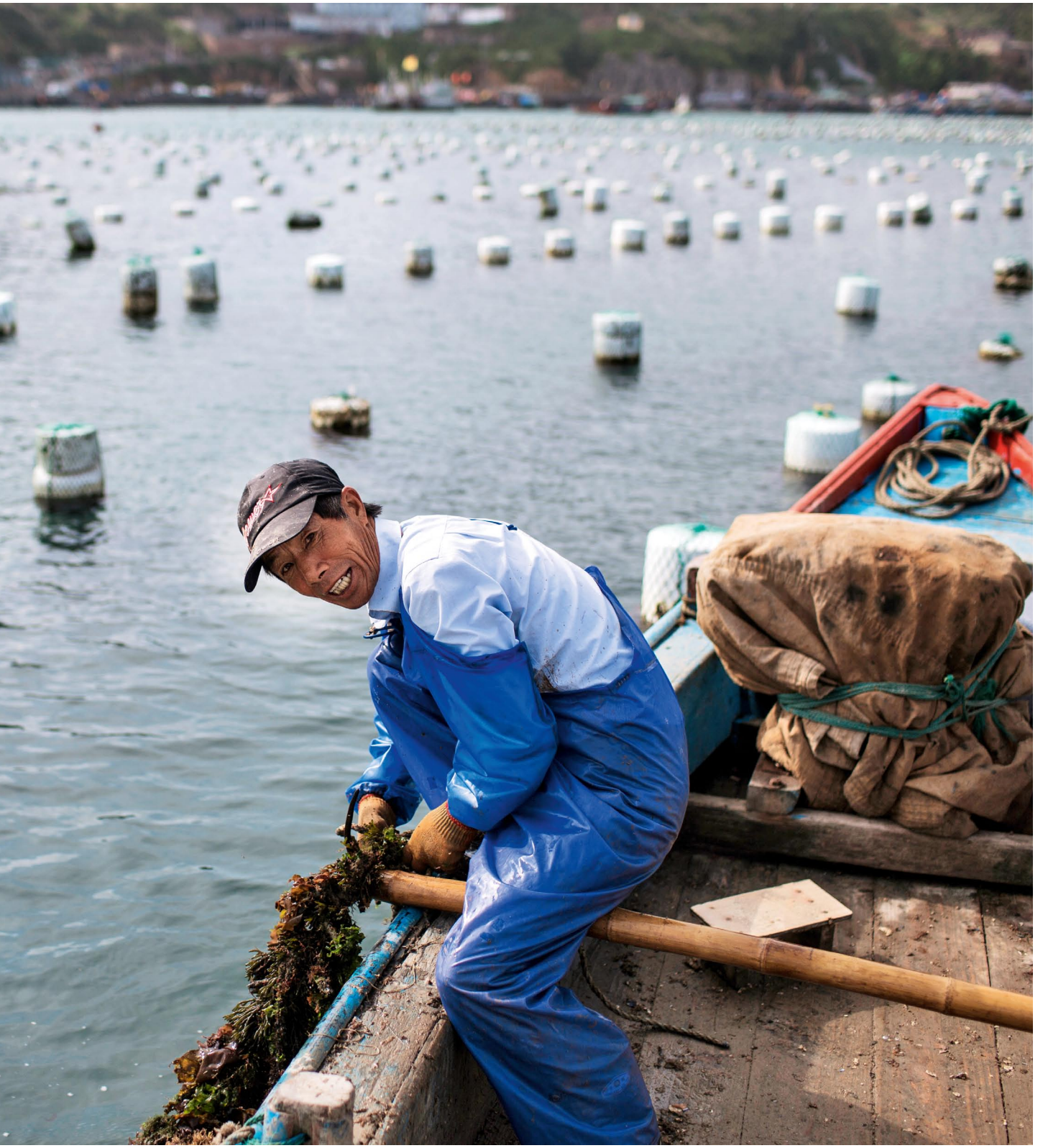
双合码头位于岱山岛的西南角，岸边停靠着好几艘工程船，一片繁忙景象。据乘客说这附近有个采石场，采下来的石头被用于填海造地。码头背后的小山上有好几排海景别墅，从远处看挺漂亮，但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看不到有人居住的迹象。

我下船后打了辆出租车，去位于岱山岛东北角的新道头村。这是个典型的传统渔村，村民基本上靠打鱼为生。我的联系人张志斌就是这个村的人，但他长大后改行当了大厨，离开了捕鱼业。

“出海打鱼太辛苦，我做不来。”张志斌对我说，“别看我是土生土长的舟山人，我还是会晕船的！在舟山像我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打鱼已经不再是舟山年轻人唯一的出路了。”

张志斌带我来到了新道头村的鱼码头，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串专门为游客服务的农家乐式的小饭馆，当地人称其为“海边人家”。不过我去的那天家家大门紧闭，看来生意不怎么好。码头上停着好几艘铁皮

浙江舟山渔场的养殖户在查看贻贝的生长情况



舟山嵊山岛的海上牧场。这里有着万亩贻贝养殖基地

船，长约 20 米，船体锈迹斑斑，一看就是常年漂在海上作业的。我很想乘坐这样的渔船出海捕鱼，体验一下渔民的生活，但张志斌立刻否决了我的提议："这种大渔船一出海就是十天半个月，有时甚至更长，船工们睡通铺，每个人的位置都是固定的，你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肯定受不了，坐小船在近海体验一下就行了。"

他领着我登上了一艘不到 10 米长的小渔船，这种船专门负责在近海打鱼，非常适合游客上船体验渔民生活。事实上，新道头村一直想以此为由头发展旅游业，甚至还专门投资建造了一家旅馆，可惜因为交通不便，游客数量太少，生意惨淡。

上船前，一位渔民为我展示了当地最常用的笼网。这种网长约 30 米，网口很宽，边缘用泡沫塑料浮子撑开，网底则非常窄，固定在两个直径约 1 米的铁圈上，网眼也很小，目测只有 1 厘米左右。笼网属于定置网，平时是固定在海底的，利用潮汐产生的推力把鱼赶进网中。我以前认为渔网都是要拉着走的，否则游得快的鱼肯定会跑掉。不过这位渔民告诉我，渔船拉着渔网在海里走是很耗油的，但凡有别的选择渔民都不会采用这种方法捕鱼。舟山群岛周围海域的潮汐力量很大，海水又很浑浊，鱼看不到渔网，一旦被水流冲进来就跑不掉了。当地渔民们利用每天两次的潮汐把鱼诱进早已安置好的笼网中，只要每天按时来收两次就可以了，既省工又省油。

如果用陆地上的狩猎来做类比的话，这种笼网捕鱼方式就好像是猎人布下的陷阱或者兽夹，这样一来猎手们就不必浪费体力追着猎物跑了，只需定期去检查一遍就行了。

我登上的这艘小渔船就是干这个用的。驾船的是新道头村的两位老船工，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多年的风吹日晒把两人的皮肤都晒成了紫铜色。我试图和他

们聊聊天，可惜他俩浓重的舟山口音很难懂，我只好请张志斌当翻译，交流起来有些困难。

下午 14 点，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但为了赶在下一次潮汐之前完工，我们还是准时驾船出发了。这艘小船配备了一台 48 马力的柴油发动机，工作的时候不但噪音极大，而且不断冒着黑烟，把我呛得睁不开眼睛。好在小船驶出码头后立即加快了速度，黑烟飘到了船后。不过那位身材较矮的船工一直站在船尾把舵，黑烟直接喷在他脸上，真不知这么多年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一提到出海打鱼，多数人脑海里都会出现一幅蓝天碧海的美妙图画，可惜我这次的出海经历毫无浪漫可言，一来发动机一直在冒黑烟，船速稍一减弱我就被呛得直流眼泪；二来舟山附近海域的海水根本不是蓝色的，而是浑浊的黄色，一点也不上相。

虽然不好看，但黄色说明水里泥沙多，营养丰富，鱼喜欢。舟山群岛位于长江入海口，江水本来就富含营养物质，再加上季风和上升的海流使得海洋中富含养分的深层水不断升至表层，让这一带海域更加肥沃，为浮游生物提供了大量养分。浮游生物相当于陆地上的绿色植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浮游生物多的地方就会有鱼，这就是为什么舟山渔场历来就是整个东海最多产的渔场，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那么，如今的舟山渔场状况如何呢？答案很快揭晓。大约 20 分钟后，我们的小船行驶到海湾的正中央。放眼望去，海面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浮子，每一个浮子代表一个笼网，浮子就是笼网位置的标记。再仔细看，原来渔民们早就在水下打了很多木桩，笼网的网口用两根相邻的木桩撑开，网底一直延伸到海床上。只见那个矮个子船工操纵小船慢慢靠近浮子，高个子船工先用钩子钩起笼网的网线，然后利用安装在船帮上的一根绞棍把笼网从水里绞出来，最后那个矮个子船工把网底拉出水面，解开网绳，把里面的渔获倒在甲板上。

第一网就让我大吃一惊，最先从网里倒出来的居然是一块木制门板！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这种笼网就相当于在海里安装了一个过滤器，所有从这块水域里流过的物体都会被过滤一遍，门板这么大的家伙自然逃不掉。

船工把门板放到一旁，倒出了真正的渔获。这一次我更加吃惊了，倒出来的几乎全都是塑料垃圾，从快餐包装纸、旧烟盒到塑料玩具应有尽有。几条小鱼隐藏在垃圾堆中间一动不动，显然已经死了。只有极个别体型更小的小鱼还活着，但也都奄奄一息。

“笼网的网底空间是很小的，鱼在里面相互挤压冲撞，很快就会被挤死了。”高个子船工通过张志斌的翻译向我解释，“你仔细看鱼的鳞片，都被挤掉了，这说明鱼受伤很重，即使还能喘气，扔进海里也活不了多久。”

我蹲下来仔细检视那堆“垃圾”，从里面挑出了几条龙鱼和带鱼。龙鱼又名水潺，头形酷似龙头，体长约 10 厘米，身体几乎透明，摸起来柔若无骨。带鱼普遍要比龙鱼长一倍，但宽度只有 2 ～ 3 厘米，体白眼细，被称为小眼睛带鱼，据说是舟山特产。

这些鱼被捡出来的时候都已经死了，我注意到带鱼的鱼鳞全都破损严重，显然在笼网里挣扎了很久才

大黄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南海、东海和黄海南部，平时栖息较深海域，4 ～ 6 月向近海洄游产卵，产卵后分散在沿岸索饵，以鱼虾等为食。成年大黄鱼体长 40 ～ 50 厘米，通体金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野生大黄鱼在中国沿海已近绝迹，目前市场上供应的大黄鱼多为养殖产品，尤其以南方省份养得最多。

多宝鱼

学名大菱鲆，原产于北大西洋海域。这种鱼生长速度快，肉质鲜嫩，小刺少，是世界公认的优质比目鱼。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霖霖院士于 1992 年从英国引进了 200 尾大菱鲆鱼苗，并养殖成功，迅速成为中国北方省份养殖最多的鱼种。最近有媒体报道说这种鱼能致癌，导致行情一落千丈，从刚刚养殖成功时的 400 多元一斤降到现在的不到 20 元一斤，养殖户损失惨重，大菱鲆产业受到重创。

死。我在死鱼堆里发现了一条像乒乓球那么大的活鱼，张志斌告诉我这是鲳鱼。鲳鱼也是舟山特产，体型极为扁平，很可能是生活在海底的鱼类，只有贴着地走的海底拖网才能把它们捞起来。鲳鱼成年后可以长到1斤多，这么小就死掉实在是太可惜了，我把它捡起来扔回了海里，虽然明知它很可能还是会死掉。

我继续在“垃圾堆”里翻弄，又找到了几十条体型更小的鲳鱼尸体，以及数量更多的小虾。它们都不到1厘米长，照理说笼网的网眼挡不住它们，但因为网里聚集了太多的垃圾和杂物，它们还是被挡住了，没能逃脱。张志斌细心地把它们都挑了出来，准备带回去当鱼饲料。

与此同时，两位船工已经把笼网重新结好，又放回海里去，准备迎接下一波潮水。然后一名船工把船开到下一个浮子处，重复上次的动作，又捞起一网“垃圾”。就这样，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了十几个笼网，捞上来的“垃圾”很快就堆成了小山。我和张志斌负责挑出里面的渔获，把龙鱼和带鱼分别放入两个塑料筐中，其余的小鱼小虾混在一起放入另一个筐中。

张志斌找到了一条约有5厘米长的梅鱼，兴奋地拿给我看。这种鱼又名梅童，因为它长不大，最多也就长到10厘米左右就不长了。据张志斌讲，梅鱼肉质细嫩，以前大都用来炖汤，但现在也开始红烧了，因为如今的舟山近海已经很难抓到野生小黄鱼了。梅鱼的身体有些发黄，长得也很像小黄鱼，正好用来作为小黄鱼的替身，延续舟山人喜欢吃“红烧小黄鱼”的饮食传统。

中国有“四大海产”的说法，指的是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舟山渔场历来就是四大海产的主要产地，上世纪70年代这四种鱼占了总渔获量的三分之二。但由于过度捕捞等原因，到90年代时这四种鱼就只占舟山渔获总量的五分之一了，其中绝大部分还是繁殖力极其旺盛的带鱼。如今大小黄鱼和乌贼全都陷入了枯竭的境地，在中国近海海域几乎绝种，极难捕到。

“现在一条大一点的野生大黄鱼每斤要卖8000元，而且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张志斌说，“如果有人捕到一条野生大黄鱼，立刻就会被关系户订走了，普通老百姓有钱也吃不到。”

我们这次当然也没有见到大小黄鱼和乌贼的踪影，只抓到了一些小眼睛带鱼。回想起来，前三种海鱼都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海鲜，如今竟然连它们的面都见不到了。

收完笼网，两位船工又把渔船开到另一片海域，这里早已放好了一串蟹笼，一共25个。蟹笼是一种专门用来捕螃蟹的定置工具，用铁丝和尼龙绳编织而成。笼子里预先放置一个诱饵，螃蟹要想吃到它，只能从一个喇叭状的开口钻进去，但却再也出不来了。

与收笼网一样，船工们先找到用来做标记的浮子，然后顺着一根粗线从水里捞出蟹笼，打开机关，把里面的螃蟹倒出来，再补放一个新的饵料进去。令我惊讶的是，倒出来的小螃蟹个头非常小，平均体重只有一两左右，很难想象螃蟹壳里面能吃出多少肉。更令我惊讶的是，船工们使用的饵料居然就是刚刚捕上来的带鱼，这说明即使是这么小的螃蟹仔还是比带鱼更值钱。

两个多小时后，这次出海捕鱼体验活动圆满结束。我们一共打到了15斤左右的龙鱼和20斤左右的小眼睛带鱼，估计在当地的菜市场上可以卖400元左右；还有三十几只小螃蟹，估计能卖200元；另有大约30斤小杂鱼，全部混在一起另装一筐。仔细看，这筐小杂鱼其实就是小龙鱼、小带鱼、小鲳鱼、小梅鱼等等小鱼小虾的混合物，只因它们个头太小，实在卖不出价钱，只能作为鱼饲料使用。

这，就是十几个笼网和25个蟹笼半天之内捕捞到的全部渔获，舟山附近的浅海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海鲜了。

事实上，这片海域里最多的东西不是鱼，而是各种陆源生活垃圾。我原以为船工会把捞上来的那堆塑料垃圾带上岸清理掉，谁知他从船舱里拿出一把大铁锹，把垃圾尽数铲回了海里，随手把嘴里的烟屁股弹进海中。他肯定没有读过上个月两本科学期刊上登出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说人类每年往海里扔进400万吨塑料垃圾，幼鱼吃了这种垃圾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最终对种群生态带来负面影响；另一篇文章说，人类每年向环境中扔掉5万亿个香烟过滤嘴，它们释放到

我们这次当然也没有见到大小黄鱼和乌贼的踪影，只抓到了一些小眼睛带鱼。回想起来，前三种海鱼都是我小时候经常吃的海鲜，如今竟然连它们的面都见不到了。

海洋中的重金属会随着渔获重新进入人体，带来健康危害。

对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船工来说，海洋生态和重金属污染都不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只关心鱼市的行情。他告诉我，其实那两筐能卖钱的龙鱼和带鱼在他们小的时候都是只能当鱼饲料的边角废料，如今大鱼抓不到了，于是人也开始吃它们了，导致价格成倍上涨。

据他回忆，上世纪 70 年代的时候，村头这片海域里的大黄鱼多得不得了，渔汛来了的时候甚至用竹筐捞就行了，根本用不着下网捕。那时候如果家里来了客人，只要划一艘小舢板去海里转一圈就能带回来一大筐海鲜，而且都是大黄鱼大螃蟹这类大家伙，根本不愁没东西招待客人。可如今舟山附近的大鱼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就连舟山本地人都吃不到大黄鱼了。

“还有，现在国内海鲜市场上很时髦的皮皮虾，在我小时候连当肥料都嫌硌脚，都是直接倒回海里去的。”船工补充道。

为什么这个曾经世界闻名的舟山渔场竟然会没鱼了呢？我在回程的途中找到了第一个答案。

鱼都到哪儿去了？

捕鱼结束，小船掉头回新道头村码头，我终于有机会仔细观察了码头周边的情况，找到了舟山渔获减少的第一个原因：沿海滩涂被破坏得太厉害了。

舟山群岛一共有近千座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海岛，使得这片海域有大量滩涂和岩礁可供鱼类产卵。舟山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东海鱼类最重要的产卵场，海鱼冬天待在深海里过冬，夏天便洄游至舟山附近的浅海海域产卵，以便能利用滩涂上丰富的养料让小鱼快点长大。著名的中国四大海产都是这样的长距离洄游鱼类，每年夏天舟山人都可以在家门口捕捉到它们，根本不用航行到深海。清朝的舟山籍诗人刘梦兰在《衢港渔灯》中曾经这样描绘岱山渔场当年的盛况：

无数渔船一港收
渔灯点点漾中流
九天星斗三更落
照遍珊瑚海上洲

可是，今天的舟山群岛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基建热潮。新道头村的海岸线原本非常平缓，涨潮时海水可以进入内陆很深的地方，退潮时便会留下大片滩涂，科学术语称之为潮间带。这是很多海洋生物产卵的地方，在整个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今这片滩涂已经被挖成了人工养鱼池，为了保护这片池塘，政府在陆海交界处建造了一条长长的堤坝，虽然挡住了潮水的侵蚀，但原来的天然海岸线便也消失了。

不仅如此，新道头村两侧的土地也都被造船厂征用了，这就进一步破坏了宝贵的滩涂和浅海，导致海洋鱼类的产卵场越来越少。再加上来来往往的轮船带来的噪音污染，以及各类工厂和附近居民排放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使得整个海岸线的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洄游鱼类自然也就不愿来了。

不过，舟山毕竟有近千座小岛，并不是每一座都被开发了，鱼类要想产卵总还是能找到地方的，所以说，鱼类减少的最大原因还是过度捕捞。

“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都有好多大黄鱼来海边产卵，晚上隔老远都能听到它们咕咕地叫，像婴儿在哭。”一位老船工回忆道，“我们只要驾着小舢板把大黄鱼围在中间，大家一起用力敲鼓，把大黄鱼震晕了，然后就可以拿筐随便捞了。”

大黄鱼对声音很敏感，繁殖期的大黄鱼会用鱼鳔发出咕咕的声音，以便相互联络。没想到聪明的人类利用了大黄鱼的这一生理特性，把正处于产卵期的大黄鱼捞出来吃掉了。除此之外，四大海产中的乌贼有趋光性，这一点也被人类利用了，上文那首诗中描写的点点渔灯就是为此。

问题在于，这样的捕捞方式会将目标鱼种不分老幼、不加区别地一网打尽，这个做法是不可持续的。

另一种不可持续的捕鱼方式就是那些威力太过强大的渔网。我刚刚亲眼见识了舟山笼网的厉害，没想到还有比它更厉害的。船工告诉我，他们用的笼网毕竟面积太小，拦截的方式也单一，杀伤力不够大。舟山最流行的是雷达网（又名帆张网），这也是一种定置网，其原理和笼网类似，都是依靠潮汐的力量把鱼赶进网中，但雷达网能 360 度随意调节方向，像雷达似的，故得此名。这种旋转方式使得雷达网无论涨潮还是退潮都可以使用，杀伤力至少提高了两倍。更厉害的是，雷达网的网口面积最大的可以达到 3600 平方米，相当于 8 个篮球场那么大！想象一下，如此大的一张网从水面一直延伸到海底，凡是从这里经过的生物，无论是表层鱼还是底层虾蟹一个都逃不掉。为了进一步增加渔获量，雷达网的网眼越做越小，甚至有不少人干脆用帆布做渔网，连鱼卵都给捞上来了。

因为雷达网太过厉害，当地人都称其为“绝户网”。其实渔民们也都知道这种捕鱼方式有问题，但只要有一个人偷偷在用，别人也就都用起来了。再说，舟山海域的鱼越来越少，用雷达网都不一定打得到鱼，不用就更打不到了。一位当地鱼贩子告诉我，舟山地区现有680艘使用雷达网的近海渔船，今年有95%的船都会亏本，因为上半年的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0%以上，下半年再怎么努力也弥补不了。

但是，雷达网还不是最厉害的。

“舟山近海早就没什么鱼了，雷达网再厉害也没用。现在要想挣钱必须开到很远的地方，然后用拖网在海里一遍一遍地拖。”我遇到的一位舟山渔船船长对我说，“甚至整个中国专属经济区也没太多好鱼了，只能偷偷去别国的海域盗捕。”

这位船长所说的拖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户网”，因为它不受潮汐和洋流的限制，在几乎所有的海域都可以使用。其中破坏性最厉害的是底拖网，网口从海面一直张到海底，不但可以把生活在深海的底层生物全部捞上来，而且还会在拖网的过程中给珊瑚礁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根据最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国海洋渔业总捕捞量当中有47%都是用拖网拖上来的，几乎占到海洋渔获的一半；另有14%的海洋渔获是用流网捕上来的，这种流网也属于定置网，其特点是面积大，放置时间长，经常一放就是一个星期不收。洄游鱼类撞上流网后鱼的鳃盖和鱼鳍等部位会被网线缠住，从而达到捕捞的目的。流网的网眼大小决定了渔获的大小，网眼太大了小鱼抓不到，网眼太小了大鱼抓不到，于是中国渔民改进了流网的设计，发明了多层流网。顾名思义，这就是把不同网眼规格的流网组合在一起放进海中，这样就可以做到大小通吃了，所以也有人把这种流网称为“绝户网”。

事实证明，像底拖网和多层流网这样的“绝户网”才是海洋渔业资源逐年匮乏的最主要原因。大多数西方国家早已禁止了这类网具的使用，中国农业部也于2014年公布了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和禁用渔具目录，并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可惜为时已晚。再加上相关执法部门监管不力，很多非法渔具至今仍然在使用。比如，农业部规定拖网的最小网目不得小于54毫米，张网的最小网目不得低于55毫米，但我在舟山看到的渔网几乎全都违反了规定。

其结果就是，中国海洋渔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不少近海渔场已经被彻底破坏，短期内很难恢复了。

其实中国海洋渔业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历史资料显示，新中国海洋捕捞业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始于1950年，那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海洋捕捞船很少，技术水平也很低，全国总的捕捞量只有60万吨。但因为抗战和解放战争导致海洋捕捞几乎停滞，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机会，于是在整个50年代中国的海洋捕捞总产量稳步增长，到1958年首次突破了200万吨，8年增长了3倍多。

第二阶段从“大跃进”开始，直到“文革”开始时为止。这段时间海洋渔业总产量首次出现起伏，以前产量巨大的经济鱼类种群（比如四大海产）数量开始下降，渔获中首次出现了幼鱼，以及大量经济价值较低的鱼种，比如鲲鱼。

第三阶段就是“文革”时期，这段时期海洋渔业生产几乎瘫痪，很多管理机构被撤销，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不鼓励渔民搞副业，使得海洋渔业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过，从7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加大了对海洋渔业的资金投入，形成了以17个国营海洋渔业公司为主体的国营海洋捕捞生产基地，产量重新开始增长。

第四阶段开始于1980年，结束于20世纪末。这段时间对应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渔业是最先被放开的领域之一，其标志就是198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放宽政策、加速发展水产业的指示》。这份红头文件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连锁反应，曾经垄断国内捕鱼行业的国营海洋渔业公司迅速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股份合作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为基础的私营捕鱼业，生产力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彻底的释放。据统计，1985～1999年全国水产品连续14年保持高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2.4%的高位，创造了世界渔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无古人的奇迹。中国渔业的总产值在大农业（即农林牧渔）中所占比重也从1978年的1.6%迅速增长到1999年的11.6%，20年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从1990年开始跃居世界第一，并将这一位次一直保持到现在。其中海洋捕捞总产量自1995年开始首次突破了1200万吨，占到全球总捕捞量的五分之一。

第五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直到现在，这一阶段海洋渔业投资仍然不断加大，但总的捕捞量却停滞不前，2015年的海洋捕捞量（不含远洋）仅为1280万吨，相当于近20年没有明显的增长。

中国远洋渔船“明茂号”上的印尼船工

舟山国际水产城干货区

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全球海洋捕捞总产量在1996年达到峰值，此后便处于稳中有降的状态，再也达不到1996年时的水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要把鱼想象成野生动物就不难理解了。

公地悲剧

如果把鱼想象成野生动物，把海洋想象成一群猎人（渔民）共同拥有的猎场，那么捕鱼业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公地悲剧，最终两败俱伤。

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学者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首先提出来的，他于1968年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如果一群人共享有限的公共资源，那么每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都会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源，最终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大家都没饭吃。之所以称之为悲剧，是因为在这个假设的情景当中，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导致灾难，但因为人类共有的自私天性，没有人能够主动地做出自我牺牲，所以最终大家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悲剧发生而无能为力。

哈丁在论文中使用的是牧羊人争草地的案例，如果改用猎人捕杀猎物的话，情况会更加糟糕，因为大部分陆地野生动物都有迁徙的习性，如果你不去抓，下次很可能就轮不到你去抓了，所以每个猎人都不会放过任何一只从自己猎场经过的野生动物。同理，大部分有经济价值的海鱼都是洄游性鱼类，而且洄游的路线比陆地动物更长，不但会跨越国境，甚至会从一个洲游到另一个洲，一旦错过就再也没机会了。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的渔民当中都流传着一句类似的谚语，大意是说，如果哪个渔民认为今天没有捕捞到的鱼，明天还会留在原地等他，那他就是个十足的傻瓜，注定贫穷一生。

但是，鱼是有限资源，其更新速度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无限增长。如果洄游线路上的每个渔

民都尽全力去拦截，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大家都打不到鱼了，这就是公地悲剧的真正含义。就拿舟山渔场来说，这是很多东海鱼类的产卵场，这一特点导致舟山渔场的幼鱼非常多，渔民们捕捞了大量幼鱼用作农业肥料，后来又用于制造鱼饲料，严重影响了东海鱼类的自然繁殖。可是，如果舟山的渔民不去捕捞这些幼鱼，等到鱼长大后游到别的海域，肯定会被其他渔民捞走，舟山的渔民同样捞不到好处。

于是，即使舟山渔民内心里知道捕捞幼鱼不好，但他们还是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捞。问题在于，如果幼鱼都被捞光了，东海渔场就完蛋了，如果东海渔场完蛋了，舟山渔场自己也肯定好不了，这就是为什么捕鱼业的公地悲剧必然会发生的原因。

事实上，舟山渔场很早就出现了公地悲剧的征兆。根据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穆盛博（Micah Muscolino）撰写的《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一书记载，舟山渔场的生态压力早在清朝时期就出现了，逼得舟山渔民们只能去很远的海域捕鱼。但当时的清政府为了防止渔民加入海盗团伙，下令禁止渔民去远海捕鱼，于是舟山近海的生态压力就更大了，因为抢鱼而引发的暴力冲突时有发生。

到了民国时期，渔民群体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高潮。比如，来自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带来了笼捕乌贼的技术，比舟山本地流行的网捕技术效率高出一倍以上。但笼捕法抓到的大都是正处于产卵期的乌贼，对乌贼种群的伤害极大，于是网捕和笼捕这两派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了 8 人死亡多人受伤的惨剧。

这是一起典型的渔民冲突事件，但肇事双方其实谁都没有把乌贼种群的延续放在心上，两派关心的都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对于渔民而言，竞争对手的渔船和海盗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在鱼还没有被捕捞之前就将他们劫走了，而后者则是从渔网里把鱼劫走了，虽然方式不同，其结果是一样的。当时的民国政府和渔业公所曾多次试图调解双方的矛盾，但所有的努力也都仅局限于解决渔业争端本身，而不是从根本上恢复乌贼种群的健康。

渔民们还试图借助宗教的力量解决渔业纠纷，但效果同样不佳。因为出海打鱼非常危险，渔民群体当中宗教迷信活动一直非常盛行。舟山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宗教机构是羊府，岱山岛的羊府宫门前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渔汛禁约》。但这个《渔汛禁约》仅限于禁止渔民越界偷鱼，干扰或者毁坏竞争对手的捕鱼工具，其重点在于保护渔民人身安全，防止行业纠纷，同样没有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丝毫关心。

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狩猎民族都有不杀幼崽的戒律，为什么渔民一直没有类似的规定呢？为什么渔民们意识不到捕杀幼鱼才是导致渔获减少的主要原因呢？这是因为渔业和陆地狩猎有个显著的不同，那就是陆上猎场的状况是相对透明的，猎人所捕杀的又都是和人很相似的哺乳动物，猎手们很容易判断出猎物的生存状况到底是好是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为了保护猎物种群的正常繁衍而改变自己的狩猎行为。但海洋是个庞大而又不透明的地方，即使是最有经验的老渔民也很难知道水下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加上海洋生态系统本身就很复杂，渔获量每年都会产生自然波动，而且波动幅度还相当大，这就更增加了这个问题的模糊性。

比如舟山渔场 1906 年曾经历过一次大规模减产，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到了第二年产量又恢复了，也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使得渔民们很难意识到渔获的减少和自己无节制的滥捕行为有关联，这就是为什么海洋渔业的公地悲剧往往比陆地狩猎来得更早，而且也更难解决的一大原因。

当然了，导致海洋渔业公地悲剧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渔民不懂科学，不知道海洋生态系统其实是很脆弱的，也是非常需要保护的。民国后期一些政治精英借鉴了日本渔业的经验，试图把科学引入中国的捕捞行业，但那批人只是主张借助科学的力量从海洋中获取更多的产品，比如借助科考船寻找未被开发的渔场，或者运用科学手段设计生产更高效的捕捞工具等等，仍然没有把海洋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考虑进去。

新中国政府在成立的初期同样提倡科学捕鱼，但主要目的也还是为了扩大产能，增加税收，对于中国近海生态资源的保护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海洋渔业的总产量直线上升，整个行业都笼罩在一片乐观的气氛当中，似乎只要想办法搞到一艘渔船就能发大财。当时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下海”，意思就是说辞职经商就好比出海捕鱼，虽然风险大，但只要运气好肯定能赚大钱。

中国下海渔民在改革开放的头 20 年里确实赚到钱了，不仅捕捞总产量直线上升，而且总产值也飞速上涨。据统计，1999 年中国渔业总产值比 1978 年增加了 80 多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直接进了渔民的腰包，一直敬陪末座的渔业成为“大农业”当中最先富起来的行业。

海洋渔业之所以在这20多年里发展神速，最需要感谢的是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是一个拥有300万平方公里海域、6500多个岛屿和3.2万公里海岸线和岛岸线的濒海大国，15米等深线内的浅海和滩涂面积高达2.1亿亩，海洋渔业的发展潜力实在是太大了。一旦放开管制，任凭渔民自由竞争，产量高速增长是预料中的事情。

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海洋捕捞业已然是疲态尽显，虽然总产量仍然能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却是以越来越高的投入为代价换来的。再加上海洋渔获的个头越来越小，高附加值的鱼种所占份额越来越低，导致整个海洋捕捞行业的利润急剧下降，有不少人开始考虑转行了。事已至此，中国的官员们终于意识到，问题不是捕捞能力不足，而是海里真的没鱼了！

“海洋生态系统的特点决定了渔业不太适合走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新中国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和基本制度基础，尤其不适合。”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科学学院副院长、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副所长唐议教授在接受我的专访时指出，“如果一定要走市场经济道路也可以，那就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先把规则制定好了再放开，否则公地悲剧必然会发生。”

出了问题不能不改，中国政府在科学家们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改革。

艰难的改革

说起来，中国政府对渔业部门的监督管理一直没有放松。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出台了500多个和渔业有关的法律法规，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979年出台的渔业许可证制度，以及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前者把自由入渔改为准入控制，后者则进一步强化了许可证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渔业人口来限渔，但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海洋鱼类资源日益减少的现象未得到有效遏制。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伏季休渔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个制度实施起来相对容易，政府部门也好监管。”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中国政府于1995年正式开始实施伏季休渔制度，黄海、渤海、东海和南海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别在夏季实施2.5～3.5个月的强制休渔，在此期间所有近海渔船一律禁止出海。这个制度的目的是要给每年夏季来到浅海产卵的海洋鱼类一个喘息的机会，本意当然是好的。可是，不同鱼种的产卵时间不尽相同，一刀切的做法不见得是最合理的。更糟糕的是，休渔期间民间积蓄的力量在休渔期结束后立刻像火山爆发般释放了出来，每年9月初的中国沿海都会出现万船齐发的壮观场面，其结果就是休渔制度产生的积极效果在休渔期结束后短短几天内就消耗殆尽了。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伏季休渔制度还是利大于弊的，因为这个制度实施起来相对容易，政府部门也好监管。”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这样向我解释，“中国某些基层部门的管理水平有限，因此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一定要简单易行，有时甚至不惜采用这种一刀切的做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

我国自“八五规划”以来便一直在执行的双控制度也是这种一刀切管理模式的经典案例。所谓“双控”指的就是渔船的数量和发动机功率这两个指标都严加控制，原则上不再增加。这两个指标都和捕捞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捕捞能力的大小。比如，同样两艘船，排水量和船载捕鱼设备的不同会导致两者的捕捞能力天差地别，出海时间的差异更会对捕捞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再比如，发动机功率在拖网渔船上确实和捕捞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但如果是其他作业方式（比如流网或者海钓），关系就没那么大了。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双控制度相对容易实施，管理起来也比较容易，所以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实证明，如果没有双控政策，只是利用渔业许可证制度限制渔民数量的话，情况只会更加糟糕。

至于前文提到的海岸线保护问题，中国政府也早有应对。农业部多年前就为中国沿海划定了功能区，但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没有严格执行，至今还有很多渔场和海水养殖区没有获得地方政府颁发的营业许可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我，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发证，是因为一旦发了证就不能随便更改用途了，以后如果再有开发商打算占用某块沿海滩涂，就必须给持证方一定的经济补偿，没证的话开发商往往就不用付这笔钱了。

1999 年，农业部再出重拳，首次提出海洋捕捞零增长的目标，几年后又提出了海洋捕捞负增长的口号。在今天这个各行各业都在追求高增长、高效益的时代，敢于提出这个口号简直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壮举。

大家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目标，在今天的中国，减产往往比增产更难做到。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些限产措施都属于“投入控制”的范畴，即通过限制捕捞能力来控制捕捞量。但是，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如果把中国现有的捕捞能力全部用上的话，其“捕捞努力量”不但远远超过了中国近海渔场所能承受的上限，也远远超过了实际的捕捞总量。要想实现捕捞总量零增长的目标，就必须要求很多渔民主动降低产能，可渔民们的经济状况本来就因为鱼越来越少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他们想要改善生活，只能想尽一切办法逃避管理，加大产出，这个矛盾给渔业部门带来了巨大的执法压力。

于是，2000 年修改的新版《渔业法》首次提出国家将实行捕捞配额制度，即为总的捕捞量设定一个上限，一旦到了这个上限就不能再捞了。这是个革命性的提法，因为这相当于“产出控制”，远比“投入控制”更加准确可靠。

“国外和国际渔业管理中已大都采用产出控制，这是最有效的做法，但技术难度很大。”唐议对我说，“我国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捕捞配额制度，但自从 2000 年正式在《渔业法》中做了规定后，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制定出任何一条细则。也就是说，在新《渔业法》颁布 16 年后，这个配额制度仍然只是《渔业法》中的一项规定而已，尚未在中国实施。”

唐议在 2003 年受农业部渔业局委托研究配额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很有发言权。在他看来，所谓配额制度大都是针对单一鱼种在特定的水域范围内制定一个总的可捕量，一旦超捕了就惩罚。而这个总可捕量一般是基于生物学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简称 MSY）来制定的，即一种鱼在一定范围里每年最多可以捕捞多少才能维持原有的生物量不消减。从科学上讲，虽然每个鱼类种群都能计算出一个 MSY 值，但这个数字很难确定，科学家必须先对这种鱼的种群现状做出准确的评估，还要对这种鱼历年来的实际捕捞量有一套完整而又精确的统计。中国的海洋物种生态研究基础非常薄弱，往往在上述这两个方面都有欠缺，MSY 数值就很难计算准确。如果这第一步都走不好，下面的路就更难走了。

“中国还有一个特殊国情，那就是中国渔业大都是多鱼种作业，很少有一种渔具或者作业方式是只捕捞单一品种的。而国外大都是单鱼种渔业，这种作业方式最适合实行配额制度，无论是总可捕量的制定还是分配配额、监督执法等具体的操作都比较容易进行，这也是为什么配额制在国外普及得这么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唐议补充道，“国外也有对多鱼种渔业实行配额制度的实例，一个方法就是对每一种鱼都设定一个上限，无论哪一种先到达限额，整个渔业就不准继续作业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分别管理，只要有一种鱼没到上限就允许继续捕捞。若想捕捞已达上限的鱼种，那就必须从其他渔民手里买配额，前提是如果其他渔民还有配额可卖的话。”

确定可捕量只是配额制度的第一步，接下来还要制定可捕总量的分配计划，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安

小黄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和东海等地，冬季在深海越冬，3～6 月洄游至浅海产卵，产卵后在近海索饵，主要以糠虾、毛虾以及小型鱼类为食。成年小黄鱼体长 16～25 厘米，通体金黄，肉质细嫩，呈蒜瓣状，味道鲜美，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野生小黄鱼在中国近海仍能捕到，但产量越来越低，人工养殖小黄鱼目前尚处于小范围试验阶段，形不成规模。

带鱼

近海洄游鱼类，主要分布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在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都有分布，带鱼身体呈带状，体长一般 50～70 厘米，最长者可达 120 厘米。带鱼食性杂，白天在海水中上层活动，晚间沉至海底。春季洄游至北方海域，秋季返回南方过冬。带鱼洄游时喜欢成群结队，是捕捞的好时机。目前带鱼在我国近海产量仍然很高，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当中唯一仍然可以形成鱼汛的鱼种。带鱼目前没有养殖的，市场上的带鱼全部是捕捞来的。

排专人负责统计渔获量，对于超标的人还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惩罚机制，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就拿分配计划来说，中国沿海各省都有自己的经济指标要完成，谁分少了都不高兴，更不用说还要和周边国家一起参与分配了。要知道，鱼在洄游的时候可不分国界，必须把洄游途经的全部海域拉在一起搞配额，否则就不科学。考虑到南海和东海的复杂局势，仅凭这一点，配额制度在中国恐怕就很难实现。

“农业部渔业局只有四十几个人的编制，其中还包括人事、财务、办公室等服务部门和水产养殖部门，真正负责捕捞渔业管理的人太少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对我说，“这还不算，中国政府还有个轮岗制度，而渔业又是这么一个复杂的行业，新官上任适应了一年终于搞明白了，刚想干点什么就又被调走了，这种情况导致中国渔业在管理上始终缺乏连续性。”

不过，据唐议教授透露，中央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了，已经准备在很多地方搞捕捞配额管理试点，比如浙江和山东就很有积极性。但这个制度到底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得以实施，目前还说不好。

尾声

那天打完鱼，渔工从筐里挑了一部分渔获交给“渔家乐”的厨师，当场为我们做了一盘清蒸带鱼、一锅清蒸螃蟹和一碗水煮龙鱼，前两种都不加作料，最后一种也只放了点酱油而已，全靠海鲜本身入味。虽然鲜度是够了，但肉实在太少，螃蟹几乎只能嘬几口就扔掉，根本挑不出肉来。

有个词叫作“景观失忆”，意思是说，生活环境的变化往往是渐进式的，生活在其中的人每天只能看到一点点变化，几年下来就会逐渐失去对昔日景观的记忆，即使最终周边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也往往察觉不到。

新道头村就是“景观失忆”的绝佳案例。仅仅在30年前，村民们还能很轻易地吃到几斤重的大黄鱼，3寸宽的大带鱼，可如今却只能吃吃不到1寸宽的小带鱼，肉质似软豆腐的龙鱼，以及连肉都挑不出来的小螃蟹了。但他们依然喜欢标榜本地海鲜味道鲜美，舟山海味天下无双，却没有意识到海鲜的质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

每周一出版　全年52期　多样便捷的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82-20 拨打11185上门收订
零售单价:15元　零售年价:780元　订阅单价:10元　订阅年价:520元,全年净省260元
读者服务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邮箱:dzfw@lifeweek.com.cn

蓝色沙漠中的猎人

文 / 袁越

近海的鱼捕光了，渔民们不得不冒险去深海捕鱼，但海洋本质上就是个蓝色沙漠，渔民就好比是沙漠中的猎人，长途跋涉只为寻找那隐藏在沙漠深处的点点绿洲。

渔民在葡萄牙亚速尔群岛海域捕杀抹香鲸

（劳马 摄）

去远方

舟山近海虽然打不到什么好鱼了，但舟山的餐馆里却仍然可以吃到像模像样的海鲜。当然了，野生大黄鱼什么的自然是很难见到了，即使见到了我也吃不起，但像鲳鱼、鱿鱼、鲅鱼、刀鱼、螃蟹、对虾、扇贝、蛏子等等这些家常品种倒是应有尽有，而且个头也都不算太小。

这些家常海鲜都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就是我在新道头村码头上见到的那群渔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被舟山渔老板雇来当船工，帮老板出海打鱼。码头边停靠的那一排 20 多米长的渔船就是他们的家，因为这些船都是去深海的，每次出海都有很长时间回不了陆地。

“我们这艘船上一共有 8 名船工，一般每次出海至少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次如果不捞回来 4 万元的渔获就得亏本。”一位正在整理网具的船工对我说，“去年的收获很不错，我们每人分到 4 万元工资。今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出海 7 次，只捞回来价值 10 万元的渔获，我们每个人只分到 5000 元工资。”

这位船工看上去大约 40 多岁，肤色黝黑，从口音判断应该是北方人。当他得知我是北京来的记者后，便放下手里的活计，低声对我说道：“你能不能向中央领导呼吁一下，把禁渔期减少到一个月啊？每年夏天正是海里鱼最多的时候，却不让我们出海打鱼，政府也不给我们补贴，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去偷去抢了。”

我当然知道他不会真的去偷去抢，而且也知道农民工们在面对记者的时候经常喜欢夸大风险，瞒报收入。如果真的半年只挣 5000 块，他们大概是不会留在这里替渔老板打工的。但如果能像去年那样一年挣回 4 万块，一些内地边远省份的农民还是很愿意干的，

（黄宇 摄）

左图：休渔季节，素有“中国渔都”之称的舟山市沈家门十里渔港内渔船满港

右图：“明茂号”远洋渔船上的船员

因为他们在海上作业的时候是不用花钱的，这份工资几乎就是纯收入。

说话间又有一位船工走过来向我反映情况：“我们的船老大和鱼贩子勾结，故意压低收购价，然后鱼贩子再偷偷把钱还给鱼老大，这样可以少给股东分钱，结果他一个人发财了，我们都亏本了。”

我一开始没听懂，听他详细介绍了背景后才明白。原来，如今的打鱼成本越来越高，像码头上这些旧船每艘仍然可以卖到500万元，船老大一个人掏不起这笔钱，便拉来很多股东分摊成本，卖鱼的收入按比例分成。但船老大是大股东，很多决定都是他说了算，于是他就利用这个办法瞒报收入，赚取中间的差价。

当天晚上我请一位当地的鱼贩子吃饭，他告诉我这种事情在舟山相当常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的渔船都在很远的地方捕鱼，捕到的鱼大都直接卖给前来收获的鱼贩子，渔民们根本接触不到鱼市场，渔获交易全凭鱼老大和鱼贩子两个人说了算。

这位鱼贩子只有30多岁，但他16岁就辍学出来贩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对整个舟山地区的海鲜行情了如指掌。

“过去只有6条一斤的才能叫小黄鱼，现在12条一斤的也叫小黄鱼，老百姓不知不觉也就接受了。”他一边抽着黑过滤嘴的利群烟一边对我说，“好鱼也有，但都特别贵。现在半斤一条的鲳鱼已经卖到120元一斤了，好的带鱼更是卖到400元一斤，野生大黄鱼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天价，而且还得有关系才能吃得到。”

据他透露，他在海上收到的好鱼根本不会进入鱼市场，而是直接卖给关系户了。“真正优质的海鲜普通人连见都见不到，它们完全就是奢侈品，只供超级富豪和大官们享受。”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优质海鲜越来越少了。如今只有在距离人类聚居区很远的地方才能捕到好鱼，近海渔场已经被捞空了。

说起来，去深海捕鱼是现代人的专利，一个原因自然是古代的小渔船走不了那么远，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渔获的消费方式和陆地上的猎物很不一样。渔民捕到的鱼无论如何都要运回陆地上才能卖掉，而鱼又

极易腐烂变质，常温下放不了太久。古代的渔民只有两个解决办法：风干和腌制，但这样一来渔获的价值便大打折扣，没法负担远航所需的高额成本。

19 世纪初期，舟山鱼商发明了冰鲜船。这种船可以直接在海上收货，然后运回陆地贩卖。冰鲜船同时还可以向正在海上作业的渔船运送补给，这样一来渔船便可以行驶到很远的地方捕鱼，不必经常返航了。

当年一个名叫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的美国人不明白舟山人夏天从哪儿搞来这么多冰块，专门前来考察了一番，发现冰块是在舟山和宁波的制冰厂制造出来的。当地农民在冬天收集天然冰块，用一层厚厚的稻草包裹住，这样整个夏天就都有冰可用了。福琼把他的发现写进了《漫游华北三年》一书中，全世界的渔民终于学会了这一招。

随着航海水平的提高，以及现代制冰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的渔民都具备了远航的能力，一场争夺海洋渔场的大战随即打响。19 世纪末期，日本渔船率先发难，开始入侵中国海域，和中国渔民争夺捕鱼权，为此中日两国发生了多次冲突，为后来的中日战争埋下伏笔。

1930 年，民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出访日本，被日本渔业和航运业取得的进步震惊了，回国后大声呼吁民国政府向日本学习，改革渔业管理思路。他在给商部提交的一份咨文中写道："欧洲渔业自西历一千六百八十二年始设会于伦敦……不数十年，由三海里之渔界，扩充至二千五百余海里。德、法继之，美、俄复继之，义、奥诸国又继之，渔业遂与国家领海主权有至密极切之关系。……中国渔政久失，士大夫不知有所谓海权。"

经过深思熟虑后，张謇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渔权即海权。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巩固海上边界，就必须扩张和加强捕鱼权。他在另一份写给商部的咨文中写道："海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互相维系，各国皆然。"

张謇的主张得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从此中国的海洋渔业除了为老百姓提供水产品和为国家增收创汇之外，又多了一个政治外交的功能。

蓝色沙漠

国与国之间的陆上边界几乎都是打出来的，但海上边界则大都是谈出来的。1982 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是大部分国家都承认的海洋最高法，该法对内水、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重要概念做了界定，其中领海的宽度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 12 海里（1 海里约等于 1.852 公里），这片海域属于国家领土，任何人不准侵犯。

专属经济区（EEZ）又名"排他性经济海域"，其范围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 200 海里，但这个距离太大了，经常会和相邻国家有冲突，所以在画线的时候必须除去离另一个国家更近的点。专属经济区的概念源于渔权争端，后来随着海底石油开采技术的成熟而逐渐盛行，最终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收入。顾名思义，专属经济区的主要功能和经济有关，区内的生物和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归主权国所有，但其他国家则享有航行和飞行的自由，以及其他符合国际法的用途（比如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

中国于 1996 年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同时宣布中国实施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两者加起来约有 300 万平方公里。即使刨去那些有争议的海域不算，中国也有 200 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可供中国渔民自由作业，占到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读到这里也许有读者会问，这么大一片海域里产的鱼难道还不够中国人吃的吗？答案是：确实不够，因为大部分海洋的生产力极其低下，是一片蓝色沙漠。

懂点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太阳，所有的有机物都是光合作用的产物。一个生态系统里的生物量完全取决于光合作用的效率，大海当然也不例外。光合作用需要阳光、水、二氧化碳和一些微量元素，光合作用的效率取决于供应量最少的那样东西到底有多少，就好比一个水桶能装多少水，完全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到底有多长。对于深海、洞穴以及冬季的极地来说，短板是阳光；对于其他大部分温带陆地来说，短板是水；对于热带和亚热带雨林来说，短板是二氧化碳；而对于表层海水来说，短板是进行光合作用所必需的微量元素，比如氮、铁、磷和钙等。

海洋中的大部分微量元素都来自陆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来自土壤，这就是为什么靠近大陆的近海海域和海岛周边的浅海海域会有那么多鱼的根本原因。问题在于，这些海域大都是别人的领海或者专属经济区，外人是很难闯进去捕鱼的。

"通常情况下，海水越深生产力越低，全球最好的渔场几乎都在地理概念上的大陆架区域。"上海海

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在全球范围内，蔚蓝的海洋正遭遇史无前例的生态危机

洋大学的唐议教授对我说，“如果全球所有国家都划定 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话，那么全球渔业资源的 90% 都会被划入各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范围。”

深海中靠近海床的底层海水中也有很多微量元素，但那里没有阳光，缺乏食物。只有当上升海流把底层海水带至海面时，光合作用才能发生。南美洲西海岸之所以有那么多鱼，就是因为著名的秘鲁寒流（又叫洪堡寒流）正好通过那里。这股寒流从海底卷起了大量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生长繁殖，为鱼类提供了充足的饵料。据统计，全球海洋捕捞总量当中有将近五分之一来自秘鲁寒流生态系统，光是一个秘鲁渔场每年就可以产出 1000 多万吨鳀鱼。

另一个类似的具有很强上升流的地方是南极周边的海域，可以称之为南极海。虽然这片海域温度很低，但因为微量元素含量高，同样聚集了大量浮游生物，这就是为什么南极盛产磷虾的原因。

可惜的是，全球像这样的海域非常少，全部加起来总面积也只占到全球海洋面积的 5%，但这一小片海域产出了全球 25% 的渔获，由此可见海水中营养元素是多么地缺乏。事实上，地球上大部分海洋单位面积所能产生的生物量比大部分戈壁滩都要少，海洋才是地球上最大的沙漠。

海水的光合作用效率高低用肉眼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海水的颜色越绿，说明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高；相反，海水的颜色越蓝，光合作用的效率就越低。也就是说，大家都喜欢的蔚蓝色的海水对于生命而言就是一片死亡之海。而大部分海岸线和岛屿周边的海水都是绿色的，这些地方就相当于沙漠中的绿洲。

当然，即使是最干燥的戈壁滩上也会有耐旱的灌木生长，沙子下面也可以找到昆虫等小动物。同样，即使是生物量最低的南太平洋海域也能找到洄游途中经过此地的鱼群，数量还不低。但不管怎样，真正的海洋绝不像潜水纪录片里看到的那样生机勃勃，而是

“明茂号”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电机设备

（黄宇 摄）

一个对所有生命而言都非常严酷的地方，海洋生态系统甚至比某些陆地生态系统更加脆弱，一旦被破坏了就很难恢复。当我们把目光对准海洋，试图从大海里寻找新的食物来源的时候，不妨再想一想：我们其实是在沙漠里打猎，每一枪都会产生巨大的破坏力。

但是，作为蓝色沙漠中的猎人，渔民们也要吃饭，他们必须努力寻找沙漠中的绿洲，把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尽可能多地抓到手。随着中国渔民的作业区越来越远，他们必然和相邻国家的渔民发生冲突。于是，经过一番协商之后，新版《中日渔业协定》于 2000 年 6 月正式生效，《中韩渔业协定》于 2001 年 6 月正式生效，《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于 2004 年 6 月正式生效。这三份渔业协定重新划定了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渔业作业区，使得一大批中国渔民不得不退出传统渔场另谋生计，特别是北方渔民的很多传统作业区都退给了韩国，使得近海捕捞承受的压力更大了。

“东海日本一侧水域距离中国较远，水也深，矛盾还不十分突出。中韩之间都是浅海，渔业资源丰富，矛盾就来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对我说，“以前黄海大部分海域都有中国渔船作业，新协定签署后很多渔场中国渔民都不能去了，但还是有不少人偷偷越界捕捞，被人家抓了不少。这方面的报道越来越多，我看着很不舒服。一方面我希望中国渔民遵守两国渔业协定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我也希望韩国有关方面手下留情，别动不动就用武力来对付中国渔民。”

我采访过的一位舟山船主告诉我，很多舟山渔船自发地结成船队，集体越界偷渔，一见到韩国海警船就一起往回跑，很多时候都能成功逃脱。万一被抓住，只要每艘船交 40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就能放，回来后大家分摊这笔费用。

“中国这边没什么鱼了，但韩国那边还有很多，只有去那边才能抓到好鱼，所以大家没有别的选择，宁可冒着被罚款的风险去盗捕，更何况那笔罚款分摊下来也就没几个钱了。”他说。

“为什么韩国那边鱼这么多呢？”我问。

“韩国人比较守规矩。比如他们有试捕的规定，一网下去如果捞上来的鱼小于某个尺寸就必须放弃这次捕捞，等鱼长大了再回来捕，所以人家那边鱼又多又大。”这位船长回答，“而且他们捕鱼是有配额的，到了配额就不捕了，因为超过的部分即使捕上来也卖不掉。中国渔民没有配额，无论捕到多少鱼都不愁卖不掉，当然都希望多捕点。”

2013 年 4 月 3 日，韩国海警在全罗北道群山市于青岛以西 82 公里海上对涉嫌“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采取执法行动

就这样，渤海、黄海和东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里的鱼都被中国渔民捞得差不多了，很多海域都已荒漠化，变成了人造的蓝色沙漠。

那么南海的情况怎样了呢？这片海域水浅污染少珊瑚礁多，是全世界著名的五大高产水域之一。但是，根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渔业经济研究系系主任拉希德·苏麦拉（U.Rashid Sumaila）教授和该系副教授张伟龙合写的《中国南海渔业资源展望》一文，整个南海海域的渔业资源量已经比 1950 年减少了 70% ～ 95%，珊瑚礁正以每年 16% 的速度在减少。造成这个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捕捞能力过剩。根据这篇论文的统计，南海聚集了全球 320 万艘渔船当中的 177 万艘，在南海作业的渔民总数高达 370 万人！这些渔民每年从南海捞上来 1000 万吨左右的渔获，占全球海洋渔获总量的 12%。这还只是官方数字，据两位专家估计，南海地区每年另有 800 多万吨的渔获未被统计，因为其中有很多鱼都是用炸药或者氰化物这类非法捕捞方式捞上来的。如果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的话，南海也会重蹈东海和黄渤海的覆辙。

就这样，走投无路的中国渔民们只能把目光转向了公海。

远一点，再远一点

公海曾经是专供欧洲人驰骋的舞台，因为他们最先具备了大规模远洋航行的能力。亚洲国家中日本最先意识到公海的价值，率先提出了向公海进发的口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政府于 19 世纪 90 年代制定了相关法律，为有能力去公海水域捕鱼的日本船只提供财金激励。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学习日本，于 1914 年制定了《公海渔业奖励条例》，但奖励金数量明显不足，根本达不到刺激渔民奔赴公海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的头 30 年里中国的近海还是有鱼的，远洋捕鱼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转机出现在 1985 年，当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首次提出要“扶持外海和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合理安排内水和近海捕捞力量”。于是，有关部门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远洋船队，向公海进发。

严格来说，远洋捕鱼分为“过洋性远洋捕鱼”和“大洋性远洋捕鱼”两种，前者指的是通过购买配额或者许可证等方式在别人的经济专属区内捕鱼，后者指的是在公海捕鱼。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航行很远的距离，对于渔船质量、捕捞水平和后勤保障等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风险也相应地增加了很多，盈利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中国的远洋渔业仍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的主要原因。

要想了解远洋捕鱼业的真相，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跟船出海，但远洋渔船的出海时间往往是以年为单位的，普通记者很难跟得上去，因此关于公海捕鱼的新闻报道非常少，渔民们的生活细节也不为人知，甚至因此而产生了些许神秘感。我有幸联系到了舟山市泛昌贸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红波，他答应带我去参观远洋渔船。

“我以前也在远洋船上干过，负责电器设备的维修。”陈红波自我介绍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出海打鱼比坐牢还辛苦！所以我干了几年就不干了，在岸上开了家贸易公司，专门为远洋渔船提供电气设备。”

陈红波开车载我来到位于舟山市普陀区的沈家门渔港，这是个天然的避风良港，不少渔船停在这里修整。我一眼就看到两艘大船并排停靠在码头上，比较旧的那艘叫“明茂”，长 76 米，排水量 2000 多吨。船身上下到处是水锈，显然已经很久没有刷过漆了。另一艘“舟渔 915”非常新，一看就是刚刚建成下水，还没有出过远门的新船。船头上挂着的铭牌显示，这是一艘只有 52 米长的鱿钓船，隶属于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

如果不是刚刚体验过近海捕鱼，我肯定会觉得这两艘船都太小了。我去年曾经搭乘一艘排水量高达 9 万吨的巨型邮轮环游世界，一路上见到了无数万吨级远洋货轮，觉得跑远洋的一定得是这种庞然大物，这个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不过，这两艘船虽然小，但比我刚刚体验过的那艘近海渔船却又大多了，看来要想真正理解远洋渔业，最好的办法就是和近海捕鱼做对比。

“‘明茂号’是中国水产有限公司舟山分公司的船，实际上应该算是国营企业。这艘船是 2005 年建成下水的，在远洋渔船里算是挺大的了。”陈红波告诉我，“我还记得 20 年前中水公司造了 4 艘远洋渔船，‘明达号’‘明兴号’‘明远号’‘明旺号’，合称‘四大天王’。说起来它们都没有‘明茂号’大，但我们去非洲捕鱼的时候当地华侨看到了都直流眼泪，说祖国终于也能造这么大的渔船了！”

很不巧，“明茂号”的船长有事下船了，幸好陈红波对这艘船非常熟悉，领着我直接登船参观，并一一给我讲解船上的设备都是干什么用的。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远洋渔船确实比近海渔船要先进太多了。我在驾驶室里看到了包括雷达和声呐探测仪在内的各种先进设备，以及一台 24 小时不间断的传真机，可以随时知道前方海域的天气变化。船上的卫星定位仪则直接和渔业局的远洋调度中心相连，农业部可以随时知道这艘船的准确位置，船长如果想越境偷鱼的话立刻就会被发现。

驾驶室后面是船员宿舍，四人一间，床铺安排得非常紧凑，绝对谈不上有多舒适，但起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空间，和大学宿舍差不多。船舱里没有多少储物的地方，但船员们似乎也没有太多个人物品，除了被子和几件晾洗衣物之外就没啥了，我没有见到一本书，连电脑也很少见。我转了一大圈，只在一张床的侧壁上看到了几张美女贴纸，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能体现出主人爱好的装饰物，这一点和大学生宿舍完全不同。

陈红波告诉我，“明茂号”是根据日本远洋渔船的样式设计出来的，日本人习惯了在狭小的空间生活，船员宿舍设计得非常小。他曾经在一艘德国淘汰下来的远洋渔船上工作过，那艘船的员工宿舍就非常宽敞，欧洲人在这方面远比亚洲人讲究。

参观途中遇到了“明茂号”的大副，这位瘦得像根竹竿一样的年轻人带着我参观了船上的公共浴室和厕所，虽然设备很简陋，但还算干净，这就已经很难得了。船员们用的淡水是靠海水淡化得来的，生活废水则必须先用污水净化设备处理后才能排向大海，厨余垃圾也必须用专门的设备先打碎才能扔到船外。

“远洋渔船的规矩非常多，可复杂了！”大副向我解释道，“比如垃圾处理的标准和船距离海岸线的远近有关，不同的距离处理标准是不同的，一旦被海岸警卫队抓到你违规肯定会被罚死。”

我没有亲身经历，不知道这些规矩在海上的执行情况如何，但我觉得这总比那些根本没有规矩，因而可以肆无忌惮地往海里乱扔垃圾的私营小渔船要好得多。事实上，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国有企业最大的优点所在，毕竟远洋渔业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政治外交。

根据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教授的统计，2010 年时中国有大约 1900 艘远洋渔船，大部分是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才能生

存的国有渔船，如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3400艘，私营渔船所占比例超过了半数。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原因是部分国企私有化，更大的原因是西非沿海国家将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的捕鱼权卖给中国私营企业，以换取中方的投资，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也许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中国远洋渔业负面新闻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中国人独有的生活习惯总是不会变。船上的厨房满是油污，一看就是经常炒中国菜，又不及时清洗。据大副介绍，船上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25元，顿顿都有肉，起码鱼是肯定可以保证的。蔬菜也能保证，但当然都是冷冻的。主食原来都是大米，几年前改成了一半米一半面，因为越来越多的船员都是从北方招来的农民工，吃不惯大米。

“所有船员签的都是两年合同，两年之后还想干就再签两年。普通船员每年6万元工资保底，小组长会多个1万～2万元。在海上的时候基本不用花一分钱，工资全都能存下来。”大副对我说，“我们还会根据捕捞量发奖金，比如去年我们一共捞上来2200吨鱿鱼，算是大丰收，因此每人都发了1万～2万元奖金。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只捞到200吨鱿鱼，奖金肯定泡汤了。”

鱿鱼价格最高的时候每吨2万元，今年降到1.5万元一吨，即使按照这个价格计算，去年这艘船也挣了3300万元，可见远洋捕鱼如果运气好的话还是能赚很多钱的。今年上半年这200吨鱿鱼可以卖300万元，听上去也不算少了，为什么居然连奖金都发不出了呢？

“我们这艘船上一共有50名船员，光工资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另外，这些人的伙食费每天就要1250元，一年50万元又去掉了。”大副给我算了笔账，“更大的花销是柴油，因为我们只能从公海上的加油船买油，价格非常昂贵。好在政府有柴油补贴，这样算下来每年也必须捕600吨鱿鱼才能保本。如果没有油补的话，每年至少要捕到1500吨鱿鱼才能持平。”

“远洋捕捞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捞到的鱼越少，柴油反而消耗得越多，因为我们必须开着船追鱼，万一追错了方向，不但鱼捕不到，柴油消耗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大副继续给我普及远洋渔业知识，“所以远洋船上的船长压力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决策很可能就赔死了。”

“其实你今天能看到‘明茂号’是很幸运的，为了省钱，远洋渔船一般两年才回一次母港。”陈红波补充道，“‘明茂号’刚刚在阿根廷附近的公海上钓了8个月鱿鱼，眼看收成不太好，便决定回到母港改装设备，再出发去北太平洋钓秋刀鱼。”

秋刀鱼目前的价格只有每吨8000元，比鱿鱼低多了，但秋刀鱼产量大，可以弥补价格的不足。事实上，这就是远洋渔业的最大特点：要么只捕高价鱼，要么只追高产鱼，两者必居其一，否则一定亏本。

我们回到甲板上，只见工人们正在拆鱿鱼灯，准备换成诱捕秋刀鱼的专用灯具。虽然鱿鱼和秋刀鱼都有趋光性，但因为捕捞方式的不同，使用的灯具也不同，这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看着甲板上密密麻麻的灯泡，我突然意识到这才是远洋渔船和近海渔船最大的不同。除了少数蟹笼船之外，中国近海渔船大都是多鱼种作业，一网下去捞上什么是什么，但远洋捕鱼高风险高成本的特性决定了远洋渔船大都是单鱼种作业，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其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可低估。考虑到中国是全世界拥有海洋捕鱼船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渔民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海洋物种未来的命运。

海洋生态危机

中国开展远洋渔业只有30年的历史，只能算是世界远洋渔业俱乐部的后起之秀。中国渔船进军公海之前，来自欧美的远洋渔船早就把海洋捞过好几遍了。

远洋渔业非常讲究性价比，欧美渔船也不例外。他们最先看中的是鲸，因为鲸体内的脂肪是工业革命的润滑油，在当年可以说是无价之宝；再加上鲸的体型庞大，捕获一头鲸相当于捕捞几百万条小鱼，这就是为什么捕鲸如此危险，却还是有那么多渔民甘愿铤而走险的原因。早期渔民使用的是小帆板和鱼叉，后来则用上了快艇和捕鲸枪，再厉害的鲸也不是对手了。鼎盛时期全世界每年杀死超过5万头鲸，不少鲸的种群都濒临灭绝。好在人类社会终于明白过来，于1986年彻底禁止了商业捕鲸行为。但是，鲸是哺乳动物，繁殖率相当低，恢复起来需要很长的时间，现在还不能掉以轻心。

下一个被人类盯上的是海龟，因为它们的肉很好吃，另外活龟可以不吃不喝很长时间也不死，是远洋船最可靠的食物来源。后来这个需求不存在了，人类又盯上了海龟蛋，因为根据民间传说，海龟蛋可以壮阳，于是成千上万的太平洋海龟蛋被盗走，其结果可想而知。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每年有10万只海

印尼海警在库塔海滩放生偷猎者非法捕猎的绿海龟

龟在北太平洋东海岸产卵，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不足3000只。好在人类及时反省，如今全部7种海龟有6种被列入了国际濒危物种名录，商业捕龟和偷蛋行为均被严格禁止。

第三个遭殃的是鲨鱼。其实鲨鱼肉不怎么好吃，体内脂肪含量也不高，这就是为什么体型同样很庞大的鲨鱼能够逃过一劫的主要原因。可惜华人喜欢吃鱼翅的习惯被全世界的渔民们知道了，于是每年有4000万～7000万只鲨鱼被杀死，只占体重5%的鱼翅被割下，身体的其余部分被扔进海里。鱼翅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每公斤400～500美元，鲨鱼肉连零头都卖不到，留着太“浪费”了。

这个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远洋捕捞业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资源浪费。远洋渔船大都是单鱼种作业，但没有任何捕捞手段能够保证不误伤到其他鱼种。出于商业的考虑，大部分这类“副产品”都被扔进海里了，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具体到鲨鱼的案例，只留鱼翅的做法可以让渔民捕捞更多的鲨鱼而不用担心冷柜的空间，于是鲨鱼种群就遭了殃。鲨鱼虽然不是哺乳动物，但大部分鲨鱼是卵胎生的，繁殖率并不高。幸运的是，因为有大批明星参与到拒绝鱼翅的公益宣传上来，使得鲨鱼保护成为海洋动物保护运动中罕有的一个成功案例，同时也让鲨鱼成为海洋保护的标志性物种，其地位大概相当于陆地上的大熊猫。

第四个遭殃的是金枪鱼。金枪鱼的故事很奇特，以前它并不是一种珍贵的鱼类，海钓爱好者们之所以喜欢钓金枪鱼，只是因为它们游速快，有个外号叫作“海洋中的法拉利”，对于海钓者来说是个挑战。传统的日本生鱼片也是不用金枪鱼的，日本人嫌它太油腻了。“二战”后日本经济腾飞，和北美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飞往加拿大的运输机返程时没货可运。为了减少浪费，有商人想到了金枪鱼，将其冷冻后运回日本制成寿司。此时恰逢日本人在饮食习惯上开始向欧美靠拢，喜欢上了这种脂肪含量高的鱼类，金枪鱼的价格立刻被炒上去了。2013年一只蓝鳍金枪鱼在东京筑地市场的拍卖会上拍出了176万美元，此事虽然有作秀的成分，但也说明这种鱼被炒到了何种程度。如

今国际市场上一只中等大小的蓝鳍金枪鱼可以卖到2万美元以上，如此高昂的价格使得大部分金枪鱼都被喜欢吃生鱼片的日本人消费了。不久前北京一家日料店花20万元人民币从日本进口了一条300斤重的蓝鳍金枪鱼，制成生鱼片后的零售价可想而知。

另一个和金枪鱼类似的案例是龙虾。美国东海岸曾经盛产龙虾，但当年却无人问津，居然有罪犯控告政府虐待犯人，证据是监狱食堂只给他们吃龙虾！后来一些去海边度假的明星们喜欢上了这东西，龙虾摇身一变，成了海鲜中的绝对明星。

鲸、鲨鱼和金枪鱼都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相当于陆地上的狮子、老虎和猎豹，它们的存在对于维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它们的数量大幅下降，就会导致次级捕食者数量暴增，其结果就是小鱼小虾这些被捕食者数量锐减，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世界粮农组织（FAO）的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海洋大型捕食者的数量比1950年降低了90%，这一点和陆地猎场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极为相似。

海龟虽然不算是顶级捕食者，但它们的作用也很大。比如，每只成年太平洋海龟每天可以吃掉90公斤水母，海龟数量大幅下降后美国西海岸水母成灾，这玩意没什么营养价值，身体却有毒，凡是有水母出没的海滩都得关闭。更糟糕的是，水母是吃小鱼的，水母成灾的海域小鱼迅速减少，未来的渔业产量肯定会大打折扣。

类似的情况在舟山也出现了。如今舟山海域同样水母泛滥，好在中国人什么都吃，完全无味的水母被做成了凉拌海蜇皮，也算是一道菜。

水母的例子不是个案。事实上，随着海洋捕捞力度越来越大，那些人类需求量大的，或者繁殖能力较差的种群数量锐减，但一些对人类没什么用的物种却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其种群数量反而增加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布朗温·吉兰德斯（Bronwyn Gillanders）教授在2016年3月23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得出结论说有至少35种海洋头足类动物（比如鱿鱼、乌贼和章鱼）在过去的60年里种群数量有了显著增加，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大都是一年生的低等动物，不但繁殖速度快，而且对恶劣环境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但是，正因为它们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的营养价值也就没有鱼类高，口味也不如大部分鱼类好，西方人吃得不多。

不过，鱿鱼们的好运气不知道还能持续多久，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我出海那会儿太平洋上的鱿鱼特别多，它们会在海面吹泡泡，从远处看过去就像下雨一样。”陈红波对我说，“这两年有大批中国渔船去大洋里抓鱿鱼，鱿鱼的产量就越来越少了，‘晴天下雨’的景象就消失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独特的饮食习惯正好填补了西方人留下的空白，因为中国人把一些原本没有太大经济价值的海洋鱼类开发了出来。另外，中国人比较会吃鱼，浪费较少，这点也比西方人强。

“我以前在一艘外国船上打过几年工，主要工作就是把鱼肉切下来，剔掉骨头后打包分装成鱼排。”陈红波继续回忆，“剩下来的鱼头老外都扔掉了，我们几个中国船员便捡回来做红烧鱼头吃，把老外看傻了。”

那些无骨鱼排大都是冷冻后供应给欧美市场的，西方人对鲜度的要求不高。中国人最喜欢吃活鱼，最起码也得是全鱼，所以后者都供应给中国市场了。中国的私营远洋渔船出海打鱼纯属商业行为，谁出价高就卖给谁，于是就有了日向鱼、欧向鱼和非向鱼的说法。日向鱼主要是能做生鱼片的高价金枪鱼，欧美也要金枪鱼，但大都是拿去做罐头，鲐鱼（Mackerel）则主要供应非洲市场，这是一种海洋上层鱼类，价格不高，但产量大。

鱿鱼则大都运回中国，供应中国市场。这种鱼数量较多，目前还没有危险，所以没有捕捞限制，只要是在公海上钓鱿鱼，能钓多少就钓多少。鲸、鲨鱼、金枪鱼和大马哈鱼这类有灭绝危险的鱼类就不同了，必须严加保护。但它们大都是洄游鱼类，光靠一个国家是不行的，必须多个国家合作才行。1982年出台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所有国家一起来保护海洋洄游鱼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当于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总原则，虽然有强制性，但这个公约没有细则，所以可操作性不强。”上海海洋大学的戴小杰博士在接受我专访时对我说，“直到1995年通过了《鱼类种群协定》，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了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海渔业资源的管理才具有了可操作性。”

戴小杰博士是中国远洋渔业协会金枪鱼技术组的专家，同时也是“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科学分委会的中方团长。他告诉我，不同的海洋动物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保护方式，像鲸豚类已经有了双重保险，一个是国际捕鲸委员会（IWC）

的禁捕令，一个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禁贸令，可以说保护机制比较完善。但像金枪鱼这类可以进行商业化捕捞的高度洄游鱼类，就只能由利益相关方在“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的协调下进行管理。像他参加的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这些组织会使用多种方法管理海洋渔业资源，比如使用渔获物的配额制度，以及渔船总数控制等。

就拿金枪鱼来说，这是全世界管理最严格的商业鱼种之一，全球关于保护金枪鱼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一共有 5 个，中国参加了其中的 4 个。所有机构每次召开各成员的缔约方大会之前都会先开科学大会和履约大会，由该组织的科学家根据最新的研究向大会汇报金枪鱼资源状况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并形成协商一致的科学报告，然后缔约方大会再依据此科学报告的结论，提出对该区域的金枪鱼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交由政治家投票。

“所有这类公约的制定都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基于现有的最佳的科学研究’（Best Science Available），不能听凭政治家拍拍脑袋就做决定。”戴小杰博士补充道，“另一个是‘预防性原则’（Precautionary Approach），即在结论不确定的时候选择相对保守的策略。比如科学计算的结果是每年可以捕 10 万吨，但因为科学总会有误差，最终政策要降一点，每年捕个 8 万～ 9 万吨就应该封顶了。”

戴小杰说的是理想状态，实际情况往往没那么乐观。“国际保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曾经商讨保护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科学家建议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不应超过每年 1.5 万吨，否则该种群资源量就会严重下降，如果还想要恢复种群数量的话，捕捞量最好不要超过每年 1 万吨。但是，在各方的压力下，该委员会最终投票通过的限额为 2.95 万吨，是科学家建议的两倍。

捕捞上限的确定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究竟用哪种方式来达到限额，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多了。国际上最早采用的方式是不事先搞分配，而是大家一起抢，直到总额达到上限为止，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奥林匹克式”。实践证明这个方式鼓励大家快捕快捞，甚至不惜采用作弊的方式偷猎，实际效果很不好。于是有人提出事先将捕捞限额分配下去，这样大家就不必跟别人抢了，可以有计划地慢慢捕，甚至还可以将自己分到的配额进行交易，便于提高捕捞效率。第二种方法的难点在于如何分配捕捞配额，目前普遍采取的做法是根据历史上的捕捞渔获量进行分配。别看鱿鱼现在随便钓，一旦将来鱿鱼数量减少，不得不纳入配额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就可以用历史捕捞数据来增加自己的配额，或者起码可以增加自己在谈判中的话语权，这就是远洋捕鱼的政治外交功能的一种体现。

“中国很早就提出要在国内实行配额捕捞制度，但一直没有做起来，主要原因就是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戴小杰补充道，“以前中国渔业过度追求 GDP，科学研究也只以提高产量为目的，这是错误的。现在则主要以提高就业，或者增加渔民福利为目标来制定渔业政策，这也是不行的。”

戴小杰认为，渔业政策的制定应该以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为首要目标，这就要求政治家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必须以科学为最终依据。“美国为什么管得好？原因就是美国政府的渔业政策是基于‘美国海洋及大气管理局’（NOAA）的研究结果制定出来

乌贼

海洋软体动物，广泛分布于热带和温带海洋之中，冬季在深海越冬，4～6 月洄游至浅海产卵，乌贼卵孵化后不久成体即死亡。乌贼遇到强敌时会以“喷墨”作为逃生的方法并伺机离开，因此又名墨斗鱼。乌贼味道鲜美，体内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少，是中国传统四大海产之一。目前中国近海野生乌贼已经十分稀少，极难捕到，但乌贼的养殖技术尚未成熟，因此市面上很少有卖的了。

鱿鱼

海洋软体动物，主要生活在大陆架内，身体呈流线型，靠漏斗喷水前进，游泳速度非常快，因此也被称为枪乌贼。鱿鱼是杂食性动物，以小鱼小虾为食，但本身也是金枪鱼和海鸟的捕食对象。鱿鱼是中国远洋渔船的主要捕捞鱼种，因西方人吃得不多，所以野生鱿鱼资源丰富，渔获量很大，但因为过度捕捞，近几年产量下降得很厉害。不过鱿鱼是一年生的，种群恢复的速度非常快。

的，而NOAA科学家的首要任务不是发论文，而是为美国政府制定可持续渔业政策提供最可靠的科学依据。”

渔业光有好的政策还不够，还必须保证严格执行才行，这就涉及到捕捞量统计的准确性问题。中国在这方面曾经饱受诟病，丹尼尔·保利教授认为中国多报了国内渔获量，瞒报了远洋捕捞数额。比如2000～2011年中国汇报给世界粮农组织（FAO）的远洋渔业年捕捞量为36.8万吨，但据他估计实际捕获量为460万吨，相差了一个数量级。而根据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数字，2014年中国远洋渔业总产量达到了203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68万吨，一下子增加了50%。按照官方解释，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鱿鱼和南极磷虾的捕捞量大幅度上涨。

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金显仕所长认为，丹尼尔·保利的研究结论不足信，因为中国早期远洋船队大都是二手船，装备比较落后，捕捞效率并不高，年捕捞量不可能有400多万吨。事实上，我国近海捕捞产量包括了西方并不捕捞和不吃的种类，如海蜇等，并且没有抛弃小杂鱼。而西方国家的渔业统计至少有30%左右的误差，主要是有约30%的小个体或非目标种的渔获物在海上就被抛弃了。FAO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海上抛弃物的问题，希望能找出一个好办法，把这部分渔获也算进去。

戴小杰则认为，中国确实在渔业日志、月报系统和独立观察员制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中方在国际机构的履约评分中排名往往比较靠后，经常被评为C级。

“中国人就好比是土包子跳芭蕾，怎么跳都打分不高，因为舞蹈规则毕竟都是人家制定的。”戴小杰说，“不过，我们既然加入了国际组织，那就应该按照他们的规则办事。事实上，我们这几年进步很大，很多领域都在逐渐改善。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中国远洋渔业在中国所有的渔业部门里应该算是管理得最好的，因为国际上加给我们的限制非常多，对我们有很好的监督和促进作用。”

确实，中国国内尚未开始实施捕捞配额制度，但远洋渔船却早已率先体验了这个制度的优劣，仅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远洋渔业已经走在了中国海洋渔业的最前列。

最后，即使捕捞上限的制定、捕捞配额的分配和数据统计监督工作全都做到位了，仍然不能保证海洋渔业资源得到妥善的保护，因为还有个非法捕捞的问题亟待解决。非法捕捞包括三种类型，分别是非法、未报告和不规范（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Fishing，简称IUU）。据FAO统计，全球每年因为IUU而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100亿～230亿美元。不但如此，IUU还给科学家制定渔业政策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举例来说，北大西洋的蓝鳍金枪鱼有一半都被IUU抓走了，如果算上IUU的话，北大西洋蓝鳍金枪鱼的实际捕捞量为6.1万吨，是官方配额的两倍，这个数字相当于北大西洋金枪鱼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

为了打击IUU，在FAO的倡议下，国际社会于2009年通过了《关于港口国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措施协定》，并于2016年6月5日正式生效。该协定的一项核心措施就是所有成员国不允许任何被怀疑是IUU的船只停靠本国港口，这将从根本上打击IUU行为。但中国并没有在这份协定上签字，理由是中国渔政部门和海关分属不同单位，管理起来麻烦太多。

由此看来，要想切实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发展目标，人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尾声

我离开“明茂号”的时候，太阳仍然高高地挂在天上。一群穿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船工仍然在紧张地忙碌着，汗水打湿了他们黝黑的脸庞。船工当中有几个长相有些异样的人，一问才知他们是来自印尼的外籍船工。我试图和他们交谈，发现他们不会说中文，英语也只会简单的日常对话。

“我们已经混得很熟了，平常完全可以用手势交流，一点问题也没有。”一位中国工人告诉我，“其实他们在来中国之前接受过印尼方面的培训，培训机构还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本手册，指导他们如何在中国渔船上工作。”

我观察了一会儿，发现这些工人确实相处得很融洽，工作的时候相互配合也很熟练，丝毫看不出他们其实语言不通，根本无法做深度交流。

“明茂号”上的这群工人普遍比我在新道头村遇到的农民工要年轻很多，看上去就像是20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看似艰苦而又孤独的工作？他们会在这一行干多久？这样的工作还能存在多久？如果没了工作他们还能干什么？

我继续行走，寻找答案。

梁宏达·奥运日更新
大唐雷音SI 首席裁音师
老梁看奥运
LAOLIANG & OLYMPIC
8/5-8/23
北京时间
每晚8点-10点
腾讯直播
扫描关注大唐雷音SI
大唐雷音SI出品
奥运，梁出没……
扫描二维码观看直播

艰难的转型

文 袁越

北戴河新区大蒲河镇的渔民常辉（右）带着游客在渤海湾里捕鱼

（黄宇 摄）

从前的渔民是辛苦的，有《渔光曲》为证；几年前的渔民是幸福的，有“下海”为证；今天的渔民到底怎样呢？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被现代化遗忘的群体

岱山岛新道头村是个典型的舟山渔村，一天上午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最初的感觉和大部分中国农村没什么两样，满眼都是农民自建的一层或者两层小楼，房前屋后的空地上见缝插针地种满了各种蔬菜，老人们坐在屋檐下消磨时光，小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追逐打闹，而中间的那一代人几乎一个也看不见。

如今全中国的农村都是这种哑铃型社会，渔村似乎也不例外。但当我仔细观察，就看出了渔村和农村的区别。新道头村一边是山，另一边是面积不算很大的一块平整的土地，我注意到很多地块上并没有种庄稼，而是铺着一层黑色塑料布，很像是北方农村常见的保温地膜。走近一看才明白，这就是岱山特有的晒盐田。因为这附近的海水非常干净，当地人把海水引上陆地倒在塑料薄膜上晒，水分蒸发后剩下的海盐可以卖出很高的价格，同等面积的盐田收入甚至比种菜还要高。

晒海盐几乎不需要付出任何劳动，内地农民是不可能有这样舒服的赚钱方式的。但盐必须换成粮食才能养活一家老小，鱼也是一样，所以海边的渔民很早就适应了这种以物易物的生活方式，和那些习惯于自给自足的内陆农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了中午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村子里热闹了起来，原来是中间那代人回来吃午饭了！这些人上午都在码头上织渔网，并没有离家太远。如今中国的农民都必须外出打工才能挣到钱，这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渔民虽然名义上属于农民的范畴，但他们似乎并不完全遵从这个定律，仍然有很多人留在家乡，靠打鱼为生。

渔民之所以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原因就在于他

们守着的是一个广阔而又丰饶的海洋，里面有无数高附加值的海产品等待他们去开发。以前的渔民之所以很穷，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去利用海洋里的资源。当他们终于学会了这项技能后，种田农民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首先从海洋渔民开始，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在不和其他行业竞争资源的前提下率先致富。

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让渔民成为中国农民当中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但是，因为各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原因，这一轮改革开放并没有引入对过剩产能和低级生产能力的淘汰机制，也没有制定出促进产业升级、提高行业竞争力的良性机制，导致大批文化程度较低，又缺乏相应技能的农民工一股脑涌入海洋捕捞业，迅速将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破坏殆尽。于是，中国海洋渔业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之后，于21世纪初期首次出现了停滞。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2001年生效的中日、中韩渔业协定在一夜之间让中国渔民失去了10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另有26万平方公里的渔场受到限制，相当于每年减少捕捞量120万吨，直接经济损失超过60亿元。2002年生效的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也导致了类似的结果，中国渔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好日子似乎已经到头了。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农业部于2013年11月出台了《关于2003～2010年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实施意见》，标志着海洋渔民转产转业政策正式开始实施。农业部计划将3万艘海洋渔船撤出渔场，30万渔业劳动力实行转产，以此来配合农业部提出的海洋捕捞总产量稳中有降的目标。

像这样短时间高强度的渔民停产转产政策并非没有先例，加拿大政府就曾经在1992年突然宣布禁渔，导致纽芬兰地区近4万名专业捕捞鳕鱼的加拿大渔民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禁渔的原因同样是因为渔业资源的突然枯竭，逼得加拿大政府不得不采取这种一刀切的政策防止鳕鱼资源彻底崩溃。但是，加拿大毕竟是富裕国家，4万名渔民全都及时领到了救济金，不至于挨饿。而中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转产30万海洋渔民，这就相当于在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增加30万个生态移民，难度比加拿大要大多了。

中国海洋大学的同春芬教授在她所著的《海洋渔业转型与渔民转型》一书中指出，中国把渔民置于农民的框架下，却又不允许他们像农民那样拥有土地，他们也不属于城镇居民范畴，不能像城镇居民那样拥有稳定的工作，渔民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被遗忘的边缘群体。

举例来说，普通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不但基本生活有保障，而且部分农民还可以通过出卖土地使用权而获得一笔额外收入。渔民不但没有土地，而且他们的捕鱼权也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渔场和渔船如果被各类建设项目侵占的话，渔民不但得不到任何补偿，反而会因为失去生产场所而沦为无产者。另外，我国虽然名义上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但执行力度远远不够，导致大量非渔业劳动力不断进入海洋捕捞行业，和传统渔民竞争本来就很有限的渔业资源。

把渔民看作是工人也不行，因为传统渔民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健全，医保、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都缺失，不少渔民常年在海上打鱼，教育水平低，和社会严重脱节，根本无法适应陆上生活，更别说换个像样的工作了。

这些差别政府肯定是知道的。海洋渔民转产转业的“双转”政策实行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柴油补贴政策和取消渔业税政策，试图以此来帮助渔民脱贫，但现在的渔民已经分化为70%雇工和30%股东，柴油补贴和减税的好处大都被后者捞走了。股东们其实是相当有钱的一群人，根本用不着补贴。

根据同春芬教授提供的数字，2012年中国海洋渔民人均年收入为1.1256万元，比农民高出3000元。但如果具体分析一下的话不难发现，渔民的高收入是被少数收入较高的渔船主拉上去的，大部分渔民和普通农民的收入基本持平。更糟糕的是，渔民的收入来源单一，结构不合理，经营性收入（也就是卖鱼）比例占到总收入的90%左右，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比例很低。农民的收入来源则相对多样化，这就使得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比渔民强很多。

导致上述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政府在制定相关渔业政策时既有产业目标又有环境目标，两者经常是矛盾的。比如，为了保护海洋环境，中国政府对渔船和马力实行“双控”，但这个政策压制了渔民对渔船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的动力，导致渔民没有能力去远洋作业，无法去公海和外国渔船竞争、从而降低近海渔场的压力。再比如，柴油补贴政策的本意是为了保障渔民生活，但这就导致很多渔民宁可亏本也要死守着自己的渔船不卖，否则就拿不到油补了。

所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上述两个目标统一起来，想办法让渔民一边保护环境一边赚到钱。也就是说，必须想办法大力发展海洋生态旅游，

（黄宇 摄）

大蒲河村的渔民在渤海湾里收流网，捕获的鱼却数量不多

鼓励游客在大海中寻找乐趣。这方面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比如美国就拥有海洋游钓船 200 多万艘，经常从事娱乐性游钓的人数高达上千万，每年为美国创造 500 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日本更厉害，每 3 个日本人当中就有 1 个海钓爱好者，为游客提供海钓服务已经成为日本渔民的一个很重要的替代生计选择。

中国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主要原因就在于真正了解并喜欢海洋的人太少了，海钓行业的服务水平也不高，于是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就拿舟山群岛为例，这片海域本应成为发展海洋生态旅游的一个绝佳地点，但实际情况却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绝大部分游客只要能在海滩上玩玩沙子或者去海鲜大排档吃一顿就满足了。舟山旅游局把沿海的那些所谓“景点”全都圈起来卖高价，但像新道头村这种能提供真实出海打鱼体验的生态旅游项目却无人问津。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游客，因为舟山群岛附近的海域真的没鱼了，出海体验实在是好不到哪里去。

即使是陆上旅游服务往往也轮不到渔民去做，而是被内地来的农民工抢走了。舟山群岛中有座桃花岛，打着“黄药师故居”的旗号吸引旅游者，曾经在桃花岛工作多年的厨师张志斌告诉我，桃花岛 2 万渔民当中真正因为旅游业而转型的只有 100 多人，其他岗位大都被外来移民占据了。

为什么舟山群岛的渔民们无法适应这个新时代呢？其他地方的渔民会不会好一些？带着这个疑问，我又去了趟北戴河，考察了那里的海洋生态旅游业。

自由的渔民

各位读者肯定都听说过北戴河，那是中央领导人避暑的地方。北戴河往南走一点就是南戴河，再往南走一点却又变成了北戴河新区。这块地方又名黄金海岸，拥有长长的优质沙滩，是北京人夏季最喜欢去的避暑胜地之一。我对玩沙子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出海打鱼，便开车去了位于北戴河新区的大蒲河镇，朋友介绍了一个住在那里的名叫常辉的渔民，说他经常

带游客出海打鱼，口碑很不错。

从北京到大蒲河镇需要走一段收费高速公路，路况极佳。但只要一出高速，道路立刻就变得坑坑洼洼起来，路面上还积了一层厚厚的浮土，车子一过尘土飞扬，驾驶体验相当糟糕。我很快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原来这条路直通港口，每天都有无数辆载重卡车从这里经过，路就是它们压坏的。

我在一条隐蔽的小岔路上发现了一整排明显超载的重型卡车，停在那里一动不动。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车躲在那里等主路上执勤的交通警察下班，然后就可以明目张胆地违规行驶了。

开到大蒲河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新修的住宅楼，楼面涂成了棕黄两色，从远处看还挺时髦的。但我走近一看才发现，所有的窗户都是黑洞洞的，竟然连一户人家都看不到。

住宅楼前面原本有一条很宽的马路，如今却被小商小贩的摊点霸占，变成了露天集市。这也难怪，一大片住宅区里连一个居民都没有，楼下的底商也都空空如也，这条路闲着也是闲着，真还不如用来摆摊呢。

“这房子是政府建的，想让我们都搬进去，腾出土地来搞开发。”常辉出来接我，向我介绍了这片住宅小区的来龙去脉，“可这房子质量特别差，我们都不愿搬，正僵着呢。”

常辉中等身材，一头短发，肤色黝黑，却穿了一件白色的李宁牌运动衫，把肤色衬托得更黑了。他领着我走进了真正的大蒲河村，一边走一边自我介绍。他出生于 1980 年，14 岁就跟着父亲下海捕鱼，连中学都没来得及读。如今他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一个是前妻生的，一个是现在的妻子生的。

我这一路考察下来，发现渔民当中离婚的非常多，原因倒也很简单：绝大多数渔民都是男人，他们往往一出海就是很长时间，夫妻聚少离多，婚姻难免不出问题。

大蒲河村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村，到处是裸露的黄土，路边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塑料垃圾。渔民们的房屋一家挨一家，每家都有一个大院子，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渔具。很难想象，如果这些渔民们全都搬到楼里住的话，这些渔具放在哪里。

“政府说我们村的土地被征用了，村里所有人都必须在两年内搬到楼里住。”常辉对我说，“我们村靠近黄金海岸，周围都是为你们北京人盖的别墅和海滨浴场，这块地方早就被开发商盯上了，估计是保不住了。”

走着走着，空气中隐约传来了哀乐的声音。我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越往村里走声音越大，居然真的有人在办丧事。

“死的人是我们村的，他几天前和一个来村里卖冰棍的小贩打架，被人家用刀子捅死了。”常辉说。

“你们这儿的民风可真彪悍啊！”我慨叹了一句。

“那可不，渔民可不好惹！”常辉回答，“我们村前几年出过一个大事，我们的人和山海关那边的人为了争夺渔场，在海上打了一架，对方用船把我们的船撞坏了，死了 4 个人。”

北方人性格彪悍，北方渔民自然也不例外。我后来发现，其实全中国的渔民性格都很彪悍。一个曾经在远洋船上工作过 4 年的人告诉我，大海上没有栏杆，也没有边界，更没有警察，渔民们会觉得自己去哪儿都行，想干什么都没人管，特别自由，再加上海上环境恶劣，他们经常要和老天爷做斗争，拼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于是，出海几年之后，所有人都养成了彪悍刚烈的性格，这一点和草原牧民非常相似。

当天晚上我请常辉吃饭，他居然声称自己不喝酒，把我惊呆了。我这一路上遇到的所有渔民都是酒鬼加烟鬼，无一例外，这一点也和他们常年在海上讨生活有很大关系。

“我以前喝酒出过洋相，所以戒了。”他说。

不过我很快发现，他戒的只是白酒而已，当晚还是喝了两瓶啤酒。对于渔民来说，两瓶啤酒恐怕跟两瓶水没什么两样。他之所以没再多喝几瓶，大概是因为初次和我相见不太好意思吧。

第二天中午从北京来了两男两女 4 位游客，我和他们一起包了常辉的船出海捕鱼。常辉有一艘不到 10 米长的木头船，看上去非常旧了，但仍然可以卖到 4 万元。不过，渔民最大的投资其实是渔具，像他这样的小船花 20 万买渔具是很常见的事情。

常辉开车带着我们来到新区码头，这里有个 1992 年修成的港口，后来包给了私人经营。港口的最深处停着不少像他这样的木制渔船，桅杆上都挂着一面五星红旗。一方面是为了宣示身份，更重要的功能是看风向。出海口附近则是工业区，好几艘运沙船正在卸货，被风吹起的沙子漫天飞舞，一不小心就会进到眼睛里，很不舒服。

常辉告诉我，整个港口都是黑社会控制的，像他这种带游客的渔船每次出海收费 500 元，港口提成 140 元，导游或者中介公司（也就是他嘴里的黑社会）

拿走 200 元，他自己只能拿到 160 元。所以他非常喜欢我这种朋友介绍来的游客，这样可以省掉给导游的 200 元。

常辉点着了柴油发动机，20 分钟后我们已经航行在渤海湾里了。那天天气不好，天空阴云密布，出海不久就下起了毛毛雨，海水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墨绿色，一点也不好看。常辉告诉我，前几年这片海域污染严重，港口里的海水都是臭的。经过这几年的大力治理，海水干净了好多，起码不再有异味了。

因为风大，我们的小船摇晃得很厉害，那几个北京游客很快就晕船了，坐在甲板上不敢站起来。常辉一边操纵渔船一边和我聊天，表情轻松自在，仿佛这里才是他的家。

“干我这行说不准，收成好的时候一年赚十几万，不好的时候血本无归。”常辉对我说，“在海里打鱼也很危险，我有一次出海捕鱼，半道上船坏了，船上又没有通讯工具，在海上漂了 4 天才获救。”

停了一会儿，他又补充道：“不过我喜欢现在的生活，自由自在，不用看别人脸色。别看你们在北京挣那么多钱，可生活压力大啊，周末不还是得到我这儿来放松嘛。”

说完这话，他加了把油门，小船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飞速向茫茫大海驶去。海风把他的眼睛吹得眯了起来，看上去像是在微笑。

此时此刻，我似乎明白了“渔民”这个职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俗话说，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我们不是渔民，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渔民们的内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当我们一边在单位里加着班，一边向往着去海边度假的时候，他们却一直在海上吹着海风，想着自己的心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船行驶到一片开阔海域，常辉决定下网。他用的是中国渔民最常用的底拖网，网口用两块门板撑开。小船拖着渔网在海上绕圈子，希望用这个办法把鱼赶进圈子里，然后被网兜住。底拖网的捕捞效率显然要比定置网高，表演性也更强，但耗油量也上去了，从经济的角度看不一定划算。

第一网捞上来十几条不知名的小杂鱼，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螺蛳和海星，以及几只小虾。虽然捞上来的塑料垃圾没有舟山的笼网那么多，但鱼的个头比舟山的更小，只能炖汤。

“我小时候这里有很多大鱼，随便出海捞一网就可以在家请客了。”常辉对我说，“现在不但鱼的个头小了，种类也少了，只剩下一些生长速度快的海泥鳅和螺蛳壳。”

类似的话，我已经听过好多遍了。资料显示，如今黄渤海有 16 种主要经济鱼类、7 种甲壳类和 3 种贝类资源濒临枯竭，传统的黄渤海群系带鱼、鲆鱼、真鲷、河鲀、黄姑等鱼类全都失去了产业价值。

常辉又下了两网，结果都差不多，一条像样的鱼都没看见。他又为我们展示了流网捕捞技术，终于看到了几条大鱼。说是大鱼，其实每条也就 3 两左右，勉强可以红烧着吃。不过游客们还是很兴奋，纷纷拍照留念，那几条被流网缠住的小鱼作为背景出现在照片里，成为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最后影像。

雨渐渐大了起来，常辉的船没有顶棚，大家决定找地方避雨。常辉驾船靠近了一艘有驾驶室的大船，有个渔民出来迎接我们。原来这是一艘警戒船，这位渔民一个人住在船上守卫附近海域的养殖场，防止有人晚上来偷鱼。这份工作看似无聊透顶，但起码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还挺幸福的。

一个人，一艘船，他在船上看海景，我们在岸上看他，这样的日子你愿意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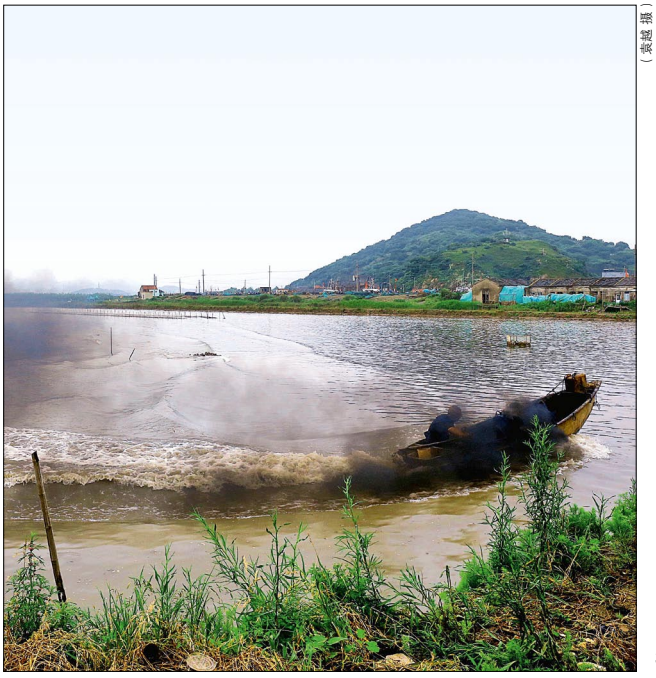
两船并排之后，常辉指挥大家往对面的船上跳。此时意外发生了，一位身材较胖的游客脚下一滑，摔在了甲板上，脑袋被磕破了。虽然貌似并不严重，我们还是决定立刻返航，带他去看医生。像这种私人旅游船，如何保证游客安全恐怕是个大问题。

回程的路上，我终于有时间仔细观察了这片海域。这里距离高档别墅区“阿那亚度假村”非常近，海滩上那个著名的“孤独图书馆”清晰可见。其实那座图书馆一点也不孤独，游客只要稍微往海里游一点就会发现，海面上密密麻麻全是养殖户布下的网箱，这片海域已经被人类彻底占领，成为了海洋生物的饲养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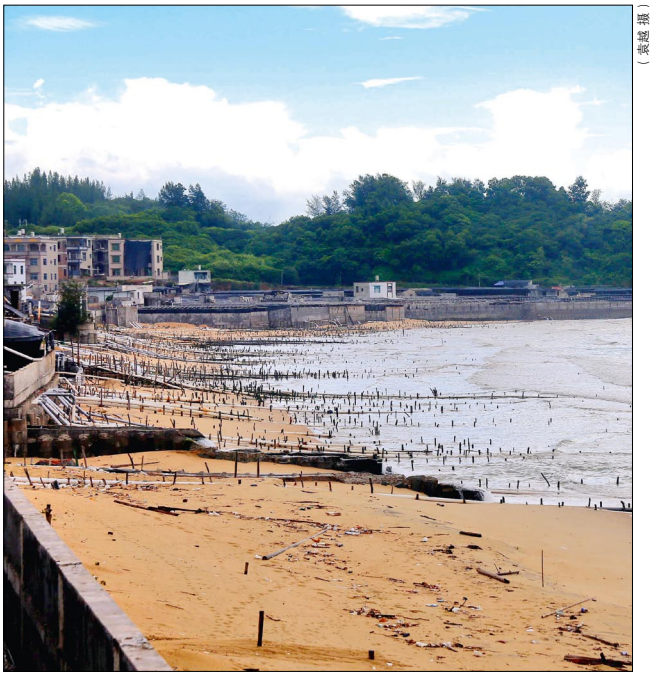
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由此开始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转变。

如今黄渤海有 16 种主要经济鱼类、7 种甲壳类和 3 种贝类资源濒临枯竭，传统的黄渤海群系带鱼、鲆鱼、真鲷、河鲀、黄姑等鱼类全都失去了产业价值。

1 （袁越 摄）



2 （袁越 摄）



3 （袁越 摄）

渔业的未来

文 袁越

捕不到鱼了怎么办？把它们养起来！

为了考察中国的海洋渔业现状，我去了很多地方。一路走下来，有三个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完全猜不出对方是在做什么。

场景一：浙江省岱山县新道头村，一艘小汽艇一边喷着黑烟一边在池塘里打转，驾驶员以极高的速度从池塘的一侧驶向另一侧，然后一个急转弯再驶回来，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转了很长时间。

场景二：山东省烟台市郊区的一处海滩，一台铲车正在把一堆大小不一的石块从岸上转移到一艘平底船上，然后这艘船驶到大海深处，船底的门打开，一整船石块瞬间沉入海底，然后这艘船再驶回岸边，重复这一过程。

场景三：福建省东山岛的一处无人的海滩，细腻的沙子中埋了无数根水管直通海洋深处，管子的另一头连接着一排排人造水泥池，一共有1000多个。海水通过这些管子流进水泥池，立刻又从另一跟管子流向大海。

当我终于知道上述三个场景都是在做什么之后，我立刻知道我构想中的这个关于海鲜的故事应该如何结尾了。如果把海鲜看作是野生动物，把海洋看作是野生动物最后的乐园，那么上述三个场景代表了人类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做的最后努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在这个故事里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

场景一：海洋动物的驯化

场景一里的那个池塘建在新道头村的浅滩上，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堤坝挡住了海水，把这片原本归集体所有的滩涂改造成了水产品养殖基地，总面积高达3600亩。如今这个基地已经被承包给了个人，承包商将其改造成100多个面积约30亩的池塘，再转租给养殖户。养殖所需的海水通过一条人工管道引入基地，再通过一系列水渠和闸门分配给每一个池塘。

基地里主要养殖螃蟹、扇贝、蛏子、虾和鱼类。前三种动物都是生活在池塘底层的淤泥里，这些淤泥需要定期更换。那艘快艇之所以费那么多柴油在池塘里打转，就是为了搅动池水，把淤泥带起来，然后通过排污管道排到大海里去。

“我租了两个池塘，养螃蟹和蛏子。”个体养殖户夏志谋对我说，“海产养殖利润高，但风险也很大，好的年景我每个池塘每年能赚5万元，但差的时候连本钱都保不住。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刮台风，那就有可能颗粒无收了。”

我到的那天正好赶上收获季，夏志谋从外地雇来的几个中年妇女正在干涸的池塘里挖蛏子。她们两人一组，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遮阳斗笠，下身穿着防水皮裤，弓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淤泥里，用双手把蛏子一个一个从淤泥里挑出来。她们每人每天都要挖出180斤蛏子，然后就可以领到200元工资了。

“蛏子苗是我专门从宁波买来的，很贵。”夏志谋向我抱怨，“租金也一直在涨，我每年光租金就要交10万元，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叫承包商赚走了。”

我这一路上遇到的小规模个体养殖户几乎人人都在抱怨，但规模大一点的就不一样了。距离新道头村1公里远的东沙镇有家中等规模的“生岳水产养殖场”，老板刘生岳一脸自豪地对我说：“这是我2013年投资500万建起来的，国家也支持了我80万。按照现在的情况估计，我明年就可以收回全部投资了。然后我准备拿出一部分利润再投资建几个养虾池，地都已经买好了。”

刘生岳养的是南美白对虾，对水质和温度都有很高的要求。养殖场有10个水泥做的养虾池，每个池子占地2亩，上面有顶棚可以保温，同时兼防台风。从大海里抽上来的海水先用漂白粉消毒后再灌进养虾池，并通过电动搅拌机不断搅拌来增加海水的含氧量，仅这一项每年就要花掉2万元的电费。虾苗是从专门的育苗场买的，饵料也是买来的养虾专用饲料。这样的高投入换来的是高回报，每个池子每年可以生产出1.6万斤对虾，如果按照目前每斤对虾批发价25元计算，刘生岳每年可以收入400万元。养虾的利润率大

1. 舟山渔民在收地笼网

2. 浙江省岱山县新道头村，一艘小汽艇一边喷着黑烟一边在池塘里打转，目的为更换池塘底层的淤泥

3. 福建东山岛一处鲍鱼养殖基地。细沙中埋了无数根水管直通海洋深处，管子的另一头连接着一排排人造水泥池，为换水所用

概在50%左右，也就是说这10个养虾池每年可以净赚200万元，难怪刘生岳说话这么有底气。

夏志谋和刘生岳分别代表了中国水产养殖业的两个极端，虽然经营状况有好有坏，但正是这批人撑起了中国水产市场的半壁江山。根据最新版《中国渔业年鉴》提供的数据，2014年中国水产品总产量为6462万吨，其中养殖产量为4748万吨，占比73.5%。总产量当中，海水产品的产量为3296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51%。海水养殖产量为1813万吨，占海水产品总产量的55%。

全世界的情况也类似。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2014年全球渔业总产量为1.957亿吨，其中养殖总产量为1.011亿吨，占比52%。这是全球水产养殖量首次超过野生捕捞量，2014年因此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年。

上一个里程碑年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那段时期人类首次成功驯化了野生动植物，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农业时代。在此之前，人类所需的所有东西，包括食物、衣服和生产工具等等全都是从大自然的手里抢来的。有了农业之后，人类可以自己生产所需的食物，不必事事都听老天爷的安排了。这个变化直接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最终诞生了艺术和科学这两个现代人类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讲，这件事同样意义重大。此前地球上绝大部分生物物种都是通过长时间自然进化而来，每个物种都只为自己而活着，所有的性状都是为了让自己更好地适应环境，更多地繁衍后代。但是，被人类驯化后的动植物失去了这种自由，它们不再具备独立自主的个性，所有的生理特征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存在。

举例来说，作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人类对于家养动植物的基本要求无非就是好吃好养高产抗逆，于是几乎所有被人类驯化的物种，无论是小麦水稻玉米大豆，还是猪狗牛马鸡鸭驴鹅，全都丧失了野生状态时的绝大部分生理特征，其行为模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如今的宠物狗已经不会在野外捕食了，家禽和家畜也基本上失去了在野外逃避天敌的能力，小麦和玉米等农作物甚至已经失去了自我繁殖的能力，只有在人类的帮助下才能繁衍后代。

水生生物在这一轮驯化热潮中明显落后了。丹麦生物学家玛丽安·荷马（Marianne Holmer）和她领导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2007年4月20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综述性论文，得出结论说目前现有的已驯化陆生动植物品种约有90%都是在2000多年以前就被人类驯化成功了，但水生动植物则正相反，人类现有的水产养殖品种中的97%（大约430种）都是在1900年之后才被驯化成功的。

别看水生生物驯化起步晚，但速度却比陆生生物驯化最快的时期还要快100倍，其结果就是水生生物无论是驯化成功的比例还是品种数量都要比陆生生物多。具体来说，陆地植物已有250种被驯化，占已知陆地植物品种总数的0.08%，陆地动物的驯化成功率更低，目前只有44种被驯化，占陆地野生动物总数的0.0002%，相比之下，已有19种海洋植物被驯化，占已知海洋植物总数的0.17%，海洋动物的人工驯化最为成功，目前已有约180种淡水动物和250种海洋动物被驯化，占已知水生动物总数的0.13%。

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现代人具备了更加先进的生物学知识，另一个原因则和生物进化本身的特点有关。为了保护自己，陆生动植物要么自身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成分，要么生活习性太过暴烈，不适合被驯化，其“可利用率”非常低。就拿动物来说，我们的祖先经常食用的陆地野生动物仅有200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在进化上比较高级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其余的都因为肉质太差、体型太小，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而不在人类狩猎的范围之类，因此陆地野兽的驯化对象只能从这200种动物中寻找。相比之下，水生动物大都属于进化上比较低级的物种，食用性要比哺乳动物好得多，人类经常食用的野生鱼类有3000多种，驯化的选择范围要比陆地动物大多了。

虽然种类多，但水生生物的驯化程度要比陆生生物低，尤其是在遗传多样性上的差异最为明显。像猪狗牛马鸡鸭驴鹅等等这几种最常见的家畜家禽几乎全都是在很早以前就被驯化了的少数野生动物的后代，其遗传多样性远比现存的其他野生动物要小得多。换

别看水生生物驯化起步晚，但速度却比陆生生物驯化最快的时期还要快100倍，其结果就是水生生物无论是驯化成功的比例还是品种数量都要比陆生生物多。

句话说，对于一个来自外星球的生物学家来说，他只要研究一下这些动物的 DNA 就可以判断出它们和野生动物不一样，是被人类驯化过的物种。

相比之下，目前已经被驯化成功的 400 多种水生动物当中只有鲤鱼可以和家禽家畜相比，其余物种在种群分化和遗传多样性等方面都更加接近野生动物。中国科学家曾经研究了全球 33 个具有代表性的普通鲤鱼品种的遗传特性，发现它们全都来自同一个杂交品系，这一点和家禽家畜非常相似。这篇文章发表在 2014 年 9 月出版的《自然遗传学》（*Nature Genetics*）杂志上，想了解鲤鱼驯化史的读者可以找来读读。

写到这里需要补充一句：遗传来源的单一和品种的多样化并不矛盾，这就好比地球上的狗全都是某个 1 万多年前被人类驯化的狼群的后代（此结论的一些细节尚有争议），但经过这么多年的人工选择和培育，如今全世界的狗狗们从外表到性格全都相差极大。鲤鱼也是如此，除了食用鲤鱼外我们还有很多仅供观赏的锦鲤，外形也是千变万化的。

鲤鱼之所以如此特殊，原因就在于这是最早被人类驯化成功的水生动物，迄今已有 2000 多年的驯化史。正因为如此，鲤鱼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养殖鱼类，目前全世界 100 多个国家一共养了 2000 多万吨鲤鱼，占全球养殖鱼类总量的 40%。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普通鲤鱼（The Common Carp）的养殖量超过了 300 万吨，占全球淡水鱼类总养殖量的 10%。

中国消费者对这种鱼一定十分熟悉，因为我们最常吃的鲤鱼就是这种。事实上，鲤鱼最早就是被我们的老祖宗驯化的。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范蠡早在公元前 475 年就写了本《陶朱公养鱼经》，里面就提到了鲤鱼的饲养方法。这本书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关于养鱼的技术专著，中国人在水生生物驯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

可惜的是，近代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却掉了队，尤其是在海水养殖方面，更是全面落后于日本。据一位中国海洋科学家回忆，新中国最早搞养殖的那批海洋生物学家学的都是日语，因为当时所能找到的参考书都是日文的。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现代海水养殖体系都是在日本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迅速致富的人口和越来越少的野生鱼类资源就像两针强心剂，把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一下子刺激起来了。最近这 20 年里，中国的水产养殖以每年 7% ～ 8% 的速度在增长，很好地弥补了捕捞业的不足。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早在 1999 年的时候，中国水产养殖业的总产量便首次超过了野生捕捞量，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国家。到了 2006 年，中国的海水养殖总产量也首次超过了海洋捕捞量，同样是世界第一。

根据 FAO 的统计（和中国渔业部门统计数字有些差异），中国水产养殖的总产量占全世界的 62%，海水养殖部分则占到全世界的 70%，贝类养殖更是占到全世界的 80% 以上。

有句话总结得很好：在中国，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养鱼池。

1994 年，一位名叫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的美国学者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第二年，

金枪鱼

大洋暖水性洄游鱼类，身体呈流线型，血液的温度比海水高，新陈代谢极为旺盛，因此游泳速度极快，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金枪鱼的鳃肌已退化，必须不停地游泳才能使新鲜海水流过鳃部以获取氧气，如果金枪鱼停止游泳就会死于窒息。金枪鱼是非常珍贵的海洋鱼类，营养价值极高。其中蓝鳍金枪鱼非常适合做成生鱼片，经济价值极高，大目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价值稍逊，长鳍金枪鱼和马苏金枪鱼又次之。不过，因为是顶级捕食者，金枪鱼体内含有大量重金属，不宜多吃。

三文鱼

溯河洄游性鱼类，在淡水中孵化，然后洄游至大海中成长，最终回到淡水中产卵。野生三文鱼分为北大西洋三文鱼和太平洋三文鱼两大类，根据洄游路线的不同又被分成了若干小类。三文鱼肉色橙红，鳞小刺少，脂肪含量高，非常适合做成生鱼片或者鱼排，也可以腌制或者烟熏。三文鱼养殖业非常成熟，早在 2000 年养殖量便超过了野生捕捞量。三文鱼是世界上第一种被美国 FDA 批准上市的转基因食用动物。

日本鱼市的工作人员在处理金枪鱼。金枪鱼是日本最昂贵的生鱼片食材

青岛渔民抓的小鱼。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现在捕到的海洋生物越来越小

他把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扩展成一本同名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布朗计算了中国的土地资源和淡水资源，以及其他一些影响农业生产率的硬指标，再把中国的人口增长率考虑进来，得出结论说未来中国肯定无法养活那么多中国人，只能去国际市场买粮食，此举必定会引发全球范围的粮荒。

20 年后，布朗的预言显然没有兑现。据说他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误判，并给出两个理由：一个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比他当初预想的更加严厉；另一个就是中国的水产养殖业异军突起，极大地弥补了传统畜牧业的不足。

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中国水产养殖业在过去 20 多年里的高速发展肯定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中国人引领了新的世界潮流。

但是，如此迅猛的扩张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方面。其中，淡水养殖最大的问题是抗生素的滥用。养殖户为了减少损失，往往过量使用预防性抗生素，导致对抗生素产生抗性的病菌在中国泛滥。海水养殖这方面的问题不如淡水那么严重，因为很多海洋生物对水质都有很高的要求，养殖户必须经常换水，抗生素就没用了。

海水养殖最大的问题就是鱼饲料的来源问题。众所周知，鱼饲料中必须含有一定比例的小鱼小虾（鱼粉），无法完全用粮食来替代，根本原因在于陆地上的植物无法合成出鱼类所需的欧米伽 -3 脂肪酸，这东西只能在海藻中被合成出来。小鱼小虾吃了海水中的海藻，于是体内也有了这种对健康十分有益的脂肪酸。

全世界很多企业和科研机构都在研究如何把欧米伽 -3 合成酶基因转入植物当中，以便让普通农作物（比如大豆）也能生产出欧米伽 -3 脂肪酸。包括孟山都公司在内的数家研究机构已经获得了成功，但因为民间反转基因势力太过强大，这个技术至今没有得到应用。于是，渔民们只能把自己辛辛苦苦捞上来的小鱼小虾拿去喂养自家池塘里的高价鱼类，这件事无论是对渔民还是对海洋生态系统来说显然都不是一件好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场景二适时地出现了。

场景二：海洋牧场

场景二里的那台平底船属于烟台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本是一家专门负责填海造路的工程公司，曾经参与建造了著名的青岛海湾大桥。2008 年

公司决定转型，加入到海水养殖的大军中来，因为公司老总意识到填海造路和海水养殖几乎是一回事，完全可以无缝对接。

土木工程和海水养殖怎么会一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养的是海参，一种只有东亚人才喜欢吃的棘皮动物。

“海参是附着在海底礁石上生活的，我们只要造出海礁，让海参有地方待就行了。”东宇公司的工程负责人邹健对我说，“我以前的工作是用石头填海，现在的任务是用石头造礁，两者都是把石头往海里扔，本质上是一样的。”

据邹健介绍，岸上堆放的石块都是从附近的山上挖下来的，他们公司以前就是干这个的，整套程序早已轻车熟路了。这艘平底船每次可以装载 200 立方米的石块，价值 1 万元。他的工作就是把这船石头运到指定海域，然后在 20 秒内倒进海底。这片海域水深 13 ～ 20 米，既不太深也不太浅，扔下去的石块正好可以在海床上形成一个石头堆。

“像这样一船石头我们每天要扔 6 船，6 万块钱就这么扔进水里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在这上面花了 2000 万元，光是去年一年就往海里扔了 25 万立方米的石头。”邹健继续介绍，“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8.3 万亩海域的人工礁石建设，架子已经搭好，就等着收获了。”

“这么大的一笔投资，收回成本一定需要很长时间吧？”我问。

“不用很长时间，因为我们公司产的是野生有机海参，价值很高。”东宇公司的企宣燕青为我算了一笔账，“普通海参都是在池子里养的，喂的是饲料，半年就可以成熟，每斤只能卖 38 元。我们产的是野生海参，不喂饲料，5 年才能长到 3 两一只，每斤售价 120 元。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收获了 30 万斤海参，预计全年可以产 50 万斤，相当于 6000 万元。”

“你们这不也是养的吗？怎么可以当野生的卖呢？消费者能买账吗？”我不解地问。

“我们一不人工育苗，二不喂人工饲料，三更不用任何添加剂，只是为海参提供一个安全的生长环境而已，当然算是野生的！”燕青说，“其实懂行的消费者肯定能分辨出来，因为人工饲养的海参和野生的差别很大。野生海参长短不一，刺短而粗钝，外表不够漂亮，吸盘很密，颜色也不均匀，吃起来有咬劲。人工饲养的又整齐又好看，但吃起来口感松松垮垮，而且有股明显的药味儿，因为他们都会用抗生素和双氧水来消毒。”

燕青非常在意“野生”这个词，跟我重复了很多遍。东宇公司非常看重自己的这个“野生 + 有机”的标签，经常组织消费者跟着潜水员下海体验采参。据介绍，东宇现有 20 名潜水员，用的是导气管而不是压缩气瓶，每人每次最多下潜半小时，手快的一次可以抓上来 180 斤海参。我本来也可以出海体验一次，但不巧的是那几天烟台正好刮大风，一刮风就起浪，海水就会变浑，海参就看不见了，所以整个体验行程都取消了。

我注意到，我一路上采访过的所有渔民都非常在意“野生”这个词，每个人都会说野生的比养殖的要好吃，燕青只不过又加上了一句“野生海参营养价值比养殖的高多了”而已，一点也不奇怪。她还经常把 37 度挂在嘴边，说烟台正处于北纬 37 度线上，这里产的海参质量最好。按照东宇公司官网的说法，37 度是人类最佳的生存体温，与此相对的地理位置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出产的野生海参具有益智健美、软化血管、滋补保健、排毒养颜、提高免疫力等各种神奇的功效。但是，官网并没有给出这个说法的科学证据，信不信由你了。

“可是，你们这么大面积地造礁，会不会影响到这片天然海域原有的生态系统？”我继续追问。

“不会啊，我们除了造礁外不做其他任何改变。”燕青回答，“而且人造礁石会弄破海底拖网，对这片海域的鱼类起到了间接的保护作用。”

这个理由把我说服了。我见识过海底拖网的厉害，“绝户网”这个外号真不是瞎起的。据说经常被拖网作业的海域整个海床都是平的，如果海底突然多出来这么多大石块，不但拖网肯定没法用了，海洋鱼类也更容易找到藏身之处，其他捕捞方式的效率也会大打折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造礁石真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人工鱼礁建设其实就是海洋牧场的一种形式，我所的老所长唐启升院士在这件事上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的现任所长金显仕对我说，“当年正是唐院士牵头，19 位院士专家联名给国务院写信，呼吁保护水生生物资源，这才有了今天这个局面。”

金显仕所长在百忙中接受了我的专访，为我讲述了当年那个里程碑事件的详细经过。就像前文说的，中国的海洋渔业在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发展，但很快就受到资源条件的限制而进入了停滞期。

左图：青岛某海参养殖厂的工人在种植海参。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许多渔民不得不放弃捕鱼业投入养殖业

右图：工人们将贻贝苗捆绑在绳索上，然后放入大海里养殖

包括唐启升院士在内的一大批老科学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做点什么。当时唐院士是黄海水产研究所的所长，这个所的前身是1946年成立的中央水产实验所，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海洋与水产研究机构，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于是，由唐院士出面，联合了另外18位院士专家给国务院写了封信，提议中央调整策略，加强对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

“联名信原来用的词是‘保护’，我提议改成‘养护’，因为我觉得海洋鱼类毕竟不是大熊猫或者中华鲟，还是可以被人类利用的。”金显仕所长对我说，“如果用了‘保护’这个词，那就意味着只能保不能用了，这是不行的。我认为保护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养护’这个词更准确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国务院对这封信非常重视，农业部渔业局立刻组织专家花了3年时间编写了一份纲要，于2006年4月正式公布于众，这就是中国渔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计划纲要》。

“虽然以前也有一些地方单位实施了某些养护措施，但这份《纲要》出来后，各级政府立刻重视了起来，纷纷拨出专款，以实际行动支持国家的新政。”金显仕所长对我说，“有了政府的资金支持，海洋牧场和增殖放流等养护措施相继开始大规模实施，大力发展休闲渔业的口号也提了出来，并且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所谓“海洋牧场”指的是在特定的开放海域内，通过规模化的投资和系统化的管理，把具有经济价值的海洋生物集中起来，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的海上放养。“增殖放流”的意思就是通过人工的方式向海洋或者河流湖泊等公共水域释放水生生物苗种或者亲体，以此来加快该种群的恢复速度。从定义来看，这两种方法介于捕捞和养殖之间，其地位类似于陆上放牧，一种介于圈养和打猎之间的获取动物蛋白的方式。

如果单从生产效率来看，圈养是获取动物蛋白的最佳方式，如今市场上的鸡肉和猪肉之所以卖得那么便宜，主要原因就是养猪场和养鸡场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成本越降越低。但是这种方式过于追求投资效率，忽视了产品质量，于是鸡肉和猪肉的口味变差了，抗生素或者瘦肉精之类的丑闻越来

（黄宇 摄）

越多，消费者也越来越不满意。这个过程在家禽家畜养殖业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现在又转移到了水产业，本质其实都是一样的。

讨厌饲养场的人大都会不遗余力地赞美野味，但普通消费者是吃不起野味的，抱怨几句之后还是得提着菜篮子乖乖地走进菜市场。问题在于，野味其实并不一定比家禽家畜更好吃，安全性也不见得比后者高，营养价值就更谈不上有多优越了。更重要的是，野味的数量是有限的，随着打猎技术越来越高，野味肯定会越来越少，吃野味早晚会变成少数富人的奢侈享受，和大部分人都没有关系了。

水产品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特殊，海产品更是如此，原因在于绝大部分水产品，无论是池塘里养的还是大海里捞的，本质上都是野生动物，个中原因前文已有叙述。这就是为什么陆地上饲养的家禽家畜，即使是通过放牧养大的，也不能称其为野味，但海洋牧场出产的海鲜就可以，因为这些海鲜无论是遗传特性、生长周期还是食物来源都和野生的没有区别。

事实上，不放人工饵料是海洋牧场的最大优点，不但为养殖户节约了成本，而且还保护了环境，属于双赢。但增殖放流就不一定了，一片天然海域突然被放进来大量单一品种的鱼苗，肯定会对原有的海洋生态系统带来影响。

“增殖放流分为生产型放流和生态型放流，前者就相当于在大海里养鱼，事先放些鱼苗进去肯定会起到一点作用，但毕竟是短期的，经济效益明显，但生态效果就很有限了。”金显仕对我说，“后者才是真正为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所做的努力，但在实际操作和监管方面难度很大。”

据金显仕透露，增殖放流工作很多都是在各省的

地方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往往只放地方性鱼种，毕竟谁也不愿给别人做嫁衣。中央政府的拨款主要用于放流长距离洄游性苗种，比如中国对虾和一些鱼类。但因为目前中国近海的捕捞强度太大，小鱼小虾还没长大就都被捕捞上来了，生态效果并不十分明显。

不管怎样，海洋牧场和增殖放流都属于临时性的养护措施，肯定都会给海洋生态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东宇公司的海参养在海底，外人不容易看出来，但大多数鱼类和贝壳类都是养在笼网里的，只要你有机会坐飞机经过中国沿海，肯定会看到海面上密密麻麻的网箱，从渤海湾一直延伸到海南岛。如果这个趋势不加以控制的话，早晚有一天整个中国沿海海域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养鱼池，就像第三个场景描述的那样。

场景三：科学的贡献

第三个场景中的那个东山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距离厦门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该岛是中国第七大岛，总面积 22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2 万，其中三分之一从事海产养殖业。我在海滩上见到的那一排密密麻麻的排水管便属于一家名叫“东山一水”的鲍鱼育种公司，像这样的公司在岛上还有好多家，他们提供了全国鲍鱼养殖所需的一半的鲍鱼苗。

东山岛的形状像一只张开翅膀的蝴蝶，距离大陆最远的那个翅膀的尖部被规划成了鲍鱼养殖基地，因为那里的水质最好，而鲍鱼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其实那片海域不但水质极佳，而且沙滩也很棒，非常适合搞旅游，但谁叫咱中国人那么喜欢吃鲍鱼呢！于是，原本风景绝美的一处沙滩被一根接一根的排水管占据了，见不到一名游客。

（袁超 摄）

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了，其他需求都得让位给和吃有关的行业。

我是跟随一个中澳联合科考团去的东山岛，澳大利亚方面的领队是阿德莱德大学著名的海洋生态学家布朗温·吉兰德斯（Bronwyn Gillanders），她在今年 5 月召开的韩国釜山世界渔业大会上被选为世界渔业协会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Fisheries Societies）主席。这次她带领一个由 15 名海洋专业大学生组成的考察团前来考察福建的海水养殖产业。厦门大学也招募了 15 名海洋系的大学生加入了这个考察团，中方领队是厦大海洋与地球学院副教授游伟伟，他的专业就是鲍鱼遗传育种，他所在的科研团队与“东山一水”鲍鱼公司正在开展产学研的合作。

“多亏了厦大科学家的帮助，才使我们生产的鲍鱼苗保持了很高的竞争力。”公司总经理林瑞明告诉我，“如今我们这个只有 32 名员工的小公司已经做到了年产值 2500 万元，利润 1000 万元的规模。”

这家公司成立于 22 年前，最早饲养的是本地品种九孔鲍，但这种鲍鱼商品规格小，病害较多，渐渐被产业淘汰了。后来中国科学家从大连引进了一种优质高产的皱纹盘鲍，经过几代的定向选育，培育出了能耐福建海域高温的皱纹盘鲍品种，畅销过一阵子。可惜后来因皱纹盘鲍近亲繁殖情况严重，导致品种质量退化，于是厦大科学家从日本和美国等地引进了西氏鲍和绿鲍，与本土的皱纹盘鲍进行杂交，随后又经过多代选育及杂交选配，终于培育出了性状优良、能耐高温的西盘鲍和绿盘鲍。如今这两个杂交品种成了福建鲍鱼产业的生力军，价格比常规苗种高 20% 以上，仍然供不应求。

“鲍鱼育种和杂交玉米育种非常像，亲本都掌握在育种公司手里，卖出去的都是杂交子一代，性能优异但养殖户无法留种自行繁殖，所以每年都得买新的。”游伟伟介绍说，“有时育种公司也会卖亲本，但出售的只是母本系，而真正优质的母本往往都是留下来自用的。”

杂交玉米的这一特性使得玉米种子公司赚了大钱，这一点曾经让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颇有微词，但其实这个特性刺激了种子公司研发新品种，使得玉米产量节节上升，最终获益的还是农民和消费者。鲍鱼产业这几年之所以愈发兴旺，也和鲍鱼育种水平逐年提高有很大关系。

左图：澳大利亚海洋生态学家吉兰德斯考察福建东山岛海产养殖业

右图：澳大利亚梅林布拉镇的渔民在海中捕捞鲍鱼

游伟伟带领大家参观了该公司的育苗池，每个池子长 6 米、宽 4 米、深 1.5 米，池壁用水泥砌成，里面摞满了青砖大小的附着板。整个公司像这样的鲍鱼池有 1000 多个，每年能够向市场提供 2500 万粒鲍鱼苗，规模算是相当大了。

在该公司的成品养殖区里我们还看到了层层相叠的鲍鱼养殖笼，每个水泥池子里装得下 800 个养殖笼，每个笼里都同时养着几十粒鲍鱼苗。如此高密度的养殖必须解决水质劣化的问题，好在公司就建在海边，每个池子都有两根水管通向大海，一根负责进水，另一根把脏水排进大海。因为鲍鱼对水质的要求太高了，这个循环水系统每时每刻都得开着，光是电费每天就要 3 万元。不过这家公司正在研究海水自循环系统，希望能减轻对海洋的依赖，增加抗风险的能力。

看到眼前的景象，吉兰德斯教授提了一个问题：这些养殖场随意向大海中排放污水，有没有征得环境部门的许可？要知道，在澳大利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抽取海水搞养殖的，必须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养殖许可证。她得到的回答是，在中国搞水产养殖不需要许可证，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好在鲍鱼养殖排放的污水没那么脏，问题还不是很大。

鲍鱼每年 10 月份产卵，鲍鱼卵养 6 ～ 8 个月就可以长到 1.5 厘米，此时就可以作为种苗出售给其他养殖户了。养殖户买回去后通常再养一年半就出售，虽然此时的鲍鱼每只只能长到 1 两左右，但养殖户们不愿意承担风险，所以中国市面上看到的鲍鱼大都是这种规格的。

“澳大利亚也有养鲍鱼的，但他们都是直接在大海里养，不用专门喂饲料，基本上算是野生的。正因为是野生的，无需承担太大的风险，所以他们通常要养 4 ～ 5 年才出售，那时的鲍鱼每个都可以长到 1 斤多重，价格是每公斤 100 澳元（折合人民币 500 元）。中国产的人工饲养鲍鱼只能卖到每公斤 120 ～ 150 元，是人家的三分之一。”游伟伟对我说，“中国人也想像澳大利亚那么养，但鲍鱼是吃海藻的，中国近海海域已经没有野生的海藻林了，所以只能人工养殖。”

海藻林是由海带目的大型褐藻所构成的海底森林，福建这边的鲍鱼吃的是一种丝状海藻，当地人称

之为龙须菜。以前福建海边到处可见野生的龙须菜，如今却只能依靠人工饲养了。这家公司所需的龙须菜都采购自当地的海藻养殖场，鲍鱼每 3 ～ 4 天就要喂一次龙须菜，由专人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塞进去，既耗工又耗时，这也是澳大利亚之所以无法大规模人工饲养鲍鱼的原因之一，澳大利亚的人工费实在是太贵了。

中澳两国在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别决定了两国的水产品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有极大的不同，澳大利亚产品质量高但价格也贵，中国产品物不美但价足够廉，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起。

当然，澳大利亚产的优质鲍鱼也不是卖给澳大利亚人吃的，而是几乎全部出口到了中国。根据 FAO 提供的数据，2013 年中国养殖鲍鱼的年产量高达 11 万吨，占全世界鲍鱼总产量的 90%，其中福建的产量为 8.85 万吨，占中国产量的 80%。换句话说，全世界有 70% 的鲍鱼都产自福建省，光是在这个小小的东山岛上就有超过 1000 家鲍鱼饲养场，是名符其实的鲍鱼岛。

参观完后，一位澳大利亚学生看出了鲍鱼养殖行业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鲍鱼必须要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维持下去。接下来他又问了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愿意花这么多钱去吃这么一点点肉？我只能如实地回答他，鲍鱼的味道固然很不错，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鲍鱼的形状很像女性生殖器，所以中国人认为它具有滋阴美颜的功效。

“这个说法有科学根据吗？”他问。

“据我所知并没有，但中医相信以形补形，食药同源，所以才会去吃鲍鱼和海参这类东西，希望它们能起到某种神奇的功效。很多中国老百姓也相信这个，双方联手把一些营养价值并不高，甚至连一点味道都没有的野生动植物给炒成了珍品佳肴，海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再次如实地回答了他。

鲍鱼和海参好歹还是有肉的，有一定的营养价值，但接下来我们去参观的海马养殖场就有些让人不解了。这家公司名叫碧水绅蓝，是一位名叫张东的海归博士创建的，他在美国做完博士后研究后顺便把佛罗里达海马带了回来，在东山岛成立了这家海马养殖场，打算用科学的方法人工饲养海马。

“海马有补肾壮阳、活血通脉、散结消肿的功效，主治阳痿遗精、宫冷不孕和遗尿尿频，还可以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性生活质量。”该公司的企宣在公司自建的海马博物馆里为大家讲解了海马的药用功能，“传统的服用方式主要是泡酒和煲汤，张东博士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将干海马制成超微粉直接服用，便于人体吸收。”

“这个说法有什么科学依据吗？”我问了同样的问题。

“当然有啊，我们公司和国家海洋药物工程研究中心建立了合作关系，他们的科学家做了大量研究，从科学上证明了海马的药用价值。”

这位企宣不是学科学的，自己解释不了，便递给我一本公司宣传手册，让我从上面找证据。我看到小册子上列出了海马含有的各种化学成分，包括神经鞘酯、磷脂酰胆碱和溶血磷脂酰胆碱等等，声称它们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强精益肾的功效，其实懂点生物学的人都知道，它们的名字虽然很高大上，但其实都是很常见的有机大分子，很多食物中都有，一点也不稀奇。这本小册子还列出了海马含有的微量元素名单，其中锌和铁用的都是英文名字 Zn 和 Fe，也许他们觉得这样可以增加神秘感吧。最后，手册上还说海马含有甾醇类，为性激素样物质，与性兴奋有关。看来中国人不光喜欢美食，还特别喜欢通过食物来滋补身体，尤其对滋阴壮阳有很强烈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像海马这样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点肉的小型硬骨鱼类晒干后可以卖到 3000 元一斤，尸体磨成粉后制成的胶囊也可以卖到 980 元一瓶的原因。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海产养殖业都是靠某种“信仰”而存活的。

看完博物馆，这位企宣又带着大家进入养殖场内部参观。当澳大利亚大学生们看到大水缸里养着的一大群小海马时，大家的不解情绪达到了最高点，有位女学生居然问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是先杀死海马再晒干制药，还是趁它们活着的时候就直接晒干磨成粉了？

中澳双方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相差太大了。

“海马是上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名录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国家明令禁止捕捞和贸易，你们这么做合法吗？”我问。

“当然合法，海马是药典里收录的一味中药材，是国家认可的。”这位企宣回答，“据我们调查，中国目前药用海马的年需求量高达 1000 吨，其中只有 30 吨能够自给自足，其余的全都是从东南亚等地走私进来的。我们之所以要养殖海马，就是为了降低野外捕捞压力，对于保护野生海马是有帮助的。”

我在很多地方听到过类似的说法，那些养蛇的养老虎的养狗熊的人都会用这个逻辑来支持自己的做

法。有人反对说，这么做很可能会刺激中药市场，鼓励另外的人去盗猎，因为有相当多的人相信野生的效果更好。不久前甚至有好几位政府高官公开发表意见，认为野生药材被人工养殖产品替代导致了中医的衰落。

“这个说法不对，我们养殖的海马不但药效一点也不逊于野生的，甚至有科学研究表明，养殖海马药效比野生的更高！”那位企宣这样回答我的质疑，但她同样无法给出那个科学研究的任何细节。

与其在“人类是否有资格利用野生动植物来治病”，或者“野生与养殖到底哪个药效高”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不如先问一句：野生动物的药效究竟有没有科学根据？如果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中国的水产养殖业也许会再来一次革命。

我又想起了《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那位布朗先生认为水产养殖业喂饱了中国人，这个看法还是太天真了。中国大力发展水产养殖行业绝不仅仅是为了喂饱中国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为了满足口舌之欲，或者从海鲜那里获得各种神奇的功效。鱼对于外国人来说也许只是蛋白质的来源，但对于中国人来说，鱼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饮食文化。中国人在吃鱼，尤其是在吃海鲜的时候，脑袋里想的并不是补充蛋白质，而是为了满足味蕾的需求，属于一种纯精神的享受。

之所以有这种结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鱼类本质上属于野生动物，无论是捕捞的还是养殖的都是如此。我们在吃猪肉和鸡肉的时候是不会追求什么原汁原味的，只能在烹饪技术上做做文章，因为它们都太同质化了。相比之下，海鲜的种类极为丰富，味道千变万化，我们在吃海鲜的时候，体会到的是老祖宗们在打猎时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新鲜感，这种感觉在家禽家畜身上是体会不到的。

总之吧，中国人实在是太爱吃了。要想真正理解中国的海鲜文化，那就必须把中国人的饮食文化考虑进来，否则是无法真正弄明白的。

当天晚上考察团在一家餐馆聚餐，双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澳大利亚这 15 个大学生当中居然有 4 个人需要在饮食上享受特殊照顾，其中两个人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一个人花生过敏，另一个人乳糖不耐受；还有一人曾经因为学了海洋专业而拒绝吃鱼两年，直到最近才终于解禁。反观中国，15 个大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有饮食禁忌，餐厅有什么大家就吃什么。

主办方按照一般宴会的标准点了一桌绝对谈不上奢华的中式菜肴，结果当天晚上每个桌子都剩下一半的菜没吃掉。据我观察，中国学生虽然个头小，但饭量都比较“正常”。澳大利亚学生别看个个人高马大，但饭量却都很小。最终，越是那些大鱼大肉类型的菜剩得就越多，蔬菜则大都被吃光了。

当晚每桌还上了一条 2 斤多重的多宝鱼，几个澳大利亚学生想托我去问餐厅老板这条鱼究竟是野生的还是家养的，最后一位中方老师替餐厅拍了板：“中国餐厅里供应的鱼，凡是像点样子的一律都是养殖的。”

金显仕曾经告诉我，中国海产养殖业有两个明星物种，南方主要养大黄鱼，产量最高，北方则更喜欢养多宝鱼，后者正是由已故的黄海所雷霁霖院士从英国引进的名贵鱼类。这种鱼学名大菱鲆（Turbot），是一种在水中贴底生长的鱼类，生长速度快，味道鲜美，深受全世界消费者喜爱。最近有媒体报道说这种鱼能致癌，导致行情一落千丈，从刚刚养殖成功时的 400 多元一斤降到现在的不到 20 元一斤，养殖户损失惨重，大菱鲆产业受到重创。

鳕鱼

一种生活在寒冷海域的鱼类，通常生活在中下层海水中，以螃蟹、鳕鱼、扇贝和蚝类等海底生物为食。鳕鱼肉颜色雪白，肉质紧密，腥味不重，特别适合做成鳕鱼排，英国国民小吃“鱼和薯条”用得最多的就是鳕鱼。鳕鱼曾经是北欧和北美地区最常见的食用鱼类，但因过度捕捞导致加拿大鳕鱼种群彻底崩溃，至今尚未恢复。不少人试图人工养殖鳕鱼，但难度非常大，成功率很低。

鳀鱼

全世界捕捞量最大的野生鱼类，广泛分布于几乎所有的海域之中。鳀鱼是滤食性鱼种，体型细长，最多不会超过 40 厘米。这种鱼是几乎所有海洋捕食者最重要的食物来源，人类通常不直接食用它，而是将其用作鱼饲料，或者制成鱼粉。因为鳀鱼的捕捞量太大，不同年份的波动也很大，于是不少机构在统计全球海洋渔获总量时通常将鳀鱼单独列出来，不计入总的捕捞量数据之中，否则的话统计数据无法准确反映出海洋渔业的总体状况。

“有些媒体记者特别不负责任，一句谣言毁掉了一个产业，曾经的海南香蕉业和多宝鱼养殖业是两个最经典的例子。”金显仕对我说，“确实有个别养殖户在养殖时用抗生素给池子消毒，但量都不大。我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养殖规范，经常派人抽查，所以说现在的养殖鱼类除了口感和野生的有些不同之外，质量都是绝对安全的，希望广大消费者放心吃。”

金显仕虽然承认有不少鱼种养殖和野生的吃起来不一样，但他同时也认为两者的差别和鱼的生活方式有关，不能一概而论。“大黄鱼是长距离洄游鱼类，野生大黄鱼整天在海里游，肉质当然会和活动范围有限的网箱养殖大黄鱼不一样，但多宝鱼本来就贴在海底生活，活动量很小，所以养殖的和野生的在口感上是没有差别的。”

金显仕还告诉我，一些养殖户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试图让养殖的大黄鱼动起来。浙江已经有人尝试用 1 公里长的网箱养大黄鱼，据说效果还不错。

看来科学家们已经开始尝试用科学的方法改变养殖海鲜的口味了，对于广大海鲜爱好者来说这是个好消息。

第二天我们又去东山岛的另一个水产养殖基地参观，厦大在那里设了一个研究站，有几个研究生在那里做实验。在基地走了一圈之后，我再一次体会到了科学的力量，因为海水养殖行业有很多违反直觉的地方，必须用科学来解释。比如，基地里有很多养虾的，科学家建议放几尾鱼进去。要知道鱼是吃虾的，一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谁知放了鱼的池塘虾的产量反而上去了！原来，每个种群都会有弱者，它们最容易得传染病，并把病菌扩散给种群内的其他成员。捕食者会把那些生病的弱者清理掉，间接防止了传染病的扩散。所以说，适当地给种群施加生存压力对于维持种群的健康是有好处的。

再比如，养殖基地里这种露天开放式混养的饲料转化率常常会低于 1，也就是说喂 9 斤饲料居然会长出 10 斤肉，原因就在于鱼类的排泄物会促进藻类的生长繁殖，相当于大自然自己生产出了一部分饲料。

金显仕告诉我，中国科学家已经把这个立体养殖的思路用在了海洋牧场上，在獐子岛和石岛等地方开始了所谓“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简称 IMTA）。简单来说，这个方法就是让一种生物的排泄物成为另一种生物的食物。比如在海水的上层养海藻，中间层用网箱养鲍鱼，吃海藻，海底再养海参，专吃鲍鱼的排泄物。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可以大大减少因养殖而导致的海水污染，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护了环境。著名的科普期刊《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曾经在 2015 年第四期上对这个养殖方法做了详细报道，中国科学家在水产养殖领域再一次走在了世界前列。

“我们要在中国沿海开展资源养护型海洋捕捞业，以及环境友好型海水养殖业，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金显仕总结道。

结语

一个人吃掉一只鸡，没人会觉得不妥，但如果他吃掉的是一头野生的大雁，肯定会被告发，因为大多数人骨子里已经不把普通家禽当作“生命”了，但野生动物则仍然被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存在。

确实，当一种动物被成功驯化后，人类便不再把它视为一种具有独立意识的“生灵”了，而是将其简单地视为能量转换器。它们的任务就是把蕴藏在饲料中的低级能量转化成为储藏在肉里的高级能量，这样可以更高效地被人类利用。

纵观人类养殖史，我们的努力方向一直就是从低效转向高效。吉兰德斯教授告诉我，澳大利亚过去曾经有段时间羊肉比鸡肉便宜，但现在已经彻底倒过来了，原因就是鸡的饲料转化率更高，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比羊低，所以现在养羊的越来越少，养鸡的越来越多了。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水生动物是最高效的能量转换器，因为大多数水生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它们为了维持生命而“浪费”掉的能量比恒温动物（比如家禽家畜）要少得多。换句话说，同样生产 1 吨肉，鱼类所消耗的饲料要比家禽家畜少多了。比如，有研究显示养殖鱼类的饲料转化率是牛的 6 倍，是猪的 4 倍，更不要说养牛养猪导致的环境污染，以及有可能带来的传染病了，所以说，如果一定要养点什么的话，养鱼是对生态环境最友好的一种方式。

事实上，还有很多养殖水产是不用专门投放饵料的，比如贝类就是如此，它们只需依靠大自然的馈赠（海藻）就能生长得很好了。据 FAO 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半的水产养殖是不喂饲料的，鱼类当中不依靠人工饲料的占 30.8%，总量大约为每年 2270 万吨。

所以说，中国人虽然是出了名的爱吃肉，但我们也开发出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肉类生产方式，算是功过相抵吧。

《三联生活周刊十年》《三联生活周刊廿年》
《有关品质》
《生命八卦》

限时8.5折

典藏特惠

慢享20年的文字与时光

1995-2015年，
三联生活周刊20年的成长历程，
我们先后四辑出版这套精选文丛，
包括经典栏目作品集及主创个人作品集。

扫码直接购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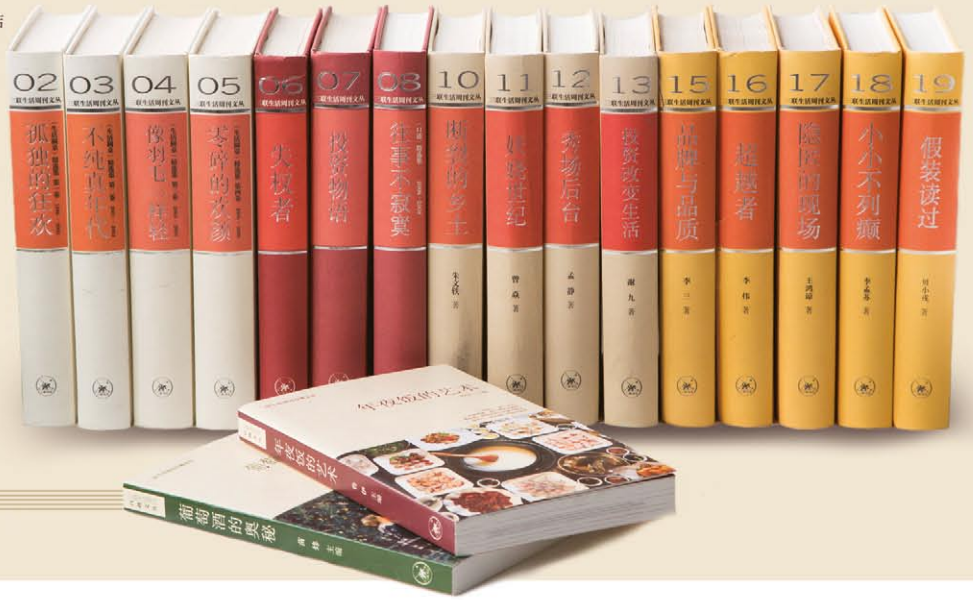
微信　淘宝

淘宝店铺搜索“三联生活周刊 lifeweek”
微信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公众号，进入微店

《三联生活周刊》精选文丛
与《葡萄酒的奥秘》、
《年夜饭的艺术》

单本6.5折

2本及以上4.5折



年夜饭的艺术　49元
葡萄酒的奥秘　45元
廿年［平装版］　58元
廿年［精装版］　78元
假装读过／贝小戎　50元
小小不列癫／李孟苏　50元
隐匿的现场／王鸿谅　50元
超越者／李伟　50元
品牌与品质／李三　50元
生命八卦／袁越　50元
投资改变生活／谢九　50元
秀场后台／孟静　50元
妖娆世纪／曾焱　50元
断裂的乡土／朱文轶　50元
有关品质／朱伟　50元
往事不寂寞／李菁　50元
投资物语／邢海洋　50元
失权者／李鸿谷　50元
零碎的欢颜（《生活周刊》精选集（4））　50元
像羽毛一样轻（《生活周刊》精选集（3））　50元
不纯真年代（《生活周刊》精选集（2））　50元
孤独的狂欢（《生活周刊》精选集（1））　50元
十年　50元

如需购买整套文丛产品，欢迎致电**读者服务中心**：010-84050451/84050425，或登录**官网商城**：http://shop.lifeweek.com.cn/

海洋的未来

文 袁越

海洋是有希望的，关键是我们人类将以何种态度对待大海。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渡渡鸟的故乡毛里求斯，这个印度洋岛国对中国人采取落地签的政策，吸引了很多中国游客去那里度假。今年 6 月我去毛里求斯参加了一场婚礼，顺便体验了一下当地的旅游业，深深体会到一个健康的海洋是多么重要。

毛里求斯最热门的旅游项目是潜水，在岸边随便找个有珊瑚礁的地方潜下去就能看到成群结队的热带鱼，和在电视里看到的一模一样。我在水里屏住呼吸，可以清楚地听到鱼嘴啄珊瑚的声音，特别好玩。这种体验电视上可没有，必须亲自下水才行。

我们又租了一艘游艇到深海区看海豚，我本以为看到海豚是小概率事件，没想到刚一出海就遇到一群海豚在迁徙，数量有上百头之多。不断有海豚从水中跃起，场面极为壮观。海豚大概是大型海洋动物中活得最好的，很少听说有哪种海豚处于濒危状态，个中原因很简单：海豚的肉不怎么好吃，渔民对它们不感兴趣。

我们的小艇开足马力赶到了海豚队伍的前面，我戴着泳镜跳入海中，从水下观察了海豚那曼妙的泳姿，仅此一项便已值回票价。可惜海豚游得太快了，还没等我细细欣赏便悄无声息地从我脚下掠过，消失在深蓝色的海水之中。我睁大眼睛试图寻找海豚的踪迹，却什么也看不到，连一条小鱼都没有。我突然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所看到的才是海洋真实的一面，蔚蓝色的大海就是一片蓝色沙漠，刚才在岸边看到的那片珊瑚礁只是沙漠中的绿洲而已。

第二天上午，我花了大约 500 元人民币的价格租了一条小船，打算体验一下海钓，一位名叫韦斯利的当地人驾船陪我出海。说是出海，其实根本没走多远，距离岸边最远的时候也不到 100 米，再远了就得换大船去追金枪鱼，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我俩一人一根钓鱼竿，用塑料假鱼当诱饵，就这样出发了。韦斯利单手掌舵，另一只手有规律地摇晃鱼竿，以此来诱鱼上钩。我学着他的样子也开始左右摇晃，不久就感觉杆头一沉，韦斯利赶紧停船检查，却发现钓上来的是一团海藻。虽然不是鱼，但有海藻的地方一定有鱼，我信心满满地又下了一杆。

谁知此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我开始怀疑我们简陋的钓鱼设备究竟能不能成功。就在我被热带的阳光烤得昏昏欲睡时，韦斯利中奖了，他钓上来一条足有 3 斤多重的蓝鳍鲹鱼（Bluefin Trevally），天蓝色的鱼尾巴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炫目的光芒，甚是好看。仔细观察，我发现这条鱼齿尖肉厚，流线型的身体扭动起来很有力量，显然是一位水中捕食的高手。但再厉害的鱼也不是人类的对手，人才是地球上最有杀伤力

的顶级捕食者。

开张之后我俩立刻精神起来，开始在附近海域转圈子。很快他又钓上来一条蓝鳍鲹鱼，可惜是一条10厘米左右的小鱼，顶多只有2两重，韦斯利熟练地把鱼钩退下来，二话不说就把那条鱼重新扔回了海里。

“这么小的鱼吃起来也没味道，还是等它长大了再抓来吃吧。”韦斯利说。

我后来知道，这片海域其实是个半封闭的潟湖，湖有很多种鱼，租船公司在不同的季节会选择不同的诱饵，以此来选择钓什么鱼。比如我们今天使用的塑料鱼饵只能钓到蓝鳍鲹鱼，其他品种很难上钩。不但如此，这家公司还对鱼的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不到一定尺寸的都要扔回去。我自己钓上来一条1斤多重的蓝鳍鲹鱼，刚刚过了及格线，得以留了下来。

后来我采访到了澳大利亚海洋生态学家布朗温·吉兰德斯，据她说有研究表明大鱼其实更有用，因为老年雌鱼的生殖力往往比年轻雌鱼更高。比如，美国海洋及大气管理局（NOAA）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1.8磅重的雌性石斑鱼一次可以产卵15万粒，4.4磅重的一次可以产卵70万粒，7.5磅重的一次可以产卵170万粒！大龄雌性石斑鱼不但产卵数量多，而且卵存活率也更高，这说明很多地方实行的只留大鱼放生小鱼的做法需要修改。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更改了一种鳕鱼的捕捞规则，只允许捕捞中间体型的鳕鱼，太大或者太小的都必须扔回海里。”吉兰德斯告诉我。

大约一个小时后，此次海钓体验活动圆满结束。我俩一共钓上来6条蓝鳍鲹鱼，4条太小扔回了海里，只留下两条大的，一条3斤多重，一条1斤多重，在当地市场上的价值大约相当于150元人民币左右。我把这两条鱼交给度假村的大厨，自己又付了相当于100多元人民币的加工费，美美地吃了顿烤鱼午餐。

就这样，我为毛里求斯贡献了100美元外汇，换来了一次美妙的海钓体验。造就这个双赢结果的前提条件是：海洋必须处于健康的状态。据我观察，毛里求斯的海岸线保护得非常好，有大量保存完整的红树林和潮间带，无论是潜水还是海钓都能玩得很好。反观中国，海岸线已经被各种堤坝和人造设施占领了，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海上长城”，其长度据说已经超过了真正的万里长城。

但是，海洋并不是没有希望的。要知道，鱼的繁殖速度比陆地大型野生动物快得多，只要保护得法，很多濒危种群理论上可以很快得到恢复。来自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华盛顿大学和美国环保基金会的科学家们在2016年3月28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指出如果保护得法的话，全球77%的渔场可以在10年内恢复到健康水平，全球鱼类总量有机会在2050年翻一番。

科学家们提出的管理建议并不复杂，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基于配额制度的总量控制，即先由科学家计算出一个捕捞上限，再把这个上限按照合理的方式分配给渔民或者渔业公司，保证后者享有合法的捕鱼权，这样渔民们就会主动地保护海鱼了。这就好像毛里求斯的那个租船公司，当他们拥有那片潟湖的捕鱼权时，便会自发地保护湖里的鱼，那是他们自己的财产，肯定会倍加珍惜。

这篇论文还以美国为例，说明政策改革是可以很快见效的。美国从2000年开始实施基于配额制度的总量控制政策，当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的渔场有92个，到2015年时这个数字降到了29个。凡是纳入新政管理的鱼种种群数量平均增加了4倍，比如墨西哥湾红鲷鱼（Red Snapper）的渔场面积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了3倍，捕捞限额增加了2倍，渔民收入增加了70%，实现了双赢。

据说中国很快就将修改渔业政策，正式引入这种已经被国际上认可的捕捞配额制度。这个改革已经说了很多年，但各个相关部门多次以条件不成熟为理由推迟了改革时间表。没错，中国有很多地方条件并不成熟，但中国沿海的鱼是没有时间等的，再这样拖下去，恐怕改革也来不及了。

另外，仅仅从捕捞业入手也是不够的。NOAA首席科学家简·卢布琴科（Jane Lubchenco）教授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关于渔业的演讲中指出，必须扩大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简称MPA）的面积，加强保护区的保护力度，为洄游鱼类提供一个可靠的避难所。一个好消息是，这项建议已经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广泛支持，目前海洋保护区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比例从上世纪70年代的几乎为零增加到了2015年的14%，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种种迹象显示，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海洋的未来是美好的。

临走前的那天，我再次来到毛里求斯海边，最后看一眼那蔚蓝色的大海。人类对于大海的亲近感似乎是天生的，毕竟所有生命均来自海洋，甚至有人提出过一个海洋假说，认为人类的祖先曾经在海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不管怎样，大海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无论从感情上还是理智上，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保护海洋。我相信，当几百年后的人类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是非功过时，没人会记得地缘政治家们的那些声嘶力竭的争吵，他们的唯一标准就是我们是否保护好了这个地球，是否把足够多的资源留给了后人。

松果生活
一万个生活家
一万种生活方式

高铁永不歇

主笔 谢九

一列动车驶入上海虹桥火车站

国务院在近期原则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之后，发改委在官网连续推出多篇文章力挺高铁经济。加之京沪高铁去年盈利 66 亿元的数据公开，京沪线被誉为全球最赚钱的高铁。多重因素刺激之下，我国的高铁建设可能会再迎高潮。

在经过了“十二五”期间的大规模投资建设之后，我国铁路运力不足的紧张局面不仅基本上得到解决，而且还大大提前完成了原定建设计划。按照 2008 年我国编制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规划目标达到 12 万公里以上，但事实上，我国在 2015 年的铁路营业里程就已经达到 12.1 万公里，提前 5 年完成了计划，其中高铁达 1.9 万公里，和 2010 年不到 9000 公里的高铁里程相比翻番还多。

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原定计划，我国铁路建设在未来 5 年已经无事可做。事实当然并非如此，按照近期最新公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到 2020 年，我国的铁路网规模要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 万公里，覆盖 80% 以上的大城市。到 2025 年，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 3.8 万公里左右。展望到 2030 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

基本覆盖。

如果以未来10年来看，我国铁路里程将从现有的12.1万公里上升到17.5万公里，提升45%，高铁里程从1.9万公里提升至3.8万公里，实现翻番。考虑到上一次编制的铁路建设规划已经提前5年完成，实际进度大大超前，未来5到10年的铁路建设也有可能最终超过规划。由此可见，未来10年之内，高铁建设的高潮依然不会停歇。

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我国未来10年的高铁建设主要有三大任务，首先是从原来的“四纵四横”升级为“八纵八横”。在2016年基本完成“四纵四横”的历史任务之后，我国的高铁建设将进入“八纵八横”的新阶段，其中“八纵”通道包括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京港澳通道等，“八横”通道包括绥满通道、京兰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等。其次是在“八纵八横”主通道的基础上，规划布局高速铁路区域连接线，目的是进一步完善路网，扩大高速铁路覆盖。三是发展城际客运铁路，在优先利用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开行城际列车服务城际功能的同时，规划建设支撑和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有效连接大中城市与中心城镇、服务通勤功能的城市群城际客运铁路。

除了高铁之外，《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同时还提出了普速铁路网建设计划，主要是“扩大中西部路网覆盖，完善东部网络布局，提升既有路网质量，推进周边互联互通，形成覆盖广泛、内联外通、通边达海的普速铁路网，提高对扶贫脱贫、地区发展、对外开放、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支撑保障能力。到2025年，普速铁路网规模达到13.1万公里左右，并规划实施既有线扩能改造2万公里左右”。

尽管高铁建设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具有巨大争议的话题，但客观而言，过去10年来，大规模的高铁建设既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也为普通人出行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如果未来10年国内的高铁里程还能够实现翻番，甚至再一次超计划完成任务，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为经济增长和国人出行的便利带来双重提升。

不过，与过去10年的高铁大建设相比，未来10年的铁路建设面临一个更现实的挑战，那就是如果继续大规模建设，是否会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毕竟，过去10年的铁路建设是在我国运力不足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在经过10年大规模建设之后，我国的运力瓶颈已经得到解决，继续大规模建设，势必会面临产能过剩的挑战。如果仅从拉动经济的角度来看，大规模的铁路投资自然是稳增长的不二法宝，但是如果因此形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后续的运营压力可能会远远超过短期稳增长的好处。我国未来10年的铁路建设是否带来严重过剩，短期之内可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最现实的考量在于铁路的盈利问题。

近日，京沪高铁在2015年盈利近66亿元的消息吸足眼球，运营仅仅5年的京沪高铁也因此被誉为全球最赚钱的高铁。不过，京沪高铁的盈利并不具有普遍性，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财务报表来看，铁总的整体盈利能力依然堪忧。2015年，铁总实现收入9162.6亿元，但是税后利润仅有6.8亿元，如果考虑到政府贴息等各种方式的补贴，铁总实际业绩应该为亏损。今年一季度，铁总亏损87.27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亏损额64.61亿元，亏损额大幅增长35%。

与铁总的亏损相比，更值得担忧的还在于其收入开始出现下降，这可能意味着我国的铁路运力开始出现饱和。从铁总最近几年公布的财务报表来看，2013年是公司收入的一个分水岭，这也刚好是铁总正式挂牌成立的第一年。在2013年之前，铁道部（铁总的前身）的收入基本上保持平稳增长，但是2013年铁总收入达到创纪录的1万亿元之后，公司收入开始呈现逐年下滑的趋势，2014年收入为9948.5亿元，2015年为9162.6亿元。

铁总收入下滑主要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所致。从铁总的收入来源来看，最近几年的客运收入依然保持较快增长，但是和经济景气度关联更高的货运收入则明显萎缩。2013到2015年，铁总的客运收入从2086亿元上涨到2506亿元，涨幅为20%，但是货运收入则从3329亿元下降至2774亿元，跌幅为17%，由于货运收入在铁总收入结构中占比更高，货运收入的下跌，最终导致铁总收入从2013年出现拐点，迄今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下降。

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几年仍将继续放缓，对于铁总而言，这意味着未来的收入下降仍是大概率事件，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铁总的货运在未来几年已经饱和，但是按照目前的铁路网中长期规划，未来数年内铁总的运力还将继续提升，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运力闲置，并且带来更大的成本压力。

不过从更高的层面来看，高铁经济是一盘大棋，铁总的业绩只是高铁经济的一小部分，仅从高铁自身的盈利并不足以体现其全部价值。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未来的高铁经济“以高速铁路通道为依托，引领支撑沿线城镇、产业、人口等合理布局，促进区

域密切交流合作和资源优化配置，加速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铁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高铁经济新业态。以高铁站区综合开发为载体，发展站区经济，引导和推动站区现代物流、商贸金融、电子商务、旅游餐饮等关联产业聚集和规模发展，努力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益。综合开发收益弥补铁路建设与运营”。考虑到高铁对于我国的新型城镇化乃至经济转型升级等都具有积极意义，如果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高铁短期的盈亏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

不过，一个更现实且紧迫的问题在于高铁资金的来源。目前铁总的建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银行贷款、中央预算内投资、铁路建设基金、铁路建设债券、专项建设基金以及地方政府的出资等，但是最核心的资金来源仍是银行贷款。从现金流的角度来看，目前铁总每年的基建投资6000多亿元，还本付息3000多亿元，每年的现金支出超过1万亿元。而现金流入中，利润仅能贡献6亿多元的现金流，6000多亿元来自贷款，成为铁总的主要现金来源，但这依然无法解决铁总的现金缺口。如果没有银行贷款的支撑，铁总的高铁建设计划随时面临断炊的风险。

目前铁总的负债总额和负债率已经上升到很高的水平线上，2013年铁总挂牌成立之时，总负债大概3.22万亿元，负债率64%，截至2015年底，铁总的负债已经达到了4.1万亿元，这样的规模已经和当年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规模相当，负债率攀升至66%。仅仅两年时间，铁总的负债就新增近1万亿元，按照这样的速度，两年之后，铁总的负债就将超过5万亿元，而10年之后，铁总的负债甚至有可能达到惊人的10万亿元。

巨额的负债为铁总带来了巨大的还本付息压力，2015年全年，铁总还本付息的金额高达3385亿元，其中利息为779亿元，同时也为未来继续获得银行贷款带来了难度。而且，铁路建设的资金过于依赖银行资金，一方面提升了银行的坏账风险，同时也挤压了实体经济其他领域的信贷资源。目前铁总的银行负债占我国人民币存量贷款的比重已经接近3%，如果考虑到房地产对于银行信贷资源的挤占，实体经济其他领域的“贷款难”和“贷款贵”问题也就长期难以解决。

无论是从铁路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实体经济信贷资源合理分配的角度来看，铁路建设的投融资改革已是刻不容缓。最近几年，有关部门一直在试图改革铁路的投融资渠道，但是实际成效并不明显。最近力度较大的一次改革是去年7月，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鼓励和扩大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的实施意见》，明确将我国规划建设的铁路项目，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外，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同时还“支持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等多种投资方式建设和运营铁路，向社会资本开放铁路所有权和经营权”；“支持铁路总公司以股权转让、股权置换、资产并购、重组改制等资本运作方式盘活铁路资产，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扩大铁路建设资金筹集渠道，优化存量资产结构”；“社会资本投资的铁路项目用地，在用地政策上与政府投资的铁路项目实行同等政策”。

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民间投资的雪崩式下滑，因为很多行业的政策壁垒，以及投资机会和投资回报率下降，大量社会资本处于持币观望的状态，今年6月份的民间投资甚至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负增长。而与此同时，国有资本的投资却在狂飙猛进，形成新一轮的国进民退。对于投资金额巨大的铁路行业，如果能够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无疑能够起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可以解决铁路投资过于依赖银行贷款的局面，又为大量没有出路的民间资本寻找到新的出口。

现在的问题在于，铁路行业虽然已经对民营资本拆除了政策壁垒，但是因为民营资本对于投资回报的敏感，而现有的铁路投资只能在各种政策扶持下实现微盈，所以，铁路行业对于民营资本依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最近几年，社会资本实际参与到铁路建设投资的规模依然很小。

不过，京沪高铁的盈利有可能会改变社会资本对于铁路投资的看法。京沪高铁在成立仅仅5年之后，去年盈利高达66亿元，这样的业绩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屈指可数。据悉，铁总旗下具备高盈利的资产并非只有京沪线，可能还有更多没有公开披露，这说明国内的铁路投资还有巨大的盈利潜力可挖。

在未来10年的“八纵八横”以及区域和城际铁路的建设中，应该也不乏类似的优质资产，对于铁总而言，是否舍得将优质资产对社会资本开放，可能是铁路投融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未来铁路大规模建设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民营资本对于盈利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国有资本，如果民营资本无法接触到真正的优质资产，铁路建设的投融资改革也就永远只能是望梅止渴。2013年之前，铁道部作为一个政企不分的部门曾经屡受诟病，2013年铁道部转型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也理应体现出和此前铁道部更多的不同。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WISSEN

与那些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相比，它不关心每天都在变化的事情，它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全年6期
96元

零售20元，
全年订阅8折

双月刊，
单月中旬出版

“萨德”入韩：“特殊主义”重回东北亚

文 刘怡

2016 年 4 月 15 日，韩国民众在位于“三八线”最前沿的京畿道坡州市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朝鲜的导弹试射活动。当天凌晨，朝鲜从东海岸的元山市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一枚“舞水端”型中程导弹

朝鲜政权出人意料的稳固性，它在核工程与导弹项目上的偏执，以及各大国最终共识的难于达成，使得朝核问题相关各方逐步重回自行其是的“特殊主义”。“萨德”入韩，只是表征之一。

首尔时间 8 月 3 日 7 点 50 分，朝鲜从平壤以南的黄海北道黄州郡一带，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 2 枚“芦洞 1 号”中程弹道导弹。美国战略司令部(USSTRATCOM)公布的消息称：第一枚导弹在升空不久后即发生爆炸，第二枚在向东飞行了 1000 公里后，于日本秋田县男鹿半岛以西 250 公里处落入日方专属经济区（EEZ）海域。这是自 1998 年“白头山 1 号”运载火箭第一级助推器溅落于日本海以来，朝鲜导弹坠落点离日本海岸最近的一次，也是“芦洞 1 号”自 1995 年装备部队以来，第一次完成全程试射。舆论普遍认为：本次试射和 7 月 19 日发射的 1 枚“化城 6 号”以及 2 枚“芦洞 1 号”一样，是对 7 月 8 日美韩达成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协议的强硬回应。

所谓“萨德”（THAAD），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erminal High-Altitude Area Defense），系美国陆军在 20 世纪 90 年代委托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拦截进入飞行末段、弹头已再入大气层的中远程弹道导弹的高性能机动式反导系统。整个系统最多配备 9 辆八联装导弹发射车，拦截弹的有效射程约 200 公里，射高 40 ～ 150 公里。系统内含的 AN/TPY-2 型 X 波段主动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可达 2000 公里，能从敌方中短程导弹升空之时起就对其弹道特征加以捕捉、分析和追踪，并在 870 公里外发现雷达反射截面积（RCS）仅为 0.01 平方米的弹头。该雷达还可为海基“宙斯盾”系统以及负责低空拦截的“爱国者”导弹提供引导数据，形成多平台联动。

从 2005 到 2012 年，“萨德”的 14 次试射成功率高达 78.57%，在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美国陆军的前 3 套“萨德”分别部署于夏威夷、关岛和威克岛，另有 2 部 AN/TPY-2 型雷达配置在以色列和土耳其。此番预定配置于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的“萨德”，将是第四套投入实战部署的系统，由美方负责采购、安装和运行，韩方提供基建设施。除此以外，阿联酋和阿曼已经明确表态将购买“萨德”，日本防卫大臣中谷

元也在2015年11月提出了希望美军在日本部署“萨德”的意向。从中东到西太平洋，正在形成一张巨大的弹道导弹监测和拦截网。

尽管“萨德”入韩表面上仅是针对朝鲜弹道导弹的威胁，但AN/TPY-2型雷达的探测和数据采集半径足以覆盖中国东北、华北和东南大部分地区，从而对中国赖以遂行反干涉战略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的日常训练和试验进行高精度监控，因之带有明显的挑衅性。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今年3月公开表示，美国在韩部署“萨德”远远超出了朝鲜半岛的实际防御需要，将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引发军事竞赛。7月9日，王毅进一步要求美方：“不要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不安全基础上，更不能以所谓安全威胁为借口，损害其他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而韩国政坛围绕“萨德”的部署位置、雷达工作模式以及中国可能的报复性反应也发生了争论，成为2016年盛夏东北亚新的安全焦点。

比“萨德”本身更意味深长的是，5月31日朝鲜前外相李洙墉突然抵华访问，以及7月6日中国表态拒绝参与美国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单边制裁。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正在逐步返回2009～2012年曾经奉行过的将朝鲜核问题与发展中朝关系脱钩的外交路线，依据自身的战略利益重塑中朝关系。而美国一意孤行促成“萨德”入韩，以及南海争端升级之后潜在的“四海联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效应，则明白地凸显了华盛顿当局将巩固在东亚的权势阵地置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之先的意图。与“普遍主义”在欧洲和中东问题上的退潮相一致，中美韩三国在安理会2270号决议上形成的短暂共识正在退潮，以单一国家利益为准绳的外交“特殊主义”已重回东北亚。

“芦洞”与“萨德”

出于保密原因，朝鲜官方对其在研和已经量产的弹道导弹型号，极少予以公开。除去2015年5月首度试射的潜射中程导弹“北极星”（Bukkeukseong）系由朝方自行公布名称外，其余各型导弹的编号，主要由美国军方依据其最初被发现的地点加以命名和编列。例如，1984年在朝鲜咸镜北道化城郡（Hwasong）露面的单级短程弹道导弹被美方称为“化城5号”，这是朝鲜第一型实用化弹道导弹，也是苏联“飞毛腿”B型的逆向仿制版。1993年在咸镜北道芦洞里（Rodong-ri）亮相的单级中程导弹被称为“芦洞1号”，1998年后在咸镜北道舞水端里（Musudan-ri）进行过多次试射的“银河”系列三级运载火箭，则被认为是潜在的洲际导弹项目“大浦洞”（Taepodong，这是舞水端里的旧称）的技术验证平台。而在2010年以后亮相的两款新导弹中，一度出现在东海岸舞水端里发射场的单级式中程型号被称为“舞水端”，搭载于8轴重型越野车的洲际导弹则被称为“化城13号”（有二级、三级两个版本）。国内媒体长期使用的“火星”“劳动”等译名，皆为讹译。

尽管型号看似庞杂而混乱，但根据发动机技术来源，可以清楚地将上述导弹分成两类：“化城5号”及其增程型“化城6号”“芦洞1号”乃至“大浦洞”系列的第一、第二级都采用与“飞毛腿”B型相同的伊萨耶夫9D21型火箭发动机或其改进型作为助推器，单台发动机推力16～20吨，燃料为热量值较低的TM-185（航空煤油）搭配AK-27I（红烟硝酸）氧化剂。“舞水端”“北极星”和“化城13号”的第二级则采用与苏制R-27型潜射中程导弹相同的伊萨耶夫4D10型火箭发动机或其改进型作为助推器，单台发动机推力约26吨，燃料为热量值较高的UDMH（偏二甲肼）搭配MON-10（90%的四氧化二氮和10%的一氧化氮混合物）氧化剂。不过由于朝鲜对4D10型的逆向仿制遭遇困难，“舞水端”和“北极星”的前几次试射使用的仍是推力较小的9D21型发动机。

根据发动机推力和朝鲜官方公布的导弹外形照片，我们亦可推算出上述几型导弹的理论射程：“化城5号”携带10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320公里，“化城6号”携带75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500公里，“芦洞1号”携带7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1300～1500公里，“大浦洞2号”携带5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8000～1万公里，“舞水端”携带10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2500～4000公里，“北极星”携带65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1600公里，“化城13号”携带700公斤弹头时的射程为7500～9000公里。换言之，除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浦洞”（据专家推断已终止发展）和迄今为止尚未进行过任何形式试射的“化城13号”外，朝鲜尚没有一型导弹的射程足以覆盖夏威夷、阿拉斯加和美国西海岸，与美方在夏威夷、关岛、日本以及菲律宾部署的重重监控措施完全不成比例。而朝鲜直到今年4月才完成了并联版4D10型发动机（用于“化城13号”第一、第二级）和在研的20吨级大推力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地面点火试验，可以预见在未来5～8年内尚不足以形成实际战斗力。

实际上，除去迄今为止所有的试射都以失败告终的“舞水端”——笔者始终怀疑该型导弹的真实价值不在于实战，而是用于测试仿制版 4D10 型发动机的稳定性，“芦洞 1 号”差不多是朝鲜唯一一型具备确实的战斗力和核威慑价值的中程导弹（MRBM）。1300 公里左右的射程已足以覆盖韩国全境和日本大部分国土，成熟的 9D21 型发动机在维护时也相当方便。实际上，2013 年 7 月新亮相的头部带有奶瓶状多弹头再入飞行器（RV）的“芦洞 1 号”改进型，以及 8 月 3 日破天荒的全程试射都显示：这种生产数量已超过 200 枚的中程导弹才是朝鲜维持地区核威慑的基本投射工具。至于在今年出镜率颇高的“舞水端”，除去发动机可靠性仍存在问题外，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其最大射程（4000 公里）不足以覆盖有价值的战略目标：仅能抵达关岛，距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里程尚远。

而在“芦洞”以外，无论是有效载荷不足的“大浦洞”还是发动机可靠性堪忧的“化城 13 号”，本质上都只是政治讹诈工具——为了使美国接受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有必要在发动外交和宣传攻势的同时，在安全方面给予现实压力。因此，朝鲜并不似其他国家一般，按照短程－中程－中远程－洲际的顺序逐步提升其弹道导弹射程和技术水平，而是在 1500 公里级的“芦洞 1 号”投入部署之后，就直接寻求获得射程超过 5500 公里的洲际导弹（ICBM）。至于装载于潜艇的“北极星”和“火星 13 号”那可靠性不明的公路三用车（TEL），它们的意义仍在于强化发射平台理论上的隐蔽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在对美谈判中增加筹码。若是金正恩希望对近在咫尺的韩国开战，单凭 20 世纪 80 年代投产的“化城 5 号”和“化城 6 号”就可以发射常规或生化弹头，覆盖韩国全境；若要威胁日本，可靠性更高并能携带核弹头的“芦洞 1 号”也足以胜任，无须动用洲际导弹。

在此情形下，韩国方面选定距“三八线”超过 270 公里的星州郡作为“萨德”的最终部署点，显然是兼顾了三项考虑：首先，此举将使“萨德”的雷达和电子传感器不至于被朝鲜的 KN-09 型多管火箭炮（射程 200 公里）或 KN-02 型短程弹道导弹（射程 120 公里）所摧毁，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了系统本身的安全。其次，尽管“萨德”落户星州郡会使首尔无法处于拦截系统保护之下，但位于京畿道平泽市的美军第 2 步兵师驻地和驻韩美军防空指挥所，位于全罗北道的群山空军基地以及忠清南道鸡龙台的韩国三军总部都可以获得有效屏障，覆盖面积超过韩国国土的 2/3。相反，首尔本身已经处在朝鲜部署于“三八线”的直射火炮和火箭炮射程之内，即使有“萨德”加成，于大局也无补益。最后，韩国政府或许认为，使“萨德”远离“三八线”可以减轻中国等国的外交疑虑。毕竟，假使部署在星州郡的 AN/TPY-2 型雷达以探测距离较近的“末段部署”（TBR）模式工作，监测半径将缩短到 800 公里以内，仅能触及中国辽东半岛和山东沿海的边缘地带，理论上的确不至于构成威胁。

但和“芦洞 1 号”的实际威胁相比，“萨德”依然显得“冗余”过甚。尽管“芦洞”的三用车平台使其可以在公路或野外环境下完成发射作业，但 9D21 型发动机的液体燃料模式意味着导弹起竖后必须进行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的推进剂和氧化剂加注程序。在半岛北部缺乏纵深的情况下，即使朝鲜军方平时将导弹发射车藏匿于地下坑道内，进行起竖和燃料加注作业时也必须暴露，从而极易被美军侦察卫星发现。届时，第七舰队的海基“标准”SM-3 型防空导弹可以直接从日本海方向投入拦截，在“芦洞 1 号”靠近日本九州海岸之前就将其击落。必要时，驻韩美军的空中力量和美方水面舰艇、核潜艇上搭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甚至可以先发制人地摧毁朝鲜的导弹试验场和机动式发射平台，使威胁消弭于无形。而极其贫弱的朝鲜防空武器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而在攻击韩国境内的目标时，“芦洞 1 号”超过 1000 公里的射程又显得过于富余了，射程在 500 公里以下的“化城 5 号”和“化城 6 号”无疑是更理想的选项。在拦截这类弹道特征较为简单的短程导弹（与 1991 年海湾战争时的“飞毛腿”B 型不存在技术代差）时，单凭驻韩美军现有的 1 个旅“爱国者”PAC-3 以及韩国空军的 2 个旅“爱国者”PAC-2 便可以实施最低限度的要点防御和低空拦截。“萨德”能做到的是扩大这类拦截的有效半径和高度，并使在低空摧毁对方弹头的机会由 1 次增加到 3 次，但无法杜绝这种攻击，对可以用地面火力加以覆盖的首尔更是无能为力。而倘若朝方实施的是孤注一掷的“饱和攻击”，最终

“萨德”能做到的是扩大这类拦截的有效半径和高度，并使在低空摧毁对方弹头的机会由 1 次增加到 3 次，但无法杜绝这种攻击，对可以用地面火力加以覆盖的首尔更是无能为力。

上图：2016 年 7 月 8 日，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济昇与驻韩美军第 8 集团军司令范达尔中将宣布签署筹建“萨德”入韩联合工作组的协议

右图：2013 年 9 月 10 日，美国陆军第 2 防空炮兵团在关岛完成了一次“萨德”系统与海、空军联合拦截中程弹道导弹的测试

仍须通过摧毁地面发射架来釜底抽薪。简言之，“萨德”是一种理想的面防御反导系统，但在美军已经拥有可观海基反导网络的前提下，以之戒备朝鲜实属过剩。

美国的战略回推

在很大程度上，“萨德”的高机动性、可移动性特征与韩国的实际反导需求并不完全重合。韩国需要的是一款立足于拦截飞行弹道较低、弹头大部分时间位于大气层内的短程导弹，且覆盖半径可达 300 ～ 500 公里的固定式反导系统；而“萨德”的拦截高度下限为 50 公里，实际上更适合对抗弹体已进入飞行中段或末段、弹头完成再入大气层飞行的中远程导弹。换言之，其为驻日美军或美国在太平洋基地提供早期预警和拦截的价值，远大过韩国防御的需要。另外，“萨德”的模块化设计和高机动性特征，意味着它可以在数小时内经公路或空运前出部署到靠近中韩边境的前沿地带，监视中国东北和山西导弹靶场的日常训练和试验。而韩国国防部关于所谓“末段部署”模式的单方面承诺，无法以任何形式获得监督和确认，完全可能因为美方的拍板，在极短时间内就遭到颠覆。

而美方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的动议，最迟不晚于 2014 年 6 月的首尔国防论坛，到 2015 年春已进入选址勘察阶段。但韩国政府始终谨慎地申明“三无”（无请求、无协商、无决定）立场，对之热情有限。然而，2016 年 1 月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随后半年间多达近 20 次的导弹试射，彻底改变了韩国政坛的风向。韩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室室长柳济昇在 7 月 8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部署“萨德”是一种防御性措施，意在保障韩国和韩国国民的安全，并使韩美同盟的军事力量不受朝鲜核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弹道导弹的威胁。青瓦台总统府亦在 8 月 7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宣称，破坏半岛以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首先是朝鲜，韩国的反应属于应激性防御举措。

与 2013 ～ 2015 年中韩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近相比，朝鲜的军事冒险和“萨德”风波无疑在最大限度

上有利于意图巩固在东北亚政治和安全权势的美国。这种巩固效应，主要表现为一种“随机式”的战略回推：自“亚太再平衡”政策出台以来，美国一方面愈加重视以政治和外交努力补充既有的军事盟约，另一方面极其重视利用各地区的突发事态和内政变化，因势利导地完成政治和安全布局。利用缅甸和越南国内政局的变化，与之发展外交和安全层面的亲密关系便是一例；以南海仲裁案为借口，推动航母战斗群进入南中国海“例行巡航”又是一例。而“萨德”入韩，可以视为这种随机式战略回推的最新成果：朴槿惠政府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的对朝“信任政治”（Trustpolitik）并未收致理想效果，与中国接近在安全上也未能获得足够满意的酬赏。这种情况下，朴槿惠本人正在逐步丧失执政党甚至全体民众在外交政策上的支持率。而朝鲜的第四次核试验，以及金正恩政权在安理会2270号决议后继续试射导弹的强硬姿态，实际上使朴槿惠政府在国内舆论场中陷入了绝境。

这种情况下，美国重启部署“萨德”的倡议，实际上已经使朴槿惠政府处在不得不接受的位置。一来，过去60多年间，只有美国始终有意愿也有能力确保韩国的外部安全，从而使首尔当局不得不仰赖美韩军事同盟支撑其对朝政策。再者，美国或许是唯一一个公开支持以韩国为中心统一整个半岛的大国，这对时常担心金正恩政权发生崩溃的韩国无疑是极强的心理暗示。而这些来自军事和政治层面的资源输入，是中国不可能或不方便给予韩国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国，但依旧无力在政治和安全层面“对冲”美国的影响。

另一方面，尽管韩国政府对朝鲜政权不稳可能导致的难民危机和经济负担深怀担忧，但从2008年以来，韩国研究机构、智库以及政府部门在“应对朝鲜政权崩溃”这一课题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与欧美政界形成了广泛的交流和互动。目前透露出的应急预案包括由驻韩美军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PACOM）维持半岛的初期稳定，搜寻并摧毁朝鲜保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使韩国在联合国大会授权下作为委任托管国负责朝鲜的重建；经过短则数年、长则10余年的融合，最终完成彻底统一。而在统一后的半岛安全问题上，美韩军事关系专家、韩国天主教大学教授郑敬永退役上校公开呼吁美国在统一后的朝鲜半岛继续保留1万人左右的驻军。而无论所谓的“崩溃应对”预案，还是使美军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的设想，都与中国降低冲突系数、确保半岛内部以及整个东北亚稳定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这使得韩国只有通过强化对美同盟一条途径，来为其预设的统一方案创造机会。

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设想框架下，为本国争取合理的外部权利空间，特别是在西太平洋追加必要的战略空间。但美方迄今为止并未对这一倡议做出任何正面回应，也即在事实上拒绝承认中国在地理战略和海洋安全层面的大国诉求，拒绝在口头和实际上给予中国任何形式的战略空间分享。这种战略上的不信任感和复杂性，同样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尽管华盛顿当局不得不

无论所谓的“崩溃应对”预案，还是使美军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的设想，都与中国降低冲突系数、确保半岛内部以及整个东北亚稳定的既定政策背道而驰。

依靠北京的斡旋和信息传递渠道来缓解朝鲜核项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压力，但在本质上并不信任复杂的多边多国干预模式。2007 年以降，由中国组织的六方会谈的影响力被刻意弱化，便是一项明证。

从 1993 年第一次朝鲜核危机至今，美国真正心仪的互动模式始终是双边式的。区别仅仅在于，在 1994 年的《朝美核框架协议》中，美方企图以“轻水堆换非武器化”的胡萝卜稳住平壤，认定朝鲜政权在该协议的 10 年执行期内将自行崩溃；而在安理会 2270 号决议通过后的 2016 年，美方认定经济制裁和国际压力迟早会迫使朝方主动与美国展开接触，最终以双边一致为基础达成协议（类似 2003 年利比亚的去核化进程）。倘若朝鲜方面一意孤行，安全和政治压力将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各国共同分担；而倘若朝方与美国的意图不谋而合——实际上，开启美朝双边谈判正是平壤长期的夙愿——后续的政治红利则可由美国一家独占。从这个角度说，六方会谈迟迟无法重启以及“萨德”入韩，同样可以视为美国弱化中国对朝影响力的布局，是华盛顿挤压中国战略空间的缩影之一。

重启“脱钩外交”

站在中国的角度，“萨德”入韩不仅构成了外交层面的冲击，对长期以来依靠陆基中远程武器遂行反干涉战略的布局也是一种明显的威胁。尽管 AN/TPY-2 型雷达的探测距离尚不足以覆盖中国最新型洲际导弹的上升段弹道（DF-41 型的推定射程超过 1.2 万公里），但已足够监视助推段和弹头的分离过程，从而对该型导弹的弹道飞行特征数据做出记录，分辨出其中的诱饵和真弹头，提升拦截的成功率。而对中国预定用于反制第一岛链内美军基地、航母等高价值目标的 DF-21 系列中程导弹，乃至部署于福建沿海的 M 家族短程弹道导弹，“萨德”的雷达系统更是可以实现无死角监控。部署于韩国和关岛的两套“萨德”，加上已经在日本青森和京都投入运转的两台 AN/TPY-2 型雷达，以及自 2012 年起在台湾新竹投入使用的“铺路爪”远程预警雷达（探测距离超过 5000 公里），在西太平洋已经形成了一张针对中国中远程导弹的监控网。倘若在菲律宾部署 AN/TPY-2 型雷达的动议也获得通过，势必形成“四海联动”效应——北京在黄海、东海、台海、南海的任何一个战略方向上有所动作，美军都可以相机调整其西太平洋军事部署，予以重点应对，如此中国的战略机动性将大大受损。

正是在“萨德”入韩已成定局的 2016 年 5 月 31 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前外相李洙墉意外现身北京，并受到习近平主席的接见，释放出了不同寻常的信号。据新华社报道，李洙墉此行旨在向中方通报 5 月初举行的劳动党“七大”情况，同时带来了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方希望与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和发展朝中传统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口信。这是 2016 年初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首度有高官出访北京，也是中朝两国正常沟通渠道恢复的标志之一。而中国领导人在会谈中除去继续申明“希望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加强沟通对话，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既定立场外，也强调了中方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愿同朝方共同努力，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换言之，在不明确违反安理会 2270 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极有可能返回到 2009 ～ 2012 年曾经实行过的“脱钩外交”模式，将半岛无核化与巩固和发展中朝关系分离开来。

实施“脱钩外交”的可能性，首先在于朝鲜政权稳固性的超出预期。尽管美、日、韩等国长期预测金正恩的执政面临来自经济领域的重重压力，随时有可能崩溃，但据韩国中央银行估计，从 2011 到 2014 年，朝鲜 GDP 依旧维持了年均 1.05% 的罕见增长率，直到 2015 年才开始下滑。中朝贸易问题专家、延边大学教授林今淑认为，金正恩在继续核工程以及导弹项目开发的同时，部分加大了对投资少、见效快的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建筑行业的投入，使经济出现了一定起色。农业领域的主粮结构置换（改种能供养更多人口的玉米），以及类似中国 70 年代末包产到户模式的“圃田担当制”，甚至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粮食供给有了一定改善。而金正恩对最高领导层的清洗，效果同样超出预期——据韩国国防部、统一部和情报当局统计，过去 4 年朝鲜的 109 个军政核心职位中有 79 个更换了首长，比例高达 72.5%；其中 15 个军队核心职位中有 12 个发生更迭，人民武力部长更是连换了 6 人之多。经过这番调整，朝鲜最重要的 10 位党、政、军核心领导人的平均年龄由 2012 年的 68.6 岁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61.1 岁，到劳动党“七大”召开时为止，基本完成了领导层换代。

但在 2015 年国际社会的对朝制裁趋于强化，特别是今年初安理会 2270 号决议通过之后，朝鲜的对外贸易总额（特别是矿产和农林渔业出口）重新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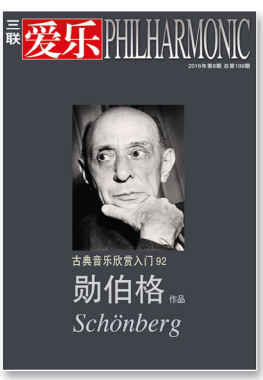
了下滑周期，发电量也由于石油进口受阻重新出现了大面积缺口。韩国《中央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观点称：李洙墉的北京之行除去恢复政治接触外，也是希望从中国获得 100 万吨左右的粮食援助。包括今年 4 月宁波柳京餐厅工作人员“脱北”事件，以及 7 月下旬的朝鲜军人越境事件都显示：从短暂的复苏期重新滑入低谷的朝鲜经济，可能在国内外催生诸多不稳定因素。而在敦促平壤当局“废核”以及停止导弹试射的努力尚未见诸成效的背景下，中国欲达成维持半岛稳定的目标，实际上不得不重回有限度扶持的政策路线。

在不违反安理会 2270 号决议的前提下，中国有能力借助 50 万吨以下的粮食援助和每年最低 52 万吨的石油输出（这一数字是中朝友谊石油管道为维持妥善度所需的最低通过值），维持平壤政权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使自身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话语权重新上升。时殷弘教授认为，尽管“脱钩外交”对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的内部改革很难说具有明显的影响效果，但它是一种“止损”效应明显的战略，有助于使朝鲜政权摆脱严重和急迫的内部危机，从而使半岛形势的最终走向脱离美韩框架的引导。在外部空间日益逼仄的背景下，“脱钩战略”至少可以使中国摆脱无法兼顾无核化与维持半岛内部稳定的两难处境，获得一个相对可靠的时间窗来制订应对核问题的下一步对策。

但无论是“脱钩外交”还是恢复中朝党际外交的尝试，实际上都已无法逆转以“萨德”入韩为标志的“特殊主义”战略在东北亚的重新兴起。2005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前总干事巴拉迪在其回忆录《诈术年代》中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伊拉克和利比亚主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却仍未能避免政权更迭的历史给了朝鲜领导人极强的心理暗示，使金氏父子深信只有紧攥核撒手锏，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而相关各国在基于普遍主义的多边应对机制陷入停滞之后，只能重回传统的自助（Self-help）模式，优先确保自身的紧要战略利益不受侵害。当这种自助行为和中美两国在西太平洋更大范围内的摩擦产生交集时，类似“萨德”入韩这样的特殊主义政策便将进一步凸显。而周边关系在未来 5 年的进展，也将对中国对美战略的前景产生深刻影响。

（本文对朝鲜弹道导弹射程的推测参考了马库斯·席勒为兰德公司撰写的长篇技术报告《朝鲜核导弹威胁综述》）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84681046　84681042（传真）
E-mail:dzfw@lifeweek.com.cn
《爱乐》杂志网址：
http://www.lifeweek.com.cn/philharmonic

《爱乐》2016 年第八期要目

古典音乐欣赏入门系列 92

- 走向无调性——格奥尔格诗歌影响下的勋伯格创作
- 张路瑶、白佳欢、李方颖对勋伯格的《升华之夜》、《月迷彼埃罗》和《华沙幸存者》的精彩解读

纪念册　潘德雷茨基《波兰安魂曲》的首演
逝者　女高音歌唱家阿德琳娜·帕蒂
话题　名家谈贝多芬九首交响曲（中）
　　漫谈：选择聆听属于自己的音乐与演奏
爱乐笔记　早安 阿格里奇
　　米佳的故事
现代音乐　约翰·凯奇的“数字音乐”
作曲家档案　“冰岛的西贝柳斯”约翰·莱夫斯
演奏家档案　古尔德关于贝多芬的自问自答
唱片说明书　听富特文格勒指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
作品　莫扎特《交响协奏曲》作品与版本比较
听片购片与收藏　兰多芙斯卡与霍尔邵夫斯基

《爱乐》2016 年订阅须知

2016 年《爱乐》月刊，每期 240 页，全年 12 期，零售单价：20 元，全年定价：240 元。

2016 年《爱乐》邮局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192 元。欢迎咨询、订阅与作为礼品馈赠他人。或在卓越网订购：www.Amazon.cn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 9 号 B 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爱乐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金街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国内钢铁去产能任务艰巨，今年要化解 4500 万吨过剩产能

钢铁，去产能与重组

记者 付晓英

去产能，合并重组是一个重要思路。

7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总结了去年以来南北车合并、五矿中冶重组等央企重组经验，要求推进强强联合，集中资源形成合力，减少无序竞争和同质化经营，有效化解相关行业产能过剩。

钢铁行业是去产能的重中之重。今年 6 月底，宝钢股份和武钢股份发布停牌公告，披露两家企业正在筹划战略重组，流传已久的宝武钢合并传言终于落地。而就在几天前，首钢与河北钢铁的合并传言又起，虽然很快被各方否认，但除了单个企业内部化解过剩产能，钢铁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显然被视为去产能的关键举措。因此，我们采访了三位钢铁行业专家，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冶金规划研究院院长李新创和北京科技大学冶金系教授许中波，对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以及兼并重组等问题进行相关分析。

产能过剩的中国钢铁行业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钢铁业目前的产能状况怎

样？产能过剩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李新创：产能利用率是判断产能过剩的直接指标，欧美国家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79%～83%比较合理，产能利用率低于75%即为严重过剩。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2007～2011年保持在80%左右，总体上处于合理水平。但2012年之后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能过剩矛盾突出。2012～2014年，我国粗钢产能分别为10亿吨、10.4亿吨、超过11亿吨，粗钢产量分别为7.2亿吨、7.79亿吨和8.23亿吨，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2%、74.9%和低于74.8%。考虑到产能统计不完全，近几年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可能还要更低一些。所以，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确属实，但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是全球性问题。按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我们目前的钢铁产能在12亿吨左右，去年的产量是8亿吨左右，按照80%左右的产能利用率算一下，大概过剩1.5亿吨左右，这是我们要在今后5年内化解掉的产能。今年的目标是化解4500万吨，目前正在稳扎稳打地推进。上半年，钢铁行业化解产能过剩迈出实质性步伐。上半年，粗钢产量下降1.1%，钢材产量仅增长1.1%，表明钢铁业发展整体呈收缩态势。

三联生活周刊：以前中国是否也出现过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过剩的产能无法化解会带来哪些影响？

李新创：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技术、资金、资源、能源、劳动力密集产业，但同时是产能过剩最严重、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导致钢材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行业整体效益大幅下滑。钢材价格自2011年第四季度以来一路下跌，屡创新低。近年来，钢铁行业盈利水平持续下降，大中型钢铁企业整体上徘徊于盈亏边缘。钢铁行业盈利水平下降既是产能过剩引起的后果，也是产能过剩的直接表现。产能严重过剩，行业整体处于盈亏的边缘，使企业转型升级的能力下降，严重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

此前，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多次出现过。但是，从钢铁行业来看，像目前这一轮的产能过剩范围如此之广、数量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还不多见。这一轮产能过剩的大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处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按照原有比较优势配置建设的产能就出现了过剩，因此，把产能盲目扩张的势头压下去是首要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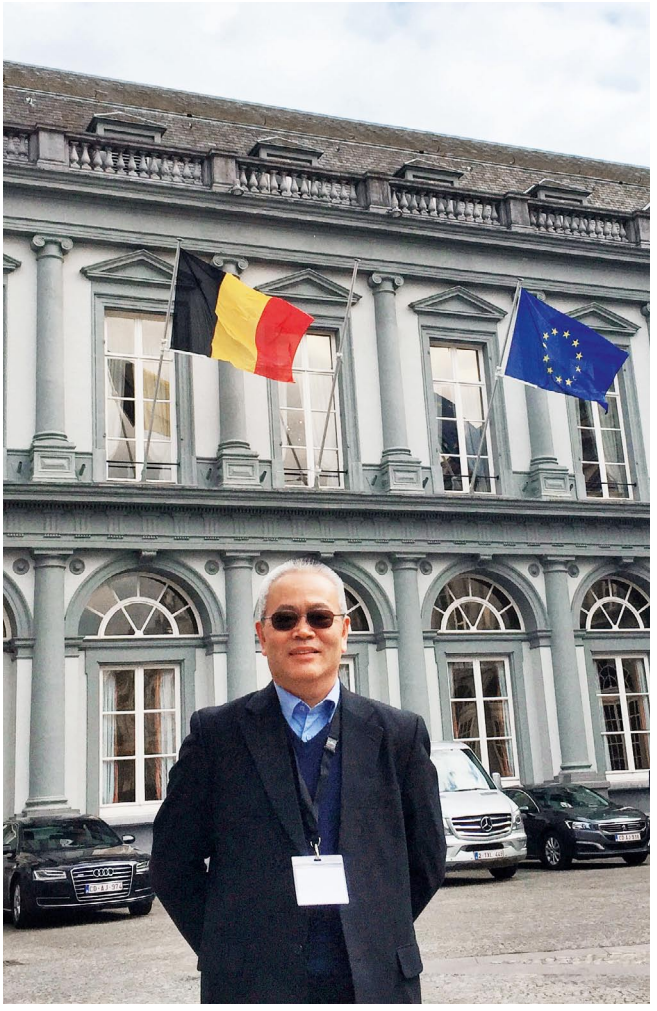
刘海民：国家已经分解了去产能的具体任务，我相信今年削减4500万吨的任务是能够完成的。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应过度夸大中国钢铁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关停多少应该由市场来决定，未来几年中国消费多少、出口多少不确定，是会变化的，因此实际需要去除多少产能不能简单地计算出一个确切的数字。钢铁生产行业能够恢复到正常的销售利润水平，即5%～6%这个社会平均销售利润率就说明除产能到位了。今年上半年中钢协会员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不到1%，整个黑色冶金冶炼业的利润率超过2%，这与正常的销售利润率有一定差距。

僵尸企业的清除与企业兼并重组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底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说，清理处置“僵尸企业”是“去产能”的“牛鼻子”，这应该如何理解？钢铁行业的“僵尸企业”如何清除？

刘海民：经济学上有一个价格形成原理，一系列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其成本由低到高排成一个序列，排到最尾端的那个叫边际生产者，市场价格应该让边际生产者不亏本。比如说它的生产成本是2000元，市场价格最低也应该是2000元。如果市场价格低于2000元，边际生产者不能够弥补成本，理性的生产者就会退出市场，结果供求关系发生变化，价格仍会上升到边际生产者不亏本的水平。但现在中国钢铁工业的问题在于，边际生产者起不到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了，亏得一塌糊涂还是不停产，这样的企业为什么有底气不停产呢？因为背后有“输血来源”。这样的边际生产者实际上是僵尸化了。僵尸企业没有生存能力，严重亏损，却因为背后的“输血”坚持亏本生产，造成市场供大于求，钢材这种商品的需求无弹性，价格却富有弹性，可能价格就从相对合理的2000元跌到1500元，整个行业也就处于一种没有利润的状态，连有竞争力的企业都受到拖累。行业内外逐渐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近期发改委在杭州召开的去产能会议，提出去除产能要以去“僵尸企业”为重点，这个提法很好，亏得多就应该出局，这样行业才会好起来。钢铁行业中的僵尸企业很典型，大概全国十来家，基本上都是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通过“输血”让它存活下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钢铁行业就好不了。

三联生活周刊：如何理解钢铁企业之间的兼并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

重组被视作去产能的关键一招？

刘海民：兼并重组对企业的好处是世界上公认的，它有合并效应，能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微观来说，企业合并以后，首先可以实现资源共用，比如企业的研发力量、技术人员、资金、供销渠道等等可以共享，原料采购价格成本会降低。当然，企业合并也可能带来问题，比如可能会造成垄断，损害消费者或者下游产业的利益。

但是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垄断这一步。中国钢铁行业的问题是过度分散。国内最大的钢铁企业河北钢铁集团的产量占全国总量不到10%，这个份额非常小，而国外大型钢铁企业前两三家的产量已经达到50%以上了。中国《反垄断法》规定，一家企业占50%以上，两家企业占三分之二以上，三家企业占四分之三以上，才具有市场控制地位。中国的钢铁企业兼并重组能够遏止过度竞争，我们叫同质化竞争。因为普通钢材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品牌上下差价最多百元左右，不同企业之间的竞争手段主要在于价格，分散的几家企业在同一个市场里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压价，甚至压价到只要能够收回现金流成本就可以，折旧都不要，长此以往，整个行业势必走向亏损。

近几年来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不同企业铁矿石的获得成本已经趋同了。2010年以前，钢铁行业有“长期协议矿”，中国市场上的长期协议价通常低于市场价格，所以能够进口“长协矿”的钢铁企业，它的原料获得成本更低，最高时每吨差价500元，折合到每吨钢材里面大概就是800块钱。另外，原来矿价高的时候，有一些国有企业自己有矿山，像鞍钢、本钢、太钢、首钢这些，有原料成本优势。所以各个企业之间，由于在原料的获得成本上不一样，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不一样，成本高的钢铁企业竞争力更弱，钢材价格一下跌，企业就可能停产，同质化竞争的矛盾还不是太突出。这几年情况变了，“长协矿”已经寿终正寝了，矿价也整体上大幅度下滑，有矿山资源的企业也失去了它的优势。矿石现在已经有期货和现货市场，有成熟的竞价模式，价格信息非常透明。因此，企业之间，原料获得成本趋同，生产工艺也一样，同质化竞争手段只有拼价格，最后大家都没利润。而完全由政府来控制产能产量，长期看是不可行的，企业利用设备更新时机以小换大，你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察觉，所以最终还是要靠企业内在动力来遏制降价竞争，那就是通过兼并重组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产品的分工，统一销售，避免价格战，使整个行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

体制阻碍与人员安置

三联生活周刊：宝钢董事长徐乐江2013年曾公开表示：“若国务院不下命令让宝钢兼并，宝钢一个企业都不会兼并重组，因为中国兼并重组的政策环境问题还没解决。”这个政策环境该怎么理解？国内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面临着哪些障碍？

刘海民：首先是体制上的障碍，跨区域、跨国

资委整合的钢铁企业成功案例很少，例如宝钢对新疆八一钢铁，还有武钢对昆钢也只是表面上的合并，昆钢实际的控制权还是在当地政府。再比如鞍钢和本钢合并后叫“鞍本集团”，挂牌挂了若干年，但从来没有实质性地合并过，后来干脆连牌子也摘掉了。之前，还有是说干脆划归为央企，地方政府不会同意的，本钢是个上市公司，可以发展当地的经济，有融资功能，减持就能变现，凭什么要无偿划拨出去呢？在中国的体制下，跨区合并存在着行政体制方面的障碍，地方政府之间互相提防，纳税怎么办、利润怎么算，都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难度很大，所以一些跨省的兼并后来失败了。从行业整体的发展思路来说，合并是很必要的，但遇到了制度方面的障碍，怎么去克服？国企合并的方式不能无偿划拨，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由各省的国资委当股东，根据资产评估所占的份额进行持股，然后派出董事，成立跨省集团？总之，兼并重组一定要解决好体制障碍，解决好人、权、责等问题。

其次就是人员安置问题。很多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远远超过其实际需要的人数，尤其是兼并重组之后，势必会形成更大的冗余，下岗分流在所难免。粗略统计，钢铁行业可能会造成近 20 万的下岗员工，因此，经济补偿和职业培训等安置工作非常重要。

许中波：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也要考虑地区差异，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化解过剩的钢铁产能，工人通常会得到相对较好的经济补偿和工作机会；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欠佳的省份，比如东北，煤炭和钢铁行业都面临着去产能的问题，这样一来，本省的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工人下岗的问题也会比较棘手。所以，国家要化解产能过剩，也要因地制宜，经济发达的省份可以多承担一些任务，至于经济落后地区，已经死掉的钢铁企业不再“输血”挽救，还有活路的企业则可以继续生产，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三联生活周刊：就以前的经验来看，兼并重组后的钢铁企业发展不是很理想，比如武钢和柳钢、宝钢和新疆八一钢铁等，宝钢和武钢的合并重组与之前有什么不同？

刘海民：前些年的一些兼并重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不完全是市场行为。比如，河北、山东国企整合为“集团”，甚至宝钢兼并新疆八一钢铁，都明显带有行政指导的意味。区域跨度太大，宝钢鞭长莫及，很难谈得上合并效应。兼并重组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和原则，比如说把处于同一个区域，生产的产品也一样、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合并之后原料采购和销售都更加方便，也能减少同质化竞争。普通钢材还是以地域为主，建立区域市场龙头；特殊的钢铁产品可以产品为纽带，实现跨区域、全国性的重组。

世界钢铁产业布局有个规律，叫“原料全球配制，生产贴近市场”。就是说原料可以从澳大利亚、从巴西运过来，但是生产要贴近市场，销售半径不能太大，普通钢材的销售半径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 500 公里，超过之后，运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所以，我认为要形成区域市场，就是区域市场的龙头。一个区域内，龙头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应该是达到 50% 甚至以上，对市场具有控制地位，内部不打价格战，不搞同质化竞争。而区域市场之间又是互相开放的，能遏制垄断，这种市场结构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

宝钢和武钢的合并重组有几个优势。首先，它们都是国资委的下属企业，在体制上是统一的；而武钢的领导也是宝钢调过去的，人事权的阻碍也小一些；另外，宝钢和武钢的产品结构相似，比如两家企业都生产硅钢、汽车板、家电板等高端产品，合并之后可以实现技术资源共享和品种分工，并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李新创：宝钢钢铁主业呈“两角一边”布局，即以上海宝钢为核心的“长江三角”、以广东湛江为核心的“珠江三角”和以新疆八一为核心的“西北沿边”。武钢钢铁主业呈“一江一边一海”布局，即以武汉青山，湖北鄂州、襄阳为基地的“中部沿江”，以云南昆明为基地的“西南沿边”和以广西防城港为基地的“南部沿海”。宝钢武钢布局优化协同空间巨大：首先，防城港基地和湛江基地可一并考虑、避免重复建设；其次，压减产能、基地定位、产线调整等方面有较大优化空间；另外，宝钢武钢国际产能合作处于探索阶段，可借重组机遇，统筹海外钢铁、原料基地布局等。

一个区域内，龙头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应该是达到50%甚至以上，对市场具有控制地位，内部不打价格战，不搞同质化竞争。而区域市场之间又是互相开放的，能遏制垄断。

大众的新能源战略之局

主笔 李三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

对于大众在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战略，尤其是操作细节，大众汽车集团（中国）总裁兼 CEO 海兹曼颇有倾诉之欲。

8 月 2 日，刚刚从欧洲度假回来的海兹曼完全没有时差，这一天的工作日程满满当当，对他来说，将工作和休假无缝对接是常态，“经常是一边度假一边开电话会议”。8 月度假是大多数德国人的习惯，今年是海兹曼第一次在北京度过 8 月酷暑。“对我来说，世界上最具有挑战、最有意思的市场就是中国市场。”他说。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否注意到近一段时间围绕合资车企的股比问题展开的讨论？

海兹曼：我想这可能与新成立或即将成立的合资企业有更直接的关系，对于已经成功运营的合资企业来说，这种股比的设想未必有直接影响。任何股比上的变动都应由合资双方一起讨论，并达成共识，这样才能够捍卫未来双赢的发展。对于任何合作双方来说，合作的目的都是要实现最终的双赢。

在股比问题上，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正在日益与国际接轨，特别是在市场化、企业经营等角度，更为接近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在汽车市场的开放过程中所采取的步骤，特别是与国际接轨的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是欢迎的。在中国，我们的合资企业能走到今天，有如此大的收获，来源于合资双方融洽的合作关系，许多重大的决策都由我们一起来进行沟通，最后一起来拍板。所以，为了更好地保证在中国市场未来的成功，我们仍然必须要一起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有没有新的调整股比的计划？

海兹曼：除了计划中的一汽－大众方面增持，我们并没有新的调整股比的计划。总之，我想表达三点：第一，只要有利于公平、平等竞争的规则我们都欢迎；第二，至今为止，我们与在华的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的合作非常愉快，而且成果也令人满意；第三，即便要进行任何股比上的调整都要在共识和双赢的基础上去推进。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本土的合作伙伴日益提高的竞争力？

海兹曼：不仅在中国，在全球其他地区竞争白热化程度正在日益凸现，在中国，尤其本土主机厂的竞争力在不断提高。对于与本土主机厂的竞争，我是持一种欢迎的态度，并且我也深信大众会越来越成功。我觉得良性竞争有个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要营造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比如能源车方面尤其需要一个公平的环境。不仅是新能源车，如果展望未来几大趋势的话，包括数字互联、自动驾驶也一样，我们希望这些领域都会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中国市场环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改善？

海兹曼：如何根据国际标准实现主机厂的平等待遇，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话题，特别是在新能源车领域。在节能减排、新能源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领域，大众汽车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尤

其是在新能源车方面，在技术导入和本地化生产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资金，我们是十分专注的。

在节能减排以及新能源车领域，我真心希望中国政府能更快地与国际接轨。尽管大家对股比问题很敏感，但我自己尤为着急的还是电池和新能源目录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确实更紧迫，我们由衷地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能有清晰的政策、公平透明的环境，以便我们在投资时有可预见性。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到节能减排以及新能源车领域，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海兹曼：目前我们正在与领先的电池厂商进行洽谈，包括中、日、韩企业。但目前一些韩系厂商的电池并没有在中国得到批准，所以，在补贴等方面还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第一辆新能源车是新的奥迪 A6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为了使这款车进入名录，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要满足多项审核，以确保满足中国政府的相关要求。尽管这款奥迪 A6 已经成功进入了中国的新能源车名录，但它何时能够上市仍然是个未知数，或者说何时能得到政府的补贴是个未知数，因为其中使用了韩系厂商的电池。

目前来看，韩系厂商的电池什么时候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放行还不明确。我的担心是，某些韩系和日系的电池供应商目前还不能进入中国相关补贴的目录。讲到新能源车，整车方面我们已经在多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包括与合资公司相关的讨论，以便我们逐条地满足政府的要求，但最终还是有瓶颈。

三联生活周刊：大众汽车在新能源领域的野心有多大？

海兹曼：2020 年大众至少会有几十万辆新能源车投放，包括靠电池就能够跑 50 公里以上的新能源车。而且先前我们也沟通过，在新能源车方面，大众汽车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与传统内燃机车类似的市场份额。

我们认为新能源车应该包括两种：靠电池跑 50 公里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或者续航 200 ～ 400 公里的纯电动车。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更关心的是新能源车是否在政府目录上，或者能不能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获得新能源车牌照，获得政府相关补贴。

大众汽车始终站在技术研发的前沿，我们的科研都落实到每年增加的新能源车车型产品上。我们希望在市场上能有更为平等的竞争条件，甚至更为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放开手脚进行投资和开发。

三联生活周刊：在新能源车领域，你认为市场的机会有多大？

海兹曼：我们相信，2020 ～ 2025 年，中国新能源车发展一定会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市场，我们的 MEB 平台，就是为纯电动新能源车生产准备的。

关于新能源车，对客户的了解和洞察对于我们新能源车的布局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在新能源车细分市场，客户是否喜欢 SUV，喜欢宽敞一点的车，或者是小巧一点的车，他们能接受的价格区间是怎样的，他们可以接受的续航里程是怎样的，他们如何使用这个汽车产品，这些都对我们的产品路线以及技术创新路线有所影响。这些话题与我们过往谈到的汽车行业发展的话题都不一样，当我们谈到这些话题时，毋庸置疑，中国市场的发展一定是走在前面的。除了汽车的设计以及技术研发以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客户可接受的价格区间，这对将来新能源车的量产意义重大。

三联生活周刊：基于中国目前打车软件的发展势头，大众汽车集团对未来出行服务市场怎么布局？

海兹曼：谈到新的移动出行解决方案，比如分时租赁，在分时租赁业务模式下，什么样的车型是最适合的，这个产品造型应该是什么样的，客户的用车习惯等等，这需要做很多的研究工作，这对中国市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在中国，汽车制造商向新的移动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的速度比其他市场要快得多。大家可能都知道，大众汽车在中国的业务差不多已经占了集团业务的 40%，中国业务的走向以及中国业务的表现对集团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中国在引领整个行业的变化，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不仅对中国有影响，其实对集团也是有所影响的。类似 Uber 提供的服务在中国非常流行，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我们正对其进行观察，也在做相应的商业研究，看现在这种业务和需求的走向，再对集团的相关业务部署和发展进行规划。

广汽的 SUV 破局之道

主笔 李三

7 月 29 日，广汽 Acura（讴歌）发布首款国产车型豪华 SUV CDX。在进入中国的第十个年头，Acura（讴歌）品牌终于正式实现了国产化。

Acura（讴歌）成立之初是本田汽车为进军美国市场而成立的豪华品牌，1986 年登陆美国市场，短短时间内就能颇受美国市场的认可，但这个传奇在中国市场却未能如期复制，今年是这款“美系”豪华车来华的第十个年头，与其他日系豪华品牌相比，讴歌亟待新的突破。按照讴歌的说法，CDX 是一款“主要为中国市场设计”的车型，选择这样一款定位于豪华入门级 SUV 来打开中国市场，显然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CDX 能否将讴歌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广本总经理佐藤利彦表示：“首款国产车型 CDX 率先采用了全新的设计理念，这是因为，我们坚信，在中国这一重要市场中的辉煌成绩，必将引领讴歌在全球的成功。”

车型研发总负责人渡边朝生曾在公开场合承认，CDX 的竞争对手锁定为奥迪 Q3、奔驰 GLA、宝马 X1 这样的豪华紧凑级 SUV。CDX 的 22.98 万～30.98 万元售价颇具诚意，降低了豪华紧凑型 SUV 的入门价格门槛。但由于目前广汽讴歌 CDX 还只有一个 1.5T 的动力选择，相比强劲的 ABB 对手，产品组合略显单一，能否如愿分食豪华紧凑级 SUV 的市场蛋糕仍然未知。有机遇，更有挑战。

在讴歌 CDX 上市之际，广本副总经理兼第二事业部长渡边康治、副本部长王顺胜以及车型研发总负责人渡边朝生等相关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三联生活周刊：据我们所知，CDX 是一款在欧美市场并没有的车型，为什么选择这款全新车型进行国产？

渡边康治：选择投放 CDX 是结合了市场环境和我们自身优势的结果，因为看到中国 SUV 市场的增长率十分迅速，我们瞄准了这一市场。从讴歌全球战略来讲，讴歌十分擅长 SUV 领域。这款车型也可以称为“专属”中国市场而研发的车型，无论从外观、内饰、配置及操控性能等各方面，都充分考虑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三联生活周刊：在研发过程中，如何体现对中国市场的“专属”？

渡边朝生：在我看来，中国豪华汽车市场对 SUV 的需求是很高的，为了应对这一需求，我们决定从最擅长的领域进行国产。针对首款车型，广汽讴歌对动力总成以及底盘都进行了革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中国客户的需求进行了周密调查，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用户并不满足于目前的高端品牌，他们拥有精准的眼光和独特价值观。建立在这个价值需求之上，我们再选择配置。我们希望达到竞争对手同等或者以上水平，同时增加了豪华车的元素，从而达到更高性价比。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发布的五款车型都采用 1.5T 发动机？你是否注意到，作为竞品的宝马 X1、奥迪 Q3 都有 2.0T 发动机的选择，未来 CDX 是否有这种考虑？

渡边朝生：开发新动力总成时，我们从环境及燃油经济性角度出发，决定采用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 +8DCT 双离合变速箱的全新动力组合，这样可以使追求讴歌产品驾驶性能的客户拥有畅快的体验。为了不对环境造成过多负担，今后将通过混动版的投入，在为客户提供更高驾驶乐趣的同时，兼具环保性。

三联生活周刊：在同类产品细分市场，CDX 有哪些“独门绝技”？

渡边朝生：CDX 的竞争对手是宝马 X1、奔驰 GLA 等，为了实现跟这些对手进行竞争，我们在车辆行驶性能以及乘坐性能上下了很大工夫，在基本需求层面，CDX 会达到跟竞品同等乃至以上水平。根据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非常在意的是后座部位的空间感。在进行后部座位设计时，我们特地请中国消费者做体验，哪怕调整一度的距离，让顾客的腿和视线达到最好的舒展程度，我们都做了精密的分析。后部座位因为轮胎运动产生噪音，这会让乘坐人感觉不舒服，为此我们进行了非常大的改善，采用隔声技术，另外

广汽本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渡边康治

在后部中间位置设置了可升降的扶手，用于四座、五座之间灵活切换，带来越级的私享空间。而且，CDX进行了动力升级，平台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变通，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效提升车型的竞争力。

在国产的过程中，导入了讴歌的全球品质标准(Acura Quality Standard)，这是一个拥有100多项品质标准的系统。特别是在涂装过程中加入了研磨工序，提高了平滑度，加厚了高透涂层，大幅度提升了光泽度。通过这些工序，使车辆的高端品质感有所提升。

三联生活周刊：这款被寄以厚望的车型有没有具体的销量目标？

王顺胜：我们将SUV CDX今年的销量目标锁定在1万辆以上。豪华车市场虽然竞争激烈，但本田拥有450万的用户群体，以及广汽本田在全国的470家营销网络，考虑到在本田体系内进行升级的消费者占比，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个销量目标。

豪华品牌在细分市场里找准定位非常重要，CDX的目标用户是“80后”“90后”这样一批年轻、进取的消费群体。考虑到豪华品牌SUV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们为SUV CDX制定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价格。此外，我们还有4年10万公里免费基础保养以及4年10万公里的免费专业道路救援服务。在销售渠道方面，讴歌作为一个独立的豪华品牌，销售服务体系是独立运营，目前有40多家4S店，目标是在年底前增长到60家。我们将从整合营销考虑，在豪华品牌领域内进行创新，真正做到“唯自己、可追随”，最终把营销推向全新高度，引领豪华SUV市场。

三联生活周刊：伴随着国产车型CDX上市，讴歌在市场销售方面有什么举措？未来的产品布局有哪些规划，进口车型和国产车型的销售比例是怎样的？

王顺胜：作为豪华品牌，之前的销量为整车进口销售，今后将围绕国产化车型CDX把控营销节奏，今年下半年会有一系列措施来提升销量。基于广汽讴歌战略考虑，明、后年都会陆续为中国市场导入新车型，助力品牌发展。目前，讴歌国产和进口车型是整合销售渠道，今后将继续根据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带来进口大型SUV、跑车、轿车等多种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车型选择，为4S店提供更多营销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一个合资品牌，在品牌建设方面，广汽会为讴歌提供哪些支持？

渡边康治：讴歌是一个全球品牌，在尊重品牌设计理念的基础上，在开发车型及品牌运营时，会优先考虑产品的驾驶性能及高品质感与服务。为了更好地面向中国市场，更好地面向中国用户，为中国用户提供更好的讴歌产品，我们与根植中国市场的广汽集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许培鸿 摄）

（聂鸣 供图）

陌生的汤显祖

文 何潇

自日本戏剧史家青木正儿始，人们说到汤显祖，总是会谈起莎士比亚。这一东一西两个剧作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都在1616年辞世，距今整整400年。

两人之间确乎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莎士比亚在1594年写作《罗密欧与朱丽叶》，汤显祖在1598年写作《牡丹亭》，都是关于年轻女子“情死”的故事。又比如，我们颂扬汤显祖的“情”与“天然”；而莎士比亚让歌德至为称颂的地方，正是“没有人比他更为自然。”

颇有意味的一个现象是，对于较为年轻的一代中国人，莎士比亚是一个比汤显祖更令他们熟悉的名字——即使他们生长在中国。了解朱丽叶的人，远比了解杜丽娘的人多。我们能随口说出哈姆雷特的名言，却并不一定知道邯郸卢生的名字。

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汤显祖是陌生的。这其中有商业文化的浸染，也有文化传承的落差。

我之所以做此感慨，是因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我，在不更事的童年时代，便熟知《哈姆雷特》和《威尼斯商人》的故事。而直至长大成人，世界观形成之后，才真正接触起汤显祖。与同辈人交往的经验告诉我，我并不是一个特例。

实际上，令我们陌生的，不唯一个汤显祖。对于成长于全球化时代的人，所有传统的“东方”，都是陌生的。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下，“东方”与“西方”的边际在日益消融。

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学习了西方种种理论之后，再回看汤显祖，会感到他是现代的。比如他的“梦”、他的“情”、他的“悲”。他的“生生死死随人愿”。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似水年华，如花美眷。恁般景致，应人人得见。

左图：由苏州昆剧院演出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

右图：陈列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汤显祖画像

《桃花扇·传歌》，清代坚白道人绘《清彩绘本桃花扇》。描绘李香君将刚学的曲辞《牡丹亭》演唱给教曲先生苏昆生、鸨母李贞丽及杨龙友欣赏的场景

（天鹰 供图）

浙江遂昌汤显祖纪念馆里陈列的《惊梦》剧照，由梅兰芳、姜妙香出演 （摄于 2009 年）

“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汤显祖的梦与情

梦

因情生梦，因梦生戏

《牡丹亭》的故事，因梦而始。太守之女，爱踏春阳。适逢春日，小姐进得园中，见姹紫嫣红开遍，感怀自己生得花容月貌，却“三春好处无人见”。遂而生梦。梦里遇到一书生折柳，是其三世婚配。游园归来，郁郁难言，至情伤而亡。后化为魂魄，与书生续未竟之情缘，最终还魂，结为连理。便是“杜丽娘慕色还魂”。

“临川四梦”，皆以梦说事。梦是从何而来的呢？汤显祖在《复甘义麓》中，谈《南柯记》和《邯郸记》：“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是路径，“情”是中心。在《紫钗记》中，梦的作用较为简单，其余三部，梦的意义，都很重大。

汤显祖的难题是：如何赋予“情”以绝对的价值，同时又不破坏社会与自我的平衡？于是，他造出了“梦”。

《牡丹亭》中，“梦”是一个制造出来的自在时空。在这个空间里，杜丽娘的所作所为，可以脱离于寻常礼法之外，不受到社会的苛责。其慕色而亡之后，花神恳请判官宽恕杜丽娘的鬼魂，如是辩解：“此女犯乃梦中之罪，如晓风残月。”

“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席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尽管汤显祖如此明确地宣告，《牡丹亭》一剧，并非男欢女爱的才子佳人戏，但 400 年来舞台演出中，多数还是将之当作才子佳人的爱情戏来演，至多，不过以爱情为矛，反抗世俗，追求婚姻自由而已。

《牡丹亭记题词》中，有著名的一段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

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世间女子如杜丽娘者，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才可被称作为“有情人”，是至情至性之人。

为了追逐心中之情，丽娘入梦。在“梦”这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特殊状态里，她的“生欲”，被彻底地释放出来，得以展现充沛和完整的生命状态。在其变为鬼之后，享受梦一般的存在之时，她显得尤为大胆。待她还魂之后，她又复变为那个读圣人书的太守之女，与普通妇人无二。

梦境之中，“离魂”的杜丽娘，出离于形骸之外。夏志清言：“丽娘的梦，是一个无时间性的世界，在这世界中，爱是唯一的真实。”这把游走在梦之中的魂魄，怀有一腔热情，不受时间、生命和死亡的拘束。而爱情之永恒，亦存在于这梦的时空里，一旦它正常化，有了实质性的形体，永恒便难以为继。

梦境之外，时间依然具有绝对的掌控权。戏曲后部的杜、柳，不过一对寻常夫妻，女人托心于相夫教子，男人期冀于仕途显扬。汤显祖所言那个，至情至性的杜女丽娘，在其走出梦境、俗世还魂的那一刻，便被时间收回了。

较之《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与《邯郸记》对于爱情的态度，有所变化，从“求”变为了“放”。美国学者夏志清用汤显祖时间观念的变化，来解释这个差别。在他看来，后两部戏中，汤显祖是以“永恒”的角度来看待人之处境，发现了爱情与他人价值的欠缺。所谓永恒，即无穷无尽的时间，在无限面前，人的意识无能为力。

《南柯记》改自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讲名为淳于棼的官员，嗜酒发梦。在梦中，淳于棼被邀进蚁国，与公主瑶芳成婚，任南柯郡守。他治理有方，拒敌有功，颇有政才。然而，其妻亡后，淳于棼为大臣陷害，称其为“异族”，劝回人间。醒来后，淳于棼寻找槐安国所在，却发现，原只是院中槐树下的小小蚁穴。其妻馈之金钗金盒，不过槐枝与槐夹，他瞬间梦醒。

《邯郸记》同样写梦，改编自《枕中记》。卢生途经邯郸，遇道士吕翁。道士赠瓷枕一个，言枕之，便可心想事成。卢生枕之入梦，经历富贵荣华，醒时身边荒凉米饭未熟。醒来大彻大悟，感到人生不过恍然一梦：“似黄粱，浮生稊米，都付与锅滚汤。”冯梦龙对《邯郸记》推崇备至，认其为“四梦”第一。“因情入道，即幻悟真，阅之令凡夫俗子有厌薄尘埃之想。”

好友孙如法写信给汤显祖，说此二梦是“以梦破梦”。汤却不同意，他回信说：“儿女之梦难除，尼父所以拜嘉鱼，大人所以占维熊也。”

在汤显祖那里，梦始终是一个与“真实世界”相对应的时空。《南柯记》里说，“梦了为觉，情了为佛”。在《邯郸记》中，汤又写：“梦死可醒，真死何及。岸谷沧桑，亦即常醒之物耶。第概云如梦，则醒复何存。”一切有如庄周梦蝶，是梦是醒，难以言说。

世

“我为蝼蚁，蝼蚁为我”

汤显祖身历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在其生活之时，明已“世入乱萌”，江河日下。人言：“国势如溃瓜，手一动而流液满地矣。”意指朱明王朝已如破瓜一般，内忧外患，随时可覆。在其少时，即有文名，首辅张居正闻其名，欲招之提携张家诸子，婉拒，导致春试落第。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 34 岁，方赐进士。此前一年，张居正去世。

自 34 岁中进士，汤显祖前 15 年宦海沉浮，后 18 年看破官场。汤历任南京太守寺博士、礼部主事。其转折点，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的弃官。

作为一个传统的读书人，汤显祖曾经有着积极的政治抱负，幻想圣君贤相，一展所长，却因刚正不阿，情节清直，仕途偃蹇。万历十九年（1591），他上疏《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并将矛头直指当朝天子。此举震惊朝野。

这是汤显祖政治生涯中闪亮的一笔，也令他贬官降职，为广东徐闻典史。此后，改派浙江遂昌，做了一个小小的知县。遂昌为官时期，汤显祖仍想借一县之地，以为清明政治之实验，也以失败告终。此时，50 年人生经历，15 年宦海沉浮，令其看透官场险恶、终于厌弃朝堂，去官还家。

然而，汤显祖不同于庄周与嵇康，他始终有“情”要抒发，要入世，要参史。他研读了宋史，曾经想过撰写明代历史人物评传，却被“奇僧”（或许是达观和尚）喝醒，断了念想。

在《答吕玉绳》中，他写道：“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阶）、高（拱）、张（居正），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不如因任人间，自有作者。”和尚的话令汤显祖如梦初醒，终于没有“陈死人”，开始了戏曲创作。汤言，戏曲能“生天、生地、生鬼、生神，极人物之万途，攒古今之千变”。这套理念，完全展现在了“临川四梦”之中。

“临川四梦”皆取材于唐宋故事。然而，汤显祖

（苏岩 摄）

昆曲《南柯梦》剧照

将之时代化了。“四梦”有真有幻，亦古亦今。它们都有着浪漫、神奇的外表，却又都是现实、真切的。汤显祖表面在写梦境、谈风月，其下却在抒发满腔郁愤，言其未竟之理想与追求。

在《答李乃始》中，汤显祖信云：“词家四种（临川四梦），里巷儿童之技。人知其乐，不知其悲。”

在汤显祖的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四梦”是发愤之作，剧中寄托了作者的悲愤。王骥德在《曲律》中说汤显祖，“语动刺骨”。臧晋叔言：“临川传奇，好为伤世之语，亦如今士子作举业，往往入时事。”潘之恒看《牡丹亭》演出，“既感杜、柳之情，复服汤公为良史”。换言之，汤在传奇中，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胆识。

有意思的是，“临川四梦”的每一部剧中，都有对于战争的描写。《邯郸记》写唐朝与吐蕃的喝陇争斗；《南柯记》写大槐安国与檀萝国的战争；《紫钗记》写在大河西、小河西与吐蕃进行的战争；即使是人们印象里风月无边的《牡丹亭》，也免不了兵戎相见，插进一段南宋与大金的战争来。并且，这场战争的出现，并非为了推动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线。从中也可以看出，汤要抒发之“情”，远非男欢女爱所能言尽。

在《南柯记》中，南柯秀才高唱：“行乡约，制雅歌，家尊五轮人四科。俺因他切磋，他将俺琢磨。”如是这些，汤显祖都曾在为官时实行过。他在徐闻蛮乡主持“贵生书院”，在遂昌兴办“相圃书院”起到了一些成效，却最终也不是解决途径。

汤显祖治理遂昌五年，剔除弊政，消灭虎患，教育青年，口碑载道。在其到任之前，遂昌也“昼有公差，梦有盗警”。汤之为官刚柔并济。时而雷厉风行，

（苏岩 摄）

昆曲《邯郸梦》剧照

“勒杀强盗十数人”；时而极重人情，可以做出除夕夜释囚回家、元宵节纵囚观灯的举动来。在他离开遂昌之时，民吏挽留，建祠纪念。查阅《遂昌县志》，在“名宦祠”祭祀的22名宦中，汤显祖是名望最高的一个。《牡丹亭》与《南柯记》描写的许多故事，正是汤显祖本人的经历。

《牡丹亭》里杜丽娘之父杜宝，任南安府清乐乡太守。其治理之下的清乐乡，宛若陶渊明笔下的武陵人仙境：“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月明无犬吠黄花，雨过有人耕绿野，村村雨露植桑麻。农夫、牧童、采桑妇、采茶女，各个欢歌乐舞，嬉笑开怀。

此等清明喜乐的景象，也出现在《南柯记》里。在《风谣》一出中，描写淳于棼治理的南柯郡：“何止苟美苟完，且是兴仁兴让。”南柯百姓高唱《孝白歌》，是汤显祖未能实践的政治蓝图：“征徭薄，米谷多，官民易亲风景和，老的醉颜酡，后生鼓腹歌。”

当我们联系其此时的社会现实，会在舞台上的一片莺歌燕语中，嗅出苦涩的意味来。万历时期，赋税最重。万历二十四年（1596），政府开始征收税矿，宦官充任的矿监税使遍布天下。“三辅嗷嗷，民不聊生。”遂昌地方多金、银之矿，无法应付即将到来的矿监税使，也是汤显祖弃官的重要原因之一。

汤显祖知道，自己的理想已经无法实现，所以辞官回家，退隐归田。然而满目疮痍，总是意难平，于是以文为器，在戏曲传奇里实验的政治理想和改良实践。这是对现实的反抗，也是对后来人的激勉。在《示

（王崇玮 摄）

2011 年 4 月，中央芭蕾舞团在北京天桥剧场预演《牡丹亭》

赵滕侯》中，汤显祖写道:“俯迹自沾衣，驱车从此去。勉矣后来人，当知心所悟。”

这是汤显祖写给其官场生涯的告别之词。

情

“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汤之同代人王思任，对“临川四梦”做评论说：“《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王思任在这篇叙中还说，“四梦”之中，“得意处惟在《牡丹》”。他对其中着意表情之旨又做点评，“若士以为情不可论理，死不足以尽情”。由此可见，王思任是深知汤显祖的。

汤之哲学，一言蔽之，唯情而已。汤显祖并非哲学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体现在戏剧作品和书信、杂著之中。

较之男女之情，汤显祖的“情”，要深广得多，也丰富得多。有意思的是，西方学者在谈论汤之“情”的时候，用到的词是更为现代的“爱情”。夏志清说“四梦”，认为前“两梦”中，汤显祖对于时间与永恒的概念，相对淡薄，因此，主人公可以融入时间，专注爱情，在情爱的狂喜之中忘却时间。西方人所说的“爱情”，是男女之情，与我们传统里所说的“情”，不是全然相同的概念。

王国维说宋元戏曲，“唯自然而已”。亦可借来看待汤显祖。《牡丹亭》里《游园》一出，丫鬟春香称赞小姐的衣裳头面，说“今日穿插得好”。杜丽娘却偏不领情，答唱道：“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话用来形容汤显祖的“情”，却是恰到好处。

人的天性，汤显祖称之为“赤子之心”或“直心”。他认为，人们如果能“直心”而为，就可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直心是道场。道人成道，全一片心尔。”

不逆于心，不矫于情，不粉饰，不虚掩，顺乎人性的天然，就是真性真情。令人饥得食，渴得饮，病得医，春思昏昏得婚媾，就是顺情而为。其本质，不过一个“真”字，是“赤子之心”。济慈说：“真即是美，美即是真。”在汤这里，“真即是情，情即是真”。抛了“真”而谈“情”，皆是形骸之论。梦中之情，未必非真；梦外之人，

未必不是身处梦中。人蚁何殊？南柯无二。

“情”与“理”的关系，是宋以来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在理学家那里，“情”是作为“理”的对立面出现的，“理”是在“纯善”、是“天理”；情是“恶，”是“人欲”。“理”应该制“情”，“存天理、灭人欲”。换言之，“理”中所没有的，就是不应该存在的，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汤显祖则与之不同。他反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那些说“理中必无”便“必无”的人，可知“情之必有”是真实存在的呢？

相较于“从一而终”的“情之正”，汤显祖更热衷放笔于自然流露的“情之至”——这一点，在《南柯记》里面体现得也很明显。淳于棼入梦，皆因“痴情妄起”，这中间有情，也有欲。觉醒之后，淳于棼回顾梦中一生，便栖心道门，弃绝酒色，因“有情”，入“无情”。

这无情中有着深切的悲情。在《寻窟》一出中，淳于棼发现梦中蚁国，实为蚁穴，惆怅若失。然而，他希望以虔诚的佛心，助亡妻和蝼蚁国百姓升天，甘愿受那焚指为香之苦。“尽吾生有尽供无尽，但普度得无情似有情。”《南柯记》最后，淳于棼立地成佛，合手不语。

清学者沈际飞，为《南柯记》所做题词，颇为有理：“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惟情至，可以造立世界；惟情尽，可以不坏虚空。而要非情至之人，未堪语乎情尽也。世人觉中假，故不情；淳于梦中真，故钟情。即槐国蝼蚁，各有深情，同生仞利，岂偶然哉？”

《牡丹亭》中，汤显祖似乎在放大“情，理之必无也”。杜丽娘春思梦遇，寻梦而亡，死后魂魄未散，以女鬼之身自荐枕席；柳梦梅因画生情，与杜丽娘的魂魄无媒自合、婚走野店……凡此种种，生而死、死而生的真情，都是“理之必无”的“人欲”。此处，汤显祖有意地在“以情抗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杜丽娘：敢想、敢爱、敢生、敢死，敢于过真正的人的生活。

戏因梦成，梦因情成。汤不认可“理”或“性”（天命之性）是为纯善。“性无善恶，情有一之。”善与恶，皆是“情”中所固有的，是实际存在的客观真实。因此，善恶之情都应该自然地表现出来。人在善恶之中，能分辨取舍，为善去恶。“情”既有善有恶，那戏中也该有“极善极恶”。汤显祖认为，通过戏剧对各种善恶形象的表现，“无情者可使之有情，无声者使之有声”。

戏剧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这是非常“尽人欲”的说法。

写作上，汤显祖强调直抒心情，反对盲目的模拟古人和墨守成规。他关注文章的“灵性”，强调自然，反对模拟。在《合奇序》中，他说：“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奇奇怪怪，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

“自然灵气”听来玄虚。汤在《序丘毛伯考》里作解：“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一言蔽之，便是：“性乎天机，情乎物际。”

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中，谈及“四梦”中的“客观之主人”和“主观之主人”。就表面而言，“四梦”的主人，是为杜女（杜丽娘）、霍郡主（霍小玉）、卢生与淳于棼。深知文义的人，会从四人身上延伸开去，看到鬼、侠、仙、佛。然则，此四人仅为曲中之主，而非作者意中之主。汤显祖意嘱的“四梦”之主人是谁？——判官、黄衫客、吕翁和契玄。

何以言之？就戏而言，杜女（杜丽娘）、霍郡主（霍小玉）、卢生与淳于棼也好；鬼、侠、仙、佛也罢，皆为场中之傀儡，受人操纵行事。而后四人：判官、黄衫客、吕翁和契玄，才是提掇线索之人。就梦而言，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鬼、侠、仙、佛”为“曲中之意”，丽娘、小玉等，仅为客观之主人；而主观之主人，还属判官等人。他们所做判词，是作者对于人物的判定，类似命运之力。此处，显示了汤显祖超出别家的才情。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汤显祖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这给他带来了痛苦。在给达观的信中，汤感到自己为“情”牵绕，无法摆脱，却又无能无力，“世界身器，且奈之何？”在《续栖贤莲社求友文》中，汤写道：“应须绝想人间，澄情觉路，非西方莲社莫吾于归矣。”言辞间仿佛有遁入空门之意。晚年，汤意欲隐居庐山，与友人结社修禅，却因其母病，未能成行。

万历四十三年（1616），汤显祖听闻17岁的娄江女子俞二娘，因痴爱《牡丹亭》，愤惋而终。错愕之余，感到“情之与人甚哉”，作诗哭之：“何自为情死？悲伤必有神。一时文字业，天下有心人。”这是他死去前一年。

次年夏，汤显祖辞世，年终67岁。时万历四十四年（1617），距今400年整。

“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汤显祖的文人兴味与文学传统

三联生活周刊：在创作上，汤显祖体现了哪些传统，又有何特别之处？

李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显祖的剧本很好地发挥了传统戏曲的特点，同时体现了古代戏曲与文人文学的密切联系。在明代，戏曲的表演艺术发展，传奇剧本写作发达，文人的写作热情很高涨。在对戏曲表演特点的认识很充分的情况下，汤显祖写了“临川四梦”。他的剧本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有文人的兴味，体现了文人的文学传统。中国戏曲与文人传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文人的作用很大。南戏一开始在民间流传，其真正成为经典，因为有文人参与。

汤显祖的剧本体现了文人传统，又发挥了传统戏曲的特点。比如，他有一种文人的戏谑态度在里面。中国戏曲是从宋杂剧、金院本，吸收说唱成长起来的。宋杂剧和金院本都很注意滑稽传统。汤显祖在吸收了这种滑稽传统之后，贯穿了文人的色彩。这是汤剧本的一个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特点怎样体现在其作品里，能否举具体谈谈？

李简：我们读他的文本，可以看到人物关系的架构。尤其是《牡丹亭》。杜宝是杜甫的后人。夫人甄氏是魏国甄皇后的后人。柳梦梅是柳宗元的后人。柳梦梅的仆人，是郭橐驼的后人。柳的朋友韩子才，是韩愈的后人。在文本人物的架构上，他体现了文人的戏谑态度。

再看其他。柳梦梅上场的时候，他的自我表白就很有戏谑的特点。再比如《邯郸记》。卢生在战番王的时候，使用了离间计。他把这个计策命名为“御沟红叶计”，用的是“御沟流红叶”的爱情典故。这都是对中国戏曲滑稽传统的发挥。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谈到汤显祖，总会说到他文字的特点，具体而言是怎样的呢？

李简：汤显祖语言上的特点，体现了文人对曲体的一种追求。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里，对曲体的语言就有“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的要求。在汤显祖的时代，文人一直在关注曲体的语言表达，很多人认为这个最佳。曲体一直在诗歌的传统里。王骥德赞扬汤显祖“于本色一家，亦惟是奉常一人——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这是汤显祖曲辞的很大特点，也是为后来的曲家所追求的。

比如《牡丹亭》的名句：“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写深闺生活，他先用“闲”做形容，写生活寂寞，闲散无聊。然后写“游丝”。“晴丝”“游丝”，在诗歌传统里经常用来描写春天。杜甫写春天，说“燕外晴丝卷”；李商隐说“絮乱丝繁天亦迷”。汤把诗歌传统里对春天的吟咏，用到这里写春天。飘动的游丝传达着春的消息，感动着杜丽娘，让她的心绪也像春天的游丝一样颤动。以春景写春情，非常清雅。接下来，他又说：“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就是非常直白的写杜丽娘化妆照镜的动作了。从中可以看出他曲辞的雅俗浓淡相间，亦雅亦俗。

三联生活周刊：汤显祖是明朝人。在明以前，是戏曲繁盛的元代。元明的戏曲家在创作和人生选择上，有着怎样的差异？

李简：元代是戏曲的第一个高峰，第一个黄金时代。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戏曲在元代开始繁盛。在元刊和明刊元杂剧的版本比较里，我们可以看到，元代时杂剧更偏向于曲。元代杂剧是独唱体。那时的歌唱部分很突出。但随着戏曲的发展，表演、情节、人物的表现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明代是戏曲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在元代，文人有很多不同选择。到了明代，文人又回到传统，他们不像元代文人那样，会去选择多种

生活。他们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是科举，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出口。他们生活在这样的节奏和安排里。很多人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了官场。明代戏曲作家的身份变了。尤其到后来，家乐繁荣，他们有自己的家班。这时剧作者就成为戏曲的核心。文人的情绪和感觉，在剧本里有很好的表现。文人对于戏曲的特点，有非常清楚的认识。声腔和表演艺术，在此时也有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经常在汤显祖的剧中看到现代性。比如说《牡丹亭》里的杜丽娘，“慕色还魂”，很像一个现代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她是主动选择的那个人。

李简：一个经典文本，一定不会局限于一个时代。它一定有可以千古流传的点。很难说杜丽娘的主动选择是一个特例。因为中国传统文学里始终有女子主动选择这一块，比如卓文君、崔莺莺，《倩女离魂》里的离魂女……但《牡丹亭》又有它特殊的地方。它改自明人的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但它又有变化。

在改编中，汤显祖突出的是什么？“游园以后，感春慕色而亡”，小说里原来就有。汤突出的，是杜丽娘追求梦中情人的坚定，为梦中情人憔悴，为梦中情人死。“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汤显祖反复提到杜丽娘的才华，比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里多很多。比如杜丽娘死后，母亲追忆时提到她读过的书、绣过的花。柳梦梅捡到杜丽娘的画像，赞扬的是她的画、她的诗、她的字。父亲对于女儿的要求，是知书达理。同时也增加了环境对杜丽娘的拘束。在这样的铺垫、强调中，去突出这个女子对于梦中情人的追求。这就与原来故事的气质不同了。不只是慕色还魂，与话本小说相比，汤歌颂了“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感人至情。又不止于此，还包括了对追求自由和人生理想的赞扬。

三联生活周刊：“梦”是汤显祖剧作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梦生情，因情生戏”。其中可以看到一些诗学上的传承，庄周梦蝶、李商隐写锦瑟，都是虚虚实实，似幻似真。

李简：“临川四梦”四个剧本都用到了梦。《紫钗记》里的梦比较简单，其他三个，都很好地运用“梦”来结撰剧本，用真与幻写人生。《邯郸记》《南柯记》都是由唐人的小说改编而成。小说里有这个情节，汤显祖对它们进行加工，表达自己的感慨。比如《南柯记》，写淳于棼梦入蝼蚁之国。用蝼蚁之情，笑天下无情之人。用淳于棼的多情、钟情，感慨天下的溺情之人。用梦中的蝼蚁之事，去写“浮世纷纷蚁子群”，用淳于棼最后的大悟，表达一切皆空的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王国维说元人戏，“唯自然而已”。汤显祖在《牡丹亭》里写，“而我一生最爱是天然”。我们看他的戏，也能感到“真”与“自然”。这种天然之气，是如何从作品里传达出来的呢？

李简：汤显祖的“自然”，既有语言的因素，也有文本内容的原因。王国维说的“自然”，更多在曲辞上。汤显祖的自然，一个体现就在他的曲辞上。许多文人写曲不会那么俗，也有人为了让大众明白，写得很俗。最好的是亦雅亦俗，有天然之气。汤显祖的亦雅亦俗做得很好，这是他“自然”的一个体现。

另外的“自然”，在汤显祖对于人情的处理。《牡丹亭》也好，《邯郸记》也好，他在表现这些“情”的时候，都非常注重体现生活的面貌。比如说《牡丹亭》之中的母子之情、父女之情。再比如，杜丽娘作为一个少女，对于感情的体会，都很贴近生活的表达。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会有很自然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看汤显祖的许多戏，能感受到巨大的“悲”在其中。尤其后期的《南柯记》和《邯郸记》。我为蝼蚁，蝼蚁为我。南柯一梦转成空。这种“悲”与希腊悲剧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悲壮，甚至说不清悲喜。你如何看待汤显祖的“悲”与“喜”？

李简：汤显祖有悲凉。《邯郸记》不论是读文本，还是看演出，都能感受出对于人生的悲哀和幻灭。多少年来，无数文本在做着如此的感慨。汤显祖在经历了生命里的磨难之后，把他的感悟贯注于戏曲中，写出这样一个被古人称为“命意高”的剧作，表达这种人生感慨。这里面有悲凉、破灭，但与此同时，也一定会有插科打诨。

整体是悲凉的，但又有戏谑在。我们的古代戏曲里，总是要谐谑的，它就是这么长起来的。很难用西方的悲剧或喜剧来说它。我们的哲学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传统戏曲，演着演着会抽离出来，比如你会在台上看到检场的人。它就是告诉你，这是一出戏。这是对于人生的一种看法。戏演的是人生，但人生也是一个大戏台。

（李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宋元明清文学，主要从事古代曲体的研究。有《元明戏曲》《古代曲学中的“戏剧”概念》《宋代城市的演艺场所与文人参与——从瓦市勾栏、酒楼茶肆谈起》《冯惟敏＜山堂缉稿＞说略》《从元杂剧的不同版本看杂剧演出的变化》等研究著述）

《牡丹亭》：舞台演出史上的“变形计”

记者 艾江涛

1598年，痛感吏治黑暗的浙江遂昌知县汤显祖辞官回乡，写作传奇而自娱余生。《牡丹亭》便诞生于这一年，自此风行400余年，历久不衰。

在《牡丹亭》开始形成影响的早期，追随其时“词坛盟主”沈璟之后，文人多批评其不合音律，难以演唱，晚明文人范文若在《梦花酣序》中的一段话堪称代表：“临川多宜黄土音，板腔绝不分辨，衬字衬句，凑插乖舛，未免拗折人嗓子。”此外，55出的剧本，不乏烦文冗曲、镂金错彩之处，将其全部搬上舞台也绝非易事。只是，在创作之中便注重搬演的汤显祖，对这些批评显然不以为意，不满于沈璟等人的改本，他甚至在《与宜伶罗章二》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牡丹亭》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

争论有之，但一个清晰的事实在于，《牡丹亭》这部明代传奇的案头代表作，却在后世被不断搬上舞台，乃至成为昆曲难以磨灭的经典。理解《牡丹亭》，除了阅读剧本背后那份“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深之至，或许还应该梳理它的舞台演出历史——在汤显祖的指导之下，《牡丹亭》的早期演出形态是什么？在《牡丹亭》后期的演出流变之中，又发生了哪些不以作者意志为转移的变形，以致在今日仍不断被改编搬演，进而成为颇可探讨的文化现象？

“汤沈之争”

400多年前，《牡丹亭》甫一出现所造成的轰动效应，在今日看来，简直就是一个事件。在昆山，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俞二娘，读完此剧后为之迷恋，在剧本上写满批注，后来竟伤心而死。而据鲍倚云《退余丛话》记载，杭州一个叫商晓玲的艺妓，一天在演出《寻梦》时，唱到“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见”一句时，竟随声倒地不起。

与汤显祖同时代的“词坛盟主”沈璟自然也注意到这部传奇，还将其中不合律的词句做了修改，随后把改本托两人共同的朋友吕玉绳交给汤显祖。没想到，汤显祖对改动大为不满，在给朋友凌初成的信中写道：“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他还告诉身边的艺人，演出《牡丹亭》，必须依据自己的原本。“汤沈之争”由此而起。

在复旦大学教授江巨荣看来，明代中晚期，受“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汤显祖、徐渭在内的一批新剧作家开始重写“人情”，追求新的情感释放，非常吸引观众。无怪乎那些敏感痴情的青年女子，感同身受，为之痴迷。《牡丹亭》诞生之时，新声竞起，当时的南戏舞台上，流行所谓“弋阳、海盐、余姚、昆山”四大声腔。弋阳腔起于江西，因而今人普遍认为《牡丹亭》最早由弋阳腔演唱，但据江巨荣的研究，汤显祖所居的江西抚州宜黄，原唱弋阳腔，只是在嘉靖之后，弋阳之调外传反在发源地面临凋敝，后弋阳旧调与宜黄地方乐调、海盐腔结合之下，形成轻柔婉转的宜黄腔。汤显祖多与宜伶为友，并为其教习歌舞，因而《牡丹亭》最初由宜黄腔所演。

然而，唱腔与曲律分属演唱与创作两个范畴，汤显祖创作《牡丹亭》时，并无考虑唱腔问题，只是按照南曲曲律填词写剧，即使沈璟认为其用昆山腔演唱不顺口，似乎也并无理由指责《牡丹亭》不合曲律。

论争的关键，在温州大学教授俞为民看来，并非如前人所谓“辞采与曲律之争”，恰恰集中于曲律这一问题。“大家都讲《牡丹亭》不合律，其实还是合律的，不过它合的是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后的曲律，不符合南曲原来按照固定腔调填词的曲律。”

传统宋元南戏的曲律，“以腔传字”，按固定腔调演唱不同曲辞，这一点很像现在流行歌曲在重新填词后的不同翻唱版本。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之前，昆山腔与其他唱腔一样，均以民间歌谣形式演唱，由于各地方言乡音有异，演唱时常有字与腔不合的现象。而改革之后，魏良辅提出用“四声”定调（上声字低唱，去声字高唱，平声字要平唱，入声字要出口就断），语言（字）与音乐（腔）完美结合，形成所谓“以字定腔、腔随字转”。

据说，沈璟每听到有人用新律清唱时调，恨不得马上掩耳躲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乃至后世的文人多与沈璟一道，批评汤显祖专尚情志，于曲律则多有乖谬。即使是汤显祖的好友臧懋循也不例外，他在《元曲选序二》中写道：“豫章汤义仍……识乏通方之见，

学罕协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谬，其失也疏。”

既然如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苏州大学教授周秦介绍，明清之间的曲家钮少雅，用集曲的办法，把《牡丹亭》中不符合格律的50多支曲，一支支用别的曲牌去套，“前面的三句是什么曲牌，中间两句是什么曲牌，后面的三句是什么曲牌，变成一个杂拼出来的曲牌，这样一来，《牡丹亭》里每支曲子，都可以不改动字词而唱”。乾隆后期，曲家叶堂又将《牡丹亭》的70多首曲子，一一格正打谱。曲谱在昆曲的流传过程中非常重要，不管是官员家班，还是民间戏班，都有专门负责排曲的人。今天演唱的《牡丹亭》，受叶堂影响很大，多参照他的《纳书楹曲谱》而来。

“《牡丹亭·惊梦》中的【皂罗袍】虽与古调不同，但它既合平仄曲律，又很好听，应该承认它，沈璟太保守了，不允许改变，一定要复古到宋元时期的原腔古调。这样无疑会影响剧作家才华的表现。”俞为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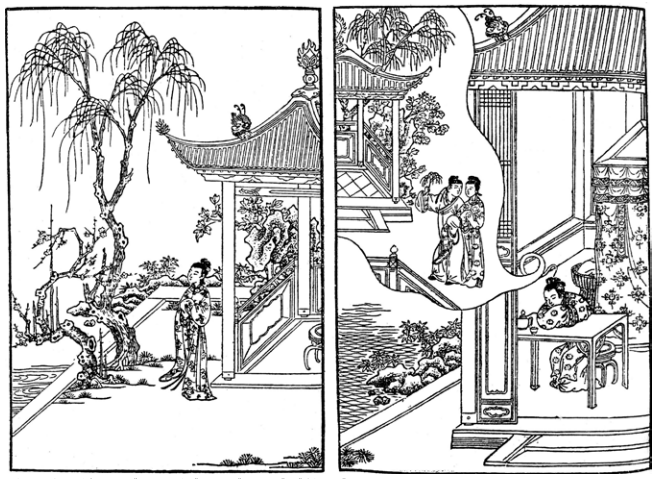
从全本到折子戏

据江巨荣的研究，明代中后期的戏曲演出，主要有家庭戏班和民间职业戏班两套体系。时风所及，那些江南的世家望族多有自己的家庭戏班。作为文人传奇，《牡丹亭》早期主要由这些家班演出。出于对创作者的尊重，一些家班还邀请汤显祖前来观看演出。

万历二年（1574）进士邹迪光在罢官之后，曾在无锡惠山，罗织了一支由数十名童子组成的家庭乐班，演习新剧。万历三十九年（1611），邹迪光曾写信给汤显祖，诚意殷殷地邀请他前来观看新排的《牡丹亭》。

在江巨荣看来，早期全本演出的可能更大，其中甚至不乏原本演出。这里所谓的“全本”，并非一字不漏地完整演出，而指以串联曲目，讲述一个前后相连的完整故事。合理的推论是，不同于故事原型均来自唐人小说的另外“三梦”（《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的本事源于话本小说，一般读书人对此并不熟悉，新戏刚出，大家需要通过全本演出，了解完整的故事情节。

江巨荣找到了一些重要的史料作为支撑。徽川人吴越石在客居南京时，曾组建了训练严格的吴家班。明代戏曲理论家潘之恒在《亘史·杂篇》中记载了当时演出的情景：“同社吴越石，家有歌儿，令演是记，能飘飘忽忽，另番一届于缥缈之余，以凄怆于声调之外。一字无遗，无微不极……乃今而后，知《牡丹亭》之有关生情，乃为惊心动魄者。”江巨荣认为，其中所载“一字无遗，无微不极”，足证当时所演为原本《牡丹亭》。



中国戏剧绘画：《牡丹亭》之《寻梦》《惊梦》

如果说从完成创作的1598年到汤显祖去世的1616年，《牡丹亭》主要以全本演出为主。那么，此后直至乾隆后期折子戏大盛这段时间，则主要以全本与改编削删版并行演出。然而，全本《牡丹亭》长达55出，文辞繁缛，演完全本势必需要连演几天，非一般财力人力可为。此外，由于曲律不太适合昆山腔演唱，不少曲家文人推出了自己的改编本。除了引起汤显祖大怒的沈璟改本，后世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是臧懋循与冯梦龙改本。臧懋循的改本，将原作压缩至36出，434首曲子削减为241首，同时将一些曲辞改得更为通俗易懂，既重格律，又重演出。冯梦龙的改本《风流梦》，共有37出，情节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如将《闺垫》《肃苑》合并为《传经习字》，加强了春香闹学的戏份。除了情节与词句的改动，冯梦龙还在剧本中加入大量舞台动作与表演提示。尽管如其他改本一样，受到很多文人的批评责骂，但《风流梦》颇受观众认可，其中诸如《春香闹学》《拾画叫画》等场次被奉为经典折子戏，长期流行于舞台。

据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记载，康熙末叶以迄乾嘉之际，在“花雅之争”败北之后，昆剧进入折子戏时代。风气所及，虽然全本演出也没有完全中断，但这一时期的《牡丹亭》主要以折子戏演出于私人厅堂、宫廷舞台与近代戏园。江巨荣从史料中发现，在潘之恒的《亘史》《鸾啸小品》中，已有一些相对成熟的表演风格记载，比如杜丽娘演得比较“幻”，有种如痴如幻的感觉，而柳梦梅则演得非常张扬，恃才学而高傲。然而，有关舞台动作等演出记录则付之阙如，人们只能透过经过历代艺人传习下今人的表演，去悬想一番了。

400 年后的四场梦

记者 张月寒

“临川四梦”主演之一、国家一级演员沈昳丽

“临川四梦”中，汤显祖最先写的是《紫钗记》。他在京察失败之后，断绝了仕途升迁之路，从此寄情于创作，将之前写过的《紫箫记》重写成《紫钗记》。写完后，汤显祖感慨颇深，写了首与年龄同名的诗《三十七》，抱怨了一下自己的处境——“几时六百石，吾生三十七。”

“临川四梦”之所以称之为梦，是因为这四部作品中都包含有一个“梦”。《牡丹亭》是著名的杜丽娘绮丽之梦，《南柯记》《邯郸记》均为大家所熟知的“黄粱一梦”典故，富贵荣华后却发现只是一场梦。而唯有《紫钗记》是最小的一个“梦”，霍小玉梦到的只是一双象征团圆和谐的鞋子。

“四梦”也是昆曲人的梦。今年上海昆剧团首次将“四梦”齐集，搬上舞台，每次连演 4 个晚上，目前已经在广州、北京上演过。团长谷好好告诉本刊，这次他们排“临川四梦”，其实之前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积累，所以并不是为了赶今年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纪念的一个活儿。谷好好说，目前在昆曲舞台上，完整的“临川四梦”只有上海昆剧团（以下简称“上昆”）这一台。

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后，本刊专访了“四梦”主演之一、“上昆”闺门旦演员沈昳丽，看站在台上的她，是怎样体味汤显祖 400 年前的这四场梦。

三联生活周刊：你这次演了《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紫钗记》中的霍小玉，之前演过《南柯记》中的金枝公主，如何揣摩这三个角色的差异？

沈昳丽：《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是每个闺门旦的必修课。昆曲舞台上留下的“临川四梦”都是以折子戏来呈现的，《牡丹亭》的折子相对来说比其他三部要完整得多。它能做成相对完整的一出戏来呈现。而且《牡丹亭》的演出机会最多，琢磨的机会也比较多。

《紫钗记》留下的只有《折柳阳关》。这个算是《紫钗记》在昆曲舞台上呈现出来相对完整的段落。《牡丹亭》有 55 折，《紫钗记》有 53 折，但完整的 53 折没看过有人全部演出来。这一次“上昆”集齐“临川四梦”的演出，是我们 8 年前已经排过一版《紫钗记》，当初也是安排了我来主演霍小玉。所以我 8 年前已经摸索了一次整个《紫钗记》的来龙去脉，整个故事背景都是很熟的。

这部《紫钗记》，其实舞台呈现上只是 8 场戏，因为一个晚上两个多小时也不可能演全。这次我们对霍小玉的形象重新拿捏了一下。“水纹珍簟思悠悠，千里佳期一夕休。从此无心爱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楼。”这是《紫钗记》中霍小玉弹唱李益这四句诗的场景。

在之前的昆曲排演中，这一段多是用琵琶演奏，但我当时却觉得琵琶的表演或许带有风尘感，于是建议用古琴弹唱。“怨撒金钱”是霍小玉的独角戏，我们改之前的整套北曲为整套南曲，是因为看到了小雨是“悲怨”而非“悲愤”，人物定位准了，戏就好看了。

“临川四梦”中其他两个梦是以男生为主的，比如《邯郸梦》和《南柯记》，它的主角其实是男生，里面的女孩子实际上只是一个辅助。我以前学过的传统折子戏里面，有一出叫《瑶台》，是《南柯记》里面所谓女主角的戏，一个蚂蚁国的金枝公主。《邯郸梦》基本上没有女角的戏。

三联生活周刊：杜丽娘和霍小玉是两个比较丰满的女性形象，这两者具体表演起来会有何不同？

沈昳丽：技术性层面的手眼身法步、唱腔，都会有共性，只是曲牌不同。曲牌的不同是定义在人物此时此地的境遇，她心境不一样，那么选的曲牌和唱腔的处理就会不一样。我们说戏曲有程式化，这个程式是相对稳定、规范的，比如兰花指就是兰花指。这个都是有一个标杆的。

折子戏不是以叙述性为第一属性。折子戏更多是看演员的表演技艺。而排演全本大戏，则更侧重于人物的刻画。所谓塑造人物、塑造角色，其实很大一部分是相对于全本大戏而言的，因为那时它的人物就变成了第一属性，而任何“唱念做打”都是用来帮助完成这个人物的。

从全本角度来看，杜丽娘和霍小玉的人物属性完全不一样，一个是浪漫、梦幻、不现实的爱情，理想主义；一个是活在现实中的一个女子。霍小玉没有养尊处优、不像杜丽娘这样处在深闺，所以霍小玉对于生存、社会、自身有着自己的现实定位，她的择偶也是有一个很现实的标准。性格上的不同会带到的部分不光是语言台词，从规范的程式中也会化出来。同样是手眼身法步，同样是兰花指或一个眼神，它的尺寸和收放度不一样，态度就会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昆曲演出，是不是仍然以汤显祖的作品居多？

沈昳丽：因为他有市场，因为《牡丹亭》。贴《牡丹亭》可能会比较好卖，会比较有上座率。我们经常会说《牡丹亭》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品牌效益，它甚至于是“戏保人”的，因为它的底子太好了。不管是我们“上昆”的老艺术家，还是青年演员，“上昆”三代人，不管哪一个去演《牡丹亭》，它的上座率都会比较有保证。别的戏出来可能就会有风险。

三联生活周刊：白先勇2004年推出青春版《牡丹亭》，引起了一轮昆曲的新热潮。之后“省昆”又推出青春版《桃花扇》。作为演员，你觉得昆曲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坚守一种原汁原味，还是欢迎更多的创新？

沈昳丽：为什么有人说，昆曲它在没落，或者它貌似又兴盛？就是它一起一落、一明一灭的这样一个规律。所谓的原汁原味、最传统或者最什么的，这个“最”字，我觉得都是一个伪定义，其实无法来印证自己是不是最原汁原味、最传统、最古老。我们能够认知多少，我们就显现多少，这个是最实际的东西。大家都觉得白先勇的“白牡丹”很好看、很漂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这个真的是给昆曲做了很大的功德。白先生说是仿旧如旧，但是仿旧如旧的前提是仿旧，它还是当下的审美，不可能去复制。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你来说，觉得昆曲最美的是什么？

沈昳丽：对我来说，昆曲是一种最朴素不过的东西。它是最朴素的一种生活。我一直有种被“塑造”的感觉。昆曲塑造了我。

三联生活周刊：你也会根据当下的审美，改变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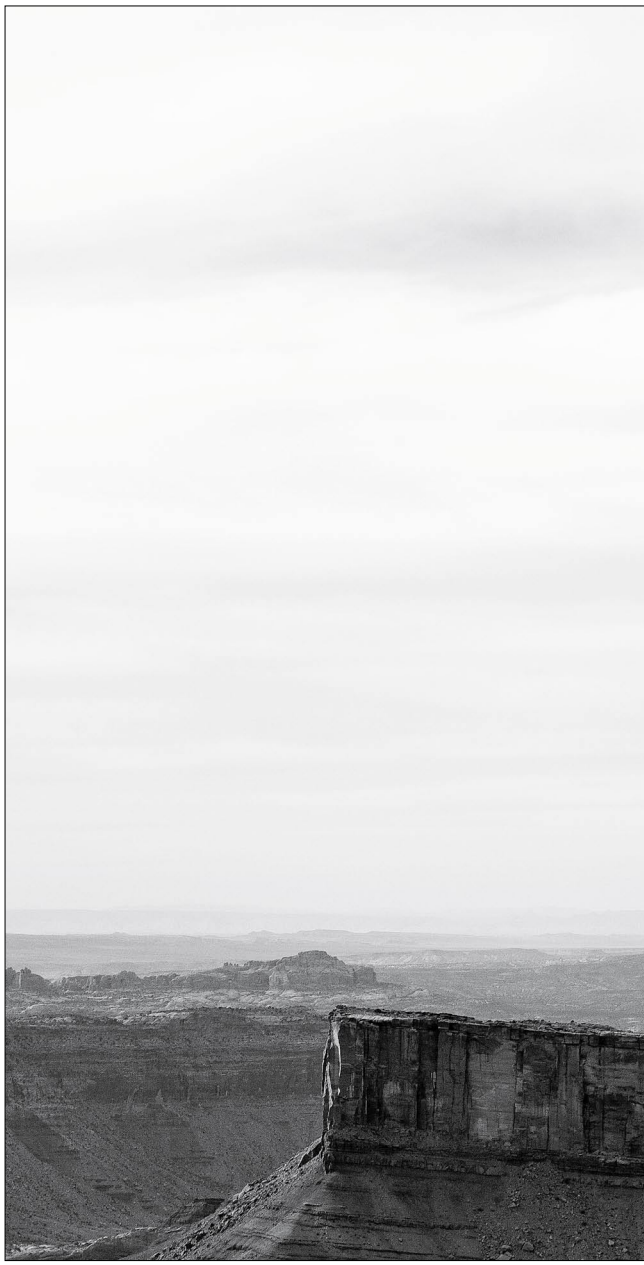
沈昳丽：我一直在调整和自我修正中。比如说《牡丹亭·寻梦》，因为它演出的机会比较多，跟很多老师都学。跟所有旦角的老艺术家，不只是向我们“上昆”的，包括“北昆”的、“浙昆”的，我都学了一圈，全部都学。戏曲是好玩的，同一段戏，每一个老师演出来有不同的特征，有些老师比较妩媚，有的比较端庄，有的唱得很细腻、含蓄……都不一样。有人在“最撩人春色是今年”的时候说“最撩人”三个字时很有兴致，但另一个有可能在“春色是今年”的时候她眼睛亮了，感悟的点不一样。

（实习记者王琪对本文也有贡献）

谁拍摄了体育？

文 潘雨希（发自纽约）

技术可以延展人的身躯，覆盖前所未有的区域，却不能取代人的思考和感情。没有温度与想象的画面，又如何进入人们的记忆？



记忆中的经典瞬间不只是由赛场上的运动员创造的。也许我们并没意识到，但那些在镜头后按动快门的摄影师，同样塑造了我们对体育的共同记忆。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近期的新展——“谁拍摄了体育：1843年至今的体育摄影史”（Who Shot Sports：A Photographic History，1843 to the Present），就难得地将目光聚焦到了那些镜头后的摄影师身上。

最早的体育摄影师可能是苏格兰人大卫·屋大维·希尔（David Octavius Hill）和罗伯特·亚当森（Robert Adamson）。作为最早使用碘化银纸照相法的人像摄影师，他们在1843年为室内网球（网球的前身）运动员莱恩（Mr.Laing or Laine）拍摄了一组人像，其中最早的一幅就出现在展览的入口处。当时由于曝光时间过长，相机无法捕捉运动中的图像，莱恩只能举起球拍，目视前方，做出准备迎击的假象。为了让他在一到两分钟的曝光时间内保持身体的正直，摄影师甚至还在他头部的后方架起了金属支架。当然，在冲洗照片之前，他们也并没有忘记在底片中抹去金属支架的痕迹。

对拍摄运动图像的渴望激发了19世纪摄影师们在快门、镜头和相机上的技术革新。1872年，摄影师埃德沃德·马布里其（Eadweard Muybridge）用设计的相机首次成功拍摄了马儿奔驰的景象。受到马布里其的启发，法国科学家艾蒂安－朱尔·马雷（Etienne-Jules Marey）在19世纪80年代发明了“记时摄影”（Chronophotography）技术，可以使照相机在一秒内连续拍摄12帧图像。不过这种技术仍有缺陷——连续拍摄的图像会显现在同一张照片上，就像展览中大量的历史照片所展示的那样。马雷和他的助理乔治·德梅尼（Georges Demeny）利用照片对人走路、奔跑、跳跃和骑行的姿势进行细致的科学分析，德梅尼还出任了世界上首个体育摄影研究中心的主任，用摄影研究压力、疲劳、肌肉运动和体育锻炼的效率。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摄影师已经可以通过数码相机、Gopro空拍机等新设备和远程控制、无线传输等新手段实现对赛事的实时和无死角拍摄。在2007年举行的一项马术比赛中，英国摄影师鲍勃·马丁（Bob Martin）就将三个能够远程控制的摄像头安装在赛马需要越过的围栏之上，并为它们设定了每秒10帧的拍摄速率。我们在展览中看到的，是他从若干照片中选出的最好一幅——在赛马越过的瞬间，镜头夸张地拉长了赛马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矫健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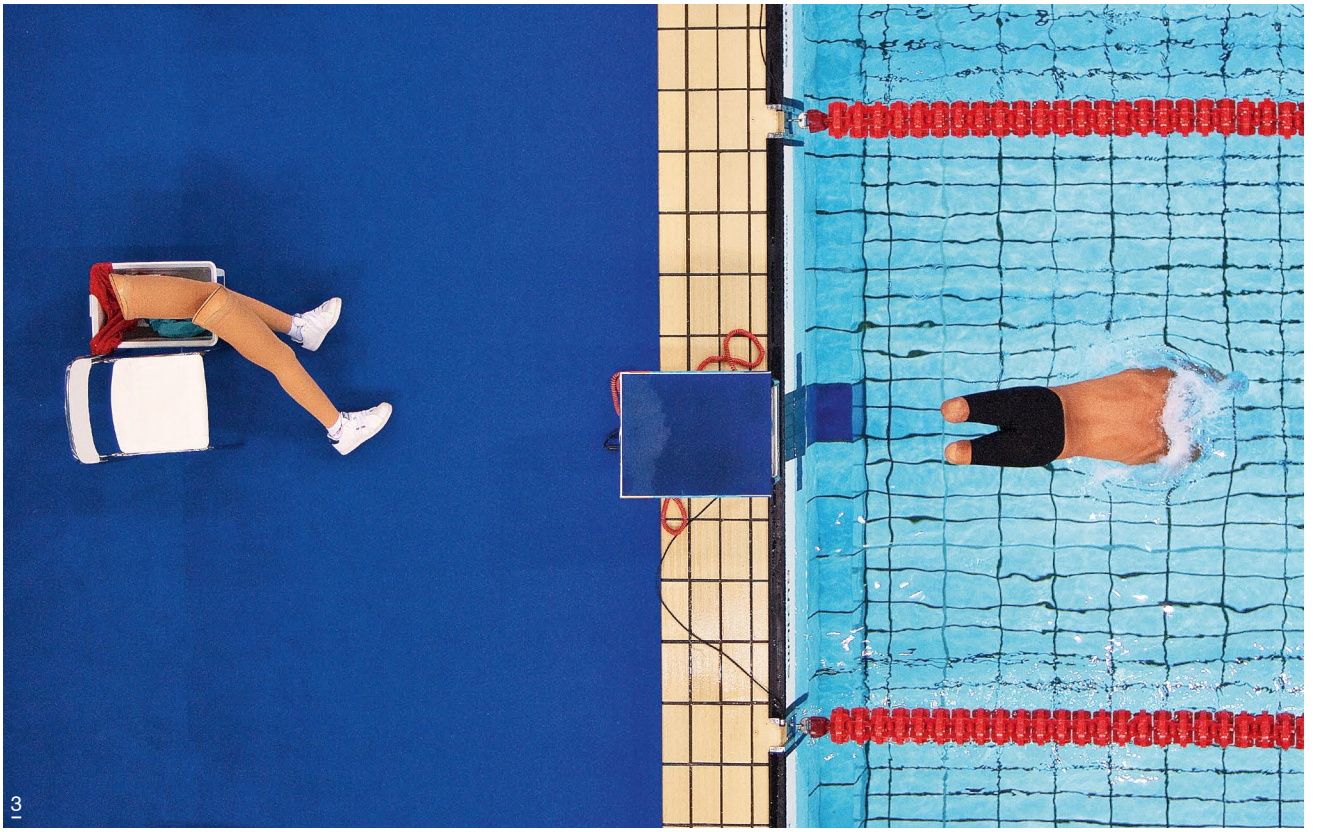
极限运动摄影师克里斯塔尔·莱特的作品《自由降落》。莱特从 122 米高的山峰上乘降落伞下落过程中拍摄

作为当今世界最好的摄影师之一，马丁在 16 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成为一位摄影师——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成为一位婚礼和工业摄影师的助理。在随后的两年间，他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如何使用大视野照相机、为静物打光，并研读摄影史。尽管后来在身为化学家的父亲的敦促下重返学校，但马丁的摄影之路并没有停止。他选择了艺术作为大学的专业，并在大学在读期间就开始为《全体育》（*Allsport*）杂志工作。从那时开始，在迄今为止 30 年的体育摄影生涯中，他从未错过一项重大赛事。在 2014 年的伦敦奥运会上，他甚至成为 1450 名媒体摄影师的“管家”，为他们总体安排摄影位置、器材和行动守则。

而在这次聚集了 177 位摄影师总共 230 件摄影作品的展览中，马丁也是展出作品数量最多（6 件）的摄影师。在他为 2004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拍摄的一幅作品中，小威廉姆斯为了全力一击而绷紧的肌肉和伸展的身体，在红土的衬托下，就有一种电视镜头捕捉不到的凝固的美。而在实际的网球摄影中，摄影师无法看到球的轨迹，只能靠感觉，马丁只有千分之一秒甚至更短的曝光时间来抓住一个画面。

1

2



3

而在雅典残奥会的泳池之上，马丁所拍摄的残奥运动员艾维·托雷斯（Avi Torres）起身入水的瞬间成为展览中一个令人难忘的画面。画面左侧留在岸边的义肢，提醒我们运动员的特别身份的同时，也凸显着他的体育精神。在拍摄之前，马丁给组委会写了无数封信件，希望获准在泳池上方的过道上安装相机。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在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尔·布列松看来，这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决定性的瞬间，摄影是“在几分之一秒内发现事物的重要性，同时以最精确的形式将事物表现出来”。而对于体育摄影师来说，他们不仅要将竞技和对抗的经典场面以最快的速度呈现给观众，还要在画面中传递运动所代表的力与美，呈现体育中闪耀的人性之光。

“体育摄影师是艺术家。”展览的策展人盖尔·巴克兰（Gail Buckland）说，“尽管从传统意义上体育摄影师被更多地看作技术人员而非艺术家，但他们在做的确乎是艺术。”

比如，他们想揭示那些常人难以想象的画面。在2010年NBA湖人对阵尼克斯的比赛前，摄影师安德鲁·伯恩斯坦（Andrew Bernstein）就在湖人的休息室里拍摄到当家球星科比场下的另一面。照片中，他在做赛前例行的放松，双腿浸在冰水中，一只手的手指也伸入到装满冰块的杯子里。但他似乎并没能完全放松下来，酷似罗丹雕塑“思想者”的姿势令他看起来像是在思考，又带着一丝忧虑。这位一年前对阵尼克斯曾砍下61分的大明星，此时并没有场上的意气风发，平静的表情下似乎有一丝对自己的不确定。

作为NBA的专职摄影师，伯恩斯坦能够拍摄一切场面，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痛苦的还是狂喜的。每当比赛时，他在场边设置的12台远程控制照相机会在天花板上8个2400瓦闪光灯的辅助下，为媒体提供源源不断的照片资源。除此之外，他自己也会坚持在每场比赛中拍摄600～800张照片，碰到全明星抑或是总决赛的时候这一数量会飙升到2000张。而对于他自己特别珍爱的瞬间，他会用黑白影像的方式记录下来，正如这张“冰上的科比”。

如果说伯恩斯坦的杰作多少出自偶然，摄影师唐纳德·米拉尔（Donald Miralle）则说，他最成功的摄影作品来自“提前构思”。在他从事体育摄影之前，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艺术，这一背景则影响了他的摄影实践。他说：“构想画面时，要像绘画一样构思，而不是去追逐什么或是抓住某个瞬间。”在他的镜头下，伦敦奥运会沙滩排球赛的现场就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夕阳染红了天空和穹顶，令画面显得格外庄严。而如果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到在正对面的建筑上，一个艺术家恰巧在作画。

优秀的体育摄影师从不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对于苏联摄影师列夫•波罗杜林（Lev Borodulin）来说，对艺术的追求甚至成为他被逐出赛场的原因。1923年生于莫斯科的波罗杜林，尽管在“二战”中两次为国负伤，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获得勋章，作品也屡屡在各类国际摄影奖项中获奖，但他对“形式主义”摄影原则的执着令苏联官方拒绝了他拍摄慕尼黑奥运会的请求，他也最终只能背井离乡。不过，他“重视美学胜过功能”的坚持为我们留下了如《射箭的女孩》这样完美吸收了俄国结构主义和包豪斯理论的体育摄影作品——用几何形围成的空间和独特的特写视角令我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画面的主人公所吸引。

极限运动摄影师克里斯塔尔·莱特（Krystal Wright）的作品《自由降落》，是她从122米高的山峰上乘降落伞下落时拍摄的。在她所拍摄的图片中，人类的渺小与山体的巨大总能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出于对自然的敬意。作为世界上最好的探险摄影家之一，莱特从小就热爱户外运动，尽管曾进入昆士兰艺术学院学习图片报道，但她说，在课堂里学习理论不是她的风格。成名后，她开始了在全世界游走，没有固定地址，一种自由职业的生活。对她来说，与同伴在野外连续数周甚至数月的拍摄要远好于“进入体育馆，向保安展示你的身份，然后站到被分配的位置”，她对极限运动的恐惧甚至不及对过上令人后悔生活的担忧。

与她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极限运动摄影师马克·费舍（Mark Fisher）。在Gopro和35毫米数码照相机并不普及的10年前，他已经背着沉重的林哈夫4×5照相机和三脚架跨过了科罗拉多。在很多次旅程中，他都需要在直升机的边缘向下拍摄从直升机跳下的滑雪和高山运动员；在零下温度的环境中几个月准备，也只能换得一次珍贵的拍摄机会。在他的经典作品中，自然是神圣而崇高的存在，然后在茫茫的雪地中，从未缺席的是勇敢的滑雪运动员的身影。他说他的作品是想展示运动员们所碰到的“戏剧性”，而走那么远，是为了获得“超越平凡”的照片。

（本文图片由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提供）

1. 苏联摄影师列夫·波罗杜林的作品《射箭的女孩》
2. 美国摄影师布莱恩·芬克的摄影作品
3. 英国摄影师鲍勃·马丁拍摄的残奥运动员艾维·托雷斯起身入水的瞬间

钟汉良：偶像四十

文 宋诗婷

电影《三人行》剧照。钟汉良饰演大反派张礼信（右）

一个偶像型演员，有点老派的那种。

对钟汉良的采访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在北京，电影《惊天大逆转》的宣传期，因为各个环节的拖延，采访时间被压缩到 10 分钟。

等待在采访室的钟汉良从印着自己照片的易拉宝后走出来。“需要拍视频吗？”他看看我，又看看身边的工作人员。“天啊，终于不用拍了。”得到满意的答案后，他明显放松下来，身体也陷进了椅子里，“来吧，我们好好聊一聊。”

那次采访一开始就结束了。第二次见面是在厦门——《惊天大逆转》的厦门发布会。

发布会被安排在厦门一家临海的五星酒店，现场工作人员在酒店的多功能厅为即将开始的发布会做最后准备。钟汉良的团队迟到了，采访也要推迟 40 分钟。因为飞机晚点，导演和女主角都将缺席今天的发布会，工作人员因而格外紧张。“钟汉良到了吗？”“快了吧？”“好像要到了？”……他们更新着主角的行程，悬着的心一点点落地。其中一位工作人员接到钟汉良团队的电话，对方想临时改变安保方案，从另一个电梯进酒店。“他们有 4 个保镖，从台湾跟过来的。”他拒绝了钟汉良方的建议，理由有些矛盾——一边觉得临时变更不够保险，一边觉得在这个冷清的酒店里有些小题大做。

等待

终于，我在酒店的套房里再次见到钟汉良。和上

次的疲惫不同，这一次他兴奋很多。钟汉良的记性很好，他不仅一眼认出了我，竟然还能记起一星期前聊过的话题。

这个暑假是钟汉良的电影丰收期，《三人行》《赏金猎人》和《惊天大逆转》三部电影先后上映，他都是男主角。正因如此，他变得格外忙碌。三部电影都要跑宣传和路演，每天睁开眼都在一个新的城市。采访当天，他还要跑最后七家影院，活动全部结束要到夜里 11 点左右。

与钟汉良聊天不能着急，他说话很慢，每句都经过认真思考，严格筛选措辞，有些问题不知如何回答，他会露出害羞的表情，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腼腆。聊起电影方面的起色，他说："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一些角色，配角也好，客串也好，大家看到我在电影方面的努力，慢慢的机会多了一些。"

在不久前结束的上海电影节上，他凭《三人行》拿到了自己在电影领域的第一个男一号奖项——最受传媒关注男主角奖。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说了 8 个字："如履薄冰，受宠若惊。"

当时坐在台下的银河海润演艺公司总裁朱淑仪对这一幕百感交集，她曾是钟汉良的经纪人，负责他签约银河海润期间的经纪事务，也是帮他转型大银幕的操盘手。"我们认识十几二十年了，这些年他经历过很多坎坷和不开心，但他的谦虚和朴实一直没有改变过。"朱淑仪说。

钟汉良是朱淑仪成立银河海润演艺公司后签下的第一个艺人。两人相识于上世纪末，当时，钟汉良第一次到内地拍戏，那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朱淑仪的师傅鞠觉亮，因为这层关系，朱淑仪和钟汉良成了朋友。

"他是个很平实的人，很努力的演员，没什么绯闻，不是五官标志的帅，娃娃脸，形象健康。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一直这么认为。"在成立演艺公司之前，朱淑仪是杜琪峰的影视公司——银河映像的制作总监。2012 年，杜琪峰希望拓展和传承自己的电影事业，先后签下几位有潜质的导演和编剧，与此同时，他委托朱淑仪成立演艺公司，为电影积累演员资源。"我要经营这个部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钟汉良。"朱淑仪说，最近几年，香港电影市场的演员断层问题非常严重，公司急需一个全能型的艺人来填补市场，而钟汉良就是她当时选定的人。"无论是身段还是脸蛋，都有偶像派的特质，但同时他也是实力派演员，从霸道总裁、帅哥小生到古装、底层百姓，任何形象都有胜任的可能，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

签约后，朱淑仪为钟汉良制定了向电影方面发展的规划："减少电视剧的产量，唱片部分也要暂时放下。"

在签约银河海润之前，钟汉良一直在内地发展，因《来不及说我爱你》《天涯明月刀》《何以笙箫默》等作品积累了稳定的观众和大量"粉丝"。但转型大银幕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开始，他只能得到一些客串或者配角的机会，先混个脸熟，让大家知道，钟汉良也开始拍电影了。

作为杜琪峰旗下公司的第一位艺人，钟汉良并没有成为期待中的"杜琪峰御用男主角"。事实上，在《三人行》之前，钟汉良也只在银河映像出品的《毒战》中有过一次露面。朱淑仪解释说："杜导，你知道的，他很小心翼翼，需要观察你，了解你，即便是刘德华、郑秀文，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毒战》里，钟汉良饰演一名追踪毒贩的警察，在整部电影中只有几场戏，台词不多，表演上可发挥的空间也有限。但在这次"试探"中，钟汉良得到了杜琪峰的认可。接受采访时，杜琪峰曾说："他出现得不多，但职业道德非常好。虽然每天只有一两个镜头，但他足足在组里待了两个月，每天有没有通告都不知道，就坐在那里两个月。这个考验让我知道，这个演员未来要好好用。"

3 年之后，钟汉良等来了《三人行》。在这部展现医生、匪徒和警察三方利益冲突的电影里，钟汉良饰演大反派张礼信。"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有些书生气，看起来不像坏人，我们就是想找一个不像坏人的坏人。"杜琪峰说。

电影一开始，张礼信就头部中枪入院，98 分钟的表演，钟汉良几乎是在病床上完成的。因为活动空间受限，编剧游乃海为钟汉良设计了大量文绉绉的台词，以展现人物性格。这也恰好发挥了钟汉良的优势，在常年的高强度电视剧拍摄中，他练就了一流的记台词功力。

拍杜琪峰的电影压力很大。开拍之前，钟汉良只知道自己要演一个匪徒，但剧情是什么他完全不知道。每天，游乃海坐在拍摄现场写剧本，写一页拍一页。接过剧本，钟汉良就开始背台词，《圣经》故事、古希腊典故、香港法律条文……背完就开机，光打过来，所有压力都在他身上。"杜导说，'什么都不用准备，来了就好。但那些记台词的功力，现场的专注力、理解力，你早就得练好了。《三人行》就是一次考试'。"

在杜琪峰的考场上，钟汉良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电影《惊天大逆转》钟汉良海报宣传照

走出考场，他也正式从银河海润毕业了。结束《三人行》的拍摄后，他与银河海润的合同到期，他决定自立门户，组建自己的艺人工作室。

转型

或许是真想甩掉以往的偶像定位，这个暑假上映的三部作品风格不同，但电影中的钟汉良都一反惯有形象，尝试了新的角色和造型。

相较于《三人行》中的反叛，钟汉良在《惊天大逆转》中的角色更具颠覆性。他在片中饰演企图在中韩足球对抗赛中制造混乱，以盗取赌金的病态罪犯郭志达，全程戴着烧伤面具，很多观众在电影过半时都没能辨认出大银幕上的大反派就是钟汉良。

《惊天大逆转》是导演李骏的第一部商业片，对于让钟汉良来演这个复杂的角色，他最初有些犹豫："这个角色特别重，从我内心来讲，我是希望找一个已知的很有演技的演员。他们列了几个演员，其中有钟汉良，但我当时觉得他是偶像型演员，心里有一些忐忑。"

导演还在犹豫，但钟汉良和他的团队很主动。"一个星期就回复了，说很喜欢这个剧本，希望往下沟通。"李骏对钟汉良积极的态度印象深刻。

沟通的障碍出现在对角色面具样式的选择上。李骏为郭志达这个角色准备了一副完全遮住脸的面具，钟汉良无法通过面部表情和眼神来表演，他一时无法接受。"怎么演？面具这个障碍被我完全忽视了。"钟汉良反复强调，最初对面具的抵触与保持形象无关，完全是出于表演上的考虑。他不甘心妥协，上网查资料，下载图片，给李骏发去了几个面具参考，希望导演能做出调整。两个人来来回回沟通了几次，最终都做出了部分妥协：面具没有换，但在剧情的进展中会设计一些结点，让面具局部破碎，逐渐露出角色的部分面部表情。

"我一直是这样的。"钟汉良说到与导演的争论，"如果可以，我会一直说一直说，很喜欢与导演沟通。"钟汉良的这个习惯，曾与他合作《来不及说我爱你》的香港导演曾丽珍也印象颇深，"拍片现场，他就是'十万个为什么'先生，总是用很多问题缠着你"。

钟汉良一直强调自己没有偶像包袱，但作为导演，李骏还是捕捉到了那张面具带给钟汉良的细微改变。"戴上面具后，他的表演特别有张力，没有了自己那张脸，他可以很快进入状态，第一场戏就完全不拘谨，一下子找到了释放的快感。"但摘下面具后，钟汉良在表演上开始有一些犹豫。电影结尾真相揭晓，郭志达一直是弟弟郭志华假扮，最后一场戏，钟汉良要饰演弟弟郭志华，在天台说一段咏叹调般的对白。"这个会不会太像话剧了？会不会太灰暗了？他开始有顾虑了。"李骏觉得，尽管钟汉良在努力克服，但他的犹豫多少与个人形象有关。

电影拍摄结束后，李骏曾主动向钟汉良道歉。"我说：'对不起汉良，我对你之前的戏不了解，但不管怎样，你在我心中是一个很棒的演员，而不仅仅是一个偶像明星了。'"听了李骏的话，钟汉良没有说话，只和他拥抱了一下。

老派偶像

从 19 岁出道起，钟汉良就一直被当作"全能偶像"打造，他很难不下意识地注重自己的形象。但在"粉丝"心中，对于个人形象的维护恰恰是他敬业的表现。"良民'哇常在我心'"说："这么多年，他脸上当然会有岁月的痕迹，但他每次出现都状态很好，没穿错过衣

服，没发过脾气，没什么绯闻，每次都带着新作品出来，这多难得啊。”

尽管“粉丝”和网友常常赞叹钟汉良的童颜，忘记他42岁的年纪，又总把他和一众小鲜肉放在一起，但和那些新偶像相比，钟汉良的作风实在老派。除了为电影、综艺节目跑宣传，他很少接受采访。在这个明星争当网红的年代，他很少在社交网络上与“粉丝”互动，也不轻易展现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真性情”，作为偶像的神秘感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

在今天的娱乐圈，结婚生子早已不再是明星需要保守的秘密，但出道23年，钟汉良鲜有绯闻，网络盛传的隐婚生子传闻他也不正面回应。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当年的刘德华——20世纪90年代，偶像就是大众情人，他们不能恋爱，不能结婚，更不能有孩子。

钟汉良把自己的生活藏起来，工作上却越来越锋芒毕露。与他搭档《惊天大逆转》的韩国演员李政宰曾说，过了40岁之后，他做好了角色越来越小的准备。而钟汉良恰恰相反，年过40后，他才觉得自己的戏路越来越宽，递到手中的剧本越来越多，表演之外的新领域也在朝他抛出橄榄枝。

与很多一炮而红的偶像相比，钟汉良这一路走来要辛苦很多。早年因主演TVB电视剧《少年五虎》而正式出道，却又因发展空间受限而到台湾转型做歌手。在邰正宵的提携下，他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OREA》，专辑大卖，他成了台湾歌迷心中的“小太阳”。90年代末是华语唱片最后的黄金时代，钟汉良赶上了，但因为一些他不愿意透露的原因，正在上升期的歌手生涯突然受阻，他不得不为自己再谋出路。

这一次，他选择来内地做演员。“我是第一批到横店拍戏的港台艺人，那时候横店还很荒凉，几乎什么都没有。”钟汉良至今记得横店彻骨的冷，那是一个让他在事业和生活上同时承受煎熬的寒冬。

想融入内地环境，普通话是钟汉良要过的重要一关。曾丽珍还记得，当年和钟汉良一起拍戏，他总在现场捧着一本《唐诗300首》，字正腔圆地朗读，画面很搞笑。

前些年，内地的行业规范还很模糊，演员常常要加班加点赶戏。“一天拍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的事经常发生。工作人员都很拼命，好像这份工作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都是用生命在拍戏。”钟汉良说。最累的时候，他结束一场哭戏却停不下眼泪，累得委屈，却没力气发泄，只能接着哭，边哭边说“拍戏怎么这么苦”。

2010年，《来不及说我爱你》热映，这部戏为他吸引了大量“粉丝”。紧接着播出的《天涯明月刀》《最美的时光》和《天龙八部》等电视剧都收视稳定，钟汉良在内地的影响力也随之稳步提升。《何以笙箫默》电视剧版播出后，钟汉良才彻底红了。

钟汉良喜欢把“一步一步来”挂在嘴边，他的事业与他的交流方式一样，慢却稳妥。“不是每个人都是莱昂纳多，一生下来就能演主角，对于男生来说，40岁左右是很好的年纪。不需要急的，一步一步来。”他很感激那几年的默默坚持，“要是一早就红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去练习，去收拾掉表演上的毛病？”

出道20多年，一路从香港到台湾，再到内地，钟汉良成了一个在事业版图上没有故乡的人。提起身份的尴尬，钟汉良难得地流露出情绪：“香港人觉得我是台湾人，台湾人觉得我是演戏的、香港来的。内地人觉得我是台湾人或者香港人。不知道家在哪里，没有人把你当自己人。”

漂泊这么多年，钟汉良觉得自己一直很被动，“跟着剧组也好，潮流也好，经济也好，去到不同的地方，很少有目标明确的规划”。

但在前经纪人朱淑仪眼中，钟汉良并非全无目标。“他是很顺其自然的人，没有太大的野心。如果你陪着他走，他信任你，就会听你的，会跟着你走，有一点点懒惰，有一点点依赖。但当你真的需要他去表达意见的时候，他会很认真地思考，过程很慢，但深思熟虑，他很了解自己，是个有自己风格的人。”

朱淑仪把钟汉良的单飞视作成熟的表现。“他已经足够强大，是一个独立的IP了。在我身边他永远有依赖，或许是时候去拓展更广阔的空间了。”朱淑仪说。

很多演员到了钟汉良的年纪都会把节奏放缓，有些人已经做导演，甚至转投商界，像钟汉良一样专心做艺人的越来越少。

“所以，我也是时候该改变一下了。”去年底，他在电影《沙漏》的发布会上宣布转型做导演，这是他独立组建工作室后最重要的一个决定。“算是一个仪式吧，送给自己不惑之年的礼物。”钟汉良说。

“不是每个人都是莱昂纳多，一生下来就能演主角，对于男生来说，40岁左右是很好的年纪。不需要急的，一步一步来。”

“蝎子”未老

记者 黑麦

如果以今天的欧洲局势为背景，蝎子乐队的那首《变革的风信》，似乎有着另一番味道。

在沦为一支“具有政治倾向”的乐队之前，蝎子乐队（Scorpions）只是一支伟大的流行摇滚乐队。1965年，主音吉他手鲁道夫·辛克（Rudolf Schenker）在披头士盛行的岁月里找到了一种强硬的吉他声场，它粗糙的失真效果似乎成为音乐圈中的一种反叛腔调。带着这种声音，辛克与主唱克劳斯·梅恩（Klaus Meine）等人成立了蝎子。“我们跟随本能前进，让音乐自由地流动，然后将蝎子那致命的毒刺展现出来。”这是乐队成立不久时，辛克对乐队的一次描述。

首张专辑《Lonesome Crow》诞生于汉堡，辛克在制作上刻意模仿了60年代中期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Cream和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的声音，而旋律化的歌曲让他们确立了非英非美的独创摇滚风格，直到1979年出版的《Love Drive》，第一首歌曲的独特嗓音和带有舞曲风格的节奏，让乐队成功杀入英国排行榜。几年后，专辑《Love At First Sting》的单曲“Still Loving You”成为德国热门榜首歌曲，辛克说这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在彼时的德国，它常常被人理解为隐晦地暗喻了仍然分裂的东西德国，这首歌似乎清晰地描述了柏林墙之下许多德国人为他们分裂的祖国而绝望的心情。

到1989年为止乐队一共在苏联举行了10次演唱会，1988年，蝎子乐队（Scorpions）作为造访苏联的第二支西方硬摇滚乐队，在列宁格勒举行了一场演唱会。在苏联期间，乐队成员的每次出行都受到安全官员们的“特殊关照”。次年8月，他们再次来到苏联，在红场他们和包括Ozzy Osbourne、Bon Jovi、Motley Cru在内的众多乐队共同演出了名为“莫斯科和平音乐节”（Moscow Peace Festival）的音乐节演唱会。面对26万观众演出，这一次，安全员顾不上监视任务，与现场狂热的歌迷们一起狂欢，演出后，乐队受到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接见。

乐队主唱克劳斯·梅恩（Klaus Meine）回忆道，他们在夏夜共同泛舟于莫斯科河上，去往高尔基公园。

蝎子乐队演出现场。左至右：鼓手米奇·D，音乐吉他手马蒂亚斯·杰布斯，主唱克劳斯·梅恩，贝斯手帕维·玛琪沃达，节奏吉他手鲁道夫·辛克

一个月后，梅恩便写下了这样的歌词："顺莫斯科河而下，前往高尔基公园，倾听那变革之风……"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蝎子乐队发布了他们著名的歌曲《变革的风信》（*Wind of Change*）。歌曲一开始那段忧郁的口哨声唤起了人们对80年代末期的回想。乐队也由此受到前Pink Floyd乐队成员罗格•沃特斯（Roger Waters）的邀请，共同完成了在柏林勃朗登堡大门前进行的著名的"The Wall"演唱会。

“半个世纪的爱，和平，摇滚”

——专访乐队主唱克劳斯·梅恩、吉他手鲁道夫·辛克

三联生活周刊：在现在的欧洲局势下，重听《变革的风信》似乎别有一番味道。

辛克：音乐神奇的地方就是能把人们联系在一起。蝎子乐队的标语是“爱、和平、摇滚乐”。和平像风一样变化，摇滚又像飓风一样狂野。半个世纪中，爱、和平、摇滚乐的含义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演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我在希腊的万神庙看到有人探讨哲学，这就像是民主的由来，它给我带来一些启发，所以我们在那里演出《变革的风信》的时候，就如同讲述了那里的故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看蝎子乐队所经历的这半个世纪？

辛克：不久前，我在办公室整理杂物的时候，看到了我母亲记录的账本，那是从1965年开始记录的，因为一开始我父亲给我置办乐器花了一大笔钱，但是我母亲说你要自己支付一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在乐队担任财务工作，那个账本是从1965年9月算起的。

当我在1965年创立这个蝎子乐队时，我还是个电工，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活在梦想里，我非常清楚我不想回到以前的工作上，我当时喜欢“猫王”、小理查德（Little Richerd）等人的音乐。我也曾是名足球运动员，喜欢团队工作，其实也是惧怕一人在聚光灯下，因此我更偏向乐队组合，当披头士乐队等英国摇滚乐队出现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想法，找些朋友一起玩音乐一起走遍世界，当我在找乐队的成员时，是在寻找对此想法志同道合的人，其实也是在找能够终身成为朋友的人。很多人说我们是幸运的，音乐让我们在梦想里生活了半个世纪。

梅恩：直到今天，蝎子乐队一直都是德国最著名的乐队之一，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像是10年前的金属乐队（Metallica），像今天的×××乐队。在Facebook上，我们80%的“粉丝”都是从18岁到28岁的年轻群体，站在舞台上，我看到他们和我们一起唱着那些歌，那个旋律的诞生比他们还要早，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了时间的变化，格局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蝎子乐队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认为创作过程中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辛克：最难的不是思考。当你在写歌的时候，用头脑来思考，就只能得到普通的作品。最好的是，灵感找到你，这是不用思考的，你只要抓住和记录飘到脑海里的那个词句和音符就好。

做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有些歌是计划外的专辑歌曲，因为当我们2010年做告别巡演的时候，确实是计划暂别舞台的。但是MTV不插电演唱会邀请我们表演，这是我们一直很想做的演唱会，但一直未能如愿。直到收到邀请，我们都觉得是个很难得的机会，干脆就用那些未发表作品完成了整个专辑。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在2010年宣布解散后，为什么很快就决定重组？

梅恩：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离不开音乐，那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和体力去演出了，或许是处于我嗓子的低潮期，我查看巡演地图的时候，发现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过，比如中国。在很多因素的促成下，我们就重组了。去年是一场音乐节，今年是一场演唱会，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音乐场合，这次的50周年演唱会上，我们准备了非常特别的设计，比如高品质的音响系统，我们也为此准备了70年代、90年代以及现在的歌曲。

首汽租车：开启出行 4.0 时代

从日行千里的幻想到超音速，出行问题一直凝聚着人类的思考与智慧，甚至可以说，出行的快捷和便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时代进步的一种表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时空的概念上地球更加成为村落，出行也更成为每个现代人的生活必需。2016年4月，罗兰贝格战略咨询公司携手首汽发布的《2016 中国约车及租车市场分析报告》中透露，2015 年，中国整体出行需求为 28 亿次 / 天。同时更明显的一个特征是，人们对出行的诉求也变得更加个性和多元。

对此，首汽租车 COO 魏东分析称，汽车出行场景日趋多样化、网络化和碎片化。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移动互联、地图定位等技术实现信息匹配的精准；网络传播的高效和低成本使得信息在全国快速传播；用户的需求日益多元化、综合化；越来越注重出行品质，不局限于有和无，而是好和更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市场需求，首汽整合了内部出行产品，快速链接线下实体与互联网的融合，相继推出首汽租车、首汽约车和 GoFun（新能源分时租赁）平台，这三大平台被统称为“首汽移动出行”板块。

对于汽车出行这样一块迅速膨胀的利益蛋糕自然逃不过一向嗅觉灵敏的资本大鳄，近几年，行业里群雄逐鹿的局面将市场鼓噪得沸沸扬扬。面对如此局面，魏东充满了自信：“我们有足够底气应对汽车和出行行业的发展。”

这样的底气十足自有其根基，最令业界瞩目的是他们坚实的背景——“首汽移动出行”所隶属的首汽集团，其前身是 1951 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并挂牌成立的首都汽车公司，迄今已有 65 年的历史。自成立以来，首汽集团一直服务于重要的国事级用车需求，其中，首汽“国宾队”以高规格的交通服务接待过众多国家元首及各类高规格代表团。可以说，首汽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汽车服务市场的历史。

而 1990 年因为北京举办亚运会，大量的外宾、媒体人员将汽车租赁的需求带入了中国。两年后，在京沪等大城市里，汽车租赁行业起步，首汽租赁有限责任公司（首汽租车）正式成立，成为了国内最早从事专业性、综合性汽车租赁服务的供应商之一。在过去 20 多年的岁月里，首汽租车开创了众多的行业先河：1996 年在行业中首家推出以租代买汽车租赁业务，1997 年在行业中率先推出汽车租赁会员制服务模式，2000 年开通了全国租车业务，2006 年设立行业中第一家电话预订中心。

而进入 2015 年以来，首汽租车更是极速加快发展步伐：年初获得首旅集团和首汽集团 1.5 亿美元启动资金之后，相继在 2015 年 7 月得到 270 亿银行授信、10 月获得嘉实基金 A 轮注资，并于 2016 年 2 月 14 日入主瑞卡租车、完成南北产业布局。至今首汽租车在全国 66 座城市开设 400 余家服务网点，车队规模 2.6 万辆。

“65 年，意味着我们整个企业文化、服务品质的沉淀。这是对于大规模车队的运营管理经验……对于大规模用车管理经验等等一系列经验的积累，展现出来就是更多细节流程和细节精细化管理。”魏东说。如此的底蕴决定了首汽租车的视野：依托于首旅集团和首汽集团两大股东，首汽租车并不仅仅止步于在汽车租赁行业里去抢夺份额，而是以更长远的眼光、更大的气魄，直接推出了“大出行”的概念，引领行业直接将标准定位到了 4.0 时代。

所谓“大出行”，就是致力于以客户“走出门”后的行动动线作为产品设计基础，为客户提供包括行、游、住、娱在内的“一站式”、全国范围的全方位出行服务解决方案。背靠首汽集团、联合首汽移动出行其他两个平台，首汽租车快速与航空公司、铁路 12306 达成合作，实现了各种交通工具的无缝对接，使出行的便利性获得了质的飞跃。同时，首汽租车也快速与康辉集团、如家酒店集团等大型旅行、酒店业达成战略合作，促成产业规模化和产品多元化的实现。

大格局，高定位，首汽租车所倡导和推行的“大出行”概念必将为人们带来更丰富的出行享受。

首汽租车 COO 魏东在《2016 年中国约车及租车市场分析报告》发布会上发言

左图：1948 年罗伯特·卡帕为毕加索和吉洛拍摄的照片

右图：毕加索与吉洛和他们的儿女在一起

弗朗索瓦丝·吉洛

毕加索之后的生活

文 钟和晏　部分图片提供 Sotheby's、Capa Archive

今年 94 岁的弗朗索瓦丝·吉洛仍然健在，她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她在一直在画画，绘画是她的自主声明。

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为毕加索在法国南部蔚蓝海岸拍下的众多照片中，有一张照片异常传神：一位头戴草帽、身穿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沿着海滩向前走着，毕加索紧跟在身后，双手高举一把大阳伞为她遮蔽太阳，他的眼睛注视着镜头。

她略微仰着脸，满脸喜气洋洋、笑逐颜开的表情，即使隔着画面也能感受到她欢快的心情。这是 1948 年夏日的一天，她是毕加索当时的伴侣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çoise Gilot）。

最近，德国记者马尔特·赫维希（Malte Herwig）出版了弗朗索瓦丝·吉洛的采访传记《说不的女人》，这本书的缘起多少与海滩上的照片有关。“我十几

1

2

岁时曾经收集过毕加索的照片，无论他赤裸上身在画室里跳舞、用一条毛巾扮演斗牛士还是干脆傻傻地拉着脸，即使在最可笑的情况下，毕加索身上仍然散发着一种神奇的创造力。”他回忆说，“其中这张照片脱颖而出，它让我如此高兴，我特意把它印在了T恤上。”

近些年来，以“毕加索和他的缪斯女神”为主题的展览和拍卖从未停止过。例如，温哥华美术馆目前正在举办“毕加索：艺术家和他的缪斯女神”展，超过60件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集中体现艺术家生活中的六位女性——他不同时期的妻子或恋人。今年2月份，伦敦苏富比也举办过这样一次拍卖，106件纸上作品以及70件陶瓷、陶土雕塑都是以这六人为表现对象的。这些拍卖作品原本被毕加索作为私人物品保留在他的工作室里，上面没有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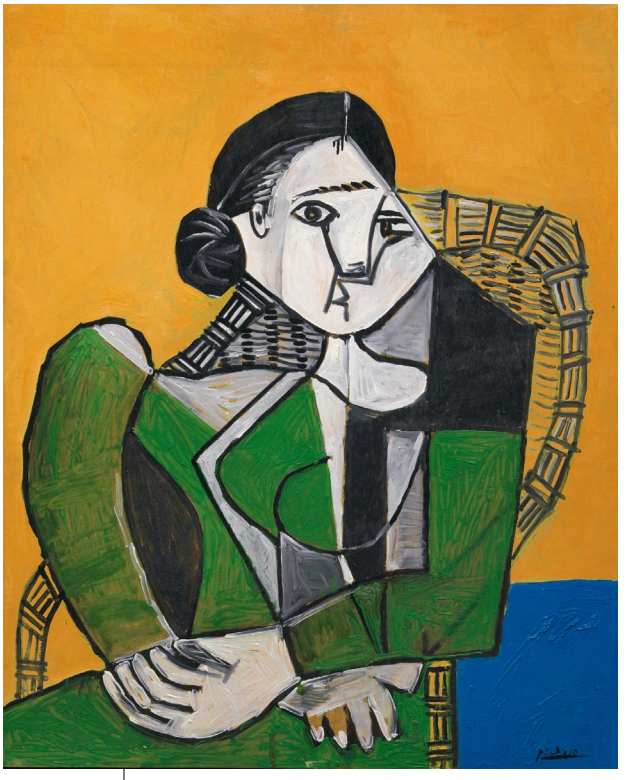
虽然一幅类似《女子头像》的大型油画如今的拍卖价高达几千万美元，真实生活中，这些“缪斯女神”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束。和毕加索分手后，奥尔加•柯克洛娃在忧伤中变得疯狂，朵拉•玛尔陷入了抑郁症，她曾经有过一句名言：“毕加索之后，唯有上帝。”玛丽－泰蕾兹•沃尔特在毕加索去世4年后上吊自杀，杰奎琳•罗克1986年用一把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人之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弗朗索瓦丝•吉洛，今年94岁的吉洛仍然健在，她也是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60多年前她与毕加索决裂，带着两个孩子逃离他们在法国南部的家。赫维希对她“毕加索之后”的生活感到好奇，他从经营她作品的画廊获得了她的地址。

他找到巴黎蒙马特高地的工作室，吉洛出现在门口。她身影清瘦、留短发，脸上是马赛人的颧骨和一对清晰的抑扬眉毛（曾被马蒂斯称为“音符眉毛”）。当时吉洛已经年逾90，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她仍然在忙碌地生活着，每天坚持绘画。每年10个月在曼哈顿中央公园西路公寓的工作室里工作，每年5、6月份回到巴黎她的第二个工作室，带着她的画作一起来回旅行。她与毕加索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年近70岁，儿子克劳德管理巴黎的毕加索机构，

3



4

1. 吉洛作品《下午茶》，1952 年

2. 毕加索版画作品《女人肖像（弗朗索瓦丝·吉洛）》，1954 年

3. 吉洛作品《台灯下的帕洛玛》，1954 年

4. 毕加索以吉洛为模特的作品《坐在扶手椅中的女人》，1953 年

女儿帕洛玛作为珠宝设计师为 Tiffany 工作了 30 多年。

除了有心脏病，吉洛的左眼近乎失明。赫维希在那次见面时问她，这对画家来说是否是灾难，她回答说："这并不影响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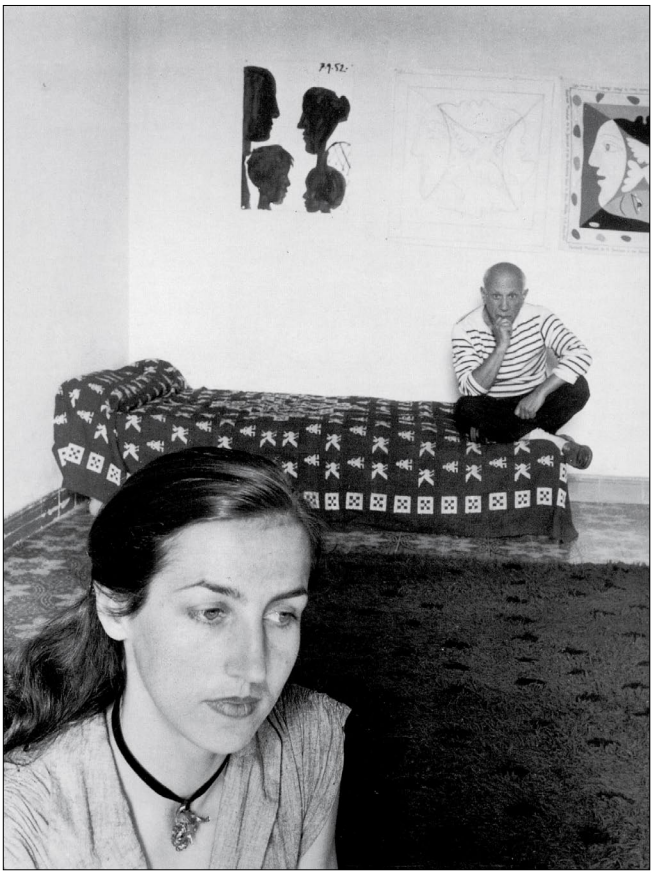
赫维希的传记是从吉洛决定离开毕加索那一刻开始的，第一句话只有两个英文单词——"Picasso raged"（毕加索暴怒了）。他写道："他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艺术家，极具自我宣传的天赋。他的生活中除了他自己和他的艺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余地了。在专制天才的伟大生命戏剧中，其他人都被降低到龙套的角色。大多数人被他所毁灭，就像飞得离太阳过近的伊卡洛斯。"

吉洛 1921 年 11 月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富裕的实业家，母亲是陶艺艺术家，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她从 1944 到 1953 年与毕加索一起生活，这段跨越 10 年的关系开始于 1943 年 5 月巴黎被占领期间，她与毕加索在左岸一家餐馆第一次相遇。毕加索坐在邻桌，手里拿着一碗樱桃走到她桌旁，要求结识她。当时毕加索 61 岁，她只有 21 岁，正从法学院转学艺术。

她向赫维希回忆起两人的生活：每到早晨毕加索糟糕的情绪，经常抱怨自己的生活很无聊，一切都很无趣。到了晚上，他又处在世界之巅。"他是一个非常多变的人。"她说，"和毕加索在一起，你得像圣女贞德，从早到晚都身披盔甲。为了证明你的力量，你得一天 24 小时全力以赴。"

这无疑是不平静的生活，她描述他有一次举着燃烧的香烟靠近她的脸颊，想像对待牛一样给她烙下印记。"但是他的虐待更多是纯粹精神性的，到后来更加可怕，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他的爱破灭了的原因。我知道如果我没有离开巴勃罗，他就会吞噬我。"

1953 年 3 月 5 日，毕加索以吉洛为模特画过一幅肖像《坐在扶手椅中的女人》。毕加索对她的控制行为、



毕加索与吉洛在 1952 年的合影

吉洛期望获得艺术生涯自主权的愿望以及两人不断深化的裂痕，这幅画中多少提供了一些线索，毕加索可能已在重新审视两人之间的关系。

毕加索曾经说过，他画扶手椅中的女性是“为了保护她们”，如他对玛丽－泰蕾兹·沃尔特、朵拉·玛尔以及吉洛早期的画像，但这幅肖像明显不同。在这里吉洛是处于主导的地位，她姿态端庄地坐在勉强容纳她的高背扶手柳条椅中，双手在腰间交叉，似乎在为她的身体挡住艺术家的审视。毕加索用较强的线条和图形方法来表现她的身体，橙色、蓝色和绿色的调色让人联想起马蒂斯的画作。

吉洛曾经这样解释过毕加索的用色：“对于每一个他生命中的女人，他有某种色彩的主旋律。我是蓝色和绿色，玛丽－泰蕾兹·沃尔特是薰衣草紫、柠檬黄和淡绿色。黑色通常与朵拉·玛尔有关，除了色彩，他对她运用了更多的形式，朵拉·玛尔的两只眼睛位于同一侧，而我是在鼻子的两侧，因为我的脸非常对称。”

据说，如今吉洛的公寓里没有毕加索的作品，若干年前，她卖掉了她唯一拥有的《女人花》系列中的一张。《女人花》创作于 1946 年 5 月，毕加索把她描绘成一朵浅绿色和蓝色的半抽象花朵。她叙述画的构成是以贴纸的方法成形的：“毕加索先把一张纸涂成天蓝色，然后他剪出许多符合我头部概念的圆形，这个概念他仍在琢磨中。等他把这个形状剪出来之后，他开始在上面画出代表眼睛、鼻子与嘴巴的象征符号。然后，他逐一钉在画布上，左边、右边、顶端及底部都试试看。”

1964 年，与毕加索分道扬镳 11 年之后，吉洛出版了《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以数十种语言售出超过百万本。这本书激怒了毕加索，他拒绝再见两人的孩子，并起诉试图阻止书的出版。当他败诉之后，他最后一次打电话给吉洛，对她说：“我祝贺你，你是赢家，你知道我总是像个赢家。”

早在 1933 年，毕加索也同样企图阻止他年轻时代的模特及恋人费尔南德·奥利维耶出版回忆录。法国艺术史学家皮埃尔·戴从 1945 年结识毕加索，是《毕加索传》的作者。他在传记中解释，毕加索对前任伴侣利用他赚小钱的行径深为不屑。“罗曼史是他创作的源泉，他觉得属于他个人，包括他与女人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在毕加索眼里，费尔南德是在出卖他的年青时代。所以 30 年后，当弗朗索瓦丝·吉洛出版她的书之后，他也有同样的反应。”

吉洛离开毕加索被视为一大罪行，巴黎不再欢迎她。1961 年，她为了工作定居美国，另一个原因是她的作品收藏者中约 80% 是美国人。她在“毕加索之后”的生活仍然丰富多彩。1970 年，她嫁给了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医生，第一位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美国科学家，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索尔克 1995 年去世。

从绘画上说，一直以来吉洛的画作被认为受到毕加索的严重影响：抽象和具象的组合，深度饱和的色彩，偶尔强烈冲突的形式，有时候甚至会被误以为是毕加索的作品。

2012 年 5 月，纽约高古轩画廊举办过“毕加索和弗朗索瓦丝·吉洛：1943 至 1953 年”的联展，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理查森（John Richardson）是那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他也是另一部毕加索多卷传

记的作者。理查森评价吉洛是“一位非常认真、专业的画家”，另一方面，他认为她最好的作品出自与毕加索一起生活的时期，之后从未超越。

也有人把她的绘画视为马蒂斯的衍生物，从吉洛本人来说，比起毕加索她更接近“色彩之王”马蒂斯，因为他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吉洛写过《马蒂斯和毕加索》一书，一本对两位巨匠复杂关系深入研究的专著。她认为：“对于马蒂斯，色彩是根本，他用它来建立空间本身。对于毕加索，色彩只是一种装饰，形状是第一位的。毕加索的画基本上是黑色、灰色和白色，通过夸张的形式创造出透视，马蒂斯的做法更多与物理棱镜原则有关。”

她在书中回忆了 1946 年 2 月第一次见到马蒂斯的情景：“他住在法国旺斯的家中，我本来以为他的房子是充满光线的，意料之外的是百叶窗被拉到只有最少的光线可以透进来，因为马蒂斯害怕会失明，他是为了保护他的视力。而且奇怪的是，在完全的幽暗中你所看到的东西是最好的，它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浮现。”

虽然毕加索和马蒂斯被公众视作相互嫉妒的竞争对手，吉洛却认为这不是在绘画方面的竞争，而是从人的角度，就像南北的对立。“毕竟毕加索来自安达卢西亚，马蒂斯来自法国的最北端。他们就像面对面的两座大山，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在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无论如何，吉洛一直没有放弃自己作为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和自主权利。多年以来，她总共创作了超过 1600 幅绘画和近 5000 件纸上作品，她的画作在佳士得和苏富比的拍卖价格达到 10 万到 20 万美元，她有 4 幅作品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所以在赫维希看来，相比毕加索的其他女性，“她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她一直在画画，绘画是她的生活方式和自我声明”。

在 20 世纪艺术家列表中，男性艺术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当吉洛被问到与毕加索的浪漫史，对她来说是否尤其不利，吉洛觉得性别差距被夸大了，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往往期望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她说，要达到艺术最高阶层的唯一途径就是“具有独特的视角，然后拼命地工作”，对于其他任何职业也一样。

《新知》2016 年第 4 期上市

（总第 16 期）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新浪微博 @ 新知

微信公众号：新知 WISSEN

关心一些恒久的事情——理性进步，智识生活的乐趣，美

Wir müssen wissen. Wir werden wissen.

[新知 2016 年第 4 期要目]

Entrée

连接另外十亿人：关于理想主义、野心和网络中立

“小丑”的文化史

没有陷落的爱情

普鲁斯特和逃逸线上的青春

机器控制论（漫画）

Main

大爆炸之前是什么？

人类在玩火吗？

基因编辑

我的祖先和我——源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神话

永恒之问

Fusion

欧洲认同在中世纪早期的构建与当代挑战

青牛白马，来去何兮——古 DNA 研究

视野下的契丹贵族

达尔文的 1859 年

弗吉尼亚 · 伍尔夫与房子的故事

亚美尼亚：国界的迷思与现实

Dessert

繁星中的双螺旋：日本现代建筑浏览

化学：不对称之存在

菲利普 · 迪克：半疯的文艺极客

世界上第一家机器人酒店探访记

新战术对旧大陆：英国海洋帝国的肇始

埃及：走进未来的法老宫殿

发现和探索大脑新大陆的历史

等待奇迹

1BOOK140 短书评

《新知》2016 年订阅须知

《新知》双月刊，每期 160 页，全年 6 期，零售单价 20 元，全年定价 120 元。

2016 年刊开始征订！

读者可到三联生活网订阅：www.lifeweek.com.cn，全年订阅 8 折优惠，订阅年价 96 元。

或在卓越网、京东商城等订阅：www.amazon.cn / www.JD.com

2015 年珍藏礼盒现已上市。

1

对于奥运，他们关心的不只是金牌

文 杨聃

从品牌到媒体，时尚界对奥运会是如此的上心，极力想摆脱“时尚是肤浅”的偏见，就像英国版《Vogue》副主编艾米莉·谢菲尔德（Emily Sheffield）所说的那样：“时尚不存在于真空中。”

奥运时装秀

从什么时候开始像奥运会这样严肃的全民盛事也开始点评“红毯环节”的最佳与最差着装了？《悉尼先驱晨报》生活方式版对此次里约奥运会各国代表队

1.《Vogue》以运动为主题拍摄的时尚大片
2. 2016 里约奥运会加拿大代表队队服
3. 泰格豪雅与曼联达成合作
4. 2016 里约奥运会英国代表队队服

着装点评的刻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场时尚活动。先抛开公允与否，抱着娱乐的态度看看它是怎么说的。

在他们看来最佳着装第一名当然是澳大利亚了，担任设计的是已有 102 年历史的本土品牌 Sportscraft。设计团队表示，这次薄荷绿与白色条纹的小清新制服灵感来自 1924 年巴黎奥运会上的澳大利亚队服。据说夹克的内衬还印上了之前澳大利亚所有 108 位金牌获得者的名字。其次，拉夫劳伦设计的美国制服、Suitsupply 设计的荷兰制服等也都在最佳之列。

最差着装的名单有点长，被调侃为“番茄炒蛋”的中国代表队制服位列其中，看看同列的名字也就不觉得委屈了，毕竟连阿玛尼设计的意大利队服也在内。它的理由很简单：“天鹅绒？阿玛尼知道奥运会在哪儿开吗？”

其次，克里斯提·鲁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设计的古巴制服、H&M 设计的瑞典制服、阿迪达斯和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设计的英国

制服都有这样或那样“不堪入目”的问题。“退欧之后的英国已经没了欧洲风，承认吧麦卡特尼，你并不擅长这个。”

相比之下《每日邮报》的点评就言辞委婉得多了，他们也没好意思上来就夸英国好，而是排在了汤加之后。别管后面代表队穿了啥，汤加的旗手已经把所有人的目光都拦截住了，“有这样的身材谁还需要穿外衣？”

这也是《每日邮报》和《悉尼先驱晨报》在观点上取得的难得的共识之一，其他的共识都在最差着装里，抱歉的是中国、意大利和瑞典又都在。在《每日邮报》看来澳大利亚代表队穿得像“医疗保健卡”一样，只能说互黑这点双方算是扯平了。

想想 1908 年伦敦奥运会之前的各国代表队有多省心，在着装上根本没啥要求，从那之后运动员入场才开始实行穿着有所区别的队服。给国家代表队设计队服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玩笑式的排名并不能抹杀品牌们的苦心。从用色到质地既要代表国家的特质又不能太刻板失掉了国民的预期，所以有些选择了安全的国旗色，有些则选择了那些在各个文化中都不容易被错误解读的吉祥色。

英国在线时尚预测和潮流趋势分析服务提供商 WGSN 的高级编辑维罗妮卡·亨得利（Veronica Hendry）回忆起 2012 年麦卡特尼设计的奥运制服，也是遭到了来自时尚界的严厉评价。“赞助品牌需要做的事很多，”她解释道，“要兼顾时尚设计还要适合高强度的体育竞技，甚至是穿一整天太难了。”

《Quartz》认为孪生兄弟设计师丹·卡登和迪恩·卡登（Dan Caten and Dean Caten）创立的 Dsquared 2 为加拿大设计的制服比较达标：红色外套采用了防风夹克的纤维面料，背面的燕尾设计搭配了加长款同样剪裁的白色 T 恤和锥形黑色运动裤。这样的外套才是运动员愿意穿的设计，并且看起来也非常入时。

左图：模特吉吉·哈迪德与美国十项全能运动员阿什顿·伊顿共同演绎的大片

右图：2106 里约奥运会古巴代表队队服

对设计师来说，奥运制服的演绎者运动员和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者或模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只需要穿出他们自己的样子，我不想让他们觉得被伪装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舒适。”法国代表队制服提供商 Lacoste 的创意总监巴普蒂斯塔（Felipe Oliveira Baptista）对《纽约时报》说。

当鲁布托被问到他设计时在想什么，他回答说：“运动员在场上对身体精准的把握像超级英雄一样藐视了重力和时间这些物理规则。我们设计的衣服是他们回到常态时庆祝的行头，仍然在那荣耀的时刻，仍然在他们的光芒下，但回到了现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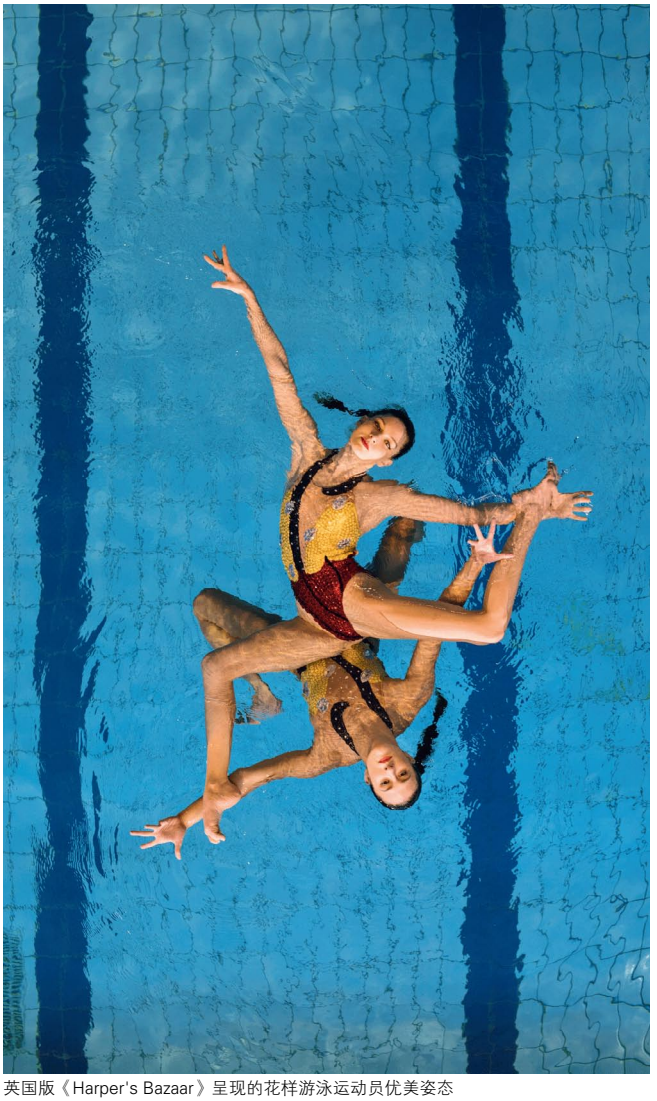
相互交织的演变历程

事实上，时尚和运动装备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可可·香奈儿把更轻、更适宜运动的服装带入了欧洲时尚界，又推行了裤装和有弹性的针织纤维面料。这让女孩子们也能像男士一样运动了。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时尚趋势为年轻女性敞开了方便之门。“爵士时代”让设计师们挑战设计更简洁、更实际的衣服。连泳衣的设计也变得更简洁并贴合身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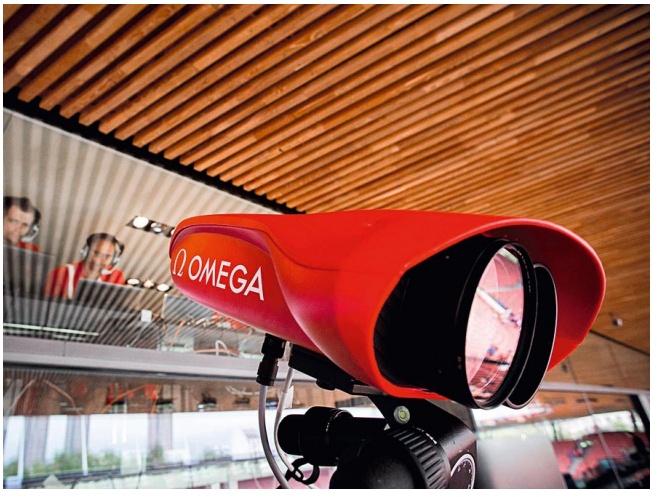
1922 年，法国网球选手苏珊·朗格伦（Suzanne Lenglen）在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上穿了一条当时流行的无袖低领短裙出赛，从此以后女性网球选手都开始效仿这样的装扮了。在 1924 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较轻、较透气的面料，如丝绸、缎和针织棉取代了传统的羊毛织物。女运动员更愿意为大众女性在穿什么样衣服的观念上起表率作用。

当法国设计师让·巴杜推广了更实用的女性运动装之后，运动服本身就成了时尚。第 54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火战车》就能看到那时运动装的审美风格。

“二战”以后，著名的德国运动品牌商达斯勒兄



英国版《Harper's Bazaar》呈现的花样游泳运动员优美姿态



欧米茄光感应终点摄影机

弟因矛盾而分家，阿道夫将公司重新命名为阿迪达斯，而鲁道夫则另起炉灶，公司命名为 Puma。第一个也是目前最久的运动鞋品牌竞争关系就这样诞生了，同时把运动鞋推上了体育竞技的舞台。

1948 年，钟表品牌欧米茄在伦敦奥运会上引入了首台终点摄影机“鹰眼”，协助计时员裁定运动员的冲线时间。随后越来越精密的电子仪器开始运用在赛事的各项竞技裁定中。

运动服的材质也从针织棉慢慢过渡到尼龙，设计也吸收了空气动力学和人体力学，更科学地帮助运动员达到最佳水平。这一过程中，运动又和街头风格紧密联系起来，篮球球衣只是众多范例中的一个，从球场的场内蔓延到场外最后扩散到世界各地具有时尚意识的消费者手里。

如今，时尚和运动已经在“运动休闲”（Athleisure）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了，又掺和进来了一个科技。耐克采用 3D 打印技术研发小型硅突起，来重新导向跑者身体周围气流；全身扫描仪帮助阿迪达斯设计出保持游泳者理想形态的泳衣。瑞士自行车专业制造商 Assos 转向风洞为美国自行车队打造量身定制的合身服装。这让“精益求精”的体育赛事更加难分上下了。

“在全程 4 公里的比赛中，第 8 名和第 1 名仅差 4 秒。”美国自行车协会（USA Cycling）运动员副总裁吉姆·米勒（Jim Miller）对《时装商业评论》说。运动服装的面料或设计，都可能给运动员带来不适感或不必要的重量，从而影响发挥。

两年前的索契冬奥会，较晚引进 Under Armour 高科技速滑服装，成为一些人指责美国队表现不佳的原因。Under Armour 表示已在测试 2018 年冬奥会服装，努力让参赛者们更快拿到装备，并为其不同体态的运动员进行量身定制。

这些“定制”对比赛干扰的界限也越来越受关注。自从 2008 年奥运会，Speedo 泳装帮助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与其他游泳运动员摘取奖牌、打破纪录后，游泳项目出台了严苛的规则。当时那件 NASA 研发的、具有提高浮力和减少阻力的全身连体泳衣已被禁止在比赛中使用。

但这并不代表服装制造商不可以创新，今年 Lululemon 为加拿大沙滩排球队设计队服。他们首先让排球队员到品牌温哥华总部的 R&D 实验室走了一趟。在那里运动医学教授汤姆·瓦勒（Tom Waller）监督着 40 个科学家、工程师和设计师去了解当下的体育挑战是什么，以及如何用科技手段对这些需求做出回应。

“他们想听听我们的反馈：我们期待的队服是什么样的，或者我们对穿上它的感觉是一种什么样的预期。”加拿大运动员希瑟·班斯利（Heather Bansley）对《Fast Company》说，“作为一个运动员，我感觉我们所做的事得到了尊重。”

排球队的第一次访问还是在冬天，实验室里能够模拟任何地区的气候房准确地复制了巴西的光照强度、温度、湿度等重要因素。一场比赛下来，运动员身体的每一个反应也被记录下来，比如肌肉、大脑和心脏活动。

Lululemon 结合了几组数据创建了队服的蓝本，经过测试，队员们决定采用全新研发的新材质 Aquelu。它能有效抵御高度紫外线的伤害，四个方向弹性伸展，还能防水防汗。根据身体扫描仪制定了符合每一位队员生理曲线的设计。目前这项福利是奥运队员专属的，但未来谁知道呢。

最好的舞台?

别看品牌们都这么拼命，最终也只有那些付了钱的赞助商才能大方露出徽标。为了保证官方合作伙伴的广告权益，国际奥委会一直实行严格的广告管制，不仅聘请了品牌警察，确保只有支付费用的赞助商才能被公众看到。还严加监管非奥运官方赞助商不得在广告中使用任何奥运元素，包括奥运选手，即使这些公司在过去的 4 年训练中一直不断为这些运动员提供帮助。毕竟，这是一个超过 6000 小时的节目，拥有多平台预计 36 亿的在线观众。

若非如此，奥运会怎么能盈利呢？早前的奥运会是教训。1976 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亏损 10 亿多美元；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花费了 90 亿美元且分文未赚。这种局面直到 1984 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才有了转机。

为了解决财务困境，时任洛杉矶奥委会主席，美国商人彼得·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找来了电视和赞助商。他施行的商业模式是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出售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并开出了 2.5 亿美元的价位，吸引各大电视台竞标奥运会的独家电视转播权，最终 ABC 以 2.25 亿美元拿下了美国的转播权，澳大利亚和欧洲的转播权则以 2.87 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项权益至今仍是大型体育赛事的核心收入之一。

另外尤伯罗斯还开创了赞助商的模式，每个行业只选一个奥运全球合作伙伴，凭借行业内的独家赞助以及更大范围和时长的广告展示，将奥运赞助的门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他还规定奥运会的赞助金额不得低于 400 万美元。最终，包括可口可乐、联合航空、美国《体育画报》在内的 32 家赞助商被选中。1988 年汉城奥运会，成为顶级赞助商需要花费大约 1000 万美元，而现在这个数字翻了将近 7 倍。

别看品牌们都这么拼命，最终也只有那些付了钱的赞助商才能大方露出 LOGO。毕竟，这是一个超过 6000 小时的节目，拥有多平台预计 36 亿的在线观众。

在场外，还有一些品牌即便不能直接沾到奥运的光，也在用不同的方式制造自己的关键词。Shopbop.com 电商平台销售的时尚品牌 Isolda 就是这样，推出了“以奥运为灵感”的丝绸休闲服来凑当前运动时刻的热闹。还有一些则紧靠热搜“里约”，像 Aquazzura 七彩毛球鞋那样主打休闲度假风。

既然如此，对运动员的商业价值来说，奥运会是最好的舞台吗？答案也不尽然。在《福布斯》统计的 100 位收入最高的运动员当中，有 62 人参与的项目来自于非奥运项目，包括棒球、橄榄球、高尔夫、F1 等等。剩下的人中依靠奥运会出名的也寥寥无几，例如效力于 NBA 的 18 位篮球运动员，就对奥运会没什么情结，勒布朗·詹姆斯、斯蒂芬·库里都先后宣布退出了。

对时尚品牌来说，奥运会也不是回报率最高的运动 IP，被高度商业化的只是奥运会这 4 年一次的名目而已。劳力士之于网球、浪琴之于马术、泰格豪雅之于赛车和足球等，他们都能在更具体的体育运动中找到各自的形象传达。即便如此，全球时尚杂志还是竞相为奥运运动员打造了不同版本的时髦形象。

在英国版《Vogue》的 8 月刊中，就有关于英国女运动员尼古拉·亚当斯（Nicola Adams）的篇幅。在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金牌的退休柔道运动员米里亚姆·布拉斯科（Miriam Blasco）、重返里约开始第四次奥运征程的花样游泳运动员杰玛·门瓜尔（Gemma Mengual）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操运动员卡罗琳·罗德里格斯（Carolina Rodríguez）都出现在了西班牙版《Harper's Bazaar》的 7 月刊里。意大利版《Elle》夏季刊里一则今年里约奥运会中最性感的男运动员报道，让多数代表欧洲国家入选的网球、足球、橄榄球运动员们，占据了 7 月刊四联页拼贴画的中心。

为什么女性性高潮这么难？

文 袁越

女权主义者追求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之类的还好说，但有一件事男女很难平等，那就是性高潮。一个身体健康的壮年男性在性生活中很容易达到高潮，同样条件的女性就不同了。有人统计过，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女性经常可以在正常性交中达到高潮，其余女性只能偶尔体验到性高潮，或者必须通过特殊的方式才能达到。

为什么女性性高潮这么难呢？

如果你把这个问题丢给一位进化生物学家，他很可能会反问你：女性为什么会有性高潮呢？在他看来，女性性高潮和生殖能力无关，根本就不应该被进化出来。男性就不同了，没有性高潮就无法射精，那可不行。

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最为流行的理论是，女性性高潮是男性性高潮的副产品。原来，女性的阴蒂和男性的阴茎是同源的，它们的前体在胚胎发育的前 8 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此后由于荷尔蒙的不同使得男孩胚胎的前体组织发育成阴茎，女孩胚胎的相应部位则停止了发育，最终成为阴蒂。但这个前体毕竟已经发育了 8 周，因此阴蒂保留了一部分神经末梢，遇到强刺激也会导致性高潮。

换句话说，这派理论相信女性性高潮是进化的副产品，就好像男人的乳头一样。男人没有乳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留着也无妨，用不着专门进化出一套新机制把它们去掉，所以就留着了。

按照这个理论，女性之所以能有性高潮，还得感谢男性，因为男性性高潮是种族繁衍所必需的，阴茎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女性也就跟着沾了光。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两位美国科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辛辛那提儿童医院的米哈埃拉·帕夫利切夫（Mihaela Pavličev）博士和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根特·瓦格纳（Gunter Wagner）通过比较哺乳动物的繁殖机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理论。他俩认为，要想弄清女性性高潮的进化过程，不能只跟男性比，还要跟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于是两人系统地研究了哺乳动物的繁殖机理，发现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像猫和兔子这类独居动物，雌性只有在和雄性性交时才会排卵，而包括人类在内的绝大部分群居灵长类动物则正相反，雌性可以自动排卵，不需要雄性的刺激。

仔细想想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独居动物平时根本遇不到异性，排卵纯属浪费，只有遇到合适的雄性配偶，排卵才有意义。但是，这种方式对于群居动物来说就不行了，于是群居哺乳动物的雌性改成了自主排卵，不再需要雄性的刺激了。

接下来，两人研究了这两种方式在进化上的顺序，发现诱导排卵在前，自主排卵在后，说明群居动物是在独居动物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 7500 万年之前。然后两人又分析了独居动物排卵时的荷尔蒙变化，发现独居动物在性交时雌性体内的催乳激素（Prolactin）和催产素（Oxytocin）都出现了峰值，说明性交以某种方式刺激了雌性大量分泌这两种激素，卵巢在这两种激素的协同作用下开始排卵。

有趣的是，人类女性在达到性高潮时这两种激素同样会大量分泌，虽然这种分泌已经没有了刺激卵巢排卵的功能。

两位科学家相信这不是巧合，这说明人类女性的性高潮和独居哺乳动物的促排卵在本质上很可能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类女性性高潮不是进化的副产品，而是早年性交促排卵功能的一个遗迹，就像人的阑尾一样。

两人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 2016 年 7 月 31 日出版的《实验动物学杂志》（*Journal of Experimental Zoology*）上。他俩还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独居哺乳动物的阴蒂通常长在阴道内部，保证可以通过性交而被刺激到。而群居哺乳动物的阴蒂却渐渐远离了阴道，越来越难以被正常性交刺激到了。

群居这种生活方式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群居，就不可能有人类的今天。所以说，女性性高潮之所以那么难，也许可以看成是女性为人类进化所做的牺牲吧。

Audi Sport 高性能车型来袭 王者降临势不可挡

2016 年 7 月，奥迪品牌高端子品牌 Audi Sport 携旗下最新三款高性能车型，来到中国。三款高性能车型中，不仅有奥迪历史加速最快量产车型、超级运动跑车全新一代奥迪 R8 V10 Coupé Performance，集万千优势于一身、为速度而生的艺术品奥迪 RS 7 Sportback Performance，还有完美融合 RS 车型极限运动性能与 Avant 旅行车车身概念的奥迪 RS 6 Avant。三款最顶级的高性能车型，三种不同的韵味，伴随着魔都上海的炎炎盛夏，开启了“唯王者共逐”的体验之旅。

天下王者，唯速不破。Audi Sport 作为奥迪品牌高端子品牌，始终以其所传承的奥迪百年运动基因而为众人知晓，而这一点更是能从百年来的全球多项顶尖赛车运动中有目共睹。无论是从百年前的阿尔卑斯山谷，到刚刚褪去夺冠硝烟的小镇勒芒，奥迪始终通过这些顶尖赛事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的技术与实力。而 Audi Sport 高性能车型不仅继承了中置发动机、quattro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高效动力系统等源自这些赛道的顶尖技术，更传承了奥迪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进取精神，是对于品牌精神最好的证明和最佳的展现。

自 2012 年奥迪 RS 5 Coupé 代表 RS 系列高性能车型首次进入中国以来，广大中国汽车消费者以及赛车运动喜好者对奥迪高性能车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今，伴随着 Audi Sport 旗下最顶尖、最新的三款高性能车的到来，势必带来更大的轰动。

作为奥迪最顶级的超级运动跑车，全新一代奥迪 R8 V10 Coupé Performance 是利用前沿科技经过全新设计开发的第二代奥迪 R8 车型，作为赛道顶尖技术的传承者，不仅以更前瞻、更具视觉冲击力的外观及内饰设计与领先科技亮相于众人面前，其搭载的 5.2 升 V 型 10 缸高转速自然吸气发动机所展现的 449 千瓦（610 马力）的最大功率，560 牛·米的最大扭矩以及 3.2 秒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更是造就其顶尖超跑的地位。

奥迪 RS 7 Sportback Performance 作为 2015 年引进的奥迪 RS 7 Sportback 的高性能版本，在现有基础上不仅结合 Overboost 超增压技术，将其动力提升，达到 445 千瓦（605 马力）的最大功率，750 牛·米的惊人最大扭矩以及 3.7 秒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更推出全新亚光风格设计：冰川白亚光版以及天云灰亚光版。强劲的动力与更犀利、唯美的个性表现，令奥迪 RS 7 Sportback Performance 得天独厚，是名副其实的速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奥迪 RS 6 Avant，在获得全世界广大好评的背景下，首次进入中国，对于广大希望兼顾性能与实用性的汽车爱好者来说，是最大的福音。奥迪 RS 6 Avant 不仅在旅行车外观上增加多处充满了奥迪 RS 元素的动感设计，也完美融合了 RS 车型的极致运动性能，与奥迪 RS 7 Sportback Performance 一致地搭载了 4.0 TFSI 发动机，可持续输出 412 千瓦（560 马力）的最大功率，可迸发 700 牛·米的峰值扭矩，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3.9 秒。在极致性能与动感设计之余，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具有创新性的奥迪气缸按需运行技术（COD）、高效的 8 速 Tiptronic 变速箱等前瞻技术，更是为奥迪 RS 6 Avant 打造了精准驾控感受以及高效的燃油经济性，而其超过 30 种的个性化装备，更为车主打造独具个人特征的神车提供了多类型的选择。

Audi Sport 作为奥迪品牌下的高端子品牌，有着独自的璀璨光芒。它不仅传承了奥迪百年运动基因，诠释了奥迪所主张的现代尊贵的运动精神，它还囊括奥迪官方赛事、用户竞技、高性能车型以及赛事周边衍生四大部分。而本次三款全新高性能车型的国内首次体验将更进一步、更具象地诠释 Audi Sport 的品牌内涵。

“生个孩子，我们一起去里约好吗？”

文 张斌

7 月 1 日，美国奥运会选拔赛上，菲尔普斯在 200 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后与怀抱两个月大儿子的未婚妻开心庆祝

第 19 块金牌，如约而至，菲尔普斯游得仿佛欢快的鱼，幸福感荡漾。未婚妻和 4 个月大的儿子想必就在看台上，人生何其美哉，16 年奥运生涯眼看游至终点，菲尔普斯就要上岸，过他的美丽人生了。

温情时刻 2 个月前曾在游泳池边上演过，美国奥运游泳选拔赛，菲尔普斯戴着大耳机，沉浸在自己的播放列表中，手机的振动无从察觉。未婚妻尼克尔怀抱着 2 个月的儿子鲍默尔来看菲尔普斯通向里约之路上关键几次的碧波斩浪，她急切拍下母子看台相拥的一幕，手机发送给准备跃入池中的菲尔普斯，这温情时刻两人都等了很久很久。

菲尔普斯的教练鲍曼伴随徒弟多年，目睹了甘苦与起伏，谈起爱徒的当下，他感慨不少：“他如今脚踏实地，日子甜美，游泳不再是人生的全部。”2013 年 9 月，鲍曼将一份里约奥运会备战计划书摆在菲尔普斯面前，上面标注着“倒计时 1068 天”。第二年，酒驾被捕，在戒酒康复中心里，菲尔普斯挨过了 6 周。不经意间，菲尔普斯此后的个人生活开始出现转机，去年他与冷落多年的父亲修好，继而又向未婚妻求婚成功，许诺在里约奥运会后结婚，度过一个悠长奢华的蜜月。

去年秋天，尼克尔怀孕，菲尔普斯惊喜若狂。与父亲宽解，自己又荣升人父，在未婚妻的眼中这么多年始终处于愤怒状态的菲尔普斯变得安宁多了。2007 年，菲尔普斯与尼克尔相识，在离婚家庭长大的共同经历，让他们更容易体谅对方。热恋一年后，菲尔普斯在北京冲击八金奇迹，尼克尔居然没有在水立方全程陪伴，她选择留在国内，不给心上人增添一丝麻烦。

2009 年，从南加州大学毕业的尼克尔荣膺加州小姐称号，这对恋人自然因此平添了不少纷扰，日子磕磕绊绊。伦敦奥运会前，菲尔普斯根本无法专注备战，感情纷扰让他消耗太大，好在最终从伦敦带回了 6 块奖牌。相爱多年，尼克尔最了解菲尔普斯，“他长时间生活在茧之中，当要达成更高水准，他却无力成为更成熟的人，他需要尽快成熟起来”。

2013 年，菲尔普斯重回泳池，他希望可以尽快找回分手的尼克尔。一年的时间，尼克尔都是冰冷一块，并与新男友开始约会了。菲尔普斯攥着手机思虑再三，发出了一条短信——“生个孩子，我们一起去里约好吗？”尼克尔用沉默对抗着，但这句话像种子播撒在内心中，总有花开时节。耐心和痴情最终唤回了尼克尔，为此菲尔普斯感慨再三，他说：“这几年的旅程很有趣，让我成为如今的我。”

相爱容易相处难，大明星也难逃常理，但尼克尔却能用幽默来化解两人之间的摩擦和不和谐。鲍曼教练对尼克尔评价甚高：“她对于他绝对是完美的，在她的世界里，绝对自信。很独立，她不需要他的钱。”但作为巨星的另外一半，还是会有煎熬袭来，尼克尔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发了一张怀孕照片，分享自己的幸福，没想会收到大量莫名其妙的恶语诅咒，盼着她早早流产。尼克尔比菲尔普斯想象得勇敢很多，她不仅看了那些邪恶的语言，而且逐一将其删掉，安心过自己的日子。

在菲尔普斯历经吸食大麻和酒驾两大挫折时，尼克尔始终坚定站在其背后，给予了全力呵护。接受求婚后，两人的日子更趋稳定、甜美，菲尔普斯感念尼克尔给予他的甜蜜日子，此前他不可想象人与人之间竟然可以如此紧密。有了亲情抚慰，菲尔普斯成熟多了，开天辟地接连被票选为美国游泳队队长和奥运旗手，领得无数赞誉与致敬。幸福是最大的动力，爱人、儿子和里约，菲尔普斯此时无敌。

第四条“红线”才是“实线”

文/宋晓军

2016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国内媒体针对韩国公开挑战中国设置的“红线”坚持在本土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展开了一轮强大的舆论攻势。鉴于其间我在CCTV新闻频道就此话题做了四次评论，一些成天守着电视机年龄较大的朋友见面就要与我讨论中国的安全形势。他们的疑问大致是，先是钓鱼岛、接着是南海、现在又是韩国，怎么频繁有邻国在美国的纵容下接二连三地触碰中国的主权和安全“红线”呢？对此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回答：第四条“红线”才是“实线”。

在说第四条“红线”之前，不妨借助美国知名外交学者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一书中的一段论述：“国家结成同盟是为了制衡威胁。而威胁是权力、临近性、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因素中任何一种增加了，其他国家就可能把具备这些特点的国家视为一种威胁，并开始寻找保护自己的某种形式。”按照这段论述中的逻辑，这几年来美国无疑是在利用中国崛起过程中权力和进攻能力因素大幅度增加的客观现实，在不断炒作和渲染中国的“侵略意图”因素也必然是同步增加的这一概念，其目的无疑是要诱使一些与中国有领土和海域争端的国家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制衡联盟”。而中国在钓鱼岛、南海和韩国设立的三条“红线”，恰恰也是对美国此举做出的一种被迫反应。也就是说，这三条“红线”都是美国在中国周边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一种逻辑上的结果。

3月12日，韩美两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名为“双龙”的联合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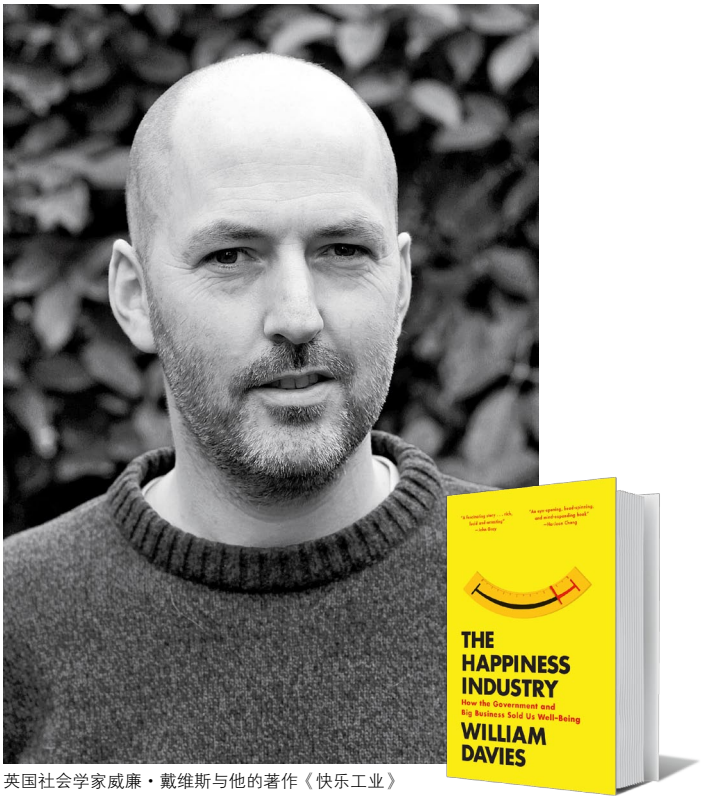
那么中国在设立了这三条“红线”后会不会轻易使用不断增加的权力和进攻能力呢？可以注意到，虽然中国通过频繁的军事演练加大了展示进攻能力的幅度和强度，但在使用不断增加的权力、特别是经济制裁权力时，却表现出了十分的谨慎。这表明，中国对美国试图构建“制衡联盟”的意图是很清楚的。说到这还必须提到，在2016年中国启动并实施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的“强化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体制建设”一节里，几乎囊括了所有美国试图诱使构建对华“制衡联盟”的国家和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美国以“中国军事威胁”为借口试图诱使一些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国家构建“制衡联盟”的设想，未必会顺利成形。这不仅仅在于中国在大幅度地展示了进攻能力的同时，面对一些国家的“踩线”行为在使用权力上的克制，而且还在于美国并未为这个“制衡联盟”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以替代中国“十三五规划”中所能提供的共同经济利益纽带。事实上，这也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触碰上述三条“红线”时表现出有些首鼠两端的真正原因。

最后我想说一下第四条“红线”——即中国大陆为台湾地区设立的“红线”。我之所以说这条“红线”才是“实线”，是因为中国最近设立的三条“红线”，其实都是为了夯实早前为台湾地区而设置的第四条“红线”。在奥巴马刚上任一个月后的2009年2月，兰德公司在一份题为《均势问题：大陆与台湾争端的政治背景与军事形势》报告中建议：美国及其盟友必须继续追求一种既遏制大陆军事力量同时又在政治、经济和人类关系网络中使北京参与并限制北京使用军事力量的战略，也许这一战略将使北京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成为一种时代错误。换句话说，该建议就是让美国通过在中国大陆周边建立“制衡联盟”的方式，来对冲甚至削弱不断增强的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压力。

你不可以不快乐

主笔 薛巍

英国社会学家威廉·戴维斯说，一些公司开始注重员工的幸福度，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英国社会学家威廉·戴维斯与他的著作《快乐工业》

快乐崇拜

一首新的神曲中唱道："感觉身体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其实老板们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英国社会学家威廉•戴维斯在《快乐工业》一书中说："对资本主义最大的威胁要是缺乏热情或活力呢？当代资本主义面对的也许不是暴力或明确的拒绝，而是工人的厌倦。没有工人一定程度的献身，生意就会遇到问题。近年来，这种担心已经吸引了经理和政策制定者们的想象力。"

他介绍说，盖洛普的研究发现，全球劳动力中只有13%的人上班时足够卖力，在北美和欧洲却有大约20%的员工"积极地闲散"。闲散表现为旷工、生病或只出勤不干活。加拿大一项研究提出，四分之一以上的旷工是由于筋疲力尽，而非生病。如今私人管理者不再需要跟工会谈判，但他们面对着一个更加麻烦的挑战，就是处理员工们缺乏动力以及持续的、轻度的精神健康问题。抵制工作不再表现为有组织的声音或直接的拒绝，而是表现为缺乏兴趣和慢性的健康问题。

结果"快乐"这一概念从私人领域转移到了公共领域。威廉·戴维斯说，越来越多的公司任命了首席幸福官，谷歌有人专门负责调动员工的情绪。两年前，英国航空试验了一种幸福毛毯，当乘客变得更放松时，毛毯的颜色会从红色变成蓝色，让乘务员可以看到乘客满意度的水平。

TED上有许多关于如何变得快乐的演说，如"想要更快乐吗？活在当下""东西越少越快乐"。全球幸福研究院院长尼尔·帕斯理查的演说《美妙生活的三个秘诀》已经被观看了260多万次。还有许多可以下载到手机上的情绪追踪应用，如"快乐生活""更快乐""快乐化"，每一个都承诺它们将使用积极心理学和专注技术帮助人们击退负面情绪，还说86%的客户在使用两个月后变得更快乐了。

快乐确实对工作很有利。一个快乐的工人的工作效率会高12%。所以关于人类情绪的科学是增长最快的操作型知识。快乐科学的先驱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对于致力于把快乐最大化的机构来说，测量快乐是一个难题。边沁提出了两种克服这一困难的办法。他认为快乐是一种复杂的愉悦的感受，他提出也许可以通过测量心率来把快乐量化。或者用金钱当作测量的标准：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售价相同，那就可以假设它们能够带来相同数量的愉悦。边沁更喜欢后一种方法。

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理查德·莱亚德说："快乐是终极目标，因为它是自明的善。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快乐很重要，我们给不出进一步的外在理由。

它就是显然很重要。”莱亚德这种观点代表了当代思潮中一种很有影响的潮流。这种观点认为，快乐或者满足感是每个人都想要的。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它，对此积极心理学能够给出方法。有了这种科学，政府就可以用以前做不到的方式来确保社会的幸福。

约翰·格雷说：“这是一种惊人粗糙的、头脑简单的思维方式。这么想的人不知道各种探索和质疑快乐的意义与价值的哲学著作。他们就像发明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边沁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自我实现，斯多葛派使幸福从属于义务，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努力协调对幸福的追求与其他价值，而在边沁看来，这些都是形而上的或者是虚构的。积极心理学的倡导者追随现代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大部分伦理思考都已经过时或者无关紧要。”

快乐的社会维度

英国左翼哲学家特里·伊格尔顿在评论戴维斯这本书时写道：“无疑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快乐。唯一的问题是，快乐由什么组成，对于这一问题道德思想家们从未达成一致，可能永远也不会达成一致。快乐是纯粹的主观感受，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测量？你可以毫无觉察地快乐着吗？你只有在没有觉察的情况下才能快乐吗？会不会有人非常悲惨却相信自己处于狂喜之中？在营销研究人员和为公司服务的心理学家们看来，幸福就是感觉良好。但不公正和剥削的受害人不可能真的幸福，这是幸福技术专家们忽视的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谈及幸福的科学时，称之为政治学。”

伊格尔顿认为，用心理学来解释工人们的不快乐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这一问题社会原因的注意。2008 年经济危机之后，就有一些心理学家说，问题不在银行而在大脑。华尔街是受到了错误的神经化学物质的影响。交易员的睾丸素太高了。根据对交易员的脑部扫描开发的药物能够改善他们的决策。“在后资本主义的自恋世界，重要的不是你想什么、做什么，而是你感觉如何。而且人的感觉是无法争辩的，这样就很便利地隔绝了所有的辩论。人们四处走动时不停地自我监测，用应用程序跟踪他们的情绪变化。资本主义老式的残忍的、专横的自我让位给了更加温柔的自我沉迷的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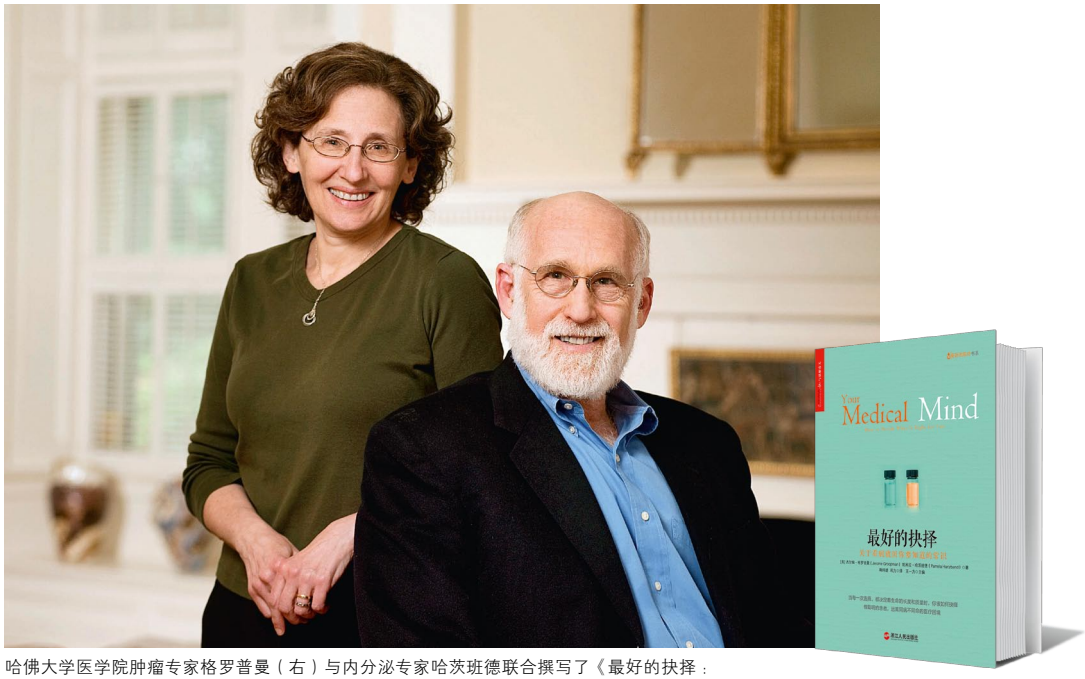
他说，戴维斯认识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把对它的批判包括进来了。这一体系过去怀疑的东西如感情、友谊、创造性、道德责任，现在都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而被笼络过去了。一位评论人士甚至提出免费发放商品，以便拉近与顾客的关系。有些雇主把涨工资当作送给员工的礼物，希望引发他们的感激之情，从而更努力地工作。好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工具化的。但幸福的意义在于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获得权力、财富和地位的手段。对于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和黑格尔的伦理思想传统来说，人的自我实现源于道德实践，这完全是为了它自身的缘故。伦理学回答的是如何才能幸福。至于为什么要幸福，这不是它能解答的。

这一伦理传统还拒绝把幸福跟它的物质环境分开。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全面发展。幸福跟我们的活动密切相关，它不是一种私人的精神状态。我们是实践主体，不是行走的意识状态。一位经常被暴打的奴隶也许会说他很满足，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不知道别样的境况。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不是完全主观的事态。有人也许以为自己很幸福，但其实那只是自我欺骗。

戴维斯说，不应该把个人的成长当作一种功利主义的目标。迪拜发誓要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城市，还想出了无比精细的方式来收集幸福数据，有人提议用监控系统监视公共场所人们的面部表情。随着科学日益精密，幸福指标以前被当作社会改革的基础，挑战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沉迷，现在却被用作改变或者规训个人的基础。幸福成了个人的事业，每个人都要为之努力，就像去健身。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抑郁被视为一种认知或者神经上的缺陷，而不是环境造成的。这让人觉得感受自己的感受成了每个人的责任，事情不对时就觉得自己失败了。认为人们每天都应该特别快乐，这会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病态。我们不能悲伤，不能心碎，也不能失望，不可以情绪低迷。

如何做一名聪明的病人

文 薄三郎



哈佛大学医学院肿瘤专家格罗普曼（右）与内分泌专家哈茨班德联合撰写了《最好的抉择：关于看病就医你要知道的常识》

当身体罹患某种疾病时，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治疗手段。在求医问诊的过程里，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决策过程，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干扰？乍看之下，我们坐拥网络，信息触手可及。即便是将自己的医疗问题发到朋友圈，分分钟内就会有许多人给你支招。仔细一想，做决定并不容易，选择项也往往不够明确。是呀，就像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曾说过的那样：“我们面对无尽的信息，却依然渴求智慧。”

如果从数据来看，这世界上有 1.3 万个疾病诊断名称、6000 余种药物、4000 多种手术操作。对具体的某种疾病而言，什么时候应该治疗和应该怎样治疗，选择药物治疗还是开刀手术，现在的医生很难给予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每一种医疗行为的背后，都有自己的益处和风险。对每个人而言，想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最好的抉择：关于看病就医你要知道的常识》一书里，来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两位教授——肿瘤专家杰尔姆·格罗普曼和内分泌专家帕米拉·哈茨班德，就用高胆固醇、甲亢、乳腺癌、肝癌等 16 位病人亲历的医疗故事，从医学、心理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角度，分析比较了不同病人在面对医疗问题时的抉择。更重要的是，抉择背后的决策过程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这本书提到了一个重要却常被忽略的概念，那就是健康素养。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技能，是指个体获取、理解和处理基本的健康信息或服务，并依此做出健康决策来维持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健康素养的形成并不简单，它涉及到多种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与个体成长的经历和故事密切相关。

我们从家人朋友同事的经验中学习，接触书刊报章和网络。我们设想，当自身遭遇类似情况时，那些曾对我们施加过的强烈影响会形成“易得性偏差”。换言之，它会塑造我们自身处理事务的风格。恰如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所言：“每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都是他对世人展现自己的生存模式、能力和独特风格的表演。也就是说：人的行为，

始终来自人对自己和对世界的看法。”

以流行性感冒这种传染性疾病为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高风险病人每年应接受流感疫苗的注射。遗憾的是，通常只有 35% ～ 45% 的成年人会选择注射。有研究发现，当人们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他们只会想到注射疫苗的潜在副作用。即便发生率很低，且副作用轻微，很多人依然拒绝注射，哪怕今后有可能患上流感，并因此导致严重的肺炎甚至死亡等。这就涉及到认知心理学领域的“忽略偏差”。它的大意是，有些人不去主动地进行治疗，生怕自己的治疗无效或失败，尤其是出现副作用的话，就会悔不当初。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后悔，从而主动回避治疗和干预。

两位作者是一对夫妻，他们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一场演讲里，假设了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位病人发现自己的甲状腺里有结节时，她接受了三次活检。可活检结果并没有确定结节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此时的她询问医生：“我该怎么办？”尽管两人都是医学专家，此时的医疗决策却完全不同。哈茨班德选择的是继续随访并观察，她的丈夫格罗普曼则会立即手术。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两人在书中《相信现代医学还是怀疑它的可靠性》一章里，就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格罗普曼是现代医学的笃信者，他年轻时对人体生物学感兴趣，希望“像真正的侦探那样追踪威胁病人生命的隐形杀手”，他目睹了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而迅速离世的过程，他相信：“如果父亲当时得到了正确的治疗，他很可能就不会死。”他对现代医学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肿瘤领域各式的新疗法也坚定了他的态度。

哈茨班德则与之相反。她的父亲对现代医学充满了怀疑，认为医生有时也会犯错。对于疾病的治疗，她并不认为多多益善。她说:“对于我自己的健康来说，我的理念是治疗应该越少越好……不管是对我自己还是我的病人，我都担心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担心各种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副作用。”

我也是一名医生，我不得不承认，医学并不是一门确定性的科学，它存在着模糊和灰色地带，没有泾渭分明的非黑即白。医学涉及医生和病人微妙并且私人的决定，没有标准万能的通用模式。这个世界上也没有重样的病人，他们具有不同的脾气性格、见解主见和医疗诉求，在医患双方共同参与的决策过程中，便会使治疗方案有所不同。对病人而言，他们熟知自己的身体、人生价值和经济情况。他们所想的，并非只是疾病本身。对医生而言：“跟病人打交道就像是走钢丝，为了缓解他们的焦虑和担忧，就必须说一些安慰和保证的话，但是这些保证都只是可能而已，并非十足确定。”

什么才是最好的治疗呢？这并非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每位医疗专家都有着不同的定义。有研究发现，病人很多时候是在医生做出诊断和推荐某种疗法的那一刻，才会形成自己的偏好。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此前可能是“一张白纸”，如果专家对某种治疗手段有自己的偏好时，他就能轻而易举地影响病人。此外，“当一个病人感到病得很重、恐惧、无助的时候，医护人员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对病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拿 Graves 病（弥漫性甲状腺肿伴功能亢进）来说吧，三分之二的美国医生认为服用放射性碘剂是最好的治疗手段，可只有 22% 的欧洲医生和 11% 的日本医生会这样选择。作者正是剥开冰冷的医疗数据，找寻到了背后的答案。

我很仔细地阅读了第八章，《怎样选择告别人生的姿态》。我曾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ICU）工作过，见识过不少令人伤感沮丧的死别时刻。中国的医护人员，很多时候将视角集中在疾病上，却往往忽视了病人身上作为“人”的那部分。在危重到涉及生死的疾病面前，人终将察觉到自己可以承受的底线在哪里。作者提出了两个心理学观点：一个叫作“聚焦主义”，大意是病人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了疾病对生活的改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生活并未“天崩地裂”；另一个叫作“缓冲效应”，也就是人们常常忽略自身能缓冲情绪痛苦的应急机制。当病人不承认现实、自圆其说、幽默开玩笑的时候，他们是借此让处于重病的自己不那么凄苦。

医疗决策的复杂性，正是两位作者撰写此书的缘由。他们对医疗行业有着极深刻的见解。他们依然在追随现代医学教育之父威廉·奥斯勒爵士的精神衣钵，认为在努力完成一个复杂的医学诊断或治疗前，都应该仔细地倾听病人，只有病人才能告诉我们答案在何方。

书中那些真实精彩、扣人心弦的病人故事，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真实世界的医疗决策。或许，这本书并没有提供具体疾病情境的答案，更多的是对当前医疗界的理性观察和思考。对普罗大众来说，求医问诊的心理学奥秘就在其中。它能破解我们对医生、医院和医疗的迷思和误解，能看到医学的不确定性和两难境地，也能帮助我们更聪明正确地应对未来的疾病难题。

谢默斯·希尼，在诺奖后……

记者 孙若茜

你完美地保留了自我就像河水
如威尔士的杰拉德所说冲入阿克洛港湾
甚至在涨潮只可能有咸水的时候。

——《旁注诗》第十节，是诗人谢默斯·希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写的第一首诗。

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

这首诗收录在他2001年出版的诗集《电灯光》中。译者、诗人杨铁军说："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本诗集就代表了这样一种对自我认识的更新和发展的努力，使得他保持了自我的'甘甜'，即使处身于广阔的'咸水'之中。这种对自我的清醒把握也是诗人获得深化、发展的根本。"以至于他此后写作的两本诗集，《区线与环线》和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人之链》，都还能始终保持着写作的水准和活力。

其中，2006年的《区线与环线》在出版当年就获得了英国最高诗歌奖项艾略特奖，成为希尼在诺贝尔奖之后的写作中最受关注的一部。彼时，诺奖已经过去，希尼的国外旅行义务有所减轻，回归到了原有的生活中。在曾经的一次访谈中希尼说道："《区线与环线》是和一段一心扑向诗歌的日子联结在一起的。在格兰摩尔农舍更专注，更孤单，更投入在写作中。对于材料，总是有不同的触发与耦合方式。对于我，就是要被一种唤醒机制惊醒——一个主题，一段记忆，一个意象，一个词，甚至一张照片。"

他以诗集的第一首《芜菁切碎机》为例："写一种把芜菁轧碎、切片的机器——是献给艺术家休伊·奥多诺的。在一个艺术展览编目中，他把一张这种机器被一堆甜菜根环绕的旧照片收入了进去。在我看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刻，我感觉到了那铸铁，那抓地的姿势，那把手上的木柄。我整个被这感觉裹挟走了。"而这首写"在时间中丧失了的事物，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必然过程"的诗，几乎奠定了整部诗集的主题和基调——回忆性的，哀歌的调子。

对于从小生活的地方以及那里的人和事的回忆与描述，是希尼从第一部诗集《一位自然主义者之死》就开始书写的主题，并且贯穿于他一生的诗歌创作之中。诗集的中文译者、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诗人雷武铃说，这是希尼反复写到的内容，从他出生、成长的乡间，扩张到附近的小镇，扩张到所在的德里郡、德里市，扩张到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的六郡，然后是爱尔兰共和国的一些地方。他反复写到父母、兄弟、姑姑、妻子和其他亲戚，以及邻居、朋友，还有那块土地上的普通人。他反复写到人们在那片土地上的生产劳动：挖泥炭、种土豆、捕鱼、牵牛配种、打铁、烤面包、砌筑房子、洗衣服、修房顶，等等。这些劳动维持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需求的各个方面。

在对这些内容的书写中，希尼都是从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情和具体的地方写起。"因而他笔下的这个世界是活生生的，不是书面的、抽象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而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界，有着乡村生活中的各种行业，三教九流。主要是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写得非常朴素真实。"这些诗之间构成呼应和回响，从各个方面，在不同的时间和事件中展示这个地方。使它不再是单一的地名，而是其中的地点、人物和事件互相关联，形成一个有历史景深和统一空间的活生生的社会，一个

真实存在的世界，由血缘亲人、邻居、同民族宗教和不同民族宗教的人们构成，紧密关联又激烈冲突的世界。“就像是一幅幅精细的人物、风景和叙事绘画，然后共同构成一幅完整的宏大的生活风俗画卷。”

雷武铃解读说，希尼作为世代农民的农村孩子，属于北爱尔兰社会受歧视的少数族群——爱尔兰天主教家庭。这种处境是由17世纪英国新教徒对爱尔兰的殖民统治造成，在爱尔兰独立时，仍留下北爱尔兰分离这一伤口。希尼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意识非常明确，他是凯尔特人，盖尔语后人，天主教徒，与学校教育中的英国文化传统不同，他们的文化传统在民间生活之中。他非常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族群的知识分子的责任，非常清楚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边缘性，自己生活的世界的边缘处境。北爱尔兰阿尔法斯特地区在英国内部也属于边缘。希尼和他同时代的诗人们非常自觉地书写本地诗歌，发掘本地文化。这些诗人甚至按照每个人的出生地，划分出各自写作的领地，深入挖掘自己的那块地方，那块地方的风景、历史、事件。因而，希尼也对本地地名，家乡土地上那些古老的盖尔语地名非常敏感，会有意和英国文学中的英语保持某种距离，使之带有地方特色，盖尔语特色。

但风格的朴素并不意味着诗歌的简单。“当诗歌内容看似简单明确的时候，诗歌语言反而要求极其复杂。”雷武铃说，这种复杂，不是繁复，而是说要满足的要求非常多、非常高。语言必须非常微妙、高效，才能揭示出简明事件中蕴含的诗意。希尼的诗歌语言非常独特，主要是描述性的，内容处于客观真实的时空之中，并非那种非常复杂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玄幻之作。他语句的突现、直接，需要后面隐藏很多前提性理解。他的诗中充满了坚实的物质名词，像是骨骼一样进行着支撑。相比那些多是比喻性、模拟性或象征性的有关精神生活的词汇，物质名词是具体确指的，非常坚实。希尼的诗也因此异常坚实。

“从来没有一个诗人如希尼那样，把平实和晦涩，两种完全对立、难以调和的美学取向融为一炉、互为表里，呈现一种有机的整体样貌。希尼的诗风格朴实，一般来说，整首诗的结构不复杂，几乎很少使用现代诗中常见的、用意义的转折或发展来结构一首诗的技巧，但却用最经济的词把看似松散的材料绷得紧紧的。”杨铁军也说，“具体到每一行诗句，往往是一些名词结构的组合，不是现代派那种名词意象的并置交错，而是一些类似句子，但却没有动词的名词结构的组合。这样的句子虽然没有动词，却不会垮塌，似乎

希尼诗集
1：《人之链》
2：《区线与环线》
3：《电灯光》

动词的力量分散到每一个楔子和结构的细缝之间了，透着一股子生气。细分到每一个词，都有沉甸甸的着力，但并不是笨重的大长词，而是短小精悍的短词，既经济又饱满，每个字母摊的力道更多了，而不是更被分薄了。”

希尼身处殖民统治的遗患之中，因此一直面临作为一个诗人与现实政治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西方，对希尼的指责往往集中在他不愿意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站队、明确表态，中国诗人在中国往往也会面临类似的指责；但中国对希尼的接受却一直把他归类为那类对社会、政治有积极担当的诗人。”杨铁军说，“这个判断我虽然认为是对的，但是我更认为它的遮蔽性大于阐释性。希尼自己在不同的访谈中也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认为自己是诗人，承担诗人的责任，而不是政治宣传家。”《区线与环线》这本诗集的另一部分内容，就是一些与当代世界现实中最严峻的政治问题相关的诗，如“9·11”事件之后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和伦敦地铁爆炸案有关的《区线与环线》，和中东冲突相关的《镜头外》，关于环保的《春天和托兰人》《莫玉拉》和《霍芬》等等。

除此之外，诗集中哀歌的调子还因诗人写到葬礼，写到死去的人，亲人或逝去的诗人，他用诗歌向他们致敬：塞菲里斯、米沃什、泰德·休斯、T.S. 艾略特、华兹华斯及其妹妹多罗西、奥登、聂鲁达、爱德华·托马斯……《给冥间的塞菲里斯》《华兹华斯的滑冰鞋》《爱德华·托马斯自在拉甘斯路上》《船尾》《在此世界之外》《在塔姆拉夫达夫向巴勃罗·聂鲁达致敬》《家中之火》等等。雷武铃说：“他似乎意识到自己也要置身在他们中间了，这些诗有一种拉长的时间、世代相传、生死绵延的感觉。”

韩少功：仍有人仰望星空（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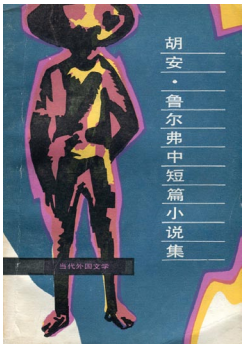
文 朱伟

韩少功是少有的极有自己定势的作家。《西望茅草地》扩展影响后，1981 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他在“后记”里坦诚说道，其创作是“现实主义”或称“批判现实主义”的，“而那些非现实主义的现代派作品，我看得不多，看了也记不太牢”。他说：“我动笔时往往更多地想到庄重质朴的托尔斯泰和鲁迅，而不是奇诡凄迷的加缪、萨特、卡夫卡。”当大家都在比对西方各种流派的认知，唯恐意识落后时，他是坚定不移的现实主义者，这也是王朝垠特别赏识他的前提。“湘军”，从叶蔚林、莫应丰起，似乎都是循着俄苏文学、现实主义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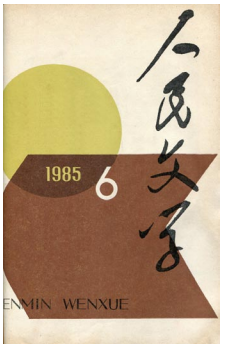
韩少功从这本小说集后走向他的第二个台阶，1981 年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风吹唢呐声》，此时的他作为知青，已是对农民——我们这个民族主体——做深入体察，自己之情感起伏，都寄托在这体察中。《风吹唢呐声》中的主角是一个憨厚、善良、不知吃亏的哑巴，与哑巴对比的是号称“百里能手”的他的哥哥。这是一篇悲伤的小说，因为哑巴的善良不过是村民们的消费品。哑巴也有欲望，他把嫂子当作美好的象征。最终，改革开放，哥哥发迹了，有了新相好，不再关心嫂子的死活。他打了哥哥，被哥哥扫地出门，嫂子离婚回家了。嫂子回家时，他避开了送别。再后来，他一失脚，轻易就死了。死后人们想起他，才叹一口气，说他是好人，而他哥哥的生意却越做越大。善报是卑微被埋没的人生，恶报却是光宗耀祖的成功，弱肉强食本就是这样进化的。这篇小说写完，他似乎有一段迷惘期，直到走向《爸爸爸》。

《爸爸爸》发表于 1985 年第六期《人民文学》，先有发表在《作家》上的《文学的根》，后有《爸爸爸》，也就是说，《爸爸爸》是《文学的根》之作为。《文学的根》谈到贾平凹的商州与秦汉文化的关系，李杭育的葛川江与吴越文化的关系，也感慨“浩荡深广的楚文化源流，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中断干涸的呢”，肯定“文学根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韩少功写过一篇《杭州会议前后》的文章，不认同 1984 年底的杭州会议是“寻根文学”的开端。但客观说，正是他与郑万隆、李杭育几乎同时在这次会议后发表的有关“根”的文章，导致了“寻根派”的命名，而“寻根派”的代表性作品，就是《爸爸爸》。

《爸爸爸》在韩少功的小说中其实冗赘不好读。



拉美文学最早让大家惊叹的是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0 年出版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最有名的中篇是《佩德罗·巴拉莫》



《爸爸爸》发表在《人民文学》1985 年第 6 期，因为调子的原因排在后面。这一期还发表了湖南作家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它用象征的写法，写几个典型形象：核心是一个只会说:“爸爸爸”“× 妈妈”的侏儒，亲切时喊“爸爸爸”，愤怒时喊“× 妈妈”。一个生下这侏儒，男人不知在何方，经常跺脚咒人，同样丑陋的他母亲；还有一个因欺负侏儒，遭他妈咒骂，“打着打着就搂到一起去”的，下山后再上山就开始预言“就要开始了”的汉子。这汉子的父亲是个知书识礼的裁缝。这几个象征性人物，在鲁迅笔下似曾相识。山寨不知是从哪个遥远的地方来的，山寨发生的事件也都是象征性的：祭神，械斗，殉道，迁徙，最终留下、传承下去的是那侏儒的“爸爸爸”。

在 1985 年当时的语境中，说实在的我并不喜欢这篇小说，这是因为 1985 年我尚未接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但我也参与了对韩少功的赞赏，赞赏的是少功的“寻根”以这篇小说轻易就超越了贾平凹的秦汉、李杭育的吴越，更不必说还在津津乐道于山林传奇的郑万隆了。因为他寻到了国民性——向上谄媚“爸爸爸”，向下猥亵“× 妈妈”，“爸爸爸”与“× 妈妈”构成母系传承，成了基因。说实在的我是在 1986 年后半年感悟到“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后，才意识到韩少功 1985 年集中推出的《爸爸爸》与《蓝盖子》《归去来》之了不起的。莫言之后，1986 年下半年，一批作家都开始以这种象征的方法写作了：北村、姚霏、孙甘露……

也许是巧合，韩少功是 1985 年第六期同时在《人民文学》发《爸爸爸》、在《上海文学》发《蓝盖子》

与《归去来》，形成了集束效应。了不起的是风格迥异的三篇几乎同时写成。在当时，我喜欢《归去来》与《蓝盖子》胜于《爸爸爸》。《归去来》是似曾相识的回归？是“觉今是而昨非”？它似乎写一个知青的回乡，好处是似是而非的认识错位中有温暖的亲切，之后有隐含的辛酸，借陶渊明逆向写了“我曾经在这里生活”，而所有曾经的生活都浓缩在一连串错位的“我是谁”追问中。而《蓝盖子》，那个曾经的苦役犯以背死人、埋死人躲避苦役的经历只是表象，铺垫着找盖子这个怪病，找盖子的隐喻才是重要的，它指向心灵痉挛。

我是回头梳理，才意识到韩少功这三篇小说构成了1985年的文学转折。如果说，韩少功通过“寻根”寻到了楚文化，那应是从楚辞中寻到了一种能使自己飞翾凌高、负其奇迈、表达历史现实审视的手段。这个“根”，是贾平凹从秦汉、李杭育从吴越中都未能意识到的。难得的是，韩少功从楚辞中找到的桥梁，巧合了拉美的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加西亚·马尔克斯198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就变成时髦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就出版了由赵德明等翻译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当时最时髦的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而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韩少功将“批判现实主义”与楚辞的源流接电，就跳过西方的“存在主义”，与“魔幻现实主义”殊途同归了。这逻辑其实是对的——怎么能续上楚文化的脉呢？寻根的结果一定是魔幻的荒诞啊。

《女女女》发表在1986年第六期《人民文学》上，比《爸爸爸》有故事性。起先，那个幺姑（小姑）是善解人意、牺牲自己去温暖别人的，洗澡意外中风后，换成了另一个人，好像要将先前付出的恩，都一点点索讨回来。我理解韩少功是要写所谓善恶之间的距离——失去了理智，原有的善就变成恶。这个幺姑中风之后的存在目的，就为打碎一切她存于亲人记忆中的美好，抹杀感情，消灭应有的同情。如果说《爸爸爸》要讨论国民性，《女女女》就要讨论人性——没有了理智，丧失了感情，人就变成动物，彼此残酷就变成本能了。幺姑最后被关在笼子里，被孩子们戏弄，应该说是由韩少功引发了后来莫言、余华写残酷的乐趣。我一直思索《女女女》的标题应何解，反思人为什么残酷？反思女娲造人，人依存之残酷？

这篇小说最后写幺姑死后地震，无数老鼠形成汹涌澎湃鼠瀑鼠流，招魂师的歌唱如楚辞，内容“两眼变兮日和月，牙齿变兮金银”，是唱盘古开天地的。而这篇小说最后结尾，我的“豁然彻悟”，是懂了“吃了饭就洗碗，生活就是这样”，这是讲生命代代相传，善恶的因果吗？最后他用到了一个“嬃”字，嬃就是女，楚人称姐为嬃。屈原的《离骚》中：“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婵媛是情思牵绕，申申是反复不休，詈是责备。（待续）

《读书》2016年第八期目录

卜　键　污卮
陈家琪　小议“伪善”
亓同惠　道德的本源与终局
刘　东　“大空间”与“小空间”
何　磊　城市、养生与当代
王　珅　从“日本风”到“中国热”

短长书
从人艺停演话剧《潘金莲》谈起（李春梅）·“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刘荣兴）·日本海外神社的反宗教本质（石晨曦）·“吾不如”之论（刘涛）

陈　慧　正视美国左翼文学的复杂性
晋　军　结构的力量：“泰坦尼克号”上的生与死
曹卫东　爱就是要走出无家可归的状态
张　治　钱锺书眼中的薄伽丘及后继者
谢一峰　拼贴与“杂拌儿”

品书录
理学研究的新突破（李伯重）·裂变时代的痛苦心灵（刘俊峰）·日本的核电劳工（陈卫平）·美的文化政治实践（张华）

聂智琪　代表性危机与民主的未来
方　旭　真理的复仇
蒋原伦　奥尔巴赫与西方叙事传统
孙来臣　《战争哀歌》：越战老兵无法愈合的心灵创痛
金　雯　金宇澄的谜语人物：负情感试论
刘大先　“裸命”归去来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读书》邮购部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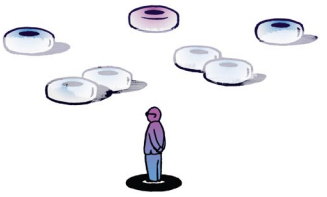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我月圆时就会变成狼人乱咬人。
我该怎么办？
记得去打狂犬病预防针。
我也许该看的是兽医科而不是精神科……
我常常觉得所有的人都想宰了我。
你别胡思乱想了。
是真的，我遇见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我……
你再胡思乱想，小心我宰了你！
我是神经病。
我也是神经病。
我是没有神经病却觉得自己有神经病。
我是有神经病却觉得自己没有神经病。
不知我们两个人哪一个比较有病。
呼……只有到你这里来才觉得安全……
又在胡思乱想了。
世上分有病的人和没病的人。
而我的工作就是区分出你是属于哪一种。
区分的方法很简单。
抽钱，双号有病，单号没病。
这医生最有病。

江湖中人

文 李荣枝（东莞） 图 陈曦



这天，学校安排一位应聘老师到我们班试讲数学课。校长邀请D老师一同作评委，听完课，D老师打59分。

D老师挺牛的，但他有牛的资本。据说他是某协会理事，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一周，我们问他去哪了，他说去了上海开研讨会。国庆放长假，我们问他将干什么，他说待在家里做研究、写论文。我们问他问题，他只要看一眼，就能十分畅快地写出演算过程。他不仅深谙数学，而且深谙古诗词。他很少自夸。唯独有一次，某同学不听话，他说了一句："我教你，你三生有幸。"话语里透露出他有不凡的一面。

D老师说过，自己是出来走江湖的。教我们时，他最小的儿子已经研究生毕业。他一把年纪，本应该弄孙为乐，颐养天年，但他偏偏不安分，推着行李，到处施教。他的老朋友问他去了哪里时，他开玩笑地说："流浪。"他的精力很旺盛，为流浪提供了良好的身体保障。天刚亮，我们还赖在床上，他就起来晨练，一年365天从未中断。晨练时，他听到生活老师敲门叫我们起床，特意在课上批评我们慵懒。走江湖也好，流浪也好，反正要潇洒，不要羁绊，他不会顾念太多遇见的人与事。我们学校只是他走江湖的一站，他迟早要走的，更何况我们学校容纳不下他远大的理想。高一下学期，很多老师陆续离职，我们问他会不会走，他笑着说："不知道。"不久，他就走了。他应该早有计划。

D老师第一次讲课，就告诉我们：他有两丑——话丑、字丑。他的普通话有很浓的乡音，不标准，像"初"读成"搓"，"梓"读成"辛"，"汝"读成"尔"，不胜枚举。他的语速很快，如他所说，像放鞭炮一样，说了一大堆，两块黑板就写满了。他自己擦也麻烦，因此，他希望黑板装上一个按钮，一按即抹掉粉笔字，并扬言谁有此项发明，一定发大财。由于他说得太快，基础差的我乃至很多同学跟不上，以致他每演算一步，问我们懂不懂，有女生大声地说"不懂"。他的字其实不丑，只是比较潦草，他自夸其草书是艺术。艺术不艺术，我不知道，反正看得明白即可。话丑一点，字潦草一点，区区小事，无伤大雅之堂，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过硬的数学本领，足以压倒两项丑陋，亦难抑我们对他的崇拜。

高中数学很难，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常不会做作业，D老师是心知肚明的。他常在我们的作业本里写这样的话："听我讲。"D老师常对我们说，放弃了数学等于放弃了你的生命。他无疑在向我们强调数学的重要性，但没有举例子，说法太抽象了。学生乃至老师都生活在那个制度下，根本不懂或者不愿懂数学精神，我们只需要知道怎么解题即可。D老师教了我一年，其间我们没有交流过。我一直以为他不知道我的名字，直至他喊出我的名字，我才知道自己错了。他说我与他的一个当了县长的学生同名，我感到很荣幸，可惜我们走的不是同一条道路。对于走江湖的人，每个地方都是一个驿站而已，我们只是他的过客，他也是我们的过客，我们连淡水之交也算不上，所以用不着道别。他曾经向我们提起S君。S君是一个被劝退的同学，他一直对此既愤怒又遗憾。愤怒，是因为S君屡教不改，还常顶撞他；遗憾，是因为S君有读书的头脑，但心不在读书，虚度了年华。作为一个老师，D老师当然希望自己的学生好，但他终究是一个指引者，S君要走隘路，他也没辙。被劝退后，S君寻求中专学校接收无果，便到处找工作，提早步入社会。D老师早已一把年纪，如今应该白头苍苍，收山了。落叶归根，回归家庭，也许是他现在走的道路。走江湖的日子要画上句号，他已经桃李满天下，又有了炫耀的资本。但是，他的回忆肯定没有我的影子。因为，我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学生。至于S君，他应该记忆犹新，毕竟他曾经在乎过。

| 本栏目投稿信箱 MENSULA@SINA.COM |